

·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

福安市畲族卷

撰著 龙远蔚 万 红
侯红蕊 白 滨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

民 族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福安市畲族卷
/龙远蔚等著. -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9

ISBN 7-105-03549-8

I. 中… II. 龙… III. ①少数民族-现状-中国-畲族②
少数民族-发展-调查研究-中国畲族 IV. D633.3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9938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艺辉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5 字数:262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定价:22.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64212794;发行部电话:64211734)



福安全景

福安文化馆黄俊 摄



柑橘丰收

福安文化馆黄俊 摄



闽东电机厂 福安文化馆黄俊 摄



金山茶园迎佳宾 福安文化馆黄俊 摄



省中医到畲乡义诊



畲拳
福安文化馆黄俊 摄



畲家新风采

福安文化馆黄俊 摄



闽东革命烈士纪念碑

福安文化馆黄俊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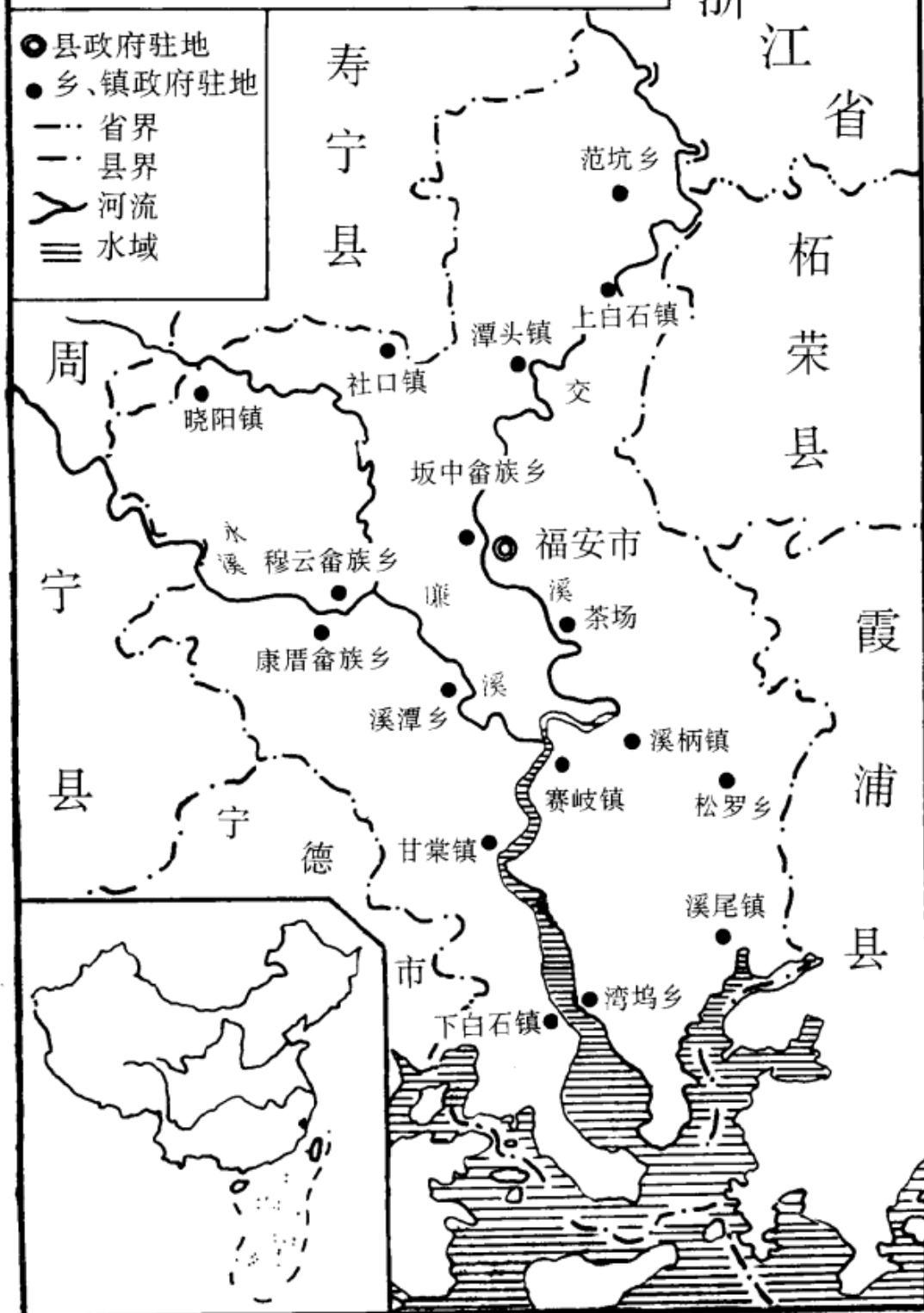
福安市民委组织了大量的人力,于1995年编纂出版了《福安畚族志》,福安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纂的《福安市志》已完成了送审稿,福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志编纂委员会编纂了《福安市人民代表大会志》,福安市教育委员会编纂了《福安市教育志》等。本书的资料来源,除我们实地调查访谈、搜集和已注明出处的以外,均由中共福安市党委、市政府的有关职能部门和市人大、市政协的常设工作机构,以及有关畚族乡党委和政府、畚族行政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提供。福安市统计局提供了各年度的统计资料。本书综合篇的某些章节,征得福安市民委和福安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同意,部分使用了1995年出版的《福安畚族志》和《福安市志》(送审稿)中1990年以前的资料。由于一些技术原因,未能在所有使用的地方一一注明出处,对此我们深表歉意。

作 者

1998年8月20日于北京

福安市行政区示意图

- 县政府驻地
- 乡、镇政府驻地
- 省界
- - - 县界
- ~ 河流
- ≡ 水域



**“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汝 信

主 任 杜荣坤

副主任 郝时远 史金波 宋家鼎
卢 勋 满都尔图(常务)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希恩 刘世哲 卢 勋

龙远蔚 史金波 李 彬

任一飞 宋家鼎 杜荣坤

杨保隆 何星亮 郝时远

满都尔图 詹承绪 戴 贤

秘 书 彭 爽

目 录

前 言	(1)
-----	-----

综 合 篇

第一章 概 况	(3)
第一节 自然条件	(3)
第二节 建置沿革	(11)
第三节 人口与计划生育	(14)
第四节 民族构成与福安畬族来源	(21)

第二章 政 治	(25)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5)
第二节 人民代表大会	(34)
第三节 人民政府	(36)
第四节 人民检察院和法院	(39)
第五节 人民政协和社会团体	(41)
第六节 民族工作和民族关系	(45)

第三章 经 济	(48)
第一节 经济发展概述	(48)
第二节 农业和农村经济	(54)
第三节 工业经济	(63)
第四节 第三产业	(68)

第四章 文 化	(76)
---------	------

第一节	文化事业	(76)
第二节	教 育	(81)
第三节	科学技术	(91)
第四节	医疗卫生	(96)
第五节	体 育	(100)
第六节	民族语言	(104)
第五章	社 会	(106)
第一节	社会结构	(106)
第二节	婚姻和家庭	(112)
第三节	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115)
第四节	社会保障	(120)
第五节	社会治安	(126)
第六节	环境保护	(128)
第七节	居民收入与生活水平	(133)

典 型 篇

第一章	坂中畚族乡调查	(141)
第一节	概 况	(141)
第二节	乡村经济	(143)
第三节	社会与文化	(156)
第二章	康厝畚族乡调查	(165)
第一节	基本情况	(165)
第二节	农业经济	(168)
第三节	乡镇企业	(176)
第四节	社会与文化	(181)

第三章 穆云畲族乡调查	(192)
第一节 资源与人口	(192)
第二节 农业经济	(195)
第三节 乡镇企业	(203)
第四节 社会与文化	(207)
第四章 凤洋村调查	(213)
第一节 基本情况	(213)
第二节 农业生产	(215)
第三节 经济结构	(219)
第四节 居民生活	(222)
第五节 社会与文化	(229)
第五章 铁湖村调查	(235)
第一节 基本情况	(235)
第二节 农业经济	(238)
第三节 非农产业	(245)
第四节 居民收入与生活	(249)
第五节 村庄基础建设	(253)
第六节 社会与文化	(256)
第六章 竹洲山村调查	(261)
第一节 革命老区	(261)
第二节 乡村经济	(262)
第三节 居民生活	(267)
第四节 社会与文化	(272)

总 序

“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

“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项目酝酿于 1990 年,1992 年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八五”规划重点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持实施。1993 年以来,课题组在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以县(旗)为单位选择了若干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少数民族调查点,开展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调查,截止到 1996 年底已完成了 12 个点的调查任务。随着调查工作广泛深入的发展,这一项目的重要意义越来越引起党和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同时,选点式的调查在全面反映我国少数民族的现状与发展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而点面结合的调查在人力、物力和财力等需求方面则绝非一个科研单位可以承担。在这种情况下,该项目于 1997 年 9 月纳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列为国家重大项目,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共同主持。

50 年代,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过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这次延续到 60 年代的调查,是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进程相适应的。它所产生的成果,为我国开展民族识别、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动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制定各项民族政策、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和各项事业、加强民族研究工作,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丰富的资料,其作用是巨大的,意义是深远的。

90年代,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在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精神鼓舞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尤其是随着我国陆路边疆外部环境的改善,少数民族地区面临着相对于东南沿海地区从对外开放的“后方”,向对外开放的“前沿”转变的契机。但是,由于发展起点总体上较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内地,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教育实现程度较低,全国的贫困人口也大多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地区在改变现状和加快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困难。少数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发展的愿望与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起来。在这种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形势下,对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进行调查研究是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开展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的基本目的,是通过客观地反映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现实成就和存在问题,深入地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如何抓住机遇、发挥优势、加快发展的思路,为党和国家有关部门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意见。同时,在50年代民族大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对少数民族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各方面深刻变化的调查研究,不仅可以记录和保存大量、丰富的民族学资料,而且可以对我国民族研究各学科的发展充实新的学术养分。我们相信,这套建立在应用研究和学术研究相结合基础上的“丛书”,对推动我国的民族工作的发展和民族研究事业的繁荣,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五大以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为主题,要求全党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在少数民族地区有着集中而突出的体现,这是我国基本

国情的重要特点之一。只有科学地认识和把握这样一种基本国情,才能够深刻领悟邓小平理论中关于在全国一盘棋的前提下,通过差别发展、各自发挥优势、先进带动后进、逐步缩小差距,实现各民族人民共同富裕的思想,才能够正确理解党和国家确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及各项政策。对我国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的统一认识和基本把握,离不开调查研究。我们党历来倡导调查研究的优良学风,因为对客观事物的调查研究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和保证。这也是这套“丛书”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是建立在调查基础上的研究课题。调查研究是一个统一体,是实现人们实事求是地认识事物、解释事物和改造事物的先决条件。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现状与发展也是一个统一体,现状即“实事”,研究发展就是“求是”。现状不仅代表着现实的基础,而且包含着发展的因素;发展不仅标志着现状的改变,而且构建着新的现实,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我们的调查研究不仅要着眼于对现状反映的实际问题进行理论思考,而且要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使我们的调查研究与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是集资料积累、学术研究和应用研究于一体的成果。“丛书”以“综合篇”、“典型篇”和“专题篇”的统一体例结构展现了各卷的同一性,同时它又以每一卷的调查研究对象所反映出的不同地区、不同经济生活、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少数民族的现状和发展体现着各自的特点。“综合篇”主要根据调查组召开的不同类型座谈会和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和档案编撰而成,力求全面地反映各调查点的基本情况;“典型篇”主要依据调查组深入农村牧区、工矿企业、文教团体和家庭实地调查的第一手资料撰著而成,力求通过若干个案剖析深化对现状与发展

的认识;“专题篇”是对当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成功经验的研究和存在问题的分析,力求从实际出发提出一些发展的对策建议。当然,现状与发展调查是一项综合程度很高的研究工作,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因此,它对学科知识的广博性、研究方法的多样性要求是显而易见的。各调查组在完成实地调查和研究工作的过程中,对此深有体会,并努力通过学习弥补自身这方面的缺憾。尽管如此,“丛书”各卷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实施本项目的过程中,各课题组在实地调查阶段始终得到地方民族工作部门和调查点党委与政府及其所属各部门、各单位、乡村、企业以及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和热情帮助,地方的有关人员也不同程度地参加了调查研究工作。这是本项目得以顺利实施和完成的基本保证。同时,这套“丛书”的面世得到了民族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对此,我们深表感谢!

“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编委会

1997年10月 北京

前 言

畲族是分布在我国大陆东南部沿海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以“大杂居、小聚居”的形式分布在福建、浙江等省。据 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我国共有畲族人口 630,378 人,其中 346,384 人分布在福建省。福安市有畲族人口 58,002 人,占全市总人口的 11.04%,分别占全国和福建省畲族人口的 9.20% 和 16.75%,是我国畲族人口最多的县级市。经征求福建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意见后,课题组选择了福安市为畲族调查点,并于 1997 年 10 月至 12 月完成了调查任务。《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福安市畲族卷》是课题组的集体研究成果。

福安市位于福建省东北部,总面积 1880.1 平方公里,其中海域面积 150.9 平方公里,山地和丘陵约占陆地面积的 86%,依山傍海,地理环境优越。改革开放以来,福安市经济获得了持续高速增长,1979 年~1996 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2.9%,其中 1991 年~1996 年的平均增长速度高达 20.7%。1996 年,全市完成国民生产总值 28.16 亿元(当年价),工农业总产值 36.9 亿元(1990 年不变价),财政收入 1.74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分别比 1978 年增长了 7.88 倍、13.52 倍和 15.92 倍。农业形成了粮食、茶叶、绿竹、水果、水产、食用菌等 8 大主导产业,1996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2232 元。工业形成了以电机电器、船舶修造为支柱,以食品加工、建筑材料、冶金铸造、医药化工、水电和包装印刷为重点的门类较为齐全的地方工业体系。其中,电机电器生产已形成一定规模,全市共有电机电器企业 200 多家,产值占市属工业产值

的40%以上,故福安市在全国有“电机电器城”之美称。到1996年底,全市共批准成立“三资”企业123家,其中台资20家,累计利用外资7255.8万美元。1995年,福安市的经济实力已居福建省63个县(含县级市)的第16位,居宁德地区10个县(市)之首。

福安畬族主要分布在山区,以“小聚居”的形式遍布全市各乡镇。全市共有3个畬族乡,畬族人口占60%以上的行政村共有78个,畬族聚居的自然村721个,分别占全市乡(镇)、行政村和自然村总数的15.79%、17.45%和34.20%。1996年,3个畬族乡的工农业总产值合计达6.46亿元,财政收入共达1035.6万元,分别为1990年的2.3倍和5倍。1990年~1996年,康厝、穆云、坂中3个畬族乡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由605元、566元、644元提高到1600元、1780元和2013元。福安畬族的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本书分3篇14章。上篇为综合篇,共5章,旨在客观反映福安市及福安畬族四十多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变化,着重反映其现状。中篇为典型调查,共6章,包括3个畬族乡的调查和比较有代表性的3个畬族村调查。下篇为3篇专题研究,分别对福安畬族乡村的经济发展、民族教育和畬族搬迁与畬族社区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课题组在福安市调查期间,得到了福建省民委、宁德地区民委、中共福安市委、福安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中共福安市委统战部、福安市民委、福安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统计局等党委和政府各职能部门,坂中畬族乡、穆云畬族乡、康厝畬族乡党委和政府,以及凤洋、东山、铁湖、竹洲山、溪塔、洋坪、和安等行政村的党支部和村委会积极地协助和配合我们的调查,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使我们顺利地完成了调查任务。在此,我们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本书是在前人已取得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此前,

专 题 篇

关于福安畬族乡村经济发展的思考.....	(281)
一、畬族乡村经济发展的基本估计	(281)
二、畬族乡村经济发展的潜力	(286)
三、迈向 21 世纪的畬族乡村经济.....	(291)
福安民族教育问题研究.....	(296)
一、福安民族教育的历史与现状	(296)
二、福安民族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300)
三、福安民族教育的发展方向与对策	(304)
福安畬族迁移与畬族社区发展.....	(308)
一、福安畬族迁移的历史及特点	(309)
二、50 年代的畬村迁移	(313)
三、80 年代的畬村迁移	(314)
四、畬族社区的贫困问题	(317)
五、90 年代“造福工程”搬迁与畬族社区发展	(322)
后 记.....	(324)

综 合 篇

第一章 概 况

福安市位于福建省东北部沿海,在北纬 $26^{\circ}41'$ ~ $27^{\circ}24'$,东经 $119^{\circ}23'$ ~ $119^{\circ}52'$ 之间。东接本省柘荣、霞浦县,西邻周宁县和宁德市,北界寿宁县和浙江省泰顺县,南临东海伸向内陆的三沙湾。全市东西宽 37 公里,南北长 80 公里,形似长瓢。面积 1880.1 平方公里,其中海域面积 150.9 平方公里。为宁德地区所辖县级市。根据 1990 年的第四次人口普查,福安市总人口 525,580 人,其中畲族 58,002 人,占全市总人口的 11.04%,是全国畲族聚居最多的县市。1996 年,全市总人口 57.6 万人,其中畲族人口约 6.3 万人。^① 福安市治古韩阳镇,处于闽东地区中心,南距省会福州 196 公里,104 国道贯穿南北,是福(州)温(州)公路的中点。

第一节 自然条件

一、地理环境

(一) 地形地貌 福安市背山临海,地貌类型复杂多样。以西部鹫峰、东部太姥和北部洞宫山脉的余脉组成地形骨架,山体大致呈北东—南西走向,也有的呈北西—南东走向。境内 1000 米以上的山峰有 31 座,集中在东西北三面,北部洞宫山南段的白云山平

^① 1990 年以后福安市无专门的民族人口统计。若畲族人口的增长速度与全市人口的增长速度相同,1996 年全市的畲族人口约为 6.3 万人。

均高度在 1000 米以上,主峰最高峰海拔 1450.2 米。境内中部有交溪干流纵贯南北,由于交溪及其支流的长期侵蚀堆积作用,形成了河谷平原或河谷丘陵。沿河两侧的平原或丘陵、低山和中山呈阶梯状分布。地势从北向南倾斜,东、西部高,中部为河谷低地,全市整个地形便成为一南北走向而向南开口的狭长盆谷地。全市地貌基本可分为五大类型:

1. 北部、东部和西部山地。海拔平均在 500 米以上,约占全市总面积的 60%。

2. 丘陵。主要分布在山地的边缘或盆地的周围,平均海拔在 500 米以下,占总面积的 26%。

3. 山间盆地。主要分布在北部、东部和西部的中低山一带,占总面积的 3%,以福安盆地为最大。

4. 冲积平原。主要分布在中部交溪及其支流的中下游沿岸,海拔在 20 米以下,约占总面积的 9%,以甘棠平原为最大。

5. 海滩(滩涂)。分布在沿海一带,约占全市总面积的 2%。

福安畲族主要居住于低山、中山、丘陵与山麓地带,村落的地貌结构,大体可分为四个区域:

1. 西部、北部中、低山地区。区内地貌由中、低山地,高、低丘陵与山间盆谷组成。平均海拔 600 米以上。由于交溪水系的发育,区内河流密布,山高谷深;地形崎岖,地势陡峻,峰峦耸立。山地坡度一般在 45 度左右。约 45%的畲族村散布在该地区。

2. 东部低山与盆谷区。以低山区为主,其次为山间盆谷和中山、高丘地。平均海拔 500 米以下。约 20%的畲族村位于该地区。

3. 交溪中下游丘陵地带。低丘坡度一般在 20 度~25 度左右。有 20%的畲族村分布在该地区。

4. 南部滨海高丘、低山、海岸平原地区。地貌由低山、高丘、低丘、平原和海滩组成,以丘陵和低山为主,交错分布,直逼海岸,相

对高度 200 米~400 米。约有 15% 的畲族村落散布在该地区。

福安市 45 个畲族人口占 80% 以上的行政村平均海拔为 241.16 米,其中海拔最高的达 550 米,最低为 30 米。

(二) 土壤与气候 福安市土壤种类多样,气候温暖湿润,适宜于农作物的生长。

1. 土壤。福安市土壤多系由花岗岩、凝灰岩、流纹岩、砂岩形成的红壤、黄壤。据 1979 年~1986 年土壤普查,全市土壤分 7 个土类,17 个亚类,36 个土属,55 个土种。按土类面积大小依次为红壤、水稻土、黄壤、紫色土、潮土、盐土、草甸土。土壤利用可分为耕地土壤和自然土壤:耕地土壤中,水稻土占 79.92%,红壤占 16.98%,黄壤占 0.49%,紫色土占 0.09%,潮土占 0.61%,盐土占 1.91%;自然土壤有 4 大土类,8 亚类,16 土属,其中红壤 1,603,217 亩,占 95.98%;黄壤 58,071 亩,占 3.48%;紫色土 8843 亩,占 0.53%;草甸土 146 亩,占 0.01%。

从耕地肥力等级来看,一级田占 10%,主要分布在海拔 60 米以下交溪流域两岸和村镇附近,水肥条件好。二级田占 61.9%,肥力尚好,但有不同程度的障碍因素。三级田占 28.1%,有明显的障碍因素,肥力低,属低产田。农地中,一级占 1.1%,主要分布在村镇附近,土壤肥沃,可种植多种粮食和经济作物;二级占 30.2%,耕层中等,水源不足,局部有障碍因素;三级占 68.7%,土质过沙或过粘,易涝易旱,水土流失严重,是低产地。自然土壤中,一级占 8.2%,土层深厚,肥力较高,是主要用材林和经济林基地;二级占 81.8%,立地条件一般,肥力中等,是茶树、油茶、针叶用材林和薪炭林的主要发展区域;三级占 10%,分布在山顶、山脊部位,坡度大,立地条件差,以封山育林保持水土为主,可种马尾松和薪炭林树种。

以农业资源区分,福安市约有 40.82% 畲族自然村落分布在海拔 250 米以下的低丘和小平原地区,区内土壤,丘陵地以红壤为

主,河谷平原以水稻土为主;约有 37.45% 的畲族自然村位于东、西部高丘陵地,及中、低山地和山谷盆地,平均海拔 250 米~500 米,土壤以红壤为主,土层深厚,已开辟的山垄水田为水稻土;有 17.04% 的畲族自然村位于东部中、低山区,平均海拔为 500 米,土壤以黄壤、红壤为主,中、低产田较多;有 4.69% 的畲族自然村位于西北部低中山区,平均海拔 500 米以上,千米以上的高山多盘踞于此,是福安畲族聚居地地势最高的区域,土壤以黄壤、红壤为主,在海拔千米以上地方分布有草甸土。

2. 气候。福安本属中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温暖湿润。由于所处地理纬度低,濒临东海,受季风环流影响,具有四季分明,夏长冬短,光热充足,无霜期长,季风明显,台风频繁,雨量集中,夏旱突出等特点。又由于其背山临海,山地地貌支离,类型多样,高差悬殊,构成多种小气候,还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布的区域性特点。全市年平均气温 $13.6^{\circ}\text{C}\sim 19.8^{\circ}\text{C}$,中部河谷两岸和南部沿海地区在 18.1°C 以上。最冷一月份,平均气温 $4.4^{\circ}\text{C}\sim 10.1^{\circ}\text{C}$,最低气温记录为 -5.2°C (1963 年 1 月 8 日),山区的极端最低气温为 $-7^{\circ}\text{C}\sim -10^{\circ}\text{C}$ 。最热七月份,平均气温 $23.6^{\circ}\text{C}\sim 29.6^{\circ}\text{C}$,最高气温记录 43.2°C 。

四季特征 春季(2 月~4 月),气温开始呈波动性回升,气温变化大。晴雨天气交替出现,以阴雨天居多,降水强度较大。夏季(5 月~9 月),夏初多梅雨,降水强度增大。盛夏有短暂的酷暑。河谷小盆地是高温中心,多台风暴雨。秋季(10 月~11 月),气温逐渐下降,温度较春季高,天气晴朗少雨。冬季(12 月~1 月),除山区外无严寒,少见霜雪。南部受海洋调节,霜雪更少。

日照 夏秋日照多,冬春较少。年均日照时间 1905.8 小时,最多 2337.9 小时(1963 年),最少 1506.5 小时(1982 年)。一年之中以七月份日照时间最长,月均 256.9 小时,平均日照 8.3 小时。二月份最少,仅 100.7 小时,平均日照 3.6 小时。山区年日照时间

为 1700 小时~1800 小时。

无霜期 福安各地平均初霜在 11 月中旬至 12 月中旬,终霜为 2 月下旬至 4 月初。年平均无霜期 287 天,最长 338 天(1973 年),最短 247 天(1958 年)。各地平均无霜期在 230 天~300 天之间。

(三) 雨量与水文 年均降水量 1350 毫米~2050 毫米,自东南沿海向西北山地递增。全年降水量集中在 3 至 9 月,占全年降水量的 82.3%,10 月~12 月处于干旱或半干旱期。按降水量的年变化和降水特点,全年可划分为四个降水季节:3 月~4 月称春雨季,平均降水量 260 毫米~340 毫米,占全年降水量的 15%~21%,平均降雨日 30 天~35 天。5 月~6 月称梅雨季,平均降水量 380 毫米~660 毫米,占全年的 27%~34%,平均降雨日 34 天~40 天。7 月~9 月称台风雷阵雨季,平均降水量 430 毫米~800 毫米,占全年的 30%~38%,平均降雨日 33 天~44 天。10 月至次年 2 月称少雨季,平均降水量 250 毫米~370 毫米,占全年降水量的 15%~21%,这个季节晴天多雨少。据气象记录,福安市降水量的年际变化不稳定,各时段降水量变化幅度也不同,如年降水量最多达 2098.6 毫米(1973 年),最少仅 981.5 毫米(1967 年);9 月降水量,1969 年最多达 429.4 毫米,1978 年最少只有 10.2 毫米。福安畲族聚居的地区内绝大部分年降水量在 1350 毫米~1700 毫米之间。

福安境内的水系以交溪(古名长溪)为主要干流。交溪源于鹫峰、洞宫和太姥三山脉,呈扇形分布境内。上游分为东溪和西溪,二溪在福安市北部湖塘坂汇合后称交溪。向南流经福安市南部分别称富春溪、茜洋溪、穆阳溪、赛江、白马河等,经三都澳入东海。交溪流域总面积 5638 平方公里,其中福安市境内流域面积 1658 平方公里;交溪主干支流总长 433 公里,其中境内长 185.4 公里。

交溪水系的主要河流:东溪源于浙江省丰阳县境,经寿宁县入

境与西溪汇合,境内长 37 公里,流域面积 343 平方公里。西溪源于浙江庆元县,经寿宁入境,境内长 14 公里,流域面积 78 平方公里。富春溪起自福安城阳乡,至赛岐与穆阳溪汇合,总长 36 公里,流域面积 228 平方公里。茜洋溪源于柘荣县,至福安市溪柄镇入交溪,境内长 20 公里,流域面积 142 公里。穆阳溪源于政和县境,经周宁县入境至赛岐镇与富春溪汇合,境内长 46.4 公里,流域面积 518 平方公里。此外,境内还有钱塘溪、山溪等单独入海的河流。

二、自然资源

(一) 土地资源 据 1983 年~1985 年福安县农业资源调查资料,全县土地总面积 2,820,150 亩(含水域滩涂),占全省面积的 1.42%,其中耕地面积 332,028 亩,占 11.77%,有水田 265,371 亩,农地 66,657 亩;林地面积 1,271,741 亩,占 45.10%,其中有林地 922,459 亩,疏林地 149,026 亩,灌木林地 50,256 亩,未成林地 150,000 亩;宜林荒地 329,059 亩,占 11.67%;连片茶山 123,566 亩,占 4.38%;园地、茶园 76,498 亩,占 2.71%;果园 27,639 亩,占 0.98%;水域面积 156,840 亩,占 5.56%,其中内陆水域 55,684 亩,浅海 101,156 亩;滩涂面积 69,060 亩,占 2.45%;其它城镇居民点、道路、河流等占地 433,719 亩,占 15.38%。福安土地资源属“八山一水一分田”,人均占有耕地少,而林地、草山、水域、滩涂等资源丰富。

(二) 水资源 全市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 19.94 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 16.5 亿立方米,浅层地下水 3.44 亿立方米。全市每平方公里产水量 110 万立方米,人均水量 4258 立方米,耕地亩均 6086 立方米,水资源比较丰富。由于受地形与季风影响,降水从东、西、北三面向中、南部递减,而蒸发能力却相反,从东南向西北递减,从而形成北部山区为余水区,南部沿海为补水区。

福安市水文地质以山区基岩裂隙水为主,富水性极不均衡,水量贫乏、分散。地下水资源为 6085.62 万立方米/年,其中基岩裂隙水源 5384 万立方米,分散在 1760.62 平方公里岩层,占地下水总资源的 88.48%,且深埋于 6 米以下,无法集中开采利用;松散岩孔隙水资源 701.2 万立方米/年,其中福安盆地、穆阳、溪潭、溪柄东北部和赛岐东部等地的河漫滩及一级阶地,潜水量比较丰富,水质较好,可以开发利用。水资源供需基本平衡。

(三) 矿产资源 现已探明的矿产有铁、铝、锌、铜、锰、钼、铋、银、高岭土、辉绿岩、花岗岩、石英、石墨、明矾石、黄铁矿、河沙等。

重要的金属矿藏有银和钼。福安于明朝宣德年间(1426 年~1435 年)就有开采银矿的记录,今市北部范坑乡上坪、岭先、山岫宅三个村尚存银坑洞遗迹多处。今坑尾洋有矿化点 1 处。钼矿物主要为辉钼矿,蕴藏量 800 多万吨,分布在康厝乡龙甲山一带,矿区面积约 12 平方公里,1981 年开采,年产钼精矿 50 多吨,是福建省最主要的单体钼矿床。此外,福安市另有钼矿化点 5 处,分布于上白石镇、坂中乡等地。

重要的非金属矿有高岭土、辉绿岩、花岗岩、河沙等。高岭土蕴藏量 300 万吨,主要分布在湾坞乡的白溪、马头,穆阳镇的桂林,城阳乡的占洋,及坂中乡等地。辉绿岩分布在下白石镇的福屿、渔江、章坑、湖塘后门山,以及坂中、潭头、穆云、溪潭、甘棠等地,蕴藏量 300 万立方米。其中下白石镇的辉绿岩藏量 47.6 万立方米,石质坚硬,年开采 500 多立方米,供惠安石雕用材,出口东南亚一带。花岗岩分布于溪柄、城阳、坂中、下白石、湾坞、溪潭、康厝、穆阳等乡镇的交溪沿岸,蕴藏量 4370 万立方米,可供作建筑材料和工艺品雕刻。河沙:交溪多年平均含砂量 0.15 公斤/立方米,折输沙量 29.9 万吨,从赛岐至甘棠奎聚游积成 5 个大沙洲,蕴藏量 200 多万吨,砂质纯洁,大小匀称,是建筑的好材料。

(四) 植物资源 福安地处中亚热带,适宜植物生长,资源丰

富,种类繁多。

1. 森林资源。福安市共有植被种类 121 科, 451 种, 其中乔木 111 种, 组成 7 个中亚热带植被类型, 49 个群系。主要有常绿阔叶林、常绿针叶林、针阔混交林, 以及毛竹林、人工经济林、灌木林等。主要树种有: 松科的马尾松、湿地松, 杉科的杉木、柳杉, 禾本科的毛竹、绿竹, 大戟科的千年桐、三年桐, 山茶科的普通油茶、木荷, 柏科的建柏, 樟科的察树、香樟, 豆科的相思树、合欢等。1996 年, 全市的森林覆盖率为 67.2%。

2. 大田作物。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 其次为甘薯、小麦、大麦。经济作物有甘蔗、油菜、花生、芝麻、黄麻、苧麻、烟叶、茉莉花、席草等。1949 年以来共引进粮、油作物新品种 100 多种。

3. 果树。据 1996 年统计, 福安果树种植面积 108, 783 亩, 产量 38, 223 吨。主要热带、亚热带果树有柑橘、柚、枇杷、龙眼、荔枝、芒果、橄榄、香蕉等; 温带果树有桃、李、梨、柿、葡萄、苹果、草莓等; 野生和半野生果树有猕猴桃、山荔枝、山枇杷、山杨梅、野葡萄、山桔子、桃金娘、榛子等。

4. 茶叶。福安种茶历史已逾千年, 是福建省重点茶区。主要茶叶品种有驰名中外的“坦洋功夫”红茶, 长期选育的福安大白茶、岭路大白茶、坦洋早红等十多个地方良种和近年引种的福云、福鼎白毫等二十多个良种。1996 年, 全市茶园面积 155, 149 亩, 总产 10910 吨。

5. 牧草。种类有 20 科 94 种。主要优质草有马唐、狗牙根、鸡眼草、假俭草、看麦娘、龙爪茅、纤毛鸭嘴草、知凡草、疏花野青茅等。

6. 水生植物。海水中有浮游植物 49 种, 主要有紫菜、海带、浒苔等; 淡水植物有红萍、席草、茭白等 21 种。

7. 药材。经普查, 全市有野生药材 500 多种, 主要有半夏、香附子、葛根、黄精、黄枝子、狗脊、常山、防己等; 栽培品种 15 种, 主

要有金银花、太子参、佛手、薄荷、积壳、厚朴等。

(五) 动物资源 福安市的动物分布属东洋界华中区东部丘陵平面亚区。动物种类较多,其中真体腔动物 344 种,环节动物 4 种,软体动物 21 种,节肢动物 155 种,脊椎动物 77 科 163 种。属国家一级保护的有云豹、蟒蛇、中华鲟,二级保护的有鬣羚、大灵猫、穿山甲、鸳鸯、雪纹蛙等。常见的野生动物:兽类有赤鹿、大灵猫、野猫、獾、狐、貉、豪猪、黄胸鼠、松鼠、华南兔、蝙蝠等;爬行类有乌龟、鳖、草蜥、水蛇、眼镜蛇、银环蛇、竹叶青、钝尾两头蛇等;两栖类有东方蝾螈、中国两蛙、姬蛙、大树蛙、蟾蜍、青蛤、洋倪等;鸟类有白鹭、鹧鸪、斑鸠、啄木鸟、乌鸦、白头翁、八哥、画眉、白眉翁等。水生动物中,海水鱼虾贝壳类达 142 种,常见的有大黄鱼、梅童鱼、鲳鱼、鳗鱼、毛虾、对虾、中华绒蟹、缢蛏、海蛎、花蛤等 30 多种;淡水鱼有草、鲢、鳙、鲤、鲫、鲂鱼等 23 种。畜禽类有猪、牛、羊、鸭、鸡、鹅、兔等。

第二节 建置沿革

一、历史和建置

福安原为县治,建县始于宋淳祐五年(1245 年)。

福安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期,先民们就在这里劳动生息。先秦时期福安为闽越居地。夏、商、周以前属扬州,周为七闽地域。春秋属越,战国属楚。秦属闽中郡,汉初隶闽越国,汉武帝时归会稽,东汉为会稽南郡地,汉始二元年(公元前 85 年)属冶县。三国时属吴国建安郡东安县地,晋、宋、齐、梁、陈属温麻县。隋开皇九年(589 年)属原丰县,大业三年(607 年)入闽县(今福州)。唐武德六年(623 年)起属长溪县。

从宋嘉定十年(1217 年)开始,乡人郑子化以其地处长溪县西

北,距县治遥远,偏僻难于治理,上书请析县,直至淳祐五年(1245年),宋理宗御批“敷赐五福,以安一县”,因而划出长溪县西北二乡、九里建县,定名福安。福安建县后直隶福建路福州。

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福安县改属福建行中书省福州路福宁州。

明洪武二年(1369年),福安县划归福建行中书省福州府管辖。景泰六年(1455年),划出县境平溪里十一至十四都归新置寿宁县。成化九年(1473年),福安县属福建承宣布政使福宁州。

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福宁州升为福宁府,福安县隶属福建省福宁府。

民国元年(1912年)废府、州,福建划分为4个道,福安县隶属东路道(道治在今闽侯)。民国三年(1914)东路道改称闽海道,福安县仍隶属该道。民国十四年(1925年),国民政府成立,废道,福安县直属于福建省,二十二年(1933年)十一月,福安县属国民党十九路军在福州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属下的闽海省,二十三年一月,人民革命政府失败,福安县复为福建省直辖。七月,福建省实行督察区制度,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四月,福安县曾分属第二、第一、第八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多驻福安县)。

1949年7月19日,福安县解放。9月30日,福建省成立第三行政督察区,辖福安县,专员公署驻福安县。1950年3月,行政督察区改以专员公署驻地县命名,福安县属福安专区。1970年2月,福安专员公署迁驻宁德县,1971年6月,福安专区改称宁德地区,福安县属宁德地区。1989年11月13日,福安撤县建市,属宁德地区。

二、行政区划

1949年7月19日,福安县解放,在原有14个乡镇设立14个乡(镇)人民民主政府。10月调整行政区划,全县分设7个区,统

辖 146 个保,2089 个甲。

1950 年 4 月,福安县废除保、甲制度,实行县、区、乡三级政制。全县设 10 个区、128 个乡。1952 年调整为 123 个乡。1953 年,全县分为 12 个区、142 个乡。同年 2 月 8 日,在原第十一区畬族聚居的仙岩乡建立“畬族仙岩乡自治区人民政府”,这是福建省建立的第一个畬族乡自治区政府。但由于畬族的民族成分没有正式确定等原因,该自治区政府被撤销并入湖坂乡,改称仙坂乡。

1957 年,贯彻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福安县先后建立了 13 个民族乡,辖有 216 个自然村。1958 年 7 月,福安县撤区并乡,全县分 11 个乡、2 个镇和 1 个区(柘荣区)。9 月,乡镇改为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畬族乡被撤消,分别并入相应的人民公社。全县 15 个人民公社,下辖 445 个生产大队。

1961 年 7 月恢复区建制,原 15 个公社改为 15 个区。8 月,福安县 12 个区 1 个镇调整为 10 个区、2 个县属镇和 1 个县属人民公社,下辖 98 个乡(即小公社)。全县辖有 844 个生产大队。1962 年,全县设 11 个区、3 个镇,下辖 98 个公社(即乡)。同年恢复仙

表 1-1 1996 年福安市三个畬族乡基本情况表

项目 乡 名	面积 (平方公里)	耕地 (亩)	总人口 (人)	少数民族人口		村委会 (个)	自然村 (个)	备注
				人数	占总人口 (%)			
坂中 畬族乡	67.70	14,488	20,667	7977	38.60	19	89	
康厝 畬族乡	110.20	24,400	25,313	6012	23.75	32	118	
穆云 畬族乡	116.80	19,500	26,007	7902	30.38	33	157	

说明:少数民族人口中包括少量回族人口;表中坂中畬族乡的行政村数量不包括 3 个街道居委会。本表资料分别由三个畬族乡政府提供。

岩、凤洋、山岭、茶洋、竹岭 5 个少数民族公社。1966 年实行区、大公社并存制度,区、公社、镇建制时有变动。至 1984 年,废弃“政社合一”制度,建立县、乡(镇)、村三级政权。全县共有 5 个镇、13 个乡,其中有坂中、康厝、穆云 3 个畲族乡。1989 年,全县调整为 7 个镇,12 个乡,其中 3 个畲族乡(见表 1-1)。

1989 年 11 月 13 日,国务院批准福安撤县建市(县级市)。1993 年,福安被国务院列为沿海对外开放城市。1996 年,全市设 11 个镇、7 个乡(含 3 个畲族乡)、3 个街道办事处和赛岐、穆阳 2 个经济开发区,农村下辖 447 个村民委员会,3772 个村民小组。

第三节 人口与计划生育

一、人口发展

(一) 1949 年以前福安县人口状况 福安县境人户的记载始见于明代,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 年)福安县共有 7410 户、25,663 人,每户平均 3.46 人。明末清初福安人口下降,至清末猛增,清宣统三年(1911 年)约为 54,600 余户、335,846 人,户均 6.15 人。民国时期,由于受灾荒、战争和瘟疫的影响,人口死亡率高,总体呈减少趋势。1949 年 1 月,全县人口降至 52,770 户、225,702 人,户均 4.28 人。38 年中共减少 110,144 人,年均减少 2899 人。自宋代至民国时期,福安居民都以汉族为主。畲族于唐末开始迁入闽东地区,大量落籍福安则在明清时期。有关福安畲族人口的记载,最早见于清光绪十年(1884 年)的《福安县志》,称“各都畲民村居”182 个,具体人户不详。据民国二十六年(1937 年)《福建统计年鉴》记载,福安畲族已有 2000 户、8400 人,占当年福安人口总数的 2.96%。

(二) 1949 年以后的人口增长 1949 年 12 月统计,福安全县

有 76,222 户、238,185 人,户均 3.12 人。1949 年~1959 年,年均人口增长率为 42.8%。1960 年~1965 年,因受 3 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人口呈下降态势。1966 年~1990 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为 17.5%,平均每年增加 7508 人。1990 年,全市有 125,394 户、525,580 人,户均 4.19 人。其人口数为 1949 年的 2.21 倍。1996 年福安市共有 134,620 户、575,560 人。

(三) 福安市畬族人口的发展 据 1952 年 4 月的统计,福安县 10 个区 610 个村的畬族居民,共 8711 户,28,258 人。据 1953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福安畬族人口为 30,743 人,占全县总人口 260,533 人的 11.80%,占福建省畬族人口 96,375 人的 31.90%。1964 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福安畬族人口为 37,195 人,占全县总人口 322,859 人的 11.52%。畬族人口比 1953 年增加 6452 人,增长 20.99%,年平均增长 1.75%。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福安畬族人口为 53,813 人,占福安总人口 477,642 人的 11.27%。畬族人口比 1964 年增加 16,618 人,增长 44.68%,年均增长 2.07%。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福安畬族人口为 58,002 人,占福安总人口 525,580 人的 11.04%。畬族人口比 1982 年增加 4189 人,增长 7.78%,年平均增长 0.97%。如果以 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与 1953 年第一次普查相比,畬族人口在 37 年中增加 27,259 人,年平均增长 1.73%。与全市人口增长趋势相比,增长率少 0.18 个百分点。据 1990 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全国畬族总人口为 630,378 人,福建省畬族人口 346,382 人,福安畬族占全国畬族总人口的 9.20%,占福建省畬族人口的 16.75%,可以说福安是我国畬族人口最多、最集中的一个市(县)。

二、人口构成

(一) 性别构成 福安历史上重男轻女。溺女婴现象十分严重,造成男女比例失调。如 1935 年,女性每 100 人与男性之比为

145.85, 1936 年为 137.1。

1949 年以后, 男女性别比的差距逐渐缩小。1953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 女性每 100 人与男性之比为 146.95, 1964 年第二次人口普查为 135.42, 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为 121.62, 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为 117.95。男性占人口的比例一般是农村高于城镇。

福安市畲族人口性别构成与汉族类同。据 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 畲族人口男女性别比为 119.16 : 100, 男性所占比例比全市的平均值高 1.21 个百分点。据 1989 年统计, 畲族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为 110.03 : 100(表 1-2)。

表 1-2 1990 年福安市男性按年龄组性别比 单位: 女性 = 100

年龄组	性别比例		年龄组	性别比例	
	全市	畲族		全市	畲族
0 岁	117.04	112.26	19—39 岁	111.63	117.51
1—6 岁	121.11	116.57	40—69 岁	146.94	139.89
7—12 岁	112.42	111.13	70 岁以上	100.26	99.25
13—18 岁	108.32	108.03			

资料来源:《福安畲族志》第 34~35 页,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二) 年龄构成 1949 年以后, 福安人口迅速增长, 人口由成年型转变为年轻型。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 全市 14 岁及 14 岁以下儿童占总人口的 35.68%; 15 岁~64 岁人口占 59.27%; 65 岁以上老年人占 5.05%。据 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 福安市人口随着年龄的提高, 少年儿童占总人口的比例逐渐减少。与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相比, 14 岁及 14 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了 5.38 个百分点; 15 岁~64 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了 3.60 个百分点; 65 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了 1.42 个百分点。这种现象表明了福安市计划生育工作取得的成效与居

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使人口的出生率有所下降,长寿老年人数量增加。据 1947 年统计,福安县共有 70 岁以上人口 4809 人,到 1990 年,70 岁以上的老人已达 19,241 人。福安畚族人口的构成与全市人口构成基本相同,仅略有差异。1990 年,全市有 4 个百岁以上老人,其中畚族 1 人。畚族人口年龄中位数为 23.74 岁,比全市中位数 23.55 岁稍高 0.19 岁。

(三)文化构成 据统计,1937 年,福安全县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 86.2%,非文盲中进过学校的只占 4.6%,其余的大多数属进过私塾,粗识文字。据 1945 年统计,文盲占总人口(215,912 人)的 81.37%。非文盲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有 126 人,占总人口的 0.06%;受过中等教育的 2506 人,占总人口的 1.16%;受过初等教育的 14,043 人,占总人口的 6.50%;进过私塾的 23,547 人,占总人口的 10.91%。1949 年以后,国家实行普及教育政策,人口文化程度逐年提高。

据 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福安市每万人口中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 56.1 人,比 1964 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19 人)增长了 1.95 倍;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 465 人,比 1964 年(124 人)增长了 2.75 倍;初中文化程度 1139 人,比 1964 年(291 人)增长了 2.91 倍;小学文化程度 5170 人,比 1964 年(2259 人)增长了 1.29 倍。从地域分布上看,城镇人口文化程度较高,畚族聚居地区和偏远山区人口的文化素质较低。

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在 6 岁及以上畚族人口(52,634 人)中,大学程度 75 人,占总人口的 0.14%,比 1982 年提高 0.06 个百分点,较全市水平低 0.49 个百分点;高中程度(包括中专)831 人,占 1.58%,比 1982 年提高 0.37 个百分点,较之全市水平低 3.69 个百分点;初中程度 2340 人,占 4.45%,比 1982 年提高 1.28 个百分点,较之全市水平低 8.47 个百分点;小学程度 33,132 人,占 62.95%,比 1982 年提高 24.60 个百分点,较之全市水平高

4.57 个百分点。全市畚族 15 岁及以上人口为 40,985 人,其中文盲、半文盲 15,133 人,占该年龄段人口的 36.92%,较之全市平均值高 9.82 个百分点。

(四) 劳动力分布 福安劳动人口历史上以农业为主。1949 年以后,劳动人口的分布有了较大变化。据 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全市劳动人口的产业分布为:第一产业人口 135,822 人,占在业人口的 69.35%,比 1982 年增加 6731 人,增长 5.21%;第二产业 24,284 人,占在业人口的 12.40%,比 1982 年减少 1835 人,下降 7.03%;第三产业 35,741 人,占在业人口的 18.25%,比 1982 年增加 9382 人,增长 35.59%。按城乡分,城镇第一产业人口 50,629 人,占全市第一产业人口的 37.28%;乡村第一产业人口 85,193 人,占全市第一产业人口的 62.72%,乡村是城镇的 1.68 倍。城镇第二产业人口 20,549 人,占第二产业总人口的 84.62%,而农村仅占 15.38%,城镇是农村的 5.5 倍。城镇第三产业人口 28,148 人,占第三产业总人口的 78.76%,而农村为 7593 人,仅占 21.24%,城镇是农村的 3.7 倍。在第一产业中,农业人口占首位,为 131,554 人,占第一产业人口的 96.86%,占在业人口的 67.17%;其次为渔业,从业者 3297 人,占 2.43%,再次为林、畜牧、水利业,共占 0.71%。1990 年,全市不在业人口为 170,445 人,占全市总人口的 32.43%,较 1982 年下降了 2.93 个百分点。

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1990 年,福安畚族在业人口 24,411 人,占全市畚族人口的 42.09%,较全市在业总人口的比重高 4.83 个百分点。畚族在业人口中,从事第一产业者 22,595 人,占 92.56%,比全市第一产业人口所占的比重高 23.21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为 878 人,占 3.60%,较全市的比重低 8.80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 938 人,占 3.84%,较全市比重低 14.41 个百分点。

(五) 人口分布 据 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福安市乡镇人

口分布最多的韩阳镇有 59,945 人;人口在 4 万以上的有赛岐、甘棠二镇;人口在 3 万人以上的有下白石、溪柄二镇和潭头、溪潭二乡;人口在 2 万人以上的有上白石镇和城阳、湾坞、康厝、穆云、社口 5 个乡;其他乡镇的人口都在 1 万人以上,人口最少的晓洋乡有 10,918 人(表 1-3)。

福安畬族遍布于全市 19 个乡镇的 429 个行政村及街道,人口分布面达全市村、街总数的 90.89%。从地理上以横贯福安中部的长溪(交溪)为界,长溪西部畬族人口 39,777 人,占西部总人口(232,244 人)的 17.13%;东部畬族人口 18,225 人,占东部总人口数(293,338 人)的 6.21%。

表 1-3 1990 年福安市乡、镇畬族人口分布 单位:人、%

乡镇	人口	占本乡镇总人口%	乡镇	人口	占本乡镇总人口%
坂中畬族乡	7400	40.16	溪柄镇	3349	10.78
康厝畬族乡	5503	22.65	韩阳镇	2106	3.51
穆云畬族乡	7286	29.99	穆阳镇	269	1.88
城阳乡	2928	11.48	赛岐镇	1919	4.14
溪潭乡	4185	12.34	社口乡	2238	21.74
甘棠镇	4324	9.53	潭头乡	1412	4.20
下白石镇	4944	12.46	上白石镇	442	1.95
湾坞乡	2852	11.62	范坑乡	143	0.79
溪尾乡	1831	11.75	晓洋乡	134	1.23
松罗乡	1685	10.97			

资料来源:据《福安畬族志》资料列表,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三、计划生育

(一) 人口增长与计划生育 1949年以后,福安人口增长迅速,1957年出生率高达43.04‰,自然增长率从1951年的17.4‰增至31.59‰,形成福安1949年后的第一个人口增长高峰期。1959年~1961年,国民经济出现暂时困难,1960年自然增长率出现负数,1961年自然增长率为9.06‰,是福安1949年以来人口增长的低谷时期。1962年~1965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人口出生率迅速提高,1962年人口出生率高达40.45‰,人口自然增长率达32.25‰,4年平均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9.92‰,是1949年以后福安第二个人口增长高峰期。1965年~1973年,福安人口持续增长,年均自然增长率为25.33‰。80年代以后,随着计划生育措施的全面落实,人口逐步走上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正常轨道。1983年~1990年的年均自然增长率为8.36‰,除1989年为11.02‰外,其它年份都在10‰以下。1991年~1996年的人口增长有所回升,1993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提高到13.13‰,1996年又下降到12.45‰。

福安的计划生育工作始于1963年,当年中共福安县委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同时成立计划生育技术领导小组。1971年7月,成立县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县卫生局合署办公。1975年,计划生育办公室从县卫生局分出,成立专门机构。1984年4月,改称县计划生育委员会。1988年,成立计划生育宣传指导站。1989年,成立县计划生育协会,各乡、镇设立分会。1990年,建立市计划生育服务站。同时各乡镇和街道成立计生服务所,行政村和居民委员会均配备计划生育管理员。福安市的计划生育工作已形成网络化和制度化。

(二) 政策措施 从1963年开始的计划生育工作至1975年主要是进行宣传教育。1975年在开展人口生育情况抽样调查的

基础上,制定了1976年~1985年10年人口增长计划。1979年3月,福安县人民政府贯彻国家提出的“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号召,实行和强化“奖励生育一胎、限制生育二胎、严禁生育三胎”的措施和工作,开始实施独生子女的奖励政策,并根据“晚”(晚婚晚育)、“稀”(生育胎次间隔5年以上)、“少”(最好生一个)的原则,控制多胎生育。规定凡生育3胎的夫妇一方实行结扎手术。1988年7月,《福建省计划生育条例》颁布后,福安县人民政府也制定颁行《贯彻福建省计划生育条例》的实施办法,规定对晚婚晚育夫妻表彰或奖励的具体内容,对违反计划生育者实施处罚,从而使全市的计划生育工作步入了规范化轨道。

第四节 民族构成与福安畬族来源

一、民族构成

福安市境内的居民以汉族为主,其次为畬族和回族。1949年以后不同时期的民族构成情况为: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福安只有2个民族,汉族人口229,791人,占总人口的88.20%;畬族人口30,743人,占11.80%。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全县共有汉族285,643人,占总人口的88.47%;畬族37,195人,占11.52%;此外还有回族3人,苗族14人,满族2人,蒙古族1人,维吾尔族1人。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汉族人口423,767人,占总人口的88.72%,畬族53,813人,占11.27%,此外还有回族32人,苗族23人,满族2人,京族4人,蒙古族1人。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福安市有10个民族,共有人口525,580人,其中汉族人口466,338人;9个少数民族共有人口59,242人,占总人口的11.27%。其中畬族58,002人,占总人口的11.04%;回族

1186人,占总人口的0.22%^①。其余7个民族中,藏族3人、苗族23人、壮族10人、满族10人、瑶族1人、高山族3人、京族4人,共计54人,占全市少数民族人口的0.01%。与第三次普查比较,汉族增加了42,573人,增长10.05%;少数民族增加5367人,增长9.96%。

二、福安畬族来源

畬族自称“山哈”,意即从外地迁来居住在山里的人,并不是当地的土著居民。

据畬族谱谍记载,福安畬族先祖于唐代已居住在广东潮州凤凰山为中心的闽粤赣交界地区,自唐末五代开始迁入闽东地区。畬族大量迁入福安是从明代开始的,至清代畬族已广布福安全境。

历史上迁入福安的畬族有蓝、雷、钟、吴、杨5个主姓,共47支。其中蓝姓10支,雷姓21支,钟姓14支,吴姓、杨姓各一支(杨姓系汉畬族通婚过养为畬族)。迁居福安的畬族以钟姓为最早,据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坂中乡和庵村《钟氏宗谱》载,早在唐五代时即有彦江公于汀州上杭迁入韩阳坂中五十三都钟莆坑。其后裔于北宋大观四年(1110年)于钟莆坑迁往福安西郊大林村,故今坂中畬族乡大林村是明清福安所属的福宁府钟姓发祥地。另一支钟姓先祖法广公祖籍广东,于明景泰年间(1450年~1456年)以后,由金溪玉林迁福安西门外五都眠山岗。明正德年间(1506年~1521年),其曾孙钟熙公的5个儿子:聪、明、彩、听、乐五公分徙大林、山头庄、白石、大留、侯官汤岭而后繁衍各地。钟姓迁入福安的还有其他支派和路线,如大林钟姓同宗的一支迁宁德柴坑,又迁金坝头,复迁福安大湾坝,再迁小岭;一支于清雍正三年(1725年)由汀州武平县迁宁德斑竹,又于道光九年(1829年)迁福安大

^① 1990年人口普查时,部分福安丁姓人口恢复回族成分,故回族人口的数量增长较快。

留；一支从延平三十五都状元内金奥迁霞浦三十六都洋底，再迁福安茶洋；一支从福鼎单桥迁入福安松罗茶洋。

雷姓畬族迁入福安时间，据前引和庵村《钟氏宗谱》，“大林钟”始祖飞公之女适金斗量雷谓礼，时在北宋末年。金斗量即今福安康厝畬族乡金斗洋村。又据清嘉庆五年（1800年）《金斗量雷氏宗谱》记载，雷氏一支“移居闽省播迁无常，惟居福安二十一都黄墓者最久，因谱失莫纪其详。居黄墓者有八世，而及大一公于崇祯年间（1628年～1644年）后移居仙石一载，大林二载，岭门二十余载，至高祖十三公，曾祖百二十六公，又于国朝康熙甲寅（1674年）移居坑兜九个月，冬移居十五斗上金斗洋，四十三载再移居下金斗洋，迄今八十余载。”

福安雷姓畬族最著者为“后门坪雷”，人口也最多。该雷姓先祖两公祖籍广东潮州普宁，于明成化二年（1466年）自福州方向迁入福安十都官湖，以后又迁十一都陈家林，复迁十八都大丘田。其后旗公及其子6人分徙各处。福安雷姓畬族多由此繁衍而来。

蓝姓畬族迁入福安较雷、钟两姓为晚，其人口仅为雷、钟之半。蓝姓中人数最多的一支是“溪塔蓝”，始祖学礼公，祖籍广东潮州海阳县山头甲，其先祖初迁浙江泰顺龟头长坝头，后迁居福建寿宁。学礼公7子，时号七雄。次子恒麟与七子恒彪两支子孙多迁居福安，也成为福安蓝姓畬族的主要衍发派系。据蓝姓谱载，一支蓝姓于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由罗源坝头里迁宁德，又迁福安；十六年，学礼七子蓝恒彪率族人由寿宁迁入福安溪塔；清顺治三年（1646年），一支蓝姓由连江狮子岩迁入南山头，后又迁大岭等处；康熙年间（1662年～1722年），一支蓝姓自汀州庐丰迁入福安上白石镇聚仙岗村。

福安吴姓畬族始祖谱名知几公，名法度（1479年～1560年），原籍浙江泰顺，随父迁居福安九都桐湾（今社口镇）。知几公原娶林氏，早逝；又娶彭氏生7子；继娶蓝氏生2子。知几公七子法东

公乃彭氏生,由畬族蓝氏所养,即长又娶畬族雷氏;知几公八子法传公为畬族蓝氏生,又娶蓝姓为妻。法东公与法传公的后裔都与畬族联姻,为畬族同化,成为畬族一姓。二公之后裔后来分迁福安各地。今福安吴姓畬族的主要聚居地为穆云畬族乡虎头村和坂中畬族乡日宅、吴厝下等地。

福安杨姓畬族与汉族杨姓的主要派系同一始祖,原籍浙江龙游县,唐代迁居福安韩阳财洪村。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迁宁德蟾溪,再传三世,又分迁福安廉溪杨家坪。杨姓支派杨文公,明末避兵乱,辗转移居大林改姓畬族钟姓。杨文公长子李生公于清乾隆五年(1740年)迁潘洋(今社口)娶畬族雷姓,后裔多与畬族联姻,遂为畬族同化。据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关西杨氏宗谱》记载,杨姓改钟姓经历一百八十多年后于19世纪初叶又重复杨姓,但仍保持畬族语言和生活习俗。今福安杨姓畬族主要聚居地在社口潘洋村、溪柄蛤蟆头村和松罗后宅村等处。

畬族历史上频繁迁徙的主要原因是为逃避战乱和压迫剥削,其次为求生存不得不去瘠就腴,寻找新开垦的土地。迁居福安的畬族,因人口发展,为寻求生计又迁往他县,或往来无定,至清末才渐趋稳定下来。畬族入居福安,为开辟山区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二章 政 治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发展

福安市各族人民有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早在 1929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就在福州市建立了福安党小组(亦称闽东党小组),直属福州市委员会。1930 年 7 月成立了中共福安县委员会。此后,福安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创建了闽东 500 里苏区。1932 年 10 月在福安城关成立了中共福安中心县委,以统一领导福安、福鼎、霞浦、宁德、寿宁等 5 县的革命斗争。1933 年底,福安中心县委在福安境内辖安德、福霞、福寿 3 个边委和中区、东区两个区委及赛岐特别支部。1934 年 6 月底,中共福安中心县委与连罗中心县委在采花桥畬族村召开联席会议,建立了中共闽东临时特委。同年底,全县共有中共党支部 370 个。1935 年 2 月,在福安境内活动的有:中共福霞县委、安福县委、安德县委、宁寿县委和福寿中心县委,共辖 26 个区委。同年 8 月,全县共有支部 55 个,党员 1592 人。

畬族聚居区是福安中共党组织活动的重要地区,早在 1929 年 9 月就在凤洋畬族村建立了党支部,这是福安畬族村的第一个党支部。1931 年秋以后,畬族村的党组织发展很快,中共福安西山区区委下辖的 11 个支部中,就有下逢、咸福、蟾溪等畬族聚居区党支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畬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一道,开展土地

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至1935年,全县有609个畬族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共有67名畬族党员^①。

1947年3月,中共福安县委改为临时工委,隶属于闽东工委。同年9月,由于工委领导人被捕叛变,工委组织遭到破坏。同月,中共闽东地委决定恢复福安县委。不久,因县委主要领导成员牺牲,党组织再次遭到破坏。1949年7月,福安解放初期,福安全县仅有党员102人。

二、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建设

1949年7月19日,福安获得解放。9月24日即成立了中共福安县委,以执政党的地位,领导福安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分期分批地开展建党工作,建立和完善党的组织,发展新党员。1965年,全县共有党员5030人,其中畬族党员446人,占党员总数的8.87%。党员的文化程度情况为:大专及大专以上7人,占0.14%;高中84人,占1.67%。年龄结构情况为:25岁以下119人,26岁~45岁4351人,45岁以下的党员合计占党员总数的88.87%;46岁~60岁的党员529人,60岁以上31人,46岁以上的党员合计占11.13%,党员的年轻化程度十分明显。

1966年~1968年,县委及工作机构、基层组织均受到冲击,党建工作处于瘫痪状态。1969年,全县开始分批恢复党员的组织生活,同年11月开始发展新党员。70年代,党员的数量增长很快,1978年,全县党员人数达到10,160人,比1965年增加了1.02倍。其中,畬族党员1248人,比1965年增加了179.82%,占全县党员总数的比例提高到12.28%。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得到加强。

^① 参阅《福安畬族志》第298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987年,全县的党员人数达到14,433人,比1978年增加了42.06%。党员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党员405人,占党员总数的2.81%,所占的比例比1965年提高了19.07倍;中专、高中毕业的党员2150人,占党员总数的14.90%,所占的比例比1965年提高了13.23个百分点。

进入90年代,福安市的党员人数稳步增长。1996年,全市共有党员17,475人,比1990年增加了18.06%,其中少数民族党员1808人,女党员1974人,分别占党员总数的10.35%和11.30%。党员的文化程度构成为: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1202人,占6.88%;中专及高中学历3920人,占22.43%;初中学历5280人,占30.22%;小学学历6908人,占39.53%;文盲165人,占0.94%。党员的年龄构成为:25岁以下党员748人,占4.28%;26岁~35岁2981人,占17.06%;36岁~45岁4501人,占25.76%;46岁~55岁3343人,占19.13%;56岁~60岁1638人,占9.37%;61岁以上的党员4264人,占24.40%。党员的分布情况为:市属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2464人;乡镇和街道机关2483人;居委会438人;行政村9679人;企业(含乡镇企业)2411人。农村党员占绝大多数。

1996年,中共福安市委委员会的直属工作机构有:办公室、纪律检查委员会、政法委员会、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对台工作部、精神文明办公室、党校、直属机关党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政策研究室、机要局和信访办公室。在1996年11月确定的机构改革“三定”方案中,市委工作机构将只设6个,即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政法委员会和直属机关工委,其它机构将并入工作内容相似的部门或者予以撤销。全市的党组织有党委36个,党组7个,党工委2个,党支部975个。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有关部门在一些股份制企业、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里也建立了党支部或党小组。

三、重大决议和决策

1956年~1993年,共召开了九次中国共产党福安县(市)代表大会。历次大会所作的决议及历届福安县(市)委所作出的决策,均对福安县(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1978年以前,受全国大环境的影响,政治决策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党代会所作出的决议也出现过一些偏差,甚至是失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的工作重心发生转移。1979年2月,县委组织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讨论将全县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事业上来。1980年,除强调认真贯彻党的五中全会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外,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和重大决策基本上是上年的延续,并开始在农村逐步落实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1981年,县委的指导思想和重大决策是解放思想,清除“左”的影响,认真贯彻党的三中全会、六中全会精神,实事求是地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纠正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

1983年的最重要决策是全面推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县委明确肯定“推行生产责任制是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一条正确途径”,当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户已发展到占农户总数的96%以上。1986年,县委确定了全县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即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指引下,突出一个中心(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抓好两个重点(质量与管理),处理好三个关系(发展生产力与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关系、宏观控制与微观搞活的关系、沿海与山区的关系),做好四个加强(加强国民经济薄弱环节、加强出口创汇能力、加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加强智力开发和精神文明建设)。这一重大决策较早地提出了以效益为中心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从而为福安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奠定了基础。1987年~

1990年的3年中,福安县委始终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治理整顿的大气候下,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全县实现了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翻一番的可喜成绩。^①

从1985年起,县委就把发展教育事业作为振兴福安经济的战略任务来抓,先后制定了《关于加强教育科技工作》、《关于知识分子若干待遇问题》等一系列政策和规定,增加教育投资,改善办学条件,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1990年,市委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在全市广泛开展“重教、支教、爱教”活动,使全党和全社会形成了重视教育、关心教育和支持教育的良好风气,学校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均迅速发展,初考、中考和高考连续3年名列宁德地区前茅。

1993年,福安市被国务院列为沿海对外开放城市。市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1993年11月召开的福安市第九次党代会上,提出了今后五年全市工作总的指导思想:“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积极推进综合改革试验,加大对外开放步伐,把握机遇,真抓实干,推动福安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大跨度发展。”围绕这一指导思想,市委提出了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工业主导,农业优先,科技领先,基础先行,三产加快,民营突破,城乡共荣,超前发展。”发展布局为:“以城区为中心,以赛岐、穆阳经济开发区和溪柄农业科技园为重点,建设国道沿线经济走廊,实施赛江沿岸经济圈战略,建成甘棠、下白石、社口卫星镇,形成横贯东西、呼应南北的发展格局。”实现“九四翻一番,九七奔小康,九八翻三番,达到全省中上水平”的发展目标。^②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召开后,市委领导班子及时组织学习,并深入乡村、厂矿企业、学校宣讲十五大精神。通过深入学习,

^① 参阅福安市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安市志》油印送审稿。

^② 参阅陈必滔在中国共产党福安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市委提出了福安市新一轮创业的总体指导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指针，以“内增实力、外树形象、稳中求快、争先升位、富民强市”为目标，把握历史机遇，紧紧抓住经济中心，努力向闽东经济中心城市迈进，迅速崛起于东南沿海断裂带，把福安建成海峡西岸繁荣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目标是：到2000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2.7亿元（当年价，下同），年均递增29.1%；财政收入力争突破4亿元。^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目前全市各族人民正在为建设百亿强市而努力奋斗。

四、精神文明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福安县委在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同时，十分重视精神文明建设。1982年10月，县委组织开展以韩阳镇为重点的市容整顿工作，组织社会治安联防，制定文明集市守则和乡规民约，并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四项基本原则”宣讲团到农村社队进行讲演，在城乡开展大规模的以中共十二大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1987年2月，县委作出《关于“七五”期间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施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强“四有”教育，狠抓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教育，改善基础设施，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同时组建了一支以县直机关部、委、办、局为领导，各级工青妇组织和企事业单位政工干部为主体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开辟了县乡两级党校、职工之家、文化中心、农民夜校等联成网络的宣传教育阵地。先后兴建了青少年宫、职工培训中心和电视卫星地面接收站等一批文化教育设施。

1988年~1990年，县委抓住提高公民素质这一核心，深入开展军警民“共学雷锋、共建精神文明、共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岗位学雷锋、行业树新风”和“雷锋、焦裕禄精神在福安”等一系列大

^① 参阅中共福安市委、福安市人民政府1997年12月9日的《福安市汇报提纲》。

型教育活动,以及移风易俗系列活动,学雷锋送温暖系列活动,文明达标活动等。突出治乱、治差、环境净化和环境美化、绿化等工作,并充分发挥共建点的作用,使“文明单位”建设、“三优街”建设以及清理文化市场、城乡环境卫生、绿化等工作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初步形成了温暖、融洽的气氛和文明、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1990年,福安被福建省和宁德地区评为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县城。

1990年福安撤县改市后,市委确立了创建文明城市的总体目标,积极开展创建文明片区、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活动,同时继续坚持岗位学雷锋、行业树新风,大力弘扬正气,使全市涌现出一大批双文明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形成了点、线、面相结合齐抓共建的良好局面。根据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新要求,1993年11月举行的中共福安市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立为本,重在建设。报告强调,要以江泽民同志倡导的新时代创业精神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大力弘扬“团结拼搏、开明守信、务实创新、奉献争先”的现代福安精神;努力提高市民素质,认真抓好文明市民培训中心、文明市民学校和青少年德育基地建设,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从根本上提高市民的道德水准;以“爱我福安、建我福安、美我福安”为主题,深入开展创建文明城市系列活动;做好以城带乡工作,树立整体文明形象,把创建文明城市工作从市区向集镇和广大农村延伸,把精神文明建设和集镇规划、新村建设结合起来,培养一批新村建设和文明乡镇的典型,以此辐射和带动其它乡村共同发展。此后,福安市的精神文明建设迈上了新台阶。

1996年,福安市在经济建设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也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中共福安市委以评选“十佳文明窗口”为契机,广泛组织开展“百家文明窗口竞赛”、“百家文明企业竞赛”

和“十佳服务标兵”、“十佳公仆”、“十佳干警”评选活动,突出岗位练兵和技能操作,全面提高了行业服务质量;城乡综合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全市共有省级文明单位(文明村)14个,地级文明单位40个、文明村17个,市级文明单位115个、文明村62个;继全国学雷锋先进个人王爱莲,全省学雷锋先进分子王永春,“刘胡兰式的金融卫士”林碧玲,见义勇为的革命烈士陈华和全省“十大杰出女性”缪惠琴等一批英模人物后,全市又涌现出“人民的好厂长”郑韩华和“见义勇为模范”黄祖年等一批先进人物;群众性的移风易俗活动取得了重大进展:从1996年7月~1997年9月,在未发生任何纠纷的情况下,完成了国道、省道两旁6143座坟墓的治理,其中迁移坟墓33座,拆除45座,炸毁、平毁20座,深埋5460座,自然绿化605座;双拥共建活动成效显著,福安市先后被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授予“双拥模范城”称号。至1997年,福安市已获得了“全国体育先进市”、“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市”、“全国环保综合治理先进市”、“全国绿化先进市”等光荣称号。^①

五、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

1929年,中共福安县党小组成立时,就十分重视发展畬族党员,建立畬族村党支部,成立畬族村苏维埃政府,培养畬族党员干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牺牲的215名福安畬族革命烈士中,就有县级党政干部4人,区级党政干部11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县委和县政府除了注重选派少数民族干部到民族院校学习外,还十分重视在实践中培养少数民族干部。1956年畬族族称正式确定,1957年福安县即成立了13个民

^① 参阅福安市精神文明办公室提供的《福安市开展创建文明城市活动汇报提纲》(1997年6月5日)等。

族乡。在这些民族乡中,有畬族正副乡长 30 人,占正副乡长总数的 83.34%;畬族乡支部书记 11 人,占乡支部书记总数的 84.62%。1962 年 8 月,在《福安地委关于加强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福安……等四县,应在县直机关科局长以上干部中,安排 1 至 2 名(少数民族干部),少数民族较多的区、社,都应该配备少数民族干部”^①。

80 年代后,培养畬族人才的途径有:

1. 各级民委直接拨款在省内外民族院校、普通高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培训干部。
2. 各级党校通过高考、中考录取畬族学员。
3. 在少数民族人口 1000 人以上的乡镇配备 1 名少数民族干部担任党政班子副职或正职。
4. 从农村基层干部中考核录用干部。
5. 通过大、中专考试直接录取畬族学生。

90 年代除以上途径外,还采取了选送畬族干部到各级党校党政干部中专班、大专班学习,输送畬族干部到沿海发达地区挂职,组织畬族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进行培训等措施,提高少数民族干部的素质。1995 年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统战部和福建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制定《福建省 1995 年~2000 年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工作规划》后,福安市进一步加强了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至 1997 年,全市共有畬族干部 363 名,其中副处级以上 5 人,正科级 17 人,副科级 53 人;少数民族人口 1000 人以上的乡镇都配备了副科级畬族领导干部,三个民族乡均由畬族公民担任乡长。广大畬族干部已成为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的中坚力量。

^① 参阅《福安畬族志》第 264 页,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括号及其内容为作者所加。

第二节 人民代表大会

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1949年12月23日,福安县召开了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标志着福安县人民民主建设的起步。至1953年12月,全县共召开了两届12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每次出席会议的代表均由县人民政府提名,与各界人民群众协商产生。各界人民代表的职责是听取并审议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对本县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重大事项进行讨论并提出建议,做出决议,为全县顺利开展清匪反霸、土地改革、减租减息、镇压反革命、恢复国民经济建设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二、人民代表大会

1953年6月至1954年4月,福安县产生了第一次由人民群众民主选举产生的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选举法》的规定,乡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县人大代表由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在实施普选的基础上,1954年4月召开了福安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标志着福安县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从1954年4月至1997年3月,福安县(市)共召开了12届人民代表大会。其中,1954年4月至1966年2月召开了5届人民代表大会,共举行了14次会议。人民代表大会依法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县长、副县长(人民委员会委员)、法院院长和出席省人代会代表,听取和审议人民政府及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等。第一、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各次会议民主气氛十分浓厚,代表们在肯定政府工作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就存在的问题和失误提出严厉的批评,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体现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1958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代表会议制度和民主气氛受到很大的影响。在此后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福安县人民代表大会被迫停止活动。1978年3月，福安县举行第七届人代会第一次会议，恢复了中断十年之久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从1980年12月举行八届一次人代会至1997年3月举行十二届五次人代会，是福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健全、完善和健康发展的新时期。人代会代表从间接选举进入了直接选举和差额选举，代表的广泛性、先进性和代表性以及参政议政素质不断提高。代表大会听取并审议人民政府、人大常委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听取本县(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财政预决算报告；选举产生县(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县(市)人民政府正副县(市)长、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报上级批准)；就全县(市)的大政方针作出重要的决议和决定，保障福安县(市)民主与法制的建设，促进了全县(市)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稳步发展。在福安市的第十二届人大代表中，共有少数民族代表66名，占代表总人数的16.3%；在全市1337名乡镇人大代表中，有少数民族代表196名，占乡镇人大代表总数的14.7%。

三、人大常委会

福安县1954年~1978年召开的历届人民代表大会均未设常务委员会，人大闭会期间由人民政府行使职权，形成政府自己监督自己的不合理状况。在1980年12月举行的福安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选举产生了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大常委会设立后，依照法律赋予的权力：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重大事项；监督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依法决定副县(市)长的任免；任免人民政府委、办、局的主任或局长；任免人大常委会机关及法院、检察院工作人

员。人大常委会的设立,对于健全福安市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90年下半年换届选举后,在全市19个乡镇设置了人大常委会常设机构。

为提高审议和决策能力,福安人大常委会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和视察工作。1984年~1990年,第九、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组织了68次规模较大的调查研究活动,经过调研产生的报告、建议、决定和决策,对福安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90年代后,人大常委会进一步加强调研和视察工作,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仅在1996年就围绕“两个文明建设”的中心工作和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重点问题,开展了60多次调查活动,就春耕生产中的种子供应、自来水提价、肉猪屠宰、蘑菇生产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撰写调研报告,供有关决策部门参考,使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1997年,福安市人大常委会设置的工作机构有:办公室、法制工作委员会、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科教文卫委员会、民族华侨工作委员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

第三节 人民政府

一、沿革

1949年7月19日福安解放后,7月25日即正式成立福安县人民民主政府。9月20日,福安县人民民主政府易名为福安县人民政府。政府下设秘书室、民政科、建设科、财政科、文教局、地方税征收处和国税办事处。1955年根据国务院的规定,在同年11月举行的福安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作出了关于福安县人民政府改称福安县人民委员会的决定,选举产生了福安县人民委员会县长1人,副县长3人,委员15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1967年3月福安县人民委员会机构瘫痪,随后军队介入地方,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安县人民武装部生产领导小组,负责管理全面工作。1968年4月成立由35名委员组成的福安县革命委员会,统揽全县党政大权。1971年5月召开中共福安县第六次代表大会,重新建立福安县革命委员会,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1980年12月才撤销县革委会,恢复成立福安县人民政府。1981年开始实行党政分开办公。

1990年3月11日,福安县人民政府改称福安市人民政府。其直属机构有:办公室、信访办、体改委、人事局、编委办、宗教事务局、档案局、侨务办、旅游局、民政局、民委、老区办、审计局、计委、物价委、统计局、劳动局、物资局、建委、土地管理局、经委、工业局、交通局、经济协作办、财贸委、财政局、工商局、商业局、粮食局、外经委、监察局、农委、农业局、林业局、水产局、乡镇企业局、茶叶管理局、科委、文化局、广播电视局、教育局、卫生局、计生委、体委、公安局、司法局、二轻局、扶贫办、地方志编纂委、农机管理站、商品房开发公司、外贸公司、供销合作联社、赛岐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驻福州办事处。共56个政府直属机构。

二、机构改革

自80年代中期以来,福安县(市)政府机构经过多次改革,但是均未能有效地精简机构、压缩行政机关工作人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为转变政府职能,更好地为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中共福安市委和市政府加大了党政机构的改革力度。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进一步简政放权,弱化微观管理职能,加强宏观调控、社会保障和监督职能,加强研究制定有关政策的职能,加强用经济和法律手段调控、监督社会经济活动的职能。

根据 1996 年 12 月 30 日市委、市政府《关于福安市党政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在新的“三定”方案中，福安市人民政府的直属机构只设 30 个。即：办公室、计划委员会、经济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安局、监察局、民政局、司法局、财政局、地方税务局、人事局、劳动局、建设委员会、交通局、农业局、水利水电局、水产局、林业局、粮食局、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文化局、卫生局、计划生育委员会、审计局、统计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土地管理局、环境保护局。议事协调机构有综合改革试验区领导小组办公室，财贸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合署的机构有：侨务办公室与政府办公室、物价委员会与计划委员会、技术监督局与经济委员会、机构编制委员会与人事局、宗教事务局与民族事务委员会、乡镇企业局与农业局、体育运动委员会与文化局。合署机构为并列机构，其领导班子和业务工作相对独立，主要领导由市人大常委会任免。

撤销的机构有：农业委员会（职能由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承担）、财贸委员会（职能由财贸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承担）、电机电器管理局（职能由经济委员会承担）、法制局（职能由政府办公室承担）。合并成一个机构保留原来牌子的有：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并入市综合改革试验区领导小组办公室、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并入经济委员会、矿产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并入土地管理局、保密局并入政府办公室。

此外，还有一批政府机构改为事业单位或者转为经济实体。

根据 1996 年 10 月底的统计，全市市级党政群机关共有工作人员 1141 人。按照新的“三定”方案，将精简为 710 人，减少 37.77%。总的要求是加强综合管理部门，精简专业管理部门；充实业务管理人员，精简行政后勤管理人员，以更好地发挥政府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1998年3月,全国九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计划在3年内将国务院部委级机构压缩至29个,将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减少一半。福安市政府制定的“三定”方案,可以说是为这次新的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第四节 人民检察院和法院

一、人民检察院

1951年11月,福安县成立人民检察署,配备干部4人。1955年3月正式成立县人民检察院,负责对国家机关及公务人员的法纪监督,对刑事案件进行审查批捕、公诉以及民事、行政诉讼的司法监督等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检察院被撤销。1978年8月正式恢复,1979年3月开始对外办公,设刑事检察、法纪检察、经济检察3个股和1个办公室,配备干部17人。1982年5月配备干警36人。1988年刑事检察科改设为刑事检察批捕科和刑事检察起诉科,增设控告申诉科,1989年增设贪污贿赂举报室。从1987年起,县人民检察院分别在税务部门、供销社和农业银行设立检察室,处理该系统属于检察部门管辖的案件。1990年4月在穆阳镇设立检察室,管辖穆阳镇和穆云、康厝两个畲族乡。

人民检察院为维护福安县(市)的社会稳定,促进全县(市)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在1980年~1990年期间,县人民检察院共受理提请逮捕1789人,经审查,批准逮捕1612人,不批准逮捕123人,增捕漏犯38人;通过审查起诉,共挖出公安机关移送案件遗漏案犯25人;依法向上级法院提出抗诉案件11件16人,已改判6件6人,维持原判4件7人,1990年尚在审结的1件3人。共受理各类经济案件299件,立案侦查187件250人,其中贪污案(包括挪用)102件136人、贿

赂案 36 件 44 人；侦查终结 182 件 226 人，分别占立案总数和案犯人数的 97% 和 90.4%，其中起诉 103 起 128 人，免诉 58 起 77 人，共追回赃款上缴国库 10,646.67 万元，为国家和集体挽回了大量的经济损失。

1996 年，福安市人民检察院认真贯彻中央关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指示精神，坚持“严格执法、狠抓办案”的工作方针，集中力量查办贪污、贿赂等大案要案，依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加强法制监督，各项检察业务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全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案件 25 件 32 人，至年底已侦查终结 24 件 31 人，清理历年积案 8 件 8 人，向法院起诉 13 件 16 人，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直接经济损失近 300 万元；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犯罪嫌疑人 587 人，经审查及时批准逮捕 476 人；受理公安机关转送起诉和免诉案件 290 件 448 人，经审查已依法上报分院审查起诉重特大刑事案件 22 件 59 人，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43 件 343 人，免于起诉 27 人；受理各类法纪案件 32 件，经调查立案侦查徇私舞弊、玩忽职守、非法拘禁、重大责任事故等类型的法纪案件 14 件 20 人。此外在办案中还及时解救人质 12 名，挽回经济损失 50 多万元。

二、人民法院

1949 年 10 月，福安县人民政府设置的司法科共有 5 名工作人员。1950 年 12 月成立福安县人民法庭，庭长由公安局长兼任，主要任务是保障土地改革政策的顺利实施。1953 年 1 月撤销县司法科，正式成立福安县人民法院。1968 年 4 月，县人民法院实行军事管制，审判职能由县革委会保卫组取代。

50 年代初，福安县人民法院主要是开展刑事和民事审判。刑事审判是依照党中央颁布的有关刑事法规和政策，配合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等运动开展审判工作。1953 年 10 月至

1956年12月,共审结各类刑事案1442件,其中反革命案489件,破坏经济建设及侵害国家财产案277件。民事案件主要是审判婚姻、房屋、继承、赔偿、赡养等民间纠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民法院审判制度得到恢复和不断完善。除审理刑事、民事案件外,1981年9月成立了经济审判庭,加强了经济审判工作。从成立经济法庭至1987年底,共受理各类经济案451件,其中审结336件,已办结案件标的金额共10,566.63万元,依法打击了一批经济犯罪分子,保护了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利。1987年4月正式成立行政审判法庭,到1990年底,共审结行政诉讼案件46起。

90年代以来,福安市人民法院在推进审判方式改革,提高司法水平和队伍整体素质,改善执法条件,充分发挥审判职能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化解了大量民事纠纷,为国家和集体挽回了大量经济损失,维护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1996年,福安市人民法院全年共审结各类案件2467件,标的金额1.16亿多元。其中:审结刑事案件322件,民事案件1138件;审结各类经济案件286件,标的金额9907.52万元;审结行政诉讼案68件;执行结案553件(其中经济79件,民事377件,行政65件,其它32件),标的金额1748.1万元。为全市经济和社会的改革、发展和稳定提供了较好的司法保障。

第五节 人民政协和社会团体

一、人民政协

1956年9月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安县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出席委员48人,代表13个界别。会议选举产生常务委员21人,其中主席1人,副主席3人。至1997年,福安县(市)人民政协共召开了八届委员会,政协委员从第一届的48人增

加到第八届的 185 人,代表界别由 13 个扩大到 21 个。主要民主党派团体有民盟福安市委员会、农工民主党福安市委员会、宁德地区黄埔同学会等。其中农工民主党共有党员 149 人,以教育、科技界为主;民主同盟有盟员 93 人,以科技界为主。宗教派别有佛教、天主教、基督教、道教,其中信仰天主教的群众达 5 万多人,是全国天主教信徒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少数民族有畲、回、满等 10 个民族,其中畲族人口 5.8 万,是全国畲族人口最集中的县(市)。此外还有侨胞侨属 6000 多人,原工商业者 1600 多人。1997 年,福安市人民政协共设有 9 个专门委员会、3 个科级办事机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福安县(市)人民政协通过参政议政、办理提案、组织调查和考察、学习宣传等形式,对全县(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仅在第四至第六届政协期间,就接受委员提案 463 件,办理提案已成为政协委员行使民主权利、对政府工作提出建议和意见的重要渠道。1986 年~1987 年,县政协先后组织开展对市场物价、水果生产、畲族乡村缺医少药等问题进行专题调查,1988 年~1989 年共组织了 41 次调查考察活动,均写出相应的调查报告,为县委和县政府的各项决策提供依据,做到监督于执行之中。政协正副主席、常委、委员根据工作需要经常列席参加县(市)委、人大和有关部门召开的重要会议,参与地方大政的研讨和决策。90 年代以后,福安市政协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方面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市委先后转发了《福安市政协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由联系政协工作的副书记具体负责协调落实;市政府也指定一位副市长联系政协工作,并就政协委员提案办理作出“优办”、“特办”等三项决定,促进了市政协履行职能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使政协在福安市的新一轮创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群众团体

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福安即设有商会。1898年成立福安教育会,清末民初即设立农会组织。1919年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紫阳小学师生发起成立福安县学生联合会组织。这些社会团体对福安县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较大影响。

1928年成立的赛岐反帝大同盟分会和1930年成立的赛岐红色工会,均是由中共党员领导的工人组织。1931年,溪柄一带有中共福安县委领导的秘密农会和赤色工人联合会,同时还成立了妇女联合会、共青团、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这些群众组织作为苏区政权的组成部分,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成立了工会、妇女联合会、共青团、工商界联合会、科学技术协会、华侨联合会、个体劳动者协会、文艺界联合会、老人会、关心下一代协会等群众团体。这些群众团体代表各行各业和各阶层的利益,成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纽带,起到了团结各界人士参政议政的重要作用。

目前福安市的社会团体主要有:

(一)总工会 1950年6月建立筹备委员会,1951年5月召开第一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总工会并设置日常办公机构。1990年全市共有基层工会184个。自50年代以来,福安各级工会在组织职工开展以增产节约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活跃职工的文化体育生活,增强职工的主人翁意识,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均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二)工商业者联合会 1953年5月成立筹委会,同年6月正式成立福安县工商业者联合会。50年代~60年代,县工商联组织工商业者及其家属参加政治学习,安排有代表性的人物担任厂长、经理等职务。80年代以后,县工商联积极开展工商咨询服务,组织调查研究,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并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工

作。

(三)共青团 1950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福安县工作委员会,1957年6月改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福安县委员会。1990年全市共有基层团委27个,团总支37个,团支部800个,团员18,656人,其中少数民族团员2149人。

(四)妇女联合会 1951年12月成立县民主妇女联合会,1957年12月改称福安县妇女联合会。80年代后,县妇联先后动员了数万名妇女参加治理“脏、乱、差”活动,组织“学雷锋小组”、“三八服务队”等开展“双文明”建设活动,涌现出一批全国、省、地、县(市)级的“三八红旗集体”和“三八红旗手”,推动了全县(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

(五)科学技术协会 1956年9月成立福安县科学技术普及协会,1958年10月改称为福安县科学技术协会。县(市)科协是推动福安县(市)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力量。1990年,福安市科协下设办公室、科技咨询服务站、食用菌技术咨询开发中心等机构,下辖25个市级科技学会、协会和研究会,19个乡镇科协,2个企业科协,46个群众团体会员。

(六)归国华侨联合会 1981年正式成立。根据1982年的调查,全县共有侨胞(包括外籍华人)、港澳同胞、归侨和侨眷666户3018人。自县侨联成立后,先后在归侨、侨眷比较集中的乡镇、县直机关单位、学校和银行系统建立了侨联小组,其主要任务是沟通侨情,积极为归侨及侨眷排忧解难。各级侨联也是吸引外商和港澳台商在福安投资的积极力量。

(七)个体劳动者协会 1984年10月成立,各乡镇设有9个分会。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个体经营发展较快,1987年已增加到5804户,会员达3500多人。90年代以后,个体经营者走向联合经营、合作经营和股份合作制经营的速度明显加快,个

体劳动者协会的机制和作用也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在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协助工商部门加强对个体户和市场的管理等方面均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六节 民族工作和民族关系

畲族迁入福安的历史可追溯至唐代。明代中叶以后闽南畲族贫苦农民陆续迁居福安,在山区从事垦荒种植。以山为基、以农为本的畲族村以盛产“畲禾”、靛菁、苧麻著名,同时还生产番薯等山地作物,同汉族人民一道为开发福安作出了贡献。各族人民和睦相处,是畲族同胞世代繁衍、广泛分布于福安各地的基本条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中,性格悍烈的畲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一道,踊跃参加红军,投身土地革命,创建苏维埃红色政权。在土地革命失败后的三年艰苦游击战争中,竹洲山畲族山区成为闽东苏维埃与红军的重要依托地,畲族同胞以“最勇敢”、“最能保守秘密”著称,与汉族人民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是,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为了达到其统治压迫的目的,挑拨汉、畲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转“畲”字的音义为“蛇”、“邪”,或者将“畲客”的称谓加以侮辱性的字眼,常常引起相互辱骂,造成畲汉人民之间的纠纷。故畲族人民中流传五怕:“一怕抓丁,二怕派夫,三怕苛税,四怕逼租,五怕辱骂”^①。畲族住在山区无山权,许多畲族农民住的房屋没有石制柱基,仅用木制柱基,以示房屋地基不属自家所有;畲族农民进入深山开垦荒地植树造林,山场亦时常被汉族地主占有。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本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之前^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消灭了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福安县

^① 参阅《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34~13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 参阅《福安畲族志》第250~251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的民族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中共福安县委和县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关系问题,1953年,县委在《福安县少数民族工作总结》中指出,要联系福安的实际情况,启发全县人民争取民族之间的团结,消除民族间的歧视、隔阂,唤起全县人民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50年代开始,大批的汉族干部到畲族地区工作,同时也有大量的畲族农民到汉族地区修建水利和公路,密切了畲族和汉族人民之间的联系,建立和发展了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

80年代,中共福安县委和县政府更加重视民族问题。1983年11月设立了福安县民族事务委员会,把民族工作摆在重要议事日程,并且确立了搞好民族团结和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基本方针。县委、县政府要求各乡镇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对畲族地区经济发展实行倾斜政策,措施要有力,在资金和物资分配上给予照顾。1987年~1989年,全县42个县直属机关单位与42个畲族村挂钩,帮助畲族群众脱贫致富;教育局为提高畲族地区的教育质量,建立了民族职业中学、民族实验小学和15所民族重点小学,形成了民族教育网络;组织、人事部门注重发现、培养和配备民族干部;文化部门在畲族村设立文化站,组织力量挖掘与整理畲族文化资料,出版《畲族民间故事》;妇联、卫生局、妇幼保健院到畲族乡村进行妇科疾病普查治疗;工商联、农委、农业局到畲族地区举办科技培训班等,有力地支持了畲族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谱写了福安县民族团结的新篇章。1988年,福安县民族实验小学、坂中畲族乡人民政府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称号。1989年12月,福安县召开民族团结表彰大会,共表彰先进集体40个,先进个人35名,其中汉族15名。

进入90年代,市委和市政府加大了对畲族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扶持力度,民族团结与共同发展繁荣成为90年代福安市民族关系的主旋律。全市市直机关均与畲族贫困村挂钩,市级领导包贫

困户(每名包两户),并制定了严格的目标责任制,限期使这些贫困村、贫困户脱贫致富。尤其是1994年~1997年期间,福安市对居住在生产生活条件恶劣山区的农户实施异地搬迁的“造福工程”,至1996年底,已累计搬迁畲族群众662户3318人,使这些搬迁群众获得了新的发展机会。畲族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取得了巨大进展。据福安市民委提供的资料:至1997年10月底,全市78个畲族行政村已实现村村通公路、通水、通电、通电话,电视信号覆盖率达到100%,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不少1997年刚通公路的畲族村,已开始出现运输专业户,农民的生产经营渠道明显拓宽,从而为加快畲族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福安市各族人民正在逐步走向富裕,这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实践,也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重要体现。

第三章 经 济

第一节 经济发展概述

一、福安经济发展史略

福安地区的经济开发活动较早。唐代溪北洋的围垦就已经完成,唐末黄崎(今下白石)港经过疏凿后,航运便利,黄崎港因此而成为长溪(交溪)流域第一大镇,商贸极其繁荣。

宋代福安的农业已具有一定规模,渔业捕捞和养殖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宋绍兴十年(1140年)甘棠塘堤围筑竣工,为当地增添了万亩良田,表明农田基本建设在当时已经受到重视。明代中叶以后,闽南畬族贫困农民成群结队迁居福安从事垦荒种靛,对福安地区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清代,造船、制茶、制糖业等均有了一定的规模,农业、水运业、手工业、商业以及渔业生产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坦洋功夫茶饮誉海内外。

民国时期,农业在福安的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民国二十五年,全县粮食总产 3.93 万吨,其中稻谷总产 1.8 万吨。全年人均占有粮食 165 公斤。据民国二十六年《福安人口农业调查》资料,在调查的 1124 户农民中,共有自耕农 245 户,半自耕农 280 户,佃农 599 户,佃农和半自耕农占调查农户总数的 78.20%,表明土地主要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故农民除耕种外,不得不从事副业生产,以增加收入来源。副业以茶叶为最大宗,最高年产茶叶 1800 余吨。畬族内部的地主和富农都极少,绝大多数均为贫雇农,而畬族

的中农和贫农很少有土地,都是租种附近汉族地主的土地^①。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封锁了出海口,使福安的土特产外销通道受阻,造成大批茶园荒芜,茶叶产量不及正常年景的十分之一,有些农户干脆放弃采摘,任凭茶树老化、荒废,使福安经济受到很大的打击。抗战胜利后,轮船运输恢复,福安经济也逐渐复苏,在县境内形成了县城、赛岐、下白石、社口、穆阳、甘棠等主要集市,全县共有商店817家,资本额5787.9万元(国币元)。但全县仍无现代工业,农业、副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方式落后,人民生活困苦不堪。

1945年,福安作为闽东首府,地方财政经常项目岁入为2462.27万元(国币元,下同),岁出1467.84万元;临时部分岁入1121.19万元,临时岁出1467.87万元。县地方公有田产3247亩,年收入21.36万元,得租谷184.2吨。福建省银行在福安设有分行,并在赛岐和穆阳设有办事处,年度春耕贷款255.37万元,核定茶叶贷款100万元。当年全县共有制茶厂60余所,工人1000余名,制糖、榨油、制伞等工厂或作坊各有数百人。全县从事手工业者总计约5000人。

1949年,福安县工农业总产值1696.22万元(1970年不变价,下同)。其中,农业总产值1522.39万元,占89.75%;工业总产值173.83万元,占10.25%。

二、1949年~1978年的经济建设

(一)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福安县也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相继开展了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全县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在1949年~19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全县的粮食总产量由39,341吨提高到51,986吨,增

^① 参阅《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36~137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幅高达 32.14%。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 年~1957 年),全县的工作重心是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推广科学种田知识。5 年间,全县共兴修中小型水利工程 835 处,推行了水稻的单季稻改双季稻种植,在推广合理密植、合理施肥、选育良种以及开展土壤改良、抗旱防涝等方面均取得了重大成就。1957 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 69,548 吨,分别比 1949 年和 1952 年增长了 76.78% 和 33.78%。林业开发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53 年~1956 年期间共造林 12.04 万亩,茶园面积增加到 9.1 万亩,茶叶的单产和总产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油茶生产由于推广了中耕除草技术,使油茶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了一倍以上。在工业方面,全县兴建了 17 家工厂,1957 年全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1160.86 万元(1970 年不变价),比 1953 年增长近一倍。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也由 1949 年的 10.25% 提高到 1957 年的 27.86%。经过全县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一五”时期的各项经济指标基本上提前一年完成。

(二)“二五”时期 1958 年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由于脱离实际,过高地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使福安经济遭受了严重损失。在“大跃进”的浪潮中,仅从 1958 年 8 月 28 日至 9 月 10 日的十多天里,全县就建立了 15 个人民公社,实现了全县的人民公社化。由于福安地处我国的沿海前线,人民公社实现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中化;在经济上强调“一大二公”,对社员实行以供给制为主的平均分配制度。全县办起了 3569 个食堂,并错误地估计粮食已经过关,让社员“放开肚皮吃饱饭”。在“大炼钢铁”的运动中,为确保“钢铁元帅升帐”,不顾条件地大搞土法炼钢,没有燃料就大量砍伐林木,没有原料就搜集民用铁锅铁器回炉炼钢铁,但炼出的大多是无用的烧结铁和废钢渣;所建的 2760 多个炼钢炉后来除个别改建为小铁厂外,其余的均毫无用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搞乱了生产关系,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给全县

的经济建设造成了巨大损失。1962 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 3343.91 万元(1970 年不变价,下同),比 1958 年下降了 32.71%。其中,农业总产值 2089.63 万元,工业总产值 1254.28 万元,分别比 1958 年下降了 30.47% 和 36.14%。

但是,这一时期在修建公路、水利工程和发展工业方面仍然取得了重要成果,为以后福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尤其是 1958 年 10 月创办的闽东(福安专区)电机厂,为福安后来发展成为享誉全国的“电机城”奠定了基础。

(三)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从 1961 年起,福安同我国的其他地方一样,开始执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贯彻《农业六十条》,缩小农村社队规模,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大队对生产小队实行“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成本和超产奖励),保护生产队的小部分所有制。为解决当时最急需的粮食问题,福建省委作出决定:当年冬种期间,每户社员可向生产队借种一亩地,有条件的生产队还可超过一亩,谁种谁收归谁所有,并允许社员有一部分自留地。这项措施对渡过当时的困难,以及对恢复和发展生产都起到了重要作用。1962 年 10 月,全县在调整生产关系的同时,适时地提高了粮食的收购价格,并对粮食收购实行超购加价和奖励的办法,同时开放农村集贸市场,活跃农村经济。在此后开展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福安县委对“左”的一套有所抵制,抓住群众最关心的生产问题,把增产作为搞好运动的标准之一。1965 年投资 452.2 万元,分别修建了茜安水渠和龙溪水渠,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同年还推广种植早稻矮秆品种,使水稻亩产提高到 263 公斤,比传统的高秆品种增产 41.4%。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全县农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65 年,全县粮食总产 6.85 万吨,比 1962 年增长 25.57%;社员家庭收入三年间分别增长了 49%、8.5% 和 47.9%,户均副业收入 19.5 元。

在工业方面,福安县对那些原料不足、产品质量差、亏损大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以及急需发展的工业部门,提高基本建设的效益,工业生产形势因此也明显好转。1965年,全县工业产值1722.38万元(1970年不变价),比1962年增长了37.32%。1963年~1965年,福安县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1%,是改革开放前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

(四)“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福安县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冲击。在农村,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和“备战夺粮”,大砍经济作物,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工业领域批判“唯生产力论”和“利润挂帅”,许多合理的规章制度被废除,导致了纪律的松懈和生产的混乱。但由于广大干部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自觉抵制,福安县经济还是在挫折中实现了缓慢增长。1976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9889.10万元(1970年不变价,下同),比1966年增长了73.79%,年均递增5.68%。其中,农业总产值5166.26万元,工业总产值4722.84万元,分别比1966年增长了45.98%和125.2%。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上升到47.76%。

三、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福安的经济建设从此进入了一个健康稳定发展的新时期。

1982年,福安县党委和政府开始在全县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原有的人民公社体制被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形式并存的新体制所代替,从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出现了快速增长。1985年全县农业总产值达9692.25万元(1980年不变价,下同),比1980年增长了58.67%,年均增长

9.67%；在工业方面则进行了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增加了企业的留利水平，并且根据福安县的资源条件和发展潜力，确定了重点抓好的七大工业行业，把电机电器作为福安工业发展的重点，同时还采取措施大力发展乡镇工业，从而使工业也获得了较快发展。1985年，全县实现工业总产值12,460万元，比1980年增长103.16%，年均递增15.23%，超过了全国（12%）、全省（13%）和宁德地区（10.5%）的同期增长速度。

“七五”期间（1986年～1990年），福安县党委和政府把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引入城市工商系统，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同时推行各种形式的经营管理责任制，实行责、权、利相结合，逐步解决企业职工吃“大锅饭”的弊端。从1988年起，福安县开始实施沿海发展战略，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使全县国民经济出现了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的好势头，取得了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翻一番的可喜成就。1990年实现工业总产值39,463万元（1980年不变价，下同），农业总产值14,592万元，分别比1985年增长了2.17倍和50.55%；乡镇企业增加到5533家，乡镇工业产值达16,584万元。全市商业网点增加到5025个，社会商品零售总额30,993万元，比1985年增长92%。

进入90年代，尤其是邓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讲话后，福安市党委和政府加大了改革开放的力度，使全市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1996年，全市完成国民生产总值28.16亿元（当年价，速度按可比价），比1990年增长2.09倍；实现工农业总产值36.64亿元（1990年不变价，下同），其中农业产值7.53亿元，工业产值29.11亿元，分别比1990年增长3.14倍、1.14倍和4.44倍。1991年～1996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和工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高达20.7%、26.7%、13.5%和32.6%，是福安市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财政收入也保持了快速增

长,1996 年达 17,396 万元(当年价),比 1990 年增长了 3.01 倍,年均递增 26.05%,比同期财政支出的年均增长速度高 5.79 个百分点,从而改善了财政收支状况,财政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 1985 年的 48.76%提高到 1996 年的 93.15%,财政自给能力大为提高。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福安市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1995 年进入了福建省县级经济发展与实力评估的发展速度第 14 位和综合实力第 16 位(全省共有 63 个县及县级市);1996 年经济实力和水平居宁德地区 10 个县(市)之首,农民人均纯收入 2232 元,居宁德地区 10 县(市)的第二位。

第二节 农业和农村经济

农业是福安市的基础产业,也是农村多种经营的基础。1996 年,全市实现农业总产值 140,768 万元(当年价,下同),完成农业增加值 9.15 亿元,占全市国民生产总值的 32.98%,略低于工业,在三大产业中位居第二。

一、农业生产条件和生产技术

(一)农业耕地 福安的农业耕地主要沿交溪水系分布。土地平坦、面积较大的有甘棠洋、溪北洋、柏柱洋、溪柄洋等 4 个小平原。根据 1981 年的土地资源调查,全市有耕地总面积 332,028 亩,占土地总面积的 11.78%。在耕地中,水田 265,371 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79.92%。其中,有 11.78 万亩水田分布在海拔 100 米以下,占水田总面积的 44.4%;海拔 100 米~300 米的水田 6.17 万亩,占水田总面积的 23.3%;其余 32.3%的水田均分布在海拔 300 米以上。旱地 66,657 亩,占全市耕地总面积的 20.08%。至 1990 年底,全市耕地面积 326,609.98 亩,比 1981 年略有减少,农

业人口人均耕地 0.727 亩,土地资源的约束较重。3 个畲族乡的人均耕地面积略高于全市的平均值:其中康厝畲族乡人均耕地 1.04 亩,穆云畲族乡人均 0.88 亩,分居全市各乡镇人均耕地面积的前两位;坂中畲族乡人均耕地 0.79 亩,亦略高于全市的平均水平。

(二)水利条件 福安地处交溪中下游,承受上游泰顺、寿宁、霞浦、柘荣和周宁等地的河水汇流过境,每当夏秋季节遇台风暴雨,河道渲泄不及,常常酿成洪灾;又因夏旱十分严重,故历代均有修堤筑坝之举。1949 年,全县共有灌溉百亩以上的引水工程 136 处,灌溉面积 2.55 万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四十年的努力,共建成蓄水工程 35 座,灌溉面积百亩以上的引水工程 54 处,各种提灌工程 190 处。至 1990 年,全市共有各种水利设施 6021 处,有效灌溉面积 17.89 万亩,占全市农业耕地总面积的 54.78%,防旱、防洪水利工程系统已初步形成。

(三)农业机械和电气化水平 福安属多山地区,农业机械的推广使用较为迟缓,直至 1958 年才购入两台尤特兹-45 型拖拉机进行试耕。60 年代~70 年代,农业机械有了一定的发展,主要是采用中型拖拉机,机耕面积逐渐增加。1980 年,全县共有农用拖拉机 1009 台,机耕面积 6.8 万亩,约占耕地总面积的 21%。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户开始个人购买拖拉机,故适合家庭经营的小型东风-12 型手扶拖拉机较受欢迎。1990 年,全市共有手扶拖拉机 1219 台,中型拖拉机 40 台,总功率 12,189 千瓦。当年机耕面积 9.2 万亩,约占水田总面积的 35.3%。农业的公路运输、粮食加工等已基本实现了机械化。

福安的水力资源丰富,水能资源开发的潜力很大。农村水电站的建设始于 1956 年,至 1990 年全市先后建成水电站 168 座,其中因效益较差等原因已报废 131 座,尚存的 37 座装机容量共 2.8 万千瓦,年发电量约 1.15 亿度。1996 年,全市乡村及村以下的小

水电站 38 处,装机容量 1.09 万千瓦,年发电量为 2103 万度。全市有 12 个乡镇建有水电站,其中康厝畲族乡有 6 座水电站,装机容量 920 千瓦,其水电站数量居全市各乡镇之首。坂中和穆云畲族乡各建有 1 座水电站,装机容量分别为 500 千瓦和 20 千瓦。1996 年全市农村用电 4999 万度,农村人口人均用电 97.46 度。3 个畲族乡人均用电的情况为:穆云 35.85 度,康厝 39.74 度,坂中 442.44 度。穆云、康厝两个畲族乡的人均用电量只及全市农村人均水平的 36.78% 和 40.78%;坂中畲族乡人均用电量则是全市农村人均水平的 3.54 倍,主要是坂中经济开发区用电量大之缘故。至 1997 年 7 月,福安市的所有行政村均实现了通电。

(四)农业化肥使用水平 1949 年以前,福安的农作物种植主要使用农家肥。50 年代,化肥的使用量逐年增加,但农家肥也仍然是最重要的有机农业用肥。传统的有机农家肥主要有人畜粪尿、绿肥、堆肥、垃圾肥、海肥、灰肥(草木灰等)。70 年代以后,化肥的使用量迅速增加,1984 年达到 34,458 吨(按实物量计算,下同),按耕地面积计算平均每亩超过了 100 公斤。此后化肥的使用总量大体均保持在该水平,只是化肥的使用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6 年,全市农村共使用化肥 34,345 吨,与 1984 年基本持平,按农作物播种面积计算平均每亩 40.04 公斤。平均每亩农田施用化肥的结构为:氮肥 21.49 公斤,磷肥 8.12 公斤,钾肥 0.52 公斤,复合肥 9.91 公斤。广大农民已基本掌握了平衡施肥技术。3 个畲族乡按播种面积计算平均每亩农田施用化肥的情况为:坂中 31.43 公斤,穆云 25.84 公斤,康厝 62.09 公斤。

(五)耕作制度 早在宋代,福安就开始一年种植两季谷物。清代,少数沿海地区农村开始种植双季稻。民国时期,南部沿海乡村已比较普遍地种植双季稻,山区及平原坂田、部分水田开始稻、薯轮作,西北部山区的大部分山垌田还是蓄水浸冬,一年一熟。

1950 年~1970 年,福安农业主要推广单季稻改双季稻、间作

稻改连作稻,双季稻的种植面积从 1952 年的 3 万亩增加到 1970 年的 12 万亩,复种指数由 122 提高到 170 左右。70 年代中期,曾以“备战夺粮”为口号,强行在半山区、山区和高山区推广双季稻,全县的双季稻种植面积达到 18 万亩~20 万亩,占水田面积的 80% 以上。但因“三寒”(霜、冻、寒露风)危害,常发生烂秧、不抽穗等现象,实际上得不偿失。1979 年以后,随着杂交水稻良种的推广,双季稻的种植面积大体保持在 12 万亩~12.5 万亩之间;复种指数由 70 年代中期的 200 调整到 180 左右,使水稻的总产、单产都达到较高的水平。从 1988 年起,在种双季稻光热不足、种单季稻有余的半山区推广种植再生稻,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旱地曾实行旱改田发展双季稻。原来“麦-豆-薯(稻)”的传统耕作制度,1960 年后几近绝迹;“麦-薯”的耕作制度亦因种小麦经济效益差,其种植面积逐年减少。

根据 1982 年的农业调查,福安的农业耕作制度主要有 25 种类型。其中:“早稻-晚稻-冬闲”耕作方式的面积 12.07 万亩,占水田总面积的 45.93%;“早稻-晚稻-油菜”面积 0.61 万亩,占 2.32%;“早稻-晚稻-小麦”面积 1.26 万亩,占 4.79%;“早稻-秋番薯”面积 2.21 万亩,占 8.41%;“单季稻-冬闲”面积 7.82 万亩,占 29.76%;其它的水田耕作方式合计占 8.79%。旱地的耕作类型主要有:“番薯-冬闲”面积 2.96 万亩,占旱地总面积的 47.59%;“番薯-蔬菜”0.63 万亩,占 9.97%;“番薯-小麦”1.79 万亩,占 28.78%;“番薯-马铃薯”0.26 万亩,占 4.18%;其它的旱地耕作类型合计占 9.48%。

二、农业经济结构

福安的传统农业以种植业为主,而在种植业中又以粮食生产为主。这种格局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种植业 主要包括粮食、经济作物和其它农作物的种植^①。1996 年全市农作物播种面积 85.77 万亩,实现产值 61,177 万元(当年价,下同),占农业总产值的 43.46%。

1.粮食生产。1996 年,福安市的粮食种植面积 61.74 万亩,占当年农作物播种面积的 71.98%,比 1990 年增加 10.37 万亩;粮食总产 17.78 万吨,比 1990 年增产 19.59%,平均亩产 288 公斤。当年粮食产值 24,036 万元,占种植业生产值的 39.29%。粮食生产以水稻为主,1996 年水稻种植面积 37.15 万亩,稻谷总产 13.25 万吨,分别占粮食种植面积的 60.17%和粮食总产的 74.52%,稻谷产值 20,498 万元,占粮食总产值的 85.28%;番薯次之,1996 年种植 9.22 万亩,占粮食种植面积的 14.93%,产值 1994.59 万元,分别占当年种植业产值的 3.26%和粮食总产值的 8.30%。比较重要的粮食作物还有马铃薯、小麦、大豆,1996 年的种植面积分别为 5.94 万亩、4.04 万亩和 3.99 万亩,其余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都在 5000 亩以下。

2.经济作物。主要有油料、麻类、糖蔗、果蔗、烟叶、药材、茉莉花等作物的种植。1996 年,全市经济作物种植面积 4.11 万亩,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 4.78%;产值 2915 万元,占种植业产值的 4.76%。在各种经济作物中,糖料蔗、药材和茉莉花的产值分居前三位,其产值分别为 996.40 万元、791.04 万元和 638.40 万元。显然,经济作物种植在福安市的农业中居比较次要的地位。

3.其他作物。主要包括蔬菜、瓜类(西瓜)、饲料和各种绿肥等,1996 年种植面积合计 19.92 万亩,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 23.22%。其中,蔬菜的种植最为重要,当年种植 15.26 万亩,年产蔬菜 11.93 万吨,产值 11,332 万元,占种植业产值的 18.52%。

^① 在福安市统计局提供的资料中,按农作物播种面积计算的种植业只包括粮食、经济作物和其他作物的种植,而按产值形态统计的种植业则包括了水果、茶叶、食用菌等的生产。为便于分析,本书将水果、茶叶和食用菌生产均列入种植业中。

瓜类的种植面积比较小,1996 年全市仅种植 5820 亩,总产 6902 吨,产值 358.9 万元。绿肥主要有紫云英,1996 年各种绿肥种植面积合计 2.32 万亩;饲料种植面积 1.64 万亩。

4. 茶叶和水果。福安的种茶业有悠久的历史,种茶也历来是农民的重要收入之一。1996 年,全市共有茶园面积 15.14 万亩,其中可采摘面积 14.26 万亩,当年新植茶园 1567 亩,全年茶叶总产 10,910 吨,产值 6873.3 万元,占种植业总产值的 11.24%。福安的茶叶生产以绿毛茶为主,1996 年绿毛茶产量达 10,868 吨,产值 6846.84 万元,均占全市茶叶总产量和产值的 99.62%。

改革开放以来,福安的水果生产发展较快。1978 年水果的总产量只有 508.95 吨,1990 年增加到 1.08 万吨,1996 年则达 3.82 万吨,分别比 1978 年和 1990 年增长了 74.1 倍和 2.54 倍。1996 年全市共有果树面积 10.88 万亩,比 1990 年增长了 60.71%。其中,当年可采摘面积 7.78 万亩,当年新植面积 4625 亩,发展势头依然很快。1996 年的水果产值 7843.84 万元,占全市种植业产值的 12.82%。在福安市的各种水果中,以优质龙眼的发展速度最快,1996 年龙眼树的面积已达 1.68 万亩(其中可采摘面积 2654 亩,当年新种面积 1220 亩),产量 1220 吨,分别比 1990 年增长了 3.14 倍和 30.28 倍;产值 1561.6 万元,占全市水果总产值的 19.91%。由于目前龙眼的采摘面积仅是其种植面积的 17.79%,而且未采摘的果园有相当部分是近几年推广种植的晚熟优质龙眼,因此一旦进入成熟期,其产值增长的潜力很大。其他水果的主要品种有芙蓉李、葡萄、橄榄、柑橘等,1996 年的产值分别为 2267.88 万元、1003.2 万元、851.4 万元和 763.16 万元。晚熟荔枝、水蜜桃等优质水果的发展速度也很快。

5. 食用菌生产。福安县历史上就有食用菌记载。1958 年从上海引进技术开始进行食用菌的人工栽培。70 年代后食用菌的人工栽培技术推广较快,至 1990 年已开发了蘑菇、香菇、银耳、凤

尾菇、金针菇、竹荪、猴头菇等人工栽培的食用菌品种,食用菌的生产与加工也因此成为福安市农业中的重要产业之一。1996年全市的食用菌总产量达1.51万吨,产值6156.66万元,分别占种植业产值和全部农业总产值的10.06%和4.37%。福安市的食用菌生产以蘑菇为主,1996年蘑菇种植面积221.78万平方米,总产1.41万吨,比1990年增长了1.08倍,蘑菇产值6095.69万元,占食用菌生产总值的99.01%,是福安市食用菌生产的龙头产品。

(二)林业 福安属多山地区,林业资源比较丰富,境内生长的杉、松、樟、桐树以及绿竹、毛竹等均有很高的开发利用价值,林副产品也极为丰富。在1989年召开的福安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根据县人大常委会的议案,作出了《关于以林兴县兴林致富的决议》,要求大力发展林业生产。1996年,全市的林业产值7627万元,占全部农业总产值的5.42%。其中,村及村以下竹木采伐产值2678万元,林副产品(包括油茶籽、竹笋、香菇等)产值4276万元,营林产值223万元。林副产品生产以香菇的生产为最大宗,1996年香菇总产683吨,产值2691万元,居全市林业及各项林副产品之首;竹笋产量361吨,产值364.61万元;黑木耳产量121吨,产值358.16万元,二者分居林副产品各业的二三位。竹木砍伐中:木材砍伐2669立方米,产值1441.1万元;毛竹砍伐169万根,产值768.95万元。

(三)畜牧业 福安农村畜牧业以肉猪的饲养为主,家禽的饲养亦占有一定地位,而水牛和黄牛的饲养则主要是役用,乳牛的饲养极少。1996年,全市的畜牧业产值30,718万元,占全部农业总产值的21.80%。在畜牧业结构中:年末生猪存栏17.56万头,当年出栏19.1万头,产值26,074万元,占畜牧业产值的84.88%;年末羊存栏3.88万头,当年出栏2.48万头,产值386万元,占畜牧业产值的1.26%;年末牛存栏7022头,其中水牛6256头、黄牛382头、乳牛384头,当年出栏1192头,产值74万元,仅占畜牧业

产值的 0.24%；家禽产品产值 2261 万元，占畜牧业产值的 7.36%；牛奶、禽蛋产品产值 1893 万元，占畜牧业产值的 6.16%；其它畜产品产值 30 万元，占畜牧业产值的 0.01%。

(四)渔业 福安的渔业包括海洋渔业和淡水渔业。据 1982 年的农业资源普查，福安的水域面积 49.59 万亩，其中淡水水域面积占 65.68%，咸水水域面积占 34.32%。从事海洋渔业的只有甘棠、下白石、湾坞和溪尾 4 个乡镇，淡水渔业则分布在福安的各乡镇。1971 年，海洋捕捞水产品产量 5123.8 吨，为历史最高纪录，此后由于资源衰减，海洋捕捞水产品的产量有所减少。1978 年以后，随着农村生产责任制的逐步建立，海洋养殖技术也有了较大的提高。1990 年，水产品总产量 5060 吨（其中海洋捕捞 3685 吨），比 1949 年增长了 16.2 倍。1996 年，全市的水产品总产量达 26,950 吨，产值 29,255 万元，占全市农业总产值的 20.78%。

在 1996 年的渔业生产中，海产品产值 19,993 万元，占渔业总产值的 68.34%。其中，海洋鱼类产品产值 7131.52 万元，虾蟹类产品产值 9154.63 万元，贝类产品产值 3086.45 万元，藻类产品产值 441.91 万元。目前比较重要的海产品主要有青蟹、对虾、蛏、牡蛎和大黄鱼，1996 年，这 5 种海产品的产值分别为 5621 万元、2957.54 万元、1540.26 万元、1020.9 万元和 668.5 万元，合计占海产品产值的 59.06%。大黄鱼为近几年才人工养殖成功，已显示了很好的发展潜力。1996 年，淡水渔业的产值为 9232 万元，占全市渔业总产值的 31.66%，其中以淡水鳗的产值最高，达 5746.78 万元，占淡水渔业产值的 62.25%，表明福安市的淡水渔业生产已开始向优质的方向转化。

三、农村产业结构

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不断完善和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农村劳动力开始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1986 年，福安县的农村劳动

力 133,152 人,其中从事农业(大农业)的劳动力 114,922 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 86.31%;而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只有 18,230 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 13.69%。至 1996 年,福安市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增加到 33,458 人,已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 20.44%,比 10 年前提高了 6.75 个百分点(见表 3—1)。值得指出的是,统计中的非农产业劳动力并不包括农村的外出打工者,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农村劳动力群体。例如康厝畲族乡畲族聚居的凤洋村,全村的 351 名劳动力中,常年在外的打工者约 200 人,农闲时全村 80% 的劳动力均外出打工。

表 3—1 福安市农村劳动力分布情况 单位:人

	乡村劳动力合计	农业劳动力	工业劳动力	建筑业劳动力	运输和邮电劳动力	商饮业劳动力	其他行业劳动力
1986 年	133,152	114,922	5342	1913	2389	2366	6220
1990 年	141,275	121,054	4820	2742	3303	3839	5517
1996 年	163,723	130,265	8421	3884	4133	5573	11,447

资料来源:福安市统计局。

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推动了非农产业的发展。90 年代以后,非农产业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1986 年,非农产业产值仅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 39.48%(表 3—2、表 3—3),1990 年也只占 47.5%,发展速度虽然有所加快,但与全国农村 1987 年非农产业就超过农业相比,非农产业的发展仍然显得缓慢,与闽南地区农村更是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在 1991 年~1996 年期间,福安市的非农产业获得了迅猛的发展,1996 年的非农产业产值高达 32.89 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 70.03%,其中农村工业总产值达 25.21 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 53.67%,也远远超过了农业。

在非农产业的结构中,发展速度最快的是农村工业,其中尤以

个体及联户办的工业发展最为突出。1996 年,在全市农村工业的结构中,村以下办的工业企业产值 14.68 亿元,占农村工业总产值的 58.23%;乡办工业次之,产值为 6.99 亿元,占 27.73%;村办工业产值 3.54 亿元,占 14.04%。农村工业的迅速崛起,已成为推动福安市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力量。

表 3-2 福安市农村社会总产值(当年价) 单位:万元

	合 计	农 业	工 业	建筑业	运输业	商饮服务业
1986 年	16,701	10,108	4470	286	1031	806
1990 年	61,697	32,392	19,349	2194	3913	3849
1996 年	469,705	140,768	252,076	7353	19,783	49,725

资料来源:福安市统计局。

表 3-3 福安市社会总产值构成 单位: %

	合 计	农 业	工 业	建筑业	运输业	商饮服务业
1986 年	100	60.52	26.77	1.71	6.17	4.83
1990 年	100	52.50	31.36	3.56	6.34	6.24
1996 年	100	29.97	53.67	1.57	4.21	10.58

本表按当年价计算。资料来源:福安市统计局。

第三节 工业经济

工业是福安市最大的产业,1996 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34.31 亿元(当年价,下同),完成工业增加值 9.86 亿元,占全市国民生产总值的 35.01%,占第二产业增加值的 94.35%(建筑业完成增加值 5012 万元,占第二产业的 5.65%)。

一、工业发展概述

早在明清时期,福安境内的制茶、造船、制糖、榨油等手工业就有了一定的规模。民国时期,福安的城关、赛岐、穆阳三个集镇中,有陶瓷、油纸伞、纸扇、服装、制鞋、五金锻打、铁器、竹器、木器、食品、印刷等手工作坊数百家,其生产多为一家一户,设备简陋,生产水平低下。1945年,全县有制糖寮(棚)50余家,年产糖150吨;油坊30余家,年产桐油200吨、茶油150吨。粮食加工业、衡器制造业等亦有一定规模。各业均建立有同业公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福安的城关、赛岐、穆阳三地共有手工行业18个,从业667户,1481人。1952年先后办起了县酒厂、印刷厂、砖瓦厂等国营企业。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后,一部分私营企业合并办起公私合营企业或国营企业。1958年,在“全民办厂”的口号下,全县的工业企业数量从1949年的10家增加到585家,一些工厂的创办奠定了日后机电、化工等行业的发展基础。但由于盲目办厂,结果导致原材料匮乏,技术力量严重不足,以致1961年大批企业被迫停办。经过3年的调整,1965年,全县共有工业企业110家,当年工业产值1722.38万元(1970年不变价,下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福安的工业发展受到很大的干扰,但仍然在曲折中获得了一定的发展。1975年,全县实现工业总产值7122.43万元,比1965年增长了3.14倍,年均增长11.54%。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福安的工业获得了蓬勃发展。1990年,全市共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236家,当年完成工业总产值20428.7万元(1980年不变价,速度按可比价),比1949年增长了69.45倍,比1978年增长2.26倍。90年代以后,福安市的工业发展进入了快速增长期:1991年~1996年,全市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32.6%,1996年达29.11亿元(1990年不变价,速度按可比价),比1990年增长了4.44倍。全市独立核算工业企业489

家,比 1990 年增加了 1.07 倍,基本上形成了以电机电器、船舶修造为支柱,以食品加工、建筑材料、冶金铸造、医药化工、水电工业和包装印刷为重点的门类较为齐全的地方工业体系,生产的各类工业产品达 160 多种,其中获国优、部优、省优的产品合计达 49 种。

二、工业结构

(一)所有制结构 截至 1996 年底,福安市共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 489 家,实现工业产值 142,876 万元(当年价,下同),完成工业增加值 41,213 万元。其中:国有企业 39 家,实现产值 55,310 万元,分别占全市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数量及工业总产值的 7.98% 和 38.71%;集体企业 203 家,实现产值 59,796 万元,分别占 41.51% 和 41.85%;私营企业 200 家,实现产值 19,899 万元,分别占 40.90% 和 13.93%;联营企业 27 家,产值 56 万元,分别占 5.52% 和 0.04%;外商投资企业 14 家,产值 1143.6 万元,分别占 2.86% 和 0.80%;港、澳、台投资企业 6 家,产值 6671 万元,分别占 1.23% 和 4.67%。国有和集体企业的数量和实现的产值分别占全市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 49.49% 和 80.55%,表明公有制经济仍居主导地位。联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和港澳台投资经济仍较弱小。

值得注意的是,福安市的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仅是乡及乡以上部分工业,若按全部工业计算,1996 年全市的工业总产值则达 34.31 亿元。其中:乡及乡以上工业产值 16.09 亿元,占 46.89%;村办工业产值 3.54 亿元,占 10.32%;村以下工业产值 14.68 亿元,占 42.79%。村以下工业均由个体或联户(合伙)开办,基本上都属于私营企业或民营企业,这部分私营企业加上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的私营企业,那么私营企业创造的工业产值则达 16.67 亿元,占福安市全部工业总产值的 48.59%,在工业经济

总量上已超过了国有和集体工业,而且发展势头依然强劲。鼓励和支持私营经济的发展,近几年已成为福安市政府加快全市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

(二)隶属结构 按隶属划分,福安市的国有工业可分为中央和地方工业两大部分。地方工业又可以分为省属、地区属、市属工业。1996年,中央属企业只有1家,实现工业产值3503.7万元,工业增加值1368万元,分别占全市国有工业的2.56%、6.33%和11.82%;省属企业1家,实现工业产值3万元,工业增加值2.3万元,分别占2.56%、0.01%和0.02%;地区属企业2家,实现工业产值10,293.3万元,工业增加值1578.6万元,分别占5.13%、18.61%和13.64%;市属企业35家,实现工业产值41,510.1万元,工业增加值8627.5万元,分别占89.75%、75.05%和74.52%。市属工业企业是福安市国有工业的主要力量。

独立核算集体工业也可以相应地划分为市属、镇属企业和乡属企业。1996年,市属集体企业34家,实现工业产值6365万元,分别占独立核算集体工业总数的16.75%和10.64%;镇属企业6家,产值2887.4万元,分别占2.96%和4.83%;乡属企业163家,产值50543.4万元,分别占80.29%和84.53%。乡属集体企业所占的比重最大。

(三)规模结构 福安市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统计中无大型企业。中型企业有3家,1996年实现工业产值12,315.7万元,完成工业增加值3525.9万元,分别占全市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总数的0.61%、8.62%和8.56%;小型企业486家,实现工业产值130,559.8万元,工业增加值37,687.1万元,分别占99.39%、91.38%和91.44%。小型企业占绝对多数。从企业的销售收入来看,年销售收入超过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只有10家。近几年来,福安市的工业企业出现了集团化的发展趋势,组建了若干个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在全市乡及乡以上的企业中,1996年实现亿

元以上工业产值的企业有 3 家,其中:闽东电机厂实现产值18,080 万元,船舶工业公司实现产值 15,085 万元,天马集团公司实现产值 11,017.9 万元,这 3 家企业或企业集团创造的工业产值位居福安市工业企业的前三位。其他大型公司和企业集团实现的工业产值依次为:罐头食品集团公司 7242.7 万元,闽东水电开发总公司 6423 万元,双龙集团公司 4296.7 万元,福光电子有限公司 4184 万元和冶金集团公司 3640 万元。以上情况表明,福安工业企业向大型化的发展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三、企业经济效益

从总体上看,福安市的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状况较好。

1996 年,全市的 489 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 21 家,企业亏损面仅为 4.29%。其中,国有企业的亏损面最大,共有 8 家企业亏损,企业亏损面为 20.51%;“三资”企业次之,有 4 家亏损,亏损面为 20%;集体企业有 8 家亏损,亏损面为 3.94%;私营和联营企业仅有 1 家企业亏损,企业亏损面为 0.44%。与全国同期 40% 以上的企业亏损面相比,福安市工业企业的亏损面比例是相当低的,而且是属于正常范围。因此在全国各地区都普遍感到下岗职工压力大的时候,福安市并没有多少企业职工下岗。

由于福安市的私营企业众多,这部分企业的开办与经营都是自己筹措资金,而不像国有企业那样依靠银行贷款,因此福安市的工业企业总体上债务负担不算太重。1996 年,福安市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 60.27%,比全国的平均值低 5 个多百分点,其债务负担基本属于正常。

1996 年,福安市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销售利润率为 12.14%,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利税 26.64 元、实现利润 12.30 元,均远远高于同期的全国平均水平。在我国经济软着陆的背景条件下,福安工业仍然能保持如此高的投入产出比是很不容易的,表明其企

业具有较强市场竞争能力,同时也表明了福安市工业具有进一步扩大和发展的良好基础。

第四节 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按我国的统计口径,第三产业包括农林牧渔服务业,地质勘探和水利管理业,交通、通讯及仓储业,批发和零售贸易及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教育、文艺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等。1996年,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为8.14亿元(当年价,下同),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8.91%。第三产业主要行业的情况如下:

一、交通与通讯

1996年,福安市的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业共完成增加值24,646万元,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30.28%,居第三产业内部各业之首,占全市国民生产总值的8.75%。其中,交通运输业完成增加值21,520万元,邮电通讯业完成增加值3126万元,分别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26.44%和3.84%,分别占全市国民生产总值的7.64%和1.11%。

(一)交通运输 福安的交通运输史可追溯至唐代黄岐港的疏凿,水上运输在福安的交通史上具有一定地位。民国时期的陆路运输也还主要靠肩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福安的公路建设每年以20公里的速度增长,1956年,福州至温州(104国道)福安段建成通车,赛江上游的客货水运业务基本上被公路运输所取代。改革开放后,福安的交通运输建设速度明显加快,1982年实现了乡乡通公路。从1984年起,县政府采取国家投资、民办公助、专业修路和群众修路相结合的办法,当年新建和续建公路38公里。

1985年起又采取国家、集体、个人一起办,国家投资和群众投资相结合的办法,3年共投资651万元修建公路。至1987年,全县共有公路38条542.7公里(其中国道1条79公里,省道2条83公里),拥有机动车1761辆,比1984年分别增长1.6倍和3.6倍,可完成水陆运输量42万吨。港口建设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全县100吨~1300吨级码头泊位增加到20个。赛岐港被定为国轮外贸物资装卸点后,辟有至上海、武汉、海南和直达香港航线,港口吞吐量67万吨,居福建省第三位。1990年,全市完成货物运输142.4万吨,客运量1266.5万人。

进入90年代,福安市加快了交通运输建设的步伐,104国道的全面改造工程、甘棠一下白石疏港公路,以及一批桥梁、码头等重点工程的竣工,极大地改善了福安市的投资环境,为全市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扩大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1996年新批“三资”企业13家,实际利用外资1450万美元,创历史最好水平。乡村公路的建设更是引人注目:仅1996年就新开通27个行政村公路125公里,至1996年底,已有336个行政村实现了通汽车,占全市行政村总数的75.17%。1997年,福安市委提出“大办交通、办大交通”的总体思路,围绕建设“山海呼应、南北贯通、水陆互补、周边连接”的大交通网络,计划筹措1亿元资金,重点抓好5个港口、7座桥梁和8条公路的新建或改造扩建工程,并加大乡村公路建设的力度。至1997年10月底,实现通车的行政村已增加到429个,占全市行政村总数的95.97%。这是一项相当的了不起的成就。预计到年底,全市所有的行政村都可以实现通车。

(二)邮电通讯 宋淳祐五年(1245年)福安建县时,即设有2个邮驿、15处铺递。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县城设邮政信柜,始有民间信件收递业务。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始开办电报和长途电话业务。至1949年7月,县境内开办有福安(城区)、赛岐、穆阳3个邮政局和福安(城区)、赛岐2个电信局,共有员工52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福安的邮电通讯事业得到较快地发展。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城乡经济的快速发展,邮电通讯业为满足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加快了发展速度。至1990年底,福安市邮电局共拥有固定资产1659.95万元,职工353人,邮电局、所和服务点343处,全市100%的行政村和88.3%的自然村实现了通邮。通讯事业的发展速度更快,1990年10月,4000门程控电话交换系统和长途420线投产后,市内电话可与赛岐港电话及19个乡镇电话总机直拨,长途全自动电话并入国际大网,可与世界160多个国家或地区实现直拨;全市电话机拥有量增加到2737部,比1980年增长了1.05倍;城乡电话普及率为每百人0.63部,其中农村每百人0.32部,城市居民每百人3.34部。1990年,全市邮电业务量达633万元(1990年不变价,下同),比1978年增长了2.7倍,年均递增11.52%。

进入90年代,福安市邮电通讯事业的发展进一步加快。1996年,全市的邮电业务量达5338万元,比1990年增长了7.43倍,年均增长42.7%;电话机拥有量达24,175部,比1990年增长7.83倍,年均增长43.8%。其增长速度都比1979年~1990年的平均增长率高3倍左右。乡村通讯事业的发展尤为突出,至1996年底,开通程控电话的行政村已达220个,占全市行政村总数的49.22%。1997年,福安市人民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农村通讯建设的力度,规定行政村通电话所需的水泥杆,由市政府每根补助50元;邮电部门负责架线安装;乡(镇)政府负责发动群众投工投劳,配合邮电部门组织实施。至1997年10月,全市447个行政村全部开通了程控电话。此外,无线电话和无线寻呼的发展也非常迅速。目前,福安市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各部门的正职负责人,以及各乡镇的正职负责人均配有无线电话,副职人员及村委会的主要干部均配有寻呼机,通讯十分方便。福安市场上每台无线电话加入网费才2000余元,寻呼机更是便宜,故这些通讯工具在福安市

的普及率比较高。

不过,邮政与通讯事业的发展还很不平衡。与高速发展的通讯事业相比,邮政业务的发展则缓慢得多,尤其是乡村的邮递业务变化不大,隔日步班投递仍然是投递的主要方式,特别是畲族聚居的山区,绝大多数畲族行政村还是隔日步班投递,信函、报纸到达乡镇政府后,村民一般都要三四天才能收到,有相当一批畲族村还是靠义务投递或顺路捎带。

二、商贸及餐饮业

民国时期,福安县有商铺 800 余家,主要分布在县城及赛岐、下白石、社口、穆阳、甘棠等集镇,商业经营活动以小商贩为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建立了国营和供销合作为主体的商业流通体系,个体私营商业处于被取缔的地位。“文化大革命”中,个体私营商业又受到沉重打击,到 1975 年,福安仅有私营商业 24 户。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个体私营商业迅速崛起。1980 年,从事各种服务行业的个体户已有 519 户。国营和供销合作商业也从按季节习惯经营改为按市场特点灵活经营,以提高经济效益。1983 年,县供销社完成了清股扩股工作,发展新社员 28,125 户,新老社员合计增加到 7.1 万户,约占全县农户总数的 80%;次年开始实行责、权、利相结合的多种形式承包制,当年清股 4.1 万股,发放红利 4.5 万元,净盈利 6200 元。至 1987 年,全县商业系统共有 54 家小型国营企业实行了“改、转、租”的改革,供销系统有 536 家核算单位落实了承包责任制,个体商业增加到 6200 多户,形成了国营、集体、个体共同发展的商业流通新体制。1990 年,福安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3.1 亿元,比 1978 年增长了 4 倍,1979 年~1990 年平均每年递增 14.35%。进入 90 年代,商贸及餐饮业发展的速度加快,1996 年,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突破 10 亿元大关,达 10.92 亿元,比 1990 年增长了 2.53 倍,1991 年~1996 年平均每年递增 23.35%,年均递增速度比改革开放后的前 12 年高 9 个百分点。1996 年,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创造增加值 2.02 亿元,占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的 24.82%,居第三产业内部各业的第二位。其中,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 1.73 亿元,餐饮业增加值 2900 万元。

从营业网点和从业人员的分布看,福安市的批发贸易以国有为主。1996 年,全市共有批发贸易法人机构 54 个,其中国有 42 个、集体 12 个,无个体私营法人机构;全市共有批发网点 845 个,其中国有 153 个、集体 67 个、个体 625 个,批发网点以个体私营居多;全市批发贸易从业人员 4367 人,其中国有单位 2267 人,占 51.91%,集体和个体分别为 578 人和 1522 人。不过,国有和集体批发贸易网点都分布在市区,乡村的 256 个批发贸易网点全部为个体经营。零售贸易和餐饮业则以个体私营为主:1996 年,全市有零售贸易网点 9170 个,从业人员 18,533 人,个体私营经济分别占 95.53% 和 89.19%;全市餐饮业网点 1085 个,从业人员 4352 人,全部为个体经营。在全市 10.92 亿元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个体私营经济占 62.18%,国有和集体经济分别占 19.87% 和 11.63%,其他经济占 6.32%,个体私营经济占绝对多数。福安无定期的农村集市贸易,乡村贸易主要依靠个体经营,尤其是在偏远山区的畲族村,居民们购买日常用品和销售零星农副土特产品都依靠村中个体小商店。因此,个体私营商业贸易的存在与发展,对活跃城乡贸易和发展农村经济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金融和保险

清咸丰年间(1851 年~1861 年),福安即出现了典当业。民国八年(1919 年),“福昌”等 10 余家钱庄先后开业。民国二十四年,中国农民银行在赛岐设立分支机构,次年,福建省银行亦在赛岐设

立了办事处,后又在福安设立支行。至1949年7月,福安县境内共有金融机构9个。由于民国政府滥发纸币,信用严重贬值,故民间仍然以银元作为信用货币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福安的金融保险事业发展很快,各金融机构通过储蓄、信托、外汇、信贷、保险多渠道筹集社会资金,有力地支持了地方经济的建设和社会发展。1996年,金融保险业实现增加值6791万元,占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的8.34%,居第三产业内部各业的第五位。

(一)金融保险机构 至1996年底,在福安市从事金融保险业务的机构主要有中国人民银行福安市支行、中国工商银行福安市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福安市支行、中国建设银行福安市支行、中国银行福安市支行、福建兴业银行福安市支行、福安市农村信用合作社、城市信用社、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福安市支公司、中保人寿保险公司及财产保险公司等。全行业从业人员662人。中国人民银行福安市支行行使央行的职能,对各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在各个金融机构中,市农行开设的分支机构最多,在城区和各乡镇共设有17个营业所和8个储蓄所;农村信用合作社次之,在城区和各乡镇设有18个基层信用社;市工商行设有1个办事处、8个储蓄所和3个联营储蓄所;市建行设有1个办事处和4个储蓄所(柜);中行福安市支行和各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较少,福建兴业银行及福安市城市信用社只是在市区开展业务活动。

(二)存贷款业务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福安的存款业务增长很快。1978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仅478万元,1990年激增到8473万元,1996年则达68,018万元,分别比1978年和1990年增长了141.3倍和7.03倍。其中,1979年~1990年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年均增长27.07%,1991年~1996年期间年均增长41.50%,显然,90年代后,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1996年,全市金融机构存款总额为91,168

万元,其构成为:居民储蓄存款 68,018 万元,占 74.61%,是存款的主要来源;企业存款 19,903 万元,占 21.83%;地方财政性存款 1641 万元,占 1.80%;农村集体存款 1129 万元,占 1.24%;信托存款及其他存款合计 479 万元,占 0.52%。在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中,城镇居民储蓄存款 58,319 万元,占 85.74%;农村居民储蓄存款 9699 万元,占 14.26%。城镇居民的储蓄存款远远高于农村居民。

1996 年,福安市金融机构的贷款总额为 101,604 万元,贷大于存 10,436 万元,表明福安市社会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求相当强烈。金融机构的贷款以短期贷款为主,1996 年,短期贷款 72,018 万元,占贷款总额的 70.88%;中长期贷款 26,218 万元,占 25.81%;其他类贷款 3368 万元,占 3.31%。短期贷款则以国有和集体工商企业为主,农业、私营及个体工商业、“三资”企业等得到的贷款较少。1996 年,国有和集体工商业贷款 52,292 万元,占短期贷款总额的 72.61%;乡镇企业贷款 7555 万元,占 10.49%;农业贷款 4900 万元,占 6.80%;私营及个体工商业贷款 1238 万元,占 1.72%;“三资”企业贷款 1799 万元,占 2.50%;建筑企业流动资金贷款 740 万元,占 1.03%;其他短期贷款 3494 万元,占 4.85%。个体及私营工商业创造了福安市约 50% 的工业产值和 60% 多的商品销售额,与其 1.72% 的短期贷款份额相比,显得不太协调。农业贷款亦显得偏低。

金融机构的贷款以银行为主。1996 年,各银行贷款合计达 92644 万元,占贷款总额的 91.18%,贷大于存 15,247 万元,即贷款是其存款的 119.70%,显示了银行具有较强的融资能力和承受风险能力。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则谨慎得多,城市信用社贷款合计 1782 万元,农村信用社贷款合计 7178 万元,均为存大于贷,贷款分别为其存款的 58.93% 和 66.79%,资金利用率略显偏低。

(三)保险业 1950 年 11 月,福安成立了保险机构,当年开办

了火灾保险和运输保险(包括内河船只和陆路肩挑)业务。次年增办了人身保险(意外伤害、人寿)和财产保险,并对国营企业单位的财产、机动运输工具及旅客意外伤害等采取强制保险,此外还开办了农业耕牛保险。1959年保险机构被撤销,直到1981年才重新恢复。随着福安经济社会的发展,各保险机构开办的保险项目也不断增加,至1990年,福安市保险公司共开办了财产、人身、农业、涉外4类保险业务16个险种的保险业务。1981年~1990年,保费收入共2034.33万元,其中人身险保费收入为1168万元,占保费总收入的57.41%,居各类保费之首;财产险保费次之,收入859万元;农业险保费收入较少,仅7.33万元。同期各类理赔共609起,赔付金额788.27万元,赔付率为38.75%。进入90年代,福安市的保险业务发展较快,开办的保险项目继续增加,尤其是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至1996年底,市、乡镇两级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已普遍参加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也正在逐步开展。1996年,全市保险业创造增加值516万元,营业盈余460万元,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第四章 文 化

第一节 文化事业

福安是福建省开发较早的区域之一,文化较为发达。自唐代以来,历代诗人、学者颇多。民国时期,福安图书馆、民众教育馆先后开办,文化事业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1949年以来,福安的文化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文化活动日渐丰富多采。

一、文化设施

(一) 文化馆和文化站 福安的文化馆建立较早。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福安图书馆易名为福安民众教育馆,即具有文化馆的雏形。该馆1949年后改名为人民文化馆,馆办活动主要是图书阅览,黑板报宣传,组织球类活动,并开办农民识字班。1953年,人民文化馆正式改名为文化馆。80年代,一座建筑面积达4064.7平方米的文化馆新楼投入使用,内设有礼堂、阅览厅、游艺厅、展览厅、影视厅、书库、培训室、美工室、文学室、舞蹈室、文物室、仓库等。后因礼堂失火,大部分建筑被焚。1987年,礼堂前楼经过整修,开设了录像放映场,增设了培训室和展览厅。目前,市文化馆共有工作人员13人,其专业结构为:文学2人、音乐2人、舞蹈1人、美术1人、戏剧辅导2人、文物1人、摄影1人、艺术档案1人、办公室1人、财务1人,专业人员占83.3%。

1951年,福安县文化馆所辖的乡镇文化站仅有赛岐、穆阳、甘棠、社口4个。1990年,市属的乡村文化站达19个,它们是:赛

岐、穆阳、仙岩、甘棠、下白石、上白石、潭头、社口、溪尾、晓阳、坂中、范坑、溪潭、康厝、阳头、凤洋、湾坞、松罗和穆云文化站。1996年,全市的乡村文化站增加到25个,不少文化站相继建起了新楼。

乡村文化站成立初期开展的活动主要有报刊阅览、图书借阅、配合政治形势放映幻灯、出黑板报、宣传政策、讲解时事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群众文化活动蓬勃发展,部分条件成熟的乡镇相继成立了文化中心站,放映电影、录像,开展摄影、工艺美术、科技培训等活动。凤洋、仙岩等畲族村文化站还经常举办畲族歌会,开展民族传统文化活动,在宣传党的政策、丰富少数民族文化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 娱乐场所 福安的文化娱乐场所包括传统的戏台和现代的娱乐设施。

1. 戏台。明清以来,福安境内修建的祠堂、宫庙均有配套的戏台,供祭祖、迎神时演出“众戏”或“神戏”之用。畲族村一般都没有专门的会场、剧院,多以这些戏台作为戏班演出的场所。每年正月,畲村都有演“神戏”的习俗,热闹非凡。

2. 影剧院。1952年,福安城关建成了全县第一座现代化的影院。1953年人民会场落成,有座位1110个,供演出戏剧和放映电影。此后影剧院不断兴建。到1990年,全市共有电影放映设施54处,现代化影剧院20个(其中市区1个,乡镇8个,村庄11个)。近几年,由于农民家中大都有了电视机,看电影的人数大为减少,电影放映设施也随之缩减。1996年,全市影剧院减少到14家,电影放映队只剩下12支。

3. 录像放映厅。1984年开始设立录像放映点。到1990年,全市共有录像放映厅26家。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VCD进入普通家庭,录像放映业呈下降的趋势。1996年,全市录像放映厅减少到23家。

4. 歌舞厅。1985年以后,歌舞厅逐渐增多。1990年,仅城关

就有营业性舞厅 19 家,非营业性舞厅 10 家。近几年,歌舞厅经营势头良好。1996 年,城关歌舞厅达 42 家,乡镇新营业的卡拉 OK 厅 37 家。

(三) 广播电视网络 1951 年,福安设立了有线广播台,是福建省最早设立专线广播台的县份之一。1953 年,县文教科曾在春节文娱活动期间,通过有线广播电台,邀请畲族男女对歌。1955 年,在畲族聚居的穆阳镇设立广播放送站,为乡村有线广播奠定了基础,当年全县共有 120 个喇叭。1965 年,全县喇叭增至 2970 个,可召开全县广播大会。1972 年,全县 4 个乡实行载波试点,其中畲族聚居的穆阳、康厝两个公社实现了村村通广播。1977 年,全县 97% 的生产大队通了广播,但在仅有的未通广播的 8 个大队中,畲族大队就占了 6 个。80 年代以后,福安 18 个乡镇均建立了广播放送站。1985 年,坂中畲族乡成为 80 年代福安第一个村村通广播的乡。到 1996 年,畲族聚居的 78 个行政村中,通有线广播的达到 64 个。

福安架设电视转播台始于 1976 年,1977 年 1 月正式开始转播。但至 1984 年,全县的电视信号覆盖率还不到 40%。1989 年改造了转播台 45 米的发射铁塔,自此电视转播效果稳定,覆盖面积扩大。1990 年,福安市建成有线电视台,到 1997 年 7 月,全市电视信号覆盖率达到 100%,447 个行政村都能收看到电视节目。

(四) 书店 1949 年 10 月,新华书店福安中心支店开业,1956 年 8 月改为福安专区新华书店,1970 年 7 月改称福安县新华书店。改革开放后,个体私营开办的书店逐渐增加,1997 年全市共有私营书店 50 余家。书店里每天都有不少读者,特别是处于繁华路段的国营新华书店,每到晚上便挤满了下了班的成年人与放了学的孩子,文化气息十分浓厚。

二、文化团体

(一) 市文化团体 1990年9月,福安市文学艺术界召开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福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该联合会下属的9个基层文艺协会分别为:福安市文学协会、福安市美术协会、福安市书法协会、福安市摄影协会、福安市音乐舞蹈协会、福安市戏剧协会、福安市秋园诗社以及福安市茶文化协会。

(二) 畲族文化团体 1956年,福安县成立了县民族歌舞团,但一年后即停办。较有活力的畲族文化团体,多由畲族乡村居民自发组成。

1. 鼓吹班。畲族人喜爱唱山歌,也擅长演奏民间器乐,每逢婚丧喜庆、宗教礼仪便自由组成几个人的小乐队,以增添热闹气氛。其中也有相对稳定的人员组成鼓吹班,前往畲、汉村庄演奏谋生。鼓吹班一般由4~8人组成,乐器有唢呐、胡琴、笛子、锣、鼓、钹等。曲牌以福州调为主,兼吹打温州平讲调和南词北调。鼓吹班中以穆云洋坪畲村蓝氏鼓吹班最负盛名,相传已有百余年艺术生涯,传承了5代,全村34户中有20余户皆擅长此业。此外比较有名的还有溪潭马山班、坂中仙岩班等。^①

2. 戏班(剧团)。关于畲族戏班,民国前已无资料可考。1954年,坂中仙岩畲族村办起了闽剧团,演员约有20余人,都由村民组成,农闲时到邻近畲、汉村中演出。演出剧目有《拾玉镯》、《何文秀》等古装戏以及《卖余粮》、《牧羊姑娘》等新编节目。其中畲歌表演唱《牧羊姑娘》在福安首届农村业余文艺会演中获得好评。1964年11月,该团的3名演员参加了北京少数民族业余文艺观摩演出。60年代中期,仙岩民族剧团中止活动。80年代一度恢复,并以创作剧目《阿母》参加全县农村业余文艺会演,获创作奖,80年

^① 参阅《福安畲族志》第376~377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代中期再度停止活动。1978年,康厝桂垄民族闽剧团成立,演出剧目有《宋太祖下南唐》、《封神榜》等17本,文武戏兼演,足迹遍及本县和霞浦等邻县,受到福安县文化局与民委的重视。1992年4月,在该剧团的基础上成立了福安市民族业余闽剧团。^①

除上述两个剧团外,社口镇的牛山湾村,穆云乡的半岭村,康厝乡的风洋村、东山村等畲族村都先后成立了业余剧团,走乡串村,在畲族山区演出。剧种以闽剧为主,兼演福安“平讲戏”,剧目多为古装传统戏。

三、文化活动

50年代以来,福安的文化活动主要表现在文艺创作、文物征集、参加各类文艺会演以及配合形势进行文化宣传等方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化工作受到广泛重视。近年来,福安市文化部门努力服务于改革开放,服务于经济建设,成功地推出了“畲、茶、古”三大特色文化,并以之为龙头带动企业文化、乡村文化、少儿文化的蓬勃发展,增进了对外交流,提高了福安的文化知名度。

在挖掘和弘扬畲族文化方面,首先将着眼点放在挖掘、整理民间文学和音乐舞蹈上。1994年3月完成了《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福安市分卷》、《中国谚语集成福建卷·福安市分卷》和《中国歌谣集成福建卷·福安市分卷》等畲族文艺作品的出版工作,挖掘出“畲族宝塔茶”、“福安新娘茶”等难得的地方茶俗,成为近年来茶艺团久演不衰的节目。新创作的畲族歌舞《竹卜惊雀》、《打尺寸》等多次在省级大赛中获奖。其次是继承和弘扬畲族传统文化的艺术特色和传统习俗的古朴魅力,从1985年起共举办了五届畲族歌会,1993年起又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三月三”畲族民俗节。1992年还利用国际茶文化交流会期间举办畲族风情旅游节,使许多国

^① 参阅《福安畲族志》第376~377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际友人目睹了畬家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三是加强畬族文物的保护工作。继坂中畬族乡大林畬村“钟氏祠堂”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之后,又在铁湖村建立了畬族民俗馆,该馆荟萃了畬族各类文物和生产、生活用具,充分展示了畬族文化特色,与闽东畬族革命纪念馆一起成为人们了解畬族文化与历史的窗口。此外,经过多年努力,福安市于1995年12月出版了《福安畬族志》,使福安畬族文化有了大的集成。

福安是我国著名的茶区之一,明代“坦洋功夫茶”即扬名海内外,茶文化成为福安文化的又一大特色。1991年~1992年成功地举办了两届国际性的茶文化交流会,并成立了畬族茶文化艺术团,每年相继推出一批高质量的茶艺表演节目,并赴香港及全国大中城市巡回演出,获得了中外嘉宾的赞誉。

在古文化的挖掘、保护和开发利用方面,主要活动有:举办“廉村古文化系列展”、“廉村古文化笔会”,拍摄播放风光片《探古寻幽廉村行》和《廉村古文化村》,并投资26万元修复了廉村明代古城墙、清前期建筑后湖宫、陈氏宗祠等建筑。此外还成立了薛令之、谢翱、郑虎臣“三贤研究会”,开辟“历史文化长廊”,搜集整理完成了60万字的《谢翱遗作集》初稿,并将40余万字的《谢翱资料集》付梓成书。“三贤”的研究者还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在《福安文艺》上开辟专版刊登。同时还准备组织福安“三贤”后裔筹资兴建天马山“三贤祠”。

第二节 教 育

福安的教育有悠久历史,早在唐代即设有书院。宋淳祐五年(1245年)福安建县后,即办书院,建县学,学风日炽。明清以后,先后兴建了5所书院,私塾也遍布各主要村落。清末,废科举,兴新学,现代学校教育开始取代封建儒学教育。宣统二年(1910

年),县内共有小学8所。民国时期,福安的教育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1929年,全县共有小学45所,在校生2484人;到1944年,小学增至69所,在校生达到3145人。此间,还创办了幼稚园和中学、中等专业学校。民国时期,福安有大学生60余人,留学生20余人。^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福安的教育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一、普通教育

(一) 学前教育 1951年秋,城阳中心小学第一分校借街尾村郑氏宗祠创办附属幼儿班。1952年,全县共有幼儿班8处,在园儿童481人。1957年秋创办了福安县幼儿园,并配备了经幼儿教师专业培训的教师担任教学工作。1959年秋,为动员农村妇女参加工作,全县大办幼儿园。1960年,全县共有幼儿园58所,但因无合格师资、教学设备和场所,1961年春基本解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幼儿教育开始走上正轨。1979年,全县除城关镇1所幼儿园外,各中、小学和部分农村完全小学附设85个幼儿班,入学幼儿3294人,幼儿园(班)教职工76人。1990年,全县设幼儿园33所434个班,在园幼儿12,088人,加上完全小学兼办的幼儿班、学前班225个,幼儿1750人,在园幼儿共达13,838人,儿童入园率达54.85%。近几年,由于幼儿学龄人口增多,幼儿园与学前班的规模也不断扩大。1996年,全市办有幼儿园50所,641个班(其中学前班360个),在园幼儿20,321人(其中学前班9563人),入园率为54.68%。全市幼儿园园长和教师共908人。

(二) 小学教育 1949年10月,福安县人民政府接管了中心国民学校16所,(保)国民学校52所,私立崇一小学1所。复课后

^① 教育一节所列1990年以前的数字均参考福安市教育委员会编《福安市教育志》。

入学学生 3145 人,在职教工 178 人。1950 年 6 月,县政府对全县小学布局和教师队伍进行初步整顿,当年全县小学增至 75 所,学生 6546 人,比接管时增加 1 倍。1954 年,全县增设初级小学 15 所,其中畲村 8 所,老区基点村 5 所,渔村 2 所,民办小学发展到 40 所。1956 年 11 月,老区基点村、畲族聚居村以及较大自然村的 32 所民办小学转为公办小学。1961 年 6 月,全县小学在校生达到 18,108 人。1966 年 10 月,学校普遍停课,一年后虽然复课,但“文革”期间教育秩序混乱,教学质量降低。

1980 年以后,小学教育重新步入正轨。1990 年,全市共有小学 1064 所,在校学生 67,903 人,教职工 3553 名。小学的 4 项主要指标:入学率为 98.6%,巩固率达 99.65%,毕业率达 98.01%,普及率为 96.95%,均达到省级一类标准,名列宁德地区前茅。近年来,小学阶段义务教育稳步发展,到 1996 年,全市共有小学 456 所(另有教学点 486 个),在校学生 65,967 人,学龄儿童入学率比 1990 年提高了 1.1 个百分点,小学毕业率达到 100%,提高近 2 个百分点。

在福安市的小学中,重点小学有福安师范附属小学、福安实验小学和福安民族实验小学。这三所学校的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质量较高,学生学业成绩在全市各校中名列前茅。同时,也有一些山村小学的办学条件较差。如穆云畲族乡的洋坪村小学,由于缺少资金,至今教室的玻璃还未装上,遇有刮风下雨的天气,孩子们便无法坚持上课;再如该乡的竹洲山村,由于地处偏远山区,交通不便,许多孩子上学要翻山越岭,有的单程要走五六个小时的山路,以至一些孩子长到 10 岁才能去上一年级。

(三) 中学教育 1949 年人民政府接管时,福安只有县立初级中学 1 所,在校生 371 人。1950 年 2 月,福安专署决定将民国二十六年迁到宁德的省立三都中学迁回福安,与县立初级中学合并,定名为三都福安联合中学。1955 年 7 月,该校改名为福安第

一中学。同年又创办了福安第二中学。1957年8月,全省第一所民族中学——福安民族中学成立。当年,福安3所中学的在校生共1365人。“文革”前,福安的中学增至5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教育工作重新走入正轨。1983年,根据“普及小学,发展初中,压缩高中”的教育发展方针,在部分不具备条件的中学停止招收高中新生。1985年1月,全县完全中学的校名以学校所在地命名的均改为以序号命名。除原属县管的福安一中、二中、三中保持原校名外,属县和乡镇双重领导的城关、下白石、甘棠、溪柄、上白石、社口和韩阳中学,分别更名为福安第四至第十中学。全县初级中学仍以学校所在地的地名作为校名的,计有溪潭、潭头、康厝、湾坞、溪尾、赛岐、松罗、坂中等8所初级中学。此外还有小学附设的初中班20所,再加上地区民族中学,全县的每个乡镇都有1所以上中学。1990年,全市中学在校生为17,620人。近年来,福安市的中学教育又有了长足发展。1996年,全市普通中学增至28所,在校学生达到29,910人(其中初中26,789人,高中3121人),高考录取率达66.8%,连续两年位居宁德地区首位。

在各中学中,福安第一中学的成绩最为显著。该校的前身是1924年创办的福安县立初级中学。1955年正式改称福安第一中学。当年该校春季高中毕业生54人,秋季毕业生23人,共77人参加高考,被录取75人,录取率为97%,高考成绩仅次于福州一中,名列全省各中学第二名。1960年高考成绩再次位居全省第二。1990年,福安一中被评为全国施行“达标”先进单位,省传统项目先进单位。该校不仅整体成绩突出,尖子学生也不断涌现。如该校一学生于1996年赴印度参加第三十七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获得金牌,实现了福建省国际数学奥赛史上零的突破。同年,该校另一学生在高考中成为全省文科“状元”。

二、职业技术教育

福安最早的职业技术学校是 1934 年创办的县立初级茶叶科技职业学校,次年该校升格为省立农业职业学校。1942 年,福安私立韩阳初级农业职业学校创办,1947 年改称福建省立福安高级农业职业学校。1949 年 12 月,福安专署接管了福安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和 1940 年迁到福安的福安师范学校。

1955 年,教育体制调整,福安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改称为省立福安农业学校,1956 年开始扩大招生。1958 年“大跃进”期间,全县的中等专业学校由原有的 2 所猛增至 18 所。新设的学校有福安专区茶业技术学校、福安专区林业学校、福安专区水利电力学校、闽东工业学校、闽东水产学校、福安专区卫生学校、福安专区戏剧学校、福安专区建筑学校、福安专区邮电技工学校、福安地委财贸学校等中级中等专业技术学校 12 所和福安县卫生、林业、邮电、艺术初级中等专业学校 4 所。同期,农业中学的发展也十分迅速。1961 年春,福安农村出现饥荒,在落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中,农业中学大部分被撤销,18 所中专中也有 14 所先后停办。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其余 4 所中专也停止了招生,福安的职业教育出现一片空白。

1974 年以后,职业技术学校开始复办。1980 年,福安县人民政府根据当时城区以电机、农村以茶业为主的经济状况,开始创办职业高中。1992 年,全市有中等专业学校 3 所,分别是宁德地区卫生学校、宁德地区农业学校和福安师范学校,在校生 2605 人;职业中学 4 所,在校生 1324 人。近几年,福安市的职业教育发展步伐加快,1996 年,3 所中专的在校生人数达 3328 人;职业中学增加到 5 所,在校生达 2263 人。

三、成人教育和扫盲教育

福安开展的成人教育主要是扫除文盲、开办职工工业余学校和农民业余学校。

(一) 扫除文盲 1951年11月,福安县、区、乡三级相继建立工农业余教育工作委员会,全面开展扫除文盲与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当年全县开设冬学^① 212班,入学农民达13,455人。1952年、1956年和1958年全县掀起了三次扫盲运动高潮,成效显著。据1959年秋的统计:50年代初,全县有青壮年文盲104,854人,到1959年9月脱盲者达56,382人。此后,由于农村饥荒与“文革”的冲击,扫盲工作停滞不前。

1978年1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扫除文盲的指示》,福安县和各乡镇建立和健全了工农业余教育领导机构,重新组织力量抓扫盲。1987年11月,宁德地区教育局扫盲验收组对福安的验收结论是:全县脱盲率达到89.28%,为基本无文盲县。此后,福安的扫盲工作继续得到巩固和发展。1996年,全市办有扫盲班161个,当年扫除文盲2816人;扫盲巩固班125个,结业学员2702人。

(二) 农民业余学校 50年代,福安的冬学开办得很有成效,农民学习文化的热情十分高涨。1954年,全县设冬学611班,学员12,900人;设农民业余学校140班,学员5029人。1978年以后,各类农民业余学校比60年代有了很大的发展,除开展扫盲工作以外,还进行科学种田及其它技术培训。1996年,全市共有乡级农民技术培训学校22所,当年招生8675人,在校学生8865人,培训结业12,009人次;共有村级农民技术培训学校398所,当年招生19,143人,在校学生19,223人,培训结业19,702人次。

(三) 职工工业余学校 1950年春,福安县在城关开办了一所

^① 冬季农闲时开设的农民业余学习班。

职工业余学校。此后,职工业余教育迅速发展起来。1959年春,全县设有初级职工业余学校68所,120个班,学员5829人。“文革”开始后,职工业余学校相继停办。1982年,各企业建立和健全了职工业余学校机构,为尽快提高职工的文化和专业素质,采取文化补课和专业技术补课双管齐下的措施,年底,全县参加“双补”学习的职工达6298人。1986年春,县干部职工业余中等专业学校成立,先后开设财务会计、文书秘书等专业,1990年该校改名为“福安市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此后,成人中专得到较大发展,1996年已增加到4所,在校学生达1157人。

(四)成人高等教育及自学考试 福安市的成人高等教育主要靠电视大学。

福建广播电视大学福安工作站正式成立于1982年,到1990年为止,已培养毕业生279人,毕业生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996年,全市办有电大大专业余班5个,在校生169人,毕业生16人。

自学考试是对立志自学成才者进行以学历考试为主的高等教育国家考试,深受广大自学者和全社会的欢迎。从1985年起,福安开始举办高校自学考试事务,1986年下半年起又开办了中专自学考试科目。1996年报考人数达2644人(其中高教2636人,中专8人),有41人获得自学考试毕业证书。

四、民族教育

福安畲族大多居住在边远山区。1950年以前,畲族聚居村的学校教育是一片空白。50年代~60年代,畲村经济落后、生源分散、设校布局难等因素制约了教育的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畲村经济发展加快,促进了教育的发展。1983年以来,福安县委、县政府加大了对畲族聚居区的教育投入,采取倾斜政策措施,加快了民族教育的发展步伐。1996年,全市有民族中学、民族

职业中学、民族实验小学各 1 所,民族完小 32 所(其中 21 所是重点民族小学),初小 218 所;民族小学共有教师 438 人,其中公办 158 人,民办、代课教师 280 人;在校普通中学民族学生 2288 人,其中高中生 175 人、初中生 2113 人;当年学龄儿童 6196 人,已入学 6153 人,入学率已达 99.3%;小学毕业生 636 人,升入初中 618 人,升学率达 97.2%;初中毕业生 406 人,升重点高中 75 人,升中专 24 人,升职业高中 80 人,升学率为 44%;高中毕业生 54 人,升大专院校 35 人,升学率达 64.8%。

比较有影响的民族中小学有:

(一) 宁德地区民族中学 创办于 1958 年,原名福建省福安民族中学,1976 年改为今名。这是福建省第一所民族中学,办学近四十年来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学校初创时仅有 2 个教学班,百余名师生,如今发展到拥有 33 个教学班、近 1800 名学生、150 名老师,是具有向高校直接保送新生资格的省重点中学和全国著名的民族中学之一。从 1958 年至今,学校共培养了 12,000 多名中学生。70 年代办高中以来共向高等学校输送了 2000 多名毕业生,其中 100 多名成为研究生。

(二) 福安市民族职业中学 前身是创办于 1969 年的福安康厝中学。1990 年经宁德地委批准正式易名为福安市民族职业中学。90 年代以来,该校先后开设了农村经济经营、汽车驾驶、民用建筑、木工制作、服装、缝纫与编织、电脑、会计等专业,走出了一条符合畬乡特色的办学路子。

(三) 福安市民族实验小学 位于坂中畬族乡仙岩村,创办于 1952 年,1985 年定今名,是宁德地区第一所县级民族实验小学。该校为了解决畬族学生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等困难,于 1981 年首创“小学寄宿制”,并不断提高教学质量,近十余年来多次荣获国家、省、地、市表彰,1992 年被国家教委评为“全国民族教育先进集体”。

虽然福安的民族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

容忽视。一是民族完小设施差。目前民族地区有许多学校缺乏校舍,不少学校仍借用过去生产队的仓库、民房的厅堂作教室上课,很多小学的教室已很破旧,常常漏雨,光线也差,严重影响了民族教育的发展。二是不少畲族群众经济生活拮据,学生负担的学费较重,生源流失较多。三是师资力量薄弱。公办教师不愿去,民办教师水平低,且民办教师收入低、生活负担重、流动性大,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

五、师资队伍建设

1940 年以前,福安教师队伍中具有高等师范学校学历者很少,民国二十九年(1940 年),福安师范学校创办后始有所改善。50 年代初期,教师队伍变动频繁,为补缺额,由县、地区举办小学教师短训班,从失业失学青年和转业军人中吸收了大量人员,小学教师数量有所增加,但教师素质有所下降。从 1954 年起,小学教师的流动得到控制,同时大量补充了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但由于民办小学发展过快,而民办小学又不断转为公办小学,民办小学教师也随之转为公办教师,致使公办教师队伍中没有受过师范专业教育者所占比例不断增大,1960 年达到 40%。“文革”期间,教学秩序混乱,中小学教师队伍的素质愈加下降。1976 年,全县中小学教职员共 3004 人,其中民办教师 1567 人,超过了 50%;全县小学教师 2553 人,其中公办 1057 人,民办 1496 人,民办教师占小学教师总数的 58.60%。

80 年代,福安县各级党委、政府大力抓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有所加强,但仍然存在师资不足、合格率低等问题。1994 年,全市有小学教师 4707 人,其中民办代课教师 1957 人,占 41.58%。专任教师学历达标率只有 70%,是全地区达标率最低的县(市)。全市中学教师 1668 人,缺编 213 人,特别是贫困山区中学公办教师严重缺编,专任教师合格率更低。1995 年以来,福安市政府为确保

“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达标任务的顺利完成,把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放在教育发展的突出位置来抓,吸收了一批非师范院校大中专毕业生从事教育工作,充实师资队伍,从而缓解了初中教师紧缺问题。市教师进修学校还举办了七种不同类型的培训班,受训教师达 1456 人。1996 年底,全市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已达 6130 人,初中补充教师的任职要求达标率、学历合格率及小学补充教师学历合格率都达到了省定的“两基”标准。

六、教育经费与办学条件

1950 年春,福安教育经费纳入县级财政预算。1959 年以前,全县的教育经费由县财政局直接经管,县教育局只掌握学校数、班级数和教职工人数的落实,没有实质性的财务支配权。1960 年以后,教育经费归口包干给教育部门具体掌管。不久,县教育局为调动学校征收学费的积极性,将部分财权下放给学区。各学校征收的学费全部上缴学区,学区按总数提取 30% 上缴教育局,70% 留在学区。上缴的部分由教育局掌握,专门解决山区较困难学校的校舍修建。由学区掌握的部分,用以解决各校办公费、旅差费,用于设备费的部分需报县教育局备案。从 1981 年起,教育经费管理采取“预算包干”的管理体制,当年县人民政府分配的教育事业费为 252.38 万元。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人员不断增加,人头经费占用了公务费,用于改善办学条件的经费所剩无几。为了筹措教育资金,县政府于 1984 年开始动员各单位和群众集资办学,多渠道筹措资金发展教育,并于 1986 年起征收教育附加费。1990 年全县教育事业费的支出达 1358.3 万元,比 1980 年增长了 3.8 倍。

由于福安的村落分散,贫困面大,政府虽然不断增加教育投资,但办学条件仍然较落后。从 1984 年起,县政府开始进行多渠道集资,至 1990 年共投资 3406 万元用于改善办学条件。七年来

新建、续建、维修校舍面积达 288,089 平方米,乡镇所在地的中小学都有了教学楼,大部分农村小学也有了宽敞、明亮、洁净的教室,校容、校貌焕然一新。重点中学有了实验楼,完全中学均有物理、化学实验室。市教师进修学校建立了电化教育组,在重点中小学开展电化教学活动。各中小学的体育设备也逐年增加,职业中学的专业教学设备也有所充实。1995 年,福安市开始实施“两基”三年规划,1995 年~1996 年,全市多渠道筹措用于改善办学条件的资金达 4286 多万元,比 1991 年~1994 年的 4 年总和增长 20%,中小学新扩建校舍竣工面积达 73,400 平方米,比前 4 年的总和增长 21.5%。虽然还有部分学校基础设施依然落后,但取得的成绩还是令人鼓舞的。

第三节 科学技术

50 年代以来,福安的各类科技机构陆续建立,科技队伍日益壮大。特别是 1990 年中共福安市第八次党代会作出“工业立市,科技兴市”的战略决策以后,将科技工作摆上了突出的重要地位,取得了较好的成绩。1993 年,福安市荣获了“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市”称号,市科委连续 5 年(1992 年~1996 年)被评为福建省科委系统先进单位。

一、机构设置与科技队伍

(一)管理机构 福安县科学技术委员会成立于 1959 年 12 月,1962 年因精简压缩行政机构一度被撤销。1978 年 8 月恢复,行使管理全市科技工作职能,担负对乡镇科委和县属各局、企业科技科(股)的业务指导工作。科委下辖科技情报所、电子计算机中心站、科技开发中心、新优品种场等 4 个单位。1978 年,福安县配备了分管科技的副县长,以加强对科技的领导工作。同年 11 月,

各乡镇相继成立了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当地的技术推广、农村技术人才培训和承办有关科技工作事项。1989年起,全县各乡镇均配备科技副乡(镇)长,以全面领导乡镇的科技工作。

(二) 科技网络 50年代,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福安的科研、推广等机构纷纷成立。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政府对科技工作日益重视,大力建立和发展科技网络。1996年,全市共有市级研究、推广机构33个,民办研究所29家,乡镇农技推广机构150多个。在农业方面建立了水果、水产、茶叶、畜牧、林业、食用菌、甘蔗等一批技术开发公司或中心,成立了植物医院18所,村级科技服务组织488个;工业方面成立了市电机电器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技术开发中心、生产力促进中心以及各企业内部的技术开发机构。全市现有各类专业技术学会、协会、研究会73个,会员约3000人。其中市级学会27个,会员1415人。此外还成立了厂矿科协3个,会员117人;村级科普分会235个,会员1218人。

(三) 科技队伍 1949年,全县共有农、工、医技术人员545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分配到福安工作的大、中专学生不断增多,科技队伍迅速壮大,其数量和结构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90年,全市共有各类专业科技人员6000人,其中获得各种专业技术职称的有5151人。1996年,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增加到7130人,其中获高级职称86人,中级职称1050人;全市拥有自然科技人员1430人,占人口比重的0.26%,其中工程技术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的16.28%,每万名农村人口中有农技人员22.3人。

二、科技传播活动

(一) 科普宣传 1979年,随着科技团体机构的陆续建立,福安的科普宣传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当年全县编印有《福安科普》、《福安农技通讯》、《福安食用菌》和《科技信息》等十多种科普和科技情报资料刊物,有关部门还利用专栏、墙报、黑板报、广播、电影、

电视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科普宣传活动,向群众传播新知识新技术。1982年,县科协开始主办“科普画廊”,每月出1期,图文并茂,深受读者欢迎,并在1989年全省“科普画廊”评比中获集体二等奖,编辑个人一等奖。1984年,县科委添置了1辆科普宣传车,不久又配备了电视录放机,组织专题科普巡回宣传,并开展“农村科教电影放映月活动”。在1988年的科普宣传中,社口乡荣获全国科普先进集体称号。从1991年起,市政府将每年5月定为“科技兴市”宣传月,几年来,通过跨街标语、福安报、福安之窗、科普画廊、有线电视台等多种宣传媒体,宣传依靠科技进步奔小康的典型、推介重大科技成果以及科普知识,并组织科技人员深入乡镇开展科技咨询服务活动,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

(二) 技术培训 1984年,福安被列为福建省山区综合开发试点县,推动了全县技术培训工作的开展。1984年~1987年,全县共举办技术培训班98期,受训人员12,900人次。1988年~1990年,全县各部门、各单位举办了经济技术、企业管理、茶园改造、果树栽培、油茶高接换冠、虾蛤混养、畜禽饲养、农机维修、食用菌、再生稻等多种技术培训班,受训人员达到11,544人次;乡镇文化技术学校、农民夜校共开办普及型培训班677期,受训人员达33,860人次。近年来,福安市建立健全了市、乡(镇)、村三级科技培训网络,1996年共举办各类技术培训班100多期,受训人员达6000多人次。

畲族实用技术人员的系统培训始于80年代。1984年,福安县民委成立后,建立了少数民族培训基地。县民委与有关技术部门合作,定期举办各种实用技术培训班,如果树栽培、乡村医生、食用菌技术、机电维修、裁缝技术等。由于办学时间紧凑,目的明确,内容针对性强,效果十分明显。

三、科技开发与推广

(一) 农业科技 1984 年,“福安县山区综合技术开发”被定为省科委重点项目,开始了福安科技工作的新篇章。山区开发的“七大项目”(绿竹、芙蓉李、蘑菇、对虾、茶叶、中低产田改造、油茶)总投资 5000 万元,三年实现总产值 2 亿元,其中新增产值 6000 万元,新增税利 600 万元。经省科委组织的验收,该项目获得省“科技开发项目管理奖”,其中的“芙蓉李高产栽培及深加工技术研究”获国家星火计划三等奖。1994 年,福安市被省科委列为“科技兴市”试点市,实施的五大科技项目(水蜜桃良种提纯复壮、绿竹高产栽培、旱地农业综合开发、晚熟龙眼开发、明前茶开发)均通过验收。近年来,福安市还组织实施了“粮食丰收工程”、“强村壮乡”、“农业项目年”、“农业品种改良年”等计划,共建立吨粮田栽培示范 12 万亩,推广再生稻 2.5 万亩,旱地粮食工程 4.5 万亩,推广番薯良种 19 万亩,建优质米基地 1 万亩,中低产田改造 21.16 万亩,推广农业新技术、新品种 70 多项。这些项目的实施,使全市农业先进实用技术覆盖面达 85%,农作物优良品种覆盖率达到 90%。

为促进畚族乡村经济的发展,1987 年,县政府确定坂中畚族乡为城郊型科技示范乡,使之成为全县的两个科技示范乡之一,也是宁德地区 10 个科技示范乡镇之一。该乡在农业方面采取一手抓粮食工程建设,一手抓多种经营的发展,加强多种经营的区域化、科学化,形成了茶、果、林、竹、蔬菜、食用菌、席草、糖蔗 8 个基地,以此带动“一村一品”的建设,坂中乡也因此成为福安市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畚族乡。

(二) 工业科技 福安的工业科技开发与应用有一定的基础。1963 年~1964 年,闽东电机厂就承担试制成功我国自行设计的 JO₂ 系列电动机;1965 年试制成功 TST-5KW 型半导体整流自激恒压三相发电机,填补了国内空白。1982 年,福安县轻工机械厂

与北京劳动保护科研所联合研制成功 KW10 型文氏消声器,在国内首次应用有限元方法计算消声器的消声特性,在 3L-10/8 型空压机进口消声器的同类产品中居国内领先地位,获得北京市重大科技成果三等奖,1983 年获福建省科技成果推广四等奖。1986 年,福安电热电器厂采用国际标准生产 3000W、500W 速热器获省优产品称号,并经过技术改进,生产出有自动呼叫、自动断电之功能的速热器。1988 年,下白石镇一青年发明电热类电器节电延寿器,直接接入 200V 交流电源工作,可节电 30%,延长电器使用寿命 1 倍以上,获得国家专利局发明专利权,并获铜牌奖。同年,闽东蜜饯厂在省农学院协助下,研究成功低糖快速蜜饯加工工艺;福安罐头食品厂研制成功中华猕猴桃应子产品,1989 年获“轻工部优秀新产品”奖。1990 年研制成功的“氯化钾复分解生产过硫酸钾”新工艺,经省级专家确定,生产工艺技术属国内首创,获 1987 年~1990 年宁德地区科技进步二等奖。

“八五”期间,福安市按照“科技先导,以质取胜,争创名牌,提高档次,形成规模”的工业科技发展总思路,坚持“厂、校、所”联姻,促进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应用。1991 年~1996 年,全市有 11 家企业与厦门大学、福州大学、同济大学、省轻工所、华中师大、上海电机研究所、杭州轻工所等省内外 16 所大学和科研单位建立了技术协作关系或签订了专利技术转让协议,共同成功开发了 21 个系列的新产品。1993 年~1996 年,全市共完成工业技改投资 2.84 亿元,技改项目 63 个,开发新产品 121 项,有 42 项通过鉴定,其中达国际水平的 9 项,国内水平的 26 项,国内先进水平 8 项,有 1 项获省科技三等奖,5 项产品获省优秀新产品奖,2 项产品获省优称号,1 项产品获省部双优称号。科技进步对全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95 年,科技进步因素对全市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已达到 50%。

第四节 医疗卫生

1949年,福安县有医院3家,诊所22个,中药铺152家。但因设备简单,药品缺乏,技术水平低,遇上危重疑难疾病,常得不到有效医治,加上预防措施跟不上,时有疫病流行。50年代后,医疗卫生队伍不断壮大,医疗设备、技术水平均有所改善和提高。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福安市的卫生事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一、医疗卫生机构

1996年,全市共有医疗机构746个,比1990年增加了177个。其中市属医疗卫生机构有市医院、市民族医院、市中医院、市卫生防疫站、市妇幼保健所、市卫生进修学校和市药品检验所。宁德地区第一医院也设在福安市内,该院由于拥有较强的技术力量和较好的医疗设备,“截留”了大部分急、重、危病人,比市属医院更具竞争力。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有18个乡镇卫生院(其中中心卫生院3个),445个村级卫生所和43个厂矿医疗室。

近几年,个体诊所的数目不断增多,1996年,福安市个体开业诊所已达到96家(其中城区56家)。星罗棋布的个体诊所和私人药店一方面给群众就医带来了方便,另一方面也使一些没有专科特长的公立医院面临着危机。

二、医疗卫生人员和医疗设施

(一) 医疗卫生人员 1990年,全市有医疗卫生技术专业人员1402人。近些年来,人才市场的开放促进了人才流动,许多在乡镇卫生院工作的医务人员嫌山区工作条件差,收入低,希望离开卫生院到市直属医疗卫生单位工作,而后者又因编制有限不能接

收,于是这些医务人员便想方设法离开福安前往经济发达地区。到1996年,全市卫生技术人员减少到983人(其中高级职称11人,中级职称113人),这种人才流失的情况严重影响了福安市卫生事业的发展。

(二) 医疗设备 50年代初,福安各医疗单位仅有简单的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计,外科的小号手术包,妇产科的简易产床和一般接生器械,化验室仅有普通显微镜和三大常规检验器材。

1958年,县级医疗单位增设放射科,购置50MAX线诊断机一台。1960年开设五官科,增加了五官检查器,视力检查镜片箱;化验室增添了肝功能检查的光电比色计、分析天平和水浴箱等。80年代以后,福安各级医疗机构的设备有所增加。1996年,市直属医院与乡镇卫生院共有B超机9台,X光机18台,心电图诊断机16台,尿八项检测仪1台,普通手术床4台,牙科治疗机5台。

1996年,全市医疗机构设有病床531张,其中市级医院340张,比1972年的230张增加了33.5%。此外还有家庭病床364张。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建筑面积43,500平方米,比1978年增加了3.4倍。

三、地方病、传染病防治

(一) 结核病 据1976年福安县人口死因回顾调查,1973年~1975年结核病死亡率为61/10万,居各类死因第4位。1977年接种卡介苗4.8万人次。1984年,结核病被列入重点防治。1989年建立结核病登记报告制度。此后,结核病的患病率逐年降低。

(二) 地甲病 1979年调查157个自然村,患病率最高的为利岔大队,达1.38%。1979年~1983年,平均每年实检36,676人次,查出患病者258人。1984年定潭头乡为地甲轻病区,1985年开展服碘盐工作。至1987年已达到基本控制标准。

(三) 丝虫病 1957年~1978年先后组织了3次大规模的丝虫病查治活动,共血检96.44万人次,查出病例20,682例,治疗3141人次。同期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群治群防活动。1983年11月至1984年3月底,全县采用海群生药化食盐防治丝虫病,监测243,187人次,药盐覆盖率为92.92%。1985年5月抽样检查,血检7515人,检出微丝蚴血症2例,微丝率为0.03%,确认福安基本消灭了丝虫病。

(四) 血吸虫病 1976年以来,全县出动劳动工日3275个,在松罗、溪尾、甘棠、赛岐、下白石、湾坞、溪柄等地查螺,灭螺面积687.1万平方米。1985年10月,经省、地、县组成的考查组考核,确认福安已达到消灭钉螺的标准,血吸虫病已基本消灭。

(五) 麻风病 1949年以后,福安县陆续开展了麻风病查治工作。1972年,全县调查确诊19例,其瘤样型者被送到古田麻风病院治疗。1985年9月,省、地有关部门确定福安基本上消灭了麻风病。

四、妇幼保健

(一) 妇女保健 1952年,县妇幼保健站成立,随即开展全县性妇女病普查普治工作,并采取各种形式宣传妇女五期(月经、怀孕、产褥、哺乳、更年)保护、劳动保护和卫生保健知识。1959年~1962年在全县普查中发现患子宫脱垂者2060人,治疗1178人;1973年~1985年检查妇女17,104人,发现患者1622人,分别予以治疗。1986年~1989年又进行了妇女病普查,共计检查2948人,查出患病者791人,发病率为26.83%,治疗356人,占患病者的45%。近年来,妇幼保健工作成绩显著,目前新法接生率达98%,新生儿破伤风发生率为0,孕产妇死亡率为2.8/万人,婴儿死亡率降为1.82%。

(二) 儿童保健 1978年,福安县卫生局开始实行计划免疫

工作。全县建立儿童接种户卡 97,977 户,占总户数的 91.2%。1988 年,全县 0 至 7 岁儿童 66,076 人,建卡 60,728 人,建卡率为 91.9%。目前儿童基础免疫主要有:小儿麻痹、百日咳、麻疹、卡介苗(以上简称“四苗”)、乙脑、流脑等多种疫苗和制剂。免疫工作以乡镇为单位,“四苗”接种率达到 85% 以上。

除计划免疫工作外,福安市还对儿童的健康状况进行过不同规模的普查。1983 年体检幼儿 917 人,其中健康幼儿 910 人,占 99.23%。1985 年对幼儿园、托儿所 1174 名儿童进行体检,健康儿童 1073 人,占 99.91%。1989 年对幼儿园、托儿所 1656 名儿童进行体检,健康儿童 1654 人,占 99.88%。近年来,福安市各幼儿园、托儿所对儿童的饮食和保健工作日益重视,多数幼儿园都设有保健医生,儿童的发病率日益下降,健康水平明显提高。

五、民族医药工作

福安市畲族地区的主要医疗机构有福安市民族医院、坂中畲族乡卫生院、康厝畲族乡卫生院和穆阳畲族乡卫生院。78 个畲族行政村有 60 个医疗站(所)。市民族医院原为福安市人民医院,1992 年 1 月更名为福安市民族医院。该院设有外科、内科、骨伤科、妇产科、儿科、口腔科、五官科、放射科、检验科、B 超、心电图室及青草科^① 等 12 个科室,核定病床 80 张。现有医务人员 60 人,其中高级职称 2 人,中级职称 4 人,初级职称 47 人。1995 年,医院门诊量为 32,200 人次,住院 431 人次。由于资金不足以及地理位置不利等原因,该院近几年出现了连续亏损的局面,仅 1995 年亏损额就达 21.2 万元。

为了加快民族医药研究推广工作,福安市于 1992 年成立了民族医药研究所,其宗旨是总结、整理和开发应用民族民间医药。近

^① 青草科:即畲医科,因畲医以传统的青草药治病而得名。

几年来,在挖掘、整理畲族医药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完成了《畲族常用药 350 种》的初稿;《畲族医药的特点、现状及其发展》被收录到《中国当代民族医药集成》中;《闽东畲医雷晋全正骨经验的研究》获第三届世界传统医学大会“突出贡献国际优秀成果奖”。

第五节 体 育

辛亥革命以前,福安的体育活动局限于民间自发范畴。民国时期,西方的竞技体育开始传入福安,在传统体育的基础上增加了田径、球类和棋牌等。1930 年~1940 年,福安曾举办过 4 次全县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和 3 次全县运动会、2 次闽东运动会。1949 年后,体育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近年来,福安市先后荣获过“全国第四批体育先进县”、“福建省体育系统先进集体”、“福建省群众体育活动先进单位”、“福建省施行锻炼达标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一、体育机构与设施

(一)体育机构 1956 年 4 月,福安设立县体育运动委员会,作为政府主管体育事业的职能部门开展工作。其任务是根据国家有关体育方针、政策,统一领导、协调、监督全县体育工作,并指导各行业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

从 1960 年起,福安县(市)的各类体育团体先后成立。目前福安市的体育团体主要有:足球协会、排球协会、射击协会、体操协会、乒乓球协会、田径协会、篮球协会、信鸽协会、老年人体育协会、羽毛球协会、围棋协会、桥牌协会、老年人钓鱼协会、职工体育协会、农民体育协会、门球协会等。

福安体育人才的培训机构主要是福安职业学校体育教师班和福安市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福安职业学校体师班开办于

1987年,学制为3年,课程有政治、语文、数学、教育学、体育理论、体育统计学、体育心理学、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医学、田径、球类、体操、武术。该专业毕业生由省教委统一组织命题考试,并结合技能测试及逐年考试成绩,在政审和专业成绩合格的基础上,约40%的毕业生被择优录用。福安市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创办于1960年,是全省10所中心青少年业余体校之一。1970年~1996年间,该校共向省体工队、省体校输送39人,考取体育大专院校74人,其中有荣获第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的陈新华等优秀运动员。

(二) 场地设施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福安县在城南的吴厝坪修建了第一个公共体育场,在衙里操坪修建了一个篮球场,为福安仅有的体育活动场所。1949年以后,人民政府接管了破损不堪的公共体育场,并逐年拨款整修和扩建。1957年,为了适应不断发展的群众性体育活动的需要,在城关西门外官埔洋新建了县人民体育场。场内拥有400米跑道的标准田径场(含足球场),有1座拥有1500个观众席的灯光球场,1个体操器械场,两个室外篮球场,以及办公楼、宿舍等附属设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政府将体育场馆设施建设纳入社会发展规划,通过社会集资、发行体育建设彩票等途径,不断完善体育设施。各学校、工厂、机关等单位也纷纷新建了自己的体育活动场所。目前,全市拥有的各类体育场地已达100多处。

二、学校体育

民国时期,体育课虽已成为中小学校的必修科目,但由于师资缺乏,场地不足,体育设施较差,体育教学还仅限于官立学校。

1949年以后,学校体育受到重视,各学校均配备体育教师,购置器材,开拓场地,体育教学工作逐步走上正轨。50年代以后,县内中小学普遍开设了以田径、篮球、排球、乒乓球、韵律操、武术等

项目为主的体育课,每周2节至3节,并每天安排一次课间操、一次眼保健操和一节课外活动课。1963年,各校利用课外活动时间在青少年中广泛开展乒乓球活动,纷纷成立了业余乒乓球队,鼓励学生参加训练。1971年,城关各中小学利用每天下午的课外活动时间轮流主办篮球友谊赛,取得了较好的训练效果。

1978年以后,各中小学的体育活动开展得更为扎实,参加《全国体育锻炼标准》测验的学生达到100%。1990年被福建省评为“体育达标先进单位”。近年来,达标率又有所提高,1995年~1996年度,参加测试的学生达57,329人,达标率为85.2%。

福安市中小学体育活动的强项为田径,各校每年都要举办田径运动会。其它项目如乒乓球、篮球、羽毛球、拔河、射击、射箭等也根据各校情况每年安排2至3次比赛。

三、群众体育

福安的群众体育活动开展得较好。早在五六十年代就举行过篮球、拔河、民间武术、舞狮、舞龙等农民体育活动和环城跑、拔河、篮球、乒乓球等职工体育竞赛。1977年~1979年,赛岐镇长崎村因开展体育活动成绩突出,被评为全省和全国农村体育先进单位。

80年代以后,参加健身锻炼的群众逐年增加。全市百人以上机关、企事业单位都成立了体育协会,21个乡镇(街道)都成立了农民体育协会。全市约一半的行政村也成立了农民体协,并把农民体育运动的开展与建新村、奔小康活动结合起来,经常利用农闲季节和节假日组织各种农民喜爱的体育活动。1996年,穆阳镇被评为“全国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集体”。

福安市有组织地开展老年人体育活动时间不长,始于1984年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成立之后。1989年9月,福安县举办了首届敬老日活动,组织门球、定点投篮、乒乓球单打、象棋、围棋、投圈、麻将等多项体育活动。同年还举办了全县第一届老年人运动会,有

1500 多名老人参加了开幕式慢走活动,200 多人参加了 38 个项目的竞赛。此后,福安市几乎每年都要举行一至两次老年人体育竞赛活动。

四、民族传统体育

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畬族群众创造了许多适宜于地域特点和民族特点的传统体育项目。福安畬族流行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主要有“打尺寸”、“打枪担”、“舞龙头”、“虎捉羊”和“猴抢蛋”等。

(一) 打尺寸 这是一项竞技性项目。相传为纪念畬族英雄蓝凤高以断弓横扫敌箭演变而成。“尺”代表断弓,“寸”即残矢之意。该项体育活动一般是在劳动之余举行,参加者至少两人,多则五六人。在一块长 30 米、宽 10 米的场地一端正中处画一直径为 1.5 米的圆圈。一人持一长约 30 厘米、粗 1.5 厘米的木棍(即“尺”)和若干支如铅笔大小的竹条(即“寸”)站在圈内,用木棍击竹条飞向前方,其他人在前场奔接,接到就得一定“尺寸”。未接住的竹条被就地捡起后可向圆圈投去,持棍者可用手接(接住得一定“尺寸”),也可以用棍将其击出。如竹条投中圈而未被接住或未被击出,则投者得胜,持棍者换人。如竹条投落圈外,或被击出(投者不能接,接则受罚),其落点经丈量后,根据其离圆圈距离的远近给予持棍者一定“尺寸”。在约定时间内先得到一定“尺寸”或得“尺寸”多者为胜。^①

(二) 打枪担 畬族群众上山砍柴草时,常就地砍竹一根,削尖两头,用以挑柴草,称为“枪担”。“枪担”长约两米,两端成斜面、尖顶,既是劳动工具,又是防身之器。上山时一边唱山歌一边用刀敲击“枪担”,逐渐形成“打枪担”这一娱乐性健身项目。^②

(三) 舞龙头 相传,畬族祖先盘瓠是龙的形象,祖公图上画

^① 参阅《福安畬族志》第 512~513 页,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② 同上书,第 513~514 页。

的祖先形象是龙头人身,手执龙杖。因而,畬族人民以龙的传人自称。“舞龙头”是畬族人民歌颂盘古开天辟地的光辉业绩以及纪念祖先抗击入侵者获胜时的表演项目。表演时,除龙头以外,还有龙珠、伞等器具,并配以畬族古音乐。

(四) 畬家拳 畬家自古习武者不乏其人,今尤以康厝畬族乡金斗洋村最负盛名。金斗洋畬族拳是少林武功中一支流派,它动作朴实无华,招招讲究实用,特点别具一格,广泛流传于畬族聚居地。该村也被誉为全国“畬族武术之乡”,并编著《畬族拳》一书,于1987年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列入中华武术文库,还拍成了电视片《闽海雄风》在全国播映。

近年来,福安市对畬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开展十分重视,不断加以挖掘整理和推陈出新,每届“三月三”畬族民俗节中,都进行畬拳表演、畬族传统棋类擂台赛等活动。1991年11月,福安市曾代表福建省参加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其中“打枪担”荣获一等奖,“打尺寸”、“虎捉羊”、“猴抢蛋”、“舞龙头”荣获三等奖。

第六节 民族语言

福安汉族使用的汉语主要是普通话与当地方言福安话,畬族群众日常生活中则主要讲福安畬话。^①

福安畬话是各地畬族人内部通行的“山哈话”,即“畬话”的一个地方变体。“山哈话”接近汉语客家方言,但跟现在汉族客家人说的客家话又有一些不同之处,它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均有自身的特点,还保留了一部分古畬语的“底层”,跟古畬语有渊源关系。由于福安畬族人口居全国大小畬族聚居区之冠,居住较为集

^① 本节参阅《福安畬族志》第543~552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因此福安畬话保留的古成分相对多些,受当地汉语方言的影响也相对较少。在全国各地的畬话中,福安畬话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福安畬话大体上可分为北片区和南片区。北片区以坂中、穆云、康厝、溪潭四个乡为主,加上溪柄、松罗、城阳、社口等乡镇,这一片区畬族人口有 34,500 多人,约占全市畬族总人口的 60%。南片区包括甘棠、下白石、湾坞、溪尾及赛岐等乡镇,畬族人口 23,000 多人,约占全市畬族人口的 40%。由于北片区畬族长期居住于偏僻山村,较之接近平原、沿海地带的南片区畬族与当地汉族来往少,因此其畬话受当地汉语方言的影响比南片区要少,古成分保留得比较好。

福安畬话共有 15 个声母(包括零声母)和 73 个韵母(包括自成音节的韵母),共有 6 个声调。50 年代以后,随着畬汉群众交往日益密切,福安畬话受当地汉语方言福安话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除语音外,一些与畬话同义的福安话词语在交际中从与畬话原词语并用,发展到逐渐替代了原畬话词语,另有大量的反映新事物的福安话词语融入福安畬话中。即使是比较稳定的语法结构,也不同程度地受到福安话的影响,一些福安话的语法结构已经开始替代某些畬话的原语法结构。

50 年代初期,福安畬族很少有人会讲当地汉话和普通话。随着教育的发展和国家对普及普通话的重视,畬族居民中认识汉字、会讲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据调查,目前 50 岁以下的畬族居民基本上都会讲普通话,这对促进畬汉人民的交流以及畬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无疑是有利的。

第五章 社 会

第一节 社会结构

一、1949 年以来的阶级、阶层变化

1949 年,福安县总人口 238,185 人,其中农业人口 213,187 人,占总人口的 89.50%,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社会。据 1952 年所划定的农村阶级成分,1950 年全县的阶级阶层情况为:地主 1935 户,占全县总户数的 2.77%;地主兼工商户和工商户兼地主 110 户,占 0.16%;富农 944 户,占 1.35%;中农 16,766 户,占 24.01%;贫农 40,638 户,占 58.20%;雇农 4599 户,占 6.59%;手工业者 1694 户,占 2.43%;小商贩 776 户,占 1.11%;工商业者 312 户,占 0.45%;债利生活者和小土地出租者合计 2051 户,占 2.93%。农村社会结构中贫雇农和中农占绝大多数。

福安畚族大多聚居在山区,经济发展落后,阶级分化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也比较缓慢。根据 1951 年的调查,在全县的 8122 户畚族中,地主仅 7 户,富农 25 户,两者合计占 0.39%;中农 774 户,占 9.53%;贫雇农 7316 户,占 90.08%。显然,畚族社区中地主、富农的比例大大低于全县的平均值,贫雇农的比例则比全县的平均值高 25.29 个百分点。畚族社区的社会结构也相对简单得多。

经过土地改革,地主阶级被消灭,个体农民成为农村社会结构的主体。1958 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全县的个体农民都转变成成为公有制条件下的集体农民,其内部差别不大,收入相对均衡。这

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止。

福安工商业活动历史悠久。清同治七年(1868年),福安即有茶叶出口外销业务。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鼎盛时出口茶叶多达500吨。全县境内有24个集市,其中坦洋茶市、富溪津渔市、穆阳山货市场都已颇具规模。1950年底,全县共有私营商业2204户,从业人员4867人。根据1955年福安县对私营商业及饮食业的普查,当年末全县共有私商2432户,从业人员4029人。其中商业1914户,从业人员3198人;饮食业256户,从业人员436人;服务业262户,从业人员395人。在1914户商业户中:坐商1137户,从业人员2245人;行商45户,从业人员46人;摊贩732户,从业人员907人。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基本上完成了手工业合作社的组建,形成了福安县集体工业的基础,私营商业也过渡成为国营商业或合作店组。1957年,全县只有私营商业354户,从业人员467人,全年销售额71.8万元,其销售额由1950年占全县销售总额的91.4%降至3.3%。私营商业受到各方面的抑制,发展艰难。

从此,工人、农民形成了福安县的基本社会结构。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才开始出现一些分层趋势,社会结构渐趋复杂,开始形成由工人、农民、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雇工等阶层或群体组成的新的社会结构。

二、农 民

1983年,福安县农村全面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原有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被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新体制所代替。随着农业生产持续稳步增长,农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96年,福安市农村社会总产值达46.97亿元,非农产业总收入已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70.03%。其

中农村工业总产值为 25.21 亿元,远远超过了农业。因此,农民内部已经发生了职业分化。

(一)农民类型 目前,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大体上可划分为农业劳动者、农业兼营者、外出打工者、农村个体工商户、农村工业职工、农村干部等农民群体。

1. 农业劳动者。在福安,农业劳动者指以从事种植业、养殖业为主的劳动者,他们仍然是福安农村社会的主体。1996 年,农业劳动者占福安农村在业总人口的 79.56%。在这些劳动者中,多数仍从事着传统的简单再生产,依然保留着传统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不过从其中也分化出一些种植或养殖专业户,他们开始走上了农业产业化的道路。有的专业户已经拥有较大的经营规模,他们有的经营成片的茶山、茶场,有的建立了股份制的鱼塘、果园,在推进农业的产业化和技术进步等方面起到了带头示范作用。

2. 农业兼营者。即兼业农户。福安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问题早在 20 年前就已暴露出来。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因素,季节性的劳动剩余时间也比较多,因此从事季节性非农产业活动的农民为数众多。他们有的进入乡镇企业务工,有的从事建筑、运输、采矿,有的从事农副产品加工以及贩运等工商业活动。由于花在农业生产上的时间不多,因此,很多兼业农户以非农业劳动为主。非农产业的收入也构成了其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1996 年,农户家庭收入中只有 52% 直接来自农、林、牧等农业生产,另外的 48% 均来自非农业生产。

3. 外出打工者。在福安农村,尤其是畲族村,农民外出打工的现象非常普遍。有些畲族村(如凤洋村等)外出打工者占全村劳动力总数的 80% 以上。与兼业农户不同,大多数打工者并不是专门从事某一职业,而是有什么活就干什么活。打工者中大多数属季节性外出打工,即农闲时外出打工。但也有相当部分属常年在福建省内或外省市打工,已基本上成为职业打工者,即使回到村里也

是稍作休息,已不再从事农业劳动。也有少数常年外出打工者成为建筑公司的经理或老板,已经在外地购置房产安家落户。

4. 农村个体工商户。福安农村的个体经济比较活跃。1996年底,全市批发贸易业个体户 625 个,其中 256 个在农村,从业人员 630 人;全市零售贸易业个体户 8760 个,其中 3508 个在农村,从业人员 5923 人;全市餐饮业个体户有 1085 个,其中 390 个在农村,从业人员 2267 人。另外,农村中还有大量的个体户从事着农副产品采集、加工、贩运以及工业加工、交通运输等工作。个体工商户是农村中收入较高的群体,其中有少数经营比较成功的个体工商户开始逐渐成为私营企业主或组成股份制企业,但也有部分个体工商户属兼业性质,如在村里开小商店的人家,大多都同时从事农业劳动。

5. 农村工业职工。即乡镇企业职工。1996 年,福安市的乡办及镇办企业拥有职工 5777 人,村办及民营企业的职工更多。当年全市乡镇企业实现产值 31.78 亿元,成为福安农村经济的支柱。这些企业的职工绝大多数是本乡本村的农民,其中有部分属兼业农户。从总体上讲,乡镇企业吸纳了农村中知识水平较高、较年轻的劳动力。部分乡镇企业的职工已与城镇企业职工无异。

6. 农村干部。主要指行政村干部。1996 年,全市 447 个行政村共有干部 1600 人。农村干部由全体村民集体民主选举产生,享受国家的固定补贴,仍然拥有责任田,参加农业生产,是农民中的管理阶层。

(二) 收入分层 从总体上看,个体工商户的收入要高于乡镇企业职工、兼业农户和外出打工者,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传统农民收入最低。但随着福安市的农业逐渐在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农业科技含量不断增高,农民种植龙眼、荔枝、橄榄、反季节蔬菜或从事养殖业也有机会获得较高的收入。另一方面,农村居民收入的差异还表现在不同的乡(镇)、村之间。交通便利、农业生产条件较好

的乡村农民收入水平较高,山区农民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1996年,福安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232元,收入最高的穆阳镇农民人均2605元,收入最低的康厝畲族乡农民人均1600元,人均收入差距为1005元。1996年,全市人均纯收入800元以下的贫困人口还有2.47万人,多数都分布在交通不便、生存条件恶劣的偏僻山区。

三、职 工

职工队伍包括企事业单位和机关的干部、工人,教育卫生等部门、行业或单位的职工。1996年,全市职工总数为35,729人,是社会结构中仅次于农民的第二大社会群体。

(一) 所有制分层 1996年,福安市国有单位共有职工28,025人,占职工总数的78.44%,是职工队伍中的最大群体;城镇及集体经济单位职工5777人,占职工总数的16.17%;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企业等其他各种经济类型单位合计共有职工1927人,占职工总数的5.39%。在国有单位职工中,中央、省、地属单位职工7634人,占国有单位职工总数的27.24%;市及以下属单位职工20,391人,占国有单位职工总数的72.76%。

(二) 行业分层 福安市职工(不分所有制)分布最多的是制造业,1996年底共有职工6745人,占全市职工总数的18.88%;其次为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有职工5976人,占全市职工总数的16.73%;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有职工4470人,占全市职工总数的12.51%;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有职工3349人,占全市职工总数的9.37%;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有职工3114人,占全市职工总数的8.72%;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有职工1058人,占2.96%。其它行业职工合计11,017人,占全市职工总数的30.83%。

(三) 职业分层 福安市职工大体上可分为工人(包括党政机

关和事业单位的工人)、专业技术人员(包括教师等)、干部等几大类。根据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统计,全市共有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2640 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12,578 人,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3995 人,商业职工 11,175 人,服务性工作人员 4140 人,生产、运输工人及有关人员 28,028 人(包括在农村工业企业当工人的农民)。

(四)收入分层 福安市职工的工资收入水平因所有制、隶属关系等不同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按隶属关系分组,1996 年,中央属单位职工工资最高,职工年平均工资 6214 元;省属单位次之,为 5582 元;市及市以下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为 4857 元;最低为地区属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为 4607 元,与中央属单位相比,收入差距为 1607 元。

从所有制来看,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工资最高,1996 年平均工资为 4950.79 元;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企业等其他经济类型单位职工工资收入次之,年平均工资为 3734.51 元;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工资最低,年平均工资为 3355.58 元。

在国有单位中,职工人均工资水平事业单位最高,党政机关次之,最低为企业(参阅本章第七节)。

四、个体工商业者和私营企业主

1979 年以前,福安个体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抑制并逐渐萎缩。改革开放后,城乡个体工商户迅速涌现,发展很快。1992 年,全市个体、私营企业工商户达 7000 多户,从业人员 2 万余人,个体、私营工业企业产值占市属工业产值的四分之一,成为福安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6 年,全市仅从事第三产业的个体工商户就有近万户。福安市个体工商户的规模不大,平均每户从业者仅 2.39 人,雇工不多,大多都是业主独立经营。与个体工商户相比,私营企业的规模则要大得多。私营企业主大多数都是个体工商业

者中的较成功者。据 1995 年福安市第三次工业普查的统计,全市工业企业中有私营企业 96 家,从业人员 2084 人,当年工业总产值达 1.89 亿元。有的地方还出现了一批民营经济村和民营经济小区。仅穆云畚族乡桂林村年销售收入 100 万元以上的私营茶厂就有 23 家。坂中畚族乡民族工业开发区 1996 年底共有企业 43 家,其中规模最大的私营股份制企业万达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年产值达 5000 万元,1996 年上缴利税 100 万元,雇用职工 300 多人;东方神电子有限公司 1996 年产值达 3000 万元,雇用职工 400 多人。私营或民营企业已成为福安市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节 婚姻和家庭

一、婚 姻

在古代,畚族婚姻比较自由。邝露《赤雅》说:“十月祭多贝大王,男女联袂而舞,谓之蹋瑶,相悦则男腾跃跳踊负女而去”。^①同姓不同宗的虽可以结婚,但比较少见。畚族历史上一般不与汉族通婚,只在盘、兰、雷、钟四姓之间互相通婚。过去,畚族的婚姻是不计聘金的,女方的嫁妆一般都是农具和生活用品,婚礼十分简单。

1949 年以前,畚族在婚姻制度上的封建买卖包办比较严重。父母有包办子女婚姻的权力。青年男女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约束,婚姻极不自由。男方娶亲须交给女方许多聘礼,贫苦农民因经济困难,往往终身不能成婚。养童养媳的风气也很盛。

50 年代初期,福安畚族由父母包办婚姻的现象还普遍存在。60 年代以后结婚的夫妇大多是通过自由恋爱结婚,如今已基本消

^① 转引自《畚族简史》第 97 页,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除了父母包办婚姻的状况,实现了恋爱自由、婚姻自主。

(一)择偶范围 基本上以本地为主,但已呈扩大之势。在我们走访的农户中,40岁以上的户主其配偶大多来自本行政村或本乡,来自外乡和其他县市的极少。40岁以下的户主通婚范围要稍大一些,但配偶来自其他县市及外省的仍不多见。此外,随着我国民族平等政策的落实,民族间的隔阂已经消失,畲族传统上的族内婚制已有所改变,畲、汉族通婚现象日渐增多。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统计,坂中畲族乡18个村民委员会(缺井口、坂中)累计,1608对夫妇中,畲族族内婚1523对,占94.71%;畲娶汉45对,占2.8%;畲嫁汉40对,占2.49%。韩阳镇16个街(村)统计,715对夫妇中,畲族族内婚230对,占32.17%;畲娶汉260对,占36.36%;畲嫁汉225对,占31.47%;畲、汉通婚共485对,占67.83%。上述数据表明,农村中畲、汉通婚现象还比较少,而城镇中畲、汉通婚的比例已高于畲族族内婚,畲、汉通婚现象已经十分普遍。

(二)性别比例 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的统计,在全市15岁及以上人口中,畲族人口共有40,985人,其中男性22,478人,女性18,507人,男女性别比为1.21:1,性别比例失调已十分显著。其中,在15岁以上畲族未婚人口中,男性为8491人,女性为3524人,未婚人口中男女性别比为2.41:1;在30岁以上未婚人口中,男性为3009人,女性为87人,性别比为34.59:1。福安市畲族未婚人口的性别比例失调问题已经十分严重,这个问题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三)丧偶 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统计,在全市15岁及以上丧偶的畲族人口中^①,男女性别比为0.71:1。其中男性丧偶占丧

^① 由于第四次人口普查无20岁以上畲族人口的离婚、丧偶人数统计,故以15岁及以上人口统计数据代替。该统计口径不十分恰当(我国《婚姻法》规定女性法定结婚年龄为20周岁及以上,男性为22周岁及以上),仅作参考。

偶总数的 41.66%，女性丧偶占丧偶总数的 58.34%。随着年龄的增加，女性丧偶率的增长较男性高，在高年龄组，即 65 岁以上人口中，这种特征更为明显。总体上看，福安畬族丧偶率为 8.30%，较之全市 7.16% 高出 1.13 个百分点。

（四）离婚 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统计，畬族 15 岁及以上离婚人口的比例为 1.09%，较之全市的 0.94% 高 0.15 个百分点，比全国的离婚率低 0.01 个百分点。在离婚未再婚人口中，男性占 97.09%，女性占 2.91%，男性未再婚率显著高于女性未再婚率。

二、家 庭

（一）家庭户规模 畬族社会的基层单位是以父母为核心，由父母与子女组成的家庭。家庭规模以 3 至 5 口人为多，7 至 8 口人的较少。畬族四五代同堂的家庭很少。三代同堂者也多是独子的家庭，由父母、儿子、儿媳、孙子三辈人组成。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表明：福安畬族家庭共有 14,995 户，占全市家庭户总数的 12.60%；户均 3.84 人，比全市户均人口少 0.49 人。畬族单身户较多，占畬族家庭户总数的 22.01%，较之全市的 10.97% 高 11.04 个百分点。从总体上看，畬族家庭户规模普遍小于当地的汉族家庭户规模。

（二）户口状况 第四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显示：福安畬族农业人口占全市农业人口的 12.71%，非农业人口仅占全市非农业人口的 1.85%。由此可见畬族人口更多地聚集在农村，以农业为生。其中畬族农业户占畬族家庭户的 94.62%。

（三）妇女地位 畬族社区是以小家庭为社会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家长是男子，但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一般都比汉族妇女高，表现在女子往往同男子一样享有财产继承权，入赘者必须改为女方姓氏等方面。这也是畬族妇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种反映。目前，畬族女子能够与男子一样平等地接受教育，

自由恋爱、结婚。畬族妇女普遍参加农业生产或外出打工、经营买卖,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节 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一、传统节日

长期以来,福安的畬族居民与汉族居民交错杂居在一起,形成了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在生活习俗方面彼此相互影响,逐渐趋于接近。故畬族流行的节日与汉族大致相同,如春节、清明、端午、中元、中秋、重阳等。比较有地方特色的节日主要有:^①

(一) 奶娘节 农历正月十五日,为畬、汉族祀神“奶娘”生日。“奶娘”姓陈名靖姑,号十四娘,福州下渡人氏。相传“奶娘”幼年学过闾山法术,能穿山破洞,捉拿妖精;能呼风唤雨,救济天下良民;能保胎催生,保护婴儿;能斩邪驱鬼,救护万民。畬民对她十分崇拜,户户神堂里都有她的神位。凡设有“奶娘宫”的畬族村庄,家家必备一斤以上的红蜡烛,并捐献钱粮,筹备三牲福礼到“奶娘宫”供祭,以保村闾平安。每隔二三年的正月,还要请巫师,组织人马去古田县临水宫“请正身”。“正身”回宫后,摆起“三司”案(三张八仙桌叠起),巫师乔装“奶娘”模样,行“庄楼变殿”、“水面踩罡”术,做“清醮”1至3天,热闹非凡。

(二) 会亲节 农历二月二日,是坂中畬族乡后门坪一带畬族村民的会亲节。这天,凡是后门坪“雷氏宗祠”的支派,以及与该村有亲戚关系的,都不远百里赶到该村会亲,时间1至2天。回故里瞻仰祖公香炉的会亲者往往要超过后门坪村人数的几倍,但本村人都能无偿予以接待。人人都以歌待客,户户都为彻夜不眠的歌

^① 有关传统节日的内容参阅《福安畬族志》第681~685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场。因此,这天也成了闽东畲族盛大的歌节,经久不衰。近十几年来,青年人热衷于流行歌曲,会唱畲歌的人日益减少,唱畲歌的多是中老年人。畲歌演唱者有后继乏人的趋势。

(三)“三月三” 福安畲族的传统节日。这天,畲族男女必须出门“踏青”,采集畲山特有的乌稔叶,泡制乌米饭,缅怀先祖,全家共餐,馈赠亲友,共同预祝丰年。近十几年来,福安市政府在“三月三”举办了多次规模盛大的畲族民俗节活动。

(四)牛歇节 农历四月初八,为畲汉两族的牛歇节。这天一早,畲族农民就要把牛赶到山上去吃露水草。接着把牛牵到水边洗刷牛身,以除垢定心,并解缰卸犁一天,以泥鳅或鸡蛋泡酒,用竹筒灌喂。又以米粥或薯米粥等精饲料喂养,以酬耕作之劳。这一日严禁棍打鞭甩,以定牛魂。同日,在穆阳一带的畲族牧童和畲族青年男女也要休息一天,前往附近海拔千米的牛池坪对歌。

(五)元帅节 农历八月二十二日,为田公元帅生日。凡供奉田公元帅的畲族人家都要过元帅节。这一天,要杀大公鸡一只,连同其他福礼摆到元帅坛前供祭。祭罢,全家人喝“元帅酒”壮胆,据说能驱邪魔鬼怪,以祈平安。

二、传统生活方式

(一)服饰 在畲族传统服装中,男性服装与当地汉族大致相同,女性服装富有民族特色。随时代发展,现在男女平时着装已与当地汉族基本相同。但是畲家女结婚时,一般都新制一套民族服装作为嫁妆。年老的畲族妇女还有保存民族服装的,并时有穿着。

畲族女服又称“凤凰装”。“凤凰装”为黑色,上衣有花纹,纹样简洁明快,只在衣领上用水红、黄、大绿等有色的马牙花纹,沿服斗的边缘缝上一条三四分宽的红布边,边的下端靠袖头的地方是一块绣花的角隅花纹。上衣袖口上缝一块1寸多宽的红布边。黑布长裤的式样和汉族相同。

畚女都配有围身裙,又称“合手巾”。也是黑布制成,裙身上端有一段3寸宽的红布横缝,上端两角绣花。

(二) 发型 畚族妇女发型独特,从后枕梳成瓜辫状,向上盘旋绕头盖一匝,高约面部的二分之一,如截筒高帽一般。发间环束数根深红色的绒线,“高帽发”顶中横插一根银簪,有的还斜插1条耳扒或1根豪猪簪。未婚少女则用红绒线缠辫子,盘绕在头上,额前留若干“刘海”。到了16岁,其头发也要梳成如截筒高帽般的妇人发髻,仅是顶中没压银簪而已。

靠近霞浦县茶洋、溪尾一带的畚族妇女则梳“福宁头”。她们的头发从后枕梳成瓜辫状后,向上盘旋到头顶,如海螺型。在“螺”顶横插一根银簪。未婚少女则把长发绕头一匝,用红绒线箍紧,左右分别用1根银筭压住。畚族妇女很爱惜自己的发饰,上山砍柴,都要披上一块花布做为保护物。这也表示她是一家之主的主妇。

50年代中期以后,畚族妇女均剪短发或留辫子。只有部分老年妇女还保持原来的传统发型。

(三) 饮食 畚族居住在山区,历史上是以番薯为主食,有“番薯丝吃到老”之说。由于大米较少,有时一锅要煮三种饭,即白米饭用来招待客人,白米和番薯丝对半掺,以供老人和小孩吃,纯番薯丝饭给青壮年吃。经过土地改革,畚族农民也分得部分水田,可以经常吃到白米饭了。80年代以后,随着稻谷产量的提高,如今绝大部分畚族居民都以大米饭为主食,仅少数山区还把番薯丝和米饭搀和起来吃。大部分番薯已被用作饲料。

畚族居民日常的蔬菜主要有芥菜、萝卜、芋头和马铃薯等。其中芥菜和萝卜还可腌制成各种咸菜食用。

畚族的节日特殊食品主要有乌米饭、菅叶粽、糍粑等。

畚族男子嗜好酒。大人爱喝自己家酿的糯米酒和“番薯酒”,小孩爱吃自家做的连酒糟一起吃的“酒娘糟”。“番薯酒”制法是把番薯丝煮熟后加麦芽经酶糖化后取其汁,将汁煮沸,冷却后掺和家

酿三日的糯米酒,即是番薯酒;另一制法是取番薯丝加水浸后煮熟,或把鲜番薯煮熟,而后加酒曲,经发酵后蒸馏出的烧酒即是。“番薯酒”香甜似蜜,人们喝了似醉非醉。农历十月过后,畲族农村家家酿酒,把酒抽到酒坛里密封起来,以备于年节、农忙时候饮用。

(四)居住 古代畲家住房以竹子为架,编竹片或芦秆为篱,覆盖悬草或杉树皮,以遮晴雨,俗称“悬草寮”。近现代以来,福安畲族房屋多为“四棉厝”,有的是两棉木料加左右两侧土墙,厝里的空间为三透。中央一透,正中用木板隔障,称为“中庭壁”,前为厅堂,后为后厅。其左右“正宫”门上各钉一个框架作神龛,称为“神堂”,左祀地方神,右祀祖公神。厅堂常放一张八仙桌,用于待客或过年过节祭祖。后厅放农具或舂米工具,或者作为餐厅。左右两头用木板隔成二三间卧房,内有小门相通,房里设床铺,并置橱、箱、桌子存放衣物等。里外卧房均设有一块可以推拉的木板窗户。多数人家把靠后厅的一间卧房作为灶房。畲族房屋每座多为两层楼,也有三层的,楼上一概不住人,只做粮仓和堆放柴草杂物之用。

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畲村建房数量明显增多。传统的土木结构瓦房逐渐改为砖瓦结构的房屋。进入90年代后,畲族村的钢筋混凝土民居也开始增加。这些新建住房,有的仍然保持着传统结构,但也有相当部分完全采用了新的建筑格局。^①

三、宗教信仰

福安居民信仰的宗教主要有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和道教。

(一)天主教 明崇祯四年(1631年),国外天主教会首次进入福安县境,在溪东村建立了第一座教堂,开始在福安秘密传教。清顺治十二年,福安罗江籍传教士罗文藻从菲律宾潜回福建传教,时值郑成功占据了金门、厦门,天主教士得到郑成功的支持,

^① 有关福安畲族传统生活方式内容参阅《福安畲族志》第681~685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公开传教,发展很快,入教人数增多。在此以后的近二百年间,福安一直是福建省天主教中心。传教士通过创办医院、学校、育婴堂等慈善机构发展教徒,扩张教会势力。1860年,全县共有天主教徒20266人,占福安县总人口的7.9%,分布在全县11个区3个镇150个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福安天主教的活动趋弱,“文化大革命”期间基本停止了活动。80年代后,福安天主教入教人数增多,特别是女教徒增长迅速。至1996年,福安市共有天主教徒4.5万余人,正式登记的天主教教堂5处,另外散见于各乡镇、村的未正式登记的教堂还有70处之多。福安天主教有主教1名,神父8名,修女4名,修士5名。不过,畚族群众极少有信天主教的。

(二) 基督教 基督教传入福安时间较晚。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英籍传教士伊牧师到福安传教,为福安基督教活动之始。50年代初,福安基督教共有教徒650人,分布在县城、溪柄、赛岐、下白石、前溪、潭头、泰逢、社口、柘头等9个堂区。1984年底,福安基督教三自会成立,为开展正常活动,福安教会以传道员(旧称传道士)代行牧师部分职责,并负责教会教务。由于天主教传入福安的时间早,教徒多,影响大,基督教的影响力日益衰落。1996年,福安市共有基督教传道员1名,教堂4处,教徒300人左右。

(三) 佛教 南齐时(479年~502年)佛教开始传入福安境内。唐开成三年(838年)建成的龟山寺,为福安修建最早的佛寺。高僧灵岩和尚、罗山和尚均在该寺受业,是六祖慧能所传第6代法嗣。佛教在福安的传播源远流长,在民间影响最大。不仅国内许多名寺古刹都有担任要职的福安籍僧人,而且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美国和港、台等国家和地区还有不少有影响的福安籍住持、法师及僧人。据统计,1996年福安市有正式登记的佛教场所213处,佛教教职人员有比丘僧224人,比丘尼227人,沙弥僧57人,沙弥尼82人。居士约有2000人,佛教徒约达12万人。福

安畚族也深受佛教影响。

(四) 道教 三国时期福安境内即有道教活动。宋代是道教活动的兴盛时期,宋淳祐八年建真庆观,为福安境内最早修建的道观。清代,民间通俗形式的道教很活跃,部分正一派道士不出家,平时与俗人相同,只有在参加法事时才穿上道袍。替死者超度亡魂的叫“道师”,从事斋醮、祈雨、设坛、驱鬼活动的称为“巫师”。“文革”期间,道教活动一度中断。80年代全真道龙门派再次传入福安。据统计,1996年,福安市有正式登记的道教场所11处,全真派乾道11人,坤道12人。福安道教除全真道徒外,还有部分正一派道士。

(五) 民间信仰 主要指畚族民间信仰。

1. 多神崇拜。畚族民间往往佛、道、地方神兼信,奉行多神崇拜。信奉的神灵有传说中的历史人物、宗族英雄田公元帅雷万清、钟景琪、雷万春(兴)、钟志公、李仙娘、盘自能、蓝光辉、钟志深、钟熙、雷大三十二公等;民间俗神有林公大王、灶神、奶娘、五显大帝等;道教神明有“三清”、三官大帝、真武帝、福德正神、将爷公等;佛教神明为观音;自然物体神灵有巨石神灵、巨树神灵等。呈明显的多神崇拜性质。

2. 祖先崇拜。福安畚族把“敬祖宗”列为崇拜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祭祖是畚族最隆重、最虔诚、最普遍的信仰活动。祭祖活动可分为家祭、墓祭和祠祭,时间往往选择在节日或做醮或修谱时举行。

第四节 社会保障

福安市的社会保障事业是伴随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县人民政府即设立了民政科。1952年成立老区建设委员会和军人转业建设委员会,进行老区建

设和烈士评定、烈属优抚、老区救济等工作 and 开展拥军优属活动,重点救济老苏区和烈属困难户,帮助人民群众生产自救,节约度荒,以工代赈。1980年4月,福安县成立规划扶贫领导小组,开始在湾坞、松罗等6个公社进行扶贫调查和实施扶贫工作。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民政局又承担起开拓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等任务。如今,福安市社会保障的大部分工作都由民政局实施。

一、优待抚恤

从1985年1月1日起,福安民政部门对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家属的定期补助改为发放定期抚恤金,并提高了发放标准。1989年,对革命烈属、因公牺牲军人家属每人每月补助35元~40元;家住城镇的,每人每月补助45元~50元。病故军人家属比上述标准低5元。以上“三属”中的孤老和孤儿,增发20%的抚恤金。1996年,福安市对农村义务兵优待金进行了改革,实行以市为单位进行统筹,在福建省率先出台了《优待金社会统筹试行办法》,并被省民政厅全文转发各地借鉴参考。1996年,全市农村义务兵优待金提高到人均1310元/年,比上年增加了33%。1996年,全市共发放优待金总额111.58万元,优抚对象23,881人。其中义务兵家属优待金额为82.64万元,其他优待对象优待金28.94万元。

二、社会安置

福安的社会安置工作主要涉及退伍军人、移民、上山下乡知青安置等。

(一)退伍军人的安置 1950年~1990年,福安共接收复员退伍军人13,206名,分别安排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矿企业、国营农场,以及安置回农村。1996年,全市共接收退役士兵和转业

志愿兵 268 人,其中转业志愿兵 10 名,三等甲级伤残军人 2 名。其安置情况为:农村安置 159 名,符合政策规定需要安排工作的 109 名。此外,民政局安置办还先后接收安置了一批军队离退休干部、志愿兵及伤残军人。

(二)移民安置 1949 年以后,福安境内最大规模的移民就是 1963 年至 1982 年的上山下乡知青的迁移和安置。1963 年~1967 年,全县动员了 1057 名城镇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到农村安家落户。1969 年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至 1982 年,全县先后共动员了 4472 名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其中在本县插队 4399 人,转外县插队 73 人。知青的重新安置工作始于 1972 年,至 1982 年,全县共统筹就业 3917 人,其中招工 2641 人,招生 729 人,征兵 493 人,招干 54 人。还有部分知识青年返回城镇自谋职业。

三、社会福利

1956 年,农业合作化后,福安农村对没有依靠的孤寡老人、孤儿以及残废社员实行由集体给予“五保”(保吃、保住、保医、保穿、保葬及孤儿保教)。人民公社时期大体上由生产队集体给予“五保”。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82 年,经过对五保户的逐户调查,全县确定享受“五保”的有 3542 户、3763 人,供养形式有社队供养、队供亲帮、亲邻供养三种形式。各乡镇对生活困难的五保户还给予适当救济。1988 年,福安县开始在各乡镇建立五保基金会,依靠集体供养的五保户由乡镇统筹解决供养问题。做到人均年口粮不低于 400 斤,由五保户所在村解决;生活费不低于 120 元,由所在村、乡镇财政、政府救济款各解决 40 元;医疗费由村负责,重病者乡镇给适当补助。

与此同时,农村五保户供养也开始逐步向举办敬老院集中供养方向发展。1990 年,全市只有 6 所乡镇敬老院,五保老人 60

名。到 1996 年,全市敬老院已达 21 所,五保老人达 206 名。敬老院大力发展院办经济,建立起 593 亩生产基地,基本上做到以场补院,五保户衣、食、住、行有专人管理,不仅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而且在卫生保健、文娱生活等方面的条件也有了较大的改善。1996 年,全市五保统筹供养总数达 3168 人,人均年口粮不低于 600 斤,生活补助标准达 432 元。五保户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好的保障。

社会福利事业的另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兴办福利企业,安置残疾人就业。1990 年底,市民政局有 4 家直属的社会福利企业,共有职工 106 人,其中残疾人 51 人,占 48%,远远不能满足残疾人的就业和自立自强的需要。近几年,福安市及各乡镇办的社会福利企业发展较快,至 1996 年,全市共有福利企业 21 家,职工 285 人,其中残疾就业人员 119 人。福安市的福利企业主要从事电机、农械、石板材、副食品加工、木制工艺品、茶叶、打火机、服装等产品的生产经营,1996 年实现产值 3880 万元,利润达 243 万元,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但仍然有部分福利企业的生产经营相当困难。

四、救灾与贫困救济

(一) 灾害与救灾 福安市历来自然灾害频繁。主要自然灾害有台风、暴雨、洪涝、干旱、冰雹和霜雪冻害等,其中尤以台风、暴雨洪涝灾害为甚。据不完全统计,1950 年~1990 年,福安共发放救灾款 928.88 万元,棉被 590 床,衣服 7251 件,棉花 10.3 吨以及化肥等其他救灾物资。仅 1990 年,全市就发生风、洪、雹、火等灾害 8 起,民政部门共拨出救灾款 83.50 万元。1993 年~1997 年,福安市连续 5 年遭受台风、洪涝、干旱、冰雹等自然灾害的袭击,损失惨重。尤其是 1996 年,继春夏期间严重的旱情后,七八月又连续遭受第 7、8 号强台风和海潮的袭击,全市受灾户达 53,613 户、

251,258人,其中特重灾民23,715户、106,716人,因灾死亡5人;房屋倒塌496座1357户,半倒和部分倒塌3652座3958户;粮食作物受灾39万亩,其中成灾27万亩,绝收4.28万亩。因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3.29亿元。灾害发生后,政府组织群众抗灾救灾,共安排到位救灾救济资金612.59万元,其中用于解决灾民口粮110.31万元,灾民紧急转移安置15万元,治病25万元,购买衣服53.6万元,住房修复补助337万元,五保户救济58万元,敬老院救济13.68万元。为受灾群众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确保了灾区的稳定。

(二) 扶贫工作 1980年4月,福安县即成立了扶贫领导小组,开始规划扶贫工作。同年在湾坞、下白石、穆阳、社口、溪尾、松罗6个公社进行试点,以后范围逐渐扩大。1980年~1985年,全县累计扶贫6957户,其中脱贫1681户,生活好转的有3954户。

1986年,福安县被国务院定为国家重点扶持的老区贫困县后,县政府加强了对扶贫工作的领导和指导。县、乡两级共抽调干部1030人下乡扶贫,县直机关单位与72个贫困自然村建立了扶贫工作联系点。在政策方面,县政府对列为贫困乡或民族乡的上白石、潭头、城阳、穆云、松罗、坂中、范坑、康厝等乡免征产品税和增值税3年,免征所得税5年。针对农村贫困户大多缺乏文化知识和生产技术的实际,县、乡政府为贫困村举办了农技、果树、水产养殖、畜牧、医疗、机电、缝纫等培训班,使贫困户3458人次接受了培训。

福安县的扶贫形式以直接扶持到户为主,因地制宜扶持贫困户发展生产。如1987年,县民政局派人常住湾坞乡半岭村扶贫点,帮助100多户贫困户生产香菇10万筒,创收约10万元。此外,县、乡政府还将部分扶贫款用于创办潭头乡蜜饯厂、松罗乡食用菌厂等经济实体,支持贫困乡村农业产业化发展。1988年,全县22个乡镇的“双扶”厂场实现产值235万元,利润25.8万元。

1986年~1990年,全县累计脱贫43,265户,扣除灾年返贫户,净脱贫率达94.41%。

从1994年起,福安市开始实施“造福工程”。即对“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地理条件恶劣,生产、生活无出路的贫困村实行异地搬迁。这是福安市扶贫攻坚和争创小康村活动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此,福安市党委和政府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掌握了全市需搬迁2392户、1.15万人的基本数据,从而制定了《福安市“造福工程”七年规划》和年度搬迁计划,并设立了福安市“造福工程”领导小组,协调政府各业务部门配合搞好移民的搬迁和安置。在政策方面,市政府制定了“免缴税费”等十条优惠政策,按人均100元~200元的标准给予配套补助;各乡镇、开发区也按每人100元的标准给予搬迁点(村)配套建设水、电、路等基础设施。

1994年~1995年,全市“造福工程”搬迁建房总共投入资金达905万元。其中省、地、市财政及部门配套144.2万元,乡镇配套30.1万元,港澳捐助48万元。贫困搬迁户从市政府制定的优惠政策中可减轻负担261万元。两年来,全市共有18个乡镇、开发区组织实施了“造福工程”,共搬迁单座楼(厝)、特困自然村134个;搬迁居民864户、4146人;新建房屋801幢,4225间,建房面积达6.25万平方米,人均15.08平方米。搬迁居民在主村、大村、集镇或公路沿边等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的地方建立起新的家园。1996年,福安市加快了“造福工程”的实施步伐,当年全市共搬迁了73个行政村中的100个自然村,居民717户、3788人。其中41个是畚族自然村,占年搬迁村的40%;搬迁畚族居民317户、1544人,分别占年搬迁量的44.21%和40.76%。

经过多年的努力,至1996年底,福安市人均纯收入800元以下的贫困人口降至2.467万人,占总人口的4.3%。贫困面已明显减小。

五、农村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福安市是福建省 14 个农村保险工作重点县(市)之一。本着“政府引导和农民自愿相结合”的方针,福安市有关部门动员农民积极参加保险,提高自救和自我保障能力。1996 年,市政府拨出专款 10.4 万元,为 1979 年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 72 名农村退伍战士投保,对荣立三等功的 16 名战士每人投保 3000 元,其余战士每人投保 1000 元,这项举措受到退伍军人的欢迎。阳上村为村里 13 名复退军人投保,以发挥退伍军人在家乡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中的作用。计划生育养老保险这一险种投保人数最多,其中穆云畲族乡的 102 名独生子女全部参加了投保;其他二胎户的投保也很踊跃。甘棠镇全体民办教师都参加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1996 年,全市农村共收取保费 303.36 万元,投保农民达 36,800 人,连续四年居宁德地区第一。总体而言,目前在退伍军人、义务兵、个体工商户、乡村医生、乡镇企业职工等农村群体中,保险工作比较好展开;穆阳、溪柄、甘棠等经济条件较好的乡镇投保人数也较多。而一般农户投保人数较少,广大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险意识还比较薄弱。

1997 年 8 月 1 日,福安市开始实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该制度以人均月收入 110 元以下的居民为保障线补助对象。1997 年第一批保障线对象有 114 户 201 人(月收入合计 11,725 元),各级财政每月应补助 10,386 元,由市级财政和街道财政按 8:2 负担。建立和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是建立健全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五节 社会治安

从 1985 年开始,福安市发生的刑事案件数量呈现逐渐增加之

势。1985年~1990年,平均每年立案500起至600起,1991年~1995年每年达到1000起左右。犯罪类型也有所变化,其中盗窃、抢劫、诈骗等侵财犯罪所占比重加大,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的流氓团伙、地方恶霸、商霸逐渐增多,青少年犯罪率有所上升,已日益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1990年8月初,福安市设立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其前身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指挥部),由38个单位派员组成,下设办公室,以加强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领导工作。此外还加强了社会治安的调查研究,仅1994年就先后组织三次专题调研,通过对治安特点、发展态势的研究,制定了综合治理工作规划,使宏观决策与集中解决治安问题相结合。在经费方面,1991年~1994年,市财政共拨出经费42.28万元,各乡镇(街道、开发区)仅用于农村治安整治的经费达13万多元。1995年,市政府还专门设立了“见义勇为人身保险”。从1991年~1997年,通过“严打”和围歼“车匪路霸”等专项斗争,尤其是1994年下半年以来的农村治安集中整治和1996年的严打斗争,打击了一大批刑事犯罪分子,重点治理了一部分治安不好的乡村,使社会治安形势有所好转。

通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福安市的群防群治网络已初具规模。1997年,全市共有治安联防队25支140人;470个村(居)委会都有了治保、调解组织。群众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积极性很高,1996年,群众检举揭发犯罪线索达276条,从中破获刑事案件69起,抓获违法犯罪分子86人,群众直接扭送违法犯罪分子11人。

1996年,福安市共破获刑事案件604起,其中重特大案件367起,抓获各类犯罪分子1153名,摧毁犯罪团伙81个372人;缴获被盗、抢、诈等赃款赃物价值120万余元。1996年11月,开通了“110自动报警服务台”。一年来,巡警接警1054次,出警987次,查获刑事案件30起,查处治安案件81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205名,调解纠纷238起,纠正交通违章290起,为民办好事218

件。通过狠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从严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维护了社会稳定,增强了群众的安全感。

第六节 环境保护

一、生态环境

(一) 自然环境的基本特征 福安境内多山,山地丘陵约占全市总面积的 80.9%。西部和北部为低山、中山区,山地坡度 30 度~45 度,地表较破碎崎岖,地势起伏大,峰峦耸立。区内河流密布,河流的落差大,流水的下切、侵蚀作用强烈。东部为低山、山间盆谷区,低山约占区域面积的三分之二,区内地势起伏较大,平均海拔 500 多米。中南部为交溪中下游平原、丘陵区,区内地貌由平原、高丘、低丘组合而成,低丘一般较零乱破碎。福安的自然环境既为农、林、牧、渔的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同时其地势地貌特征也决定了若乱垦滥伐极易引起水土流失。

福安各族居民历史上即有营造“风水”林和防护林的习惯,境内西北部、北部和东部也有丰富的森林资源。这些“风水”林、防护林和森林对保护环境生态,调节小气候,客观上起到了积极作用。民国以后,森林资源消耗严重,特别是 1958 年滥伐林木用于“大炼钢铁”,使得县内亚热带常绿林木遭到极大破坏,所存无几。1962 年后,实行封山育林,山林得以恢复。1990 年,全市有林地面积 179.6 万亩,森林覆盖率 48.3%。1996 年,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67.2%。

福安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降雨量多(年均降水量为 1350 毫米~2050 毫米),降雨日集中,暴雨频繁。受气候、地形、地理位置影响,台风、暴雨洪涝、干旱等灾害频繁,危害严重,属灾害易发地区。

(二) 水土流失状况 受自然环境和人为活动的影响,福安历史上水土流失较为严重。1949年,水土流失面积约占全县土地面积的六分之一。50年代“大炼钢铁”,大量采伐林木为燃料,再度造成大面积水土流失。据1984年的调查统计,全县水土流失面积达270,395亩,占陆地总面积的10.42%。水土流失不仅直接造成土层浅薄,土壤有机质减少,肥力下降,而且还容易造成泥沙淤积,使灌溉渠道受损、河床淤积,给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带来不便。

福安的水土流失区主要分布在红壤区,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80.60%。水土流失类型以面蚀为主,面蚀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90.8%。从总体上看,陡坡水土流失所占的比例最大,缓坡其次,平缓坡较少。造成水土流失的因素既有自然的,也有人为的:自然因素是福安的降雨量多,且降雨日集中,暴雨频繁;人为因素是人类活动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乱砍滥伐造成森林面积减少,水源涵养能力下降,加大了洪水灾害的破坏力。

二、水环境质量

福安市水资源丰富,主要水系为交溪。其多年平均流量为148立方米/秒,枯季最小流量为10.4立方米/秒。1997年11月,交溪水系12个断面监测的结果显示:水质良好的占25%;清洁的占58.3%;轻污染的占16.7%。饮用水源水质14项指标达标率为99.8%,水质基本良好。

工业废水是交溪主要的水污染源。1996年,全市工业废水排放量为652万吨,其中符合标准的排放量为313万吨,工业废水的排放达标率为48%。在1996年进行的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中,交溪的6个监测断面,百塔、洪口、富春溪、赛岐、铁湖、龟湖以及秦溪断面的监测数据显示:交溪由于径流量大,规划区流域工业污染源较少,所以水质良好,各项指标达到地面水Ⅰ类或Ⅱ类标准;龟湖因位于旧城内,接纳了大量的工业、生活废水,水质恶化,

高锰酸盐指数严重超标;秦溪上游水质良好,可作为饮用水源,但下游因接纳了工业生活废水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污染,而且由于秦溪周边农地施肥后,部分肥料随地下水渗入河中,造成氨气和高锰酸盐指数较高。福安农药厂是交溪的主要污染源,附近水域受到一定程度的污染,但由于交溪的径流量大,自净能力强,所以交溪铁湖以下断面水质仍较好。赛岐轮渡码头断面水质相对较差,是由于接纳了赛岐、罗江的工业、生活废水和码头作业造成的污染。

三、工业“三废”污染与治理

(一)“三废”污染状况 随着工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福安市早年在资源开发和工业布局上的缺陷开始逐渐暴露出来,又由于缺乏相应的治理措施,因此每年都有大量未经处理的工业、生活废水流入交溪。70年代兴办的合成氨厂、化工厂、造纸厂、铁厂、电镀厂等都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加之近二十年来乡镇工业的不断发展,每年“三废”的排放量成倍增加。环境污染已成为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1. 工业废水污染。70年代以来,企业的工业废水多直接排入河中。1986年,全县排放废水总量185.34万吨,其中工业废水69.07万吨,经过处理的只有6.34万吨,而经过处理达标的只有0.54万吨,达标率只有0.78%。此后每年废水排放量成倍增加。1990年,全市废水排放总量增加到443.47万吨,其中汇总企业废水排放200.25万吨,企业废水处理率为17.05%;符合排放标准的废水量为23.51万吨,达标率仅11.74%。全市万元产值工业废水排放量达62.52吨。

2. 工业废气污染。70年代以来,随着一些建材化工类工业企业的投产,其排放的废气亦造成大气污染。1986年,全市废气排放总量16,000.62万标立方米,1987年即增加到31,131.99万标

立方米。随着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其能耗多以燃煤为主,废气污染也日趋严重。1990年,全市仅乡镇企业废气排放量就达425.84万标立方米,废气中含二氧化硫、氧化物、烟尘、工业粉尘、一氧化碳等。乡镇企业万元产值废气排放量为3.23万标立方米,是国有企业的两倍。

3. 工业废渣污染。工业废渣又称工业固体废弃物。福安的工业废渣主要有尾矿、炉渣、粉煤灰、冶炼废渣等。1987年,全县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为2.46万吨,而1990年即增加到6.19万吨,3年就增加了1.52倍。历年工业固体废弃物堆存量已达27万吨。

(二)“三废”的治理 根据国务院关于“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的通知,自1984年起,福安县开始对全县范围内工业“三废”污染物超标排放的企事业单位征收超标排污费,以促进企事业单位定期治理“三废”。1984年~1990年,全市共征收排污费46.54万元,作为治理污染源资金。90年代以后,福安市加大了环保工作的力度,1995年~1996年,全市累计征收排污费147万元,投入污染防治资金155万元。“三废”治理率明显提高。

1. 废水治理。为控制水源污染和进行废水治理,福安县(市)调整了工业布局。1987年,县政府规划出新工业区,将铸造、电镀等污染性工业集中于该区域,并由有关部门给予贷款配套治理污染。当年对分散生产的13家小型电镀厂进行了关、停、并、转,较好地控制了电镀业的废水污染问题。一批企业也采取了治理废水污染的措施,如福安钼矿投资25万元建造了一条尾矿坝用于过滤废水,截存尾矿;811化工厂使用活性炭处理工业废水中的苯,减少工业废水中的有害物质;海军4807工厂投资60万元建立油水分离站,解决油水入海污染问题;福安农药厂投资26万元,进行废水中和处理和废气三级吸收处理;溪柄糖厂投资2.5万元建造两个氧化塘,对生产酒精所排放的废水进行曝晒处理。1996年取缔

了年产 5000 吨以下的造纸厂两家,封存造纸车间两个,蒸球两个;关闭电镀厂 1 家;关闭了 3 家位于穆阳水厂上游 1000 米内的石板材厂。1996 年底,福安市的废水治理率达 48.3%,比 1990 年提高了 36 个百分点。

2. 废气治理。废气治理主要通过企业技术改造、装配废气处理设备控制污染源。1984 年,福安钼矿安装空气压缩机进行尘灰处理;1986 年对地区水泥厂立窑、磨房车间进行除尘治理;1987 年~1990 年,城区的县罐头厂、福安茶厂、地区医院、福安酒厂先后完成了水膜除尘处理,烟尘排放均达到林格曼浓度 0~1 度的国家烟尘排放标准。地区水泥厂和福安农药厂通过技改,安装粉尘回收装置,两个厂实现综合利用利润 2.14 万元,取得经济与环境双重效益。1996 年,全市实施废气治理项目 5 个,增加废气处理能力 4300 万标立方米。1996 年底,福安市废气除尘率已达 80%,废气治理率达 90%。

3. 废渣治理。对废渣的治理主要采取垃圾焚烧、卫生填埋和简易填埋等方式。1996 年,市政府对近几年发展迅速、污染严重的石板材加工业进行了集中治理,整顿了城阳乡的 94 家石板材厂和穆阳地区的 38 家石板材厂,要求各乡镇必须成立专业清渣队和明确堆渣场地。到 1996 年底,福安市固体废物治理率达 53%。

近年来,福安市的环保规划和环境保护宣传工作逐渐加强。通过每年的全市环保工作会议及对各级领导干部和管理人员的培训、考试,以及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逐步提高并形成了全市干部群众的环境保护自觉意识。特别是市长环保目标责任制的实施,大大加强了环保工作的开展。目前,在全市范围内已经实施了水、气、声、渣及放射性污染物排放申报登记制度,为实现环境保护的制度化打下了基础。

第七节 居民收入与生活水平

一、居民收入

(一) 职工收入水平及构成 1975 年, 福安县全民所有制单位共有职工 13, 737 人, 工资总额 817.07 万元, 人均 594.80 元/年; 集体所有制单位有职工 9533 人, 工资总额为 351.10 万元, 人均 368.30 元/年。改革开放后, 经济发展使职工收入出现持续、快速增长。1996 年, 全市国有单位职工人均工资 4950.79 元/年, 是 1975 年的 8.32 倍; 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人均工资 3355.58 元/年, 是 1975 年的 9.11 倍。伴随职工工资的增长, 职工的收入构成也发生了变化。

职工收入的增长, 在构成上表现为标准工资的提高以及奖金和津贴的增加。特别是在 80 年代, 奖金和津贴的增加幅度较大。改革开放后, 计时工资在工资构成中的比重不断下降, 而计件工资和奖金的比重大为提高。以国有单位为例, 1984 年计时工资占 62%, 计件工资、奖金和各种津贴分别占 3%、10.73%、20.67%。至 1996 年, 单纯的计时工资形式已不存在, 改为计时和计件相结合的标准工资, 计件为衡量标准, 在工资构成中占 65.95%, 奖金和津贴分别占 6.55% 和 26.16%。各种津贴在工资总额中所占比重十年来基本维持在 20% 左右。

职工的收入水平有较大差异, 主要表现在:

1. 所有制差异。表 5-1 显示, 各个时期国有单位职工的平均工资均高于城镇集体单位职工, 除个别年份外, 也高于个体、私营、股份合作制及外商投资等“其它所有制”单位职工。而“其它所有制”单位职工的工资又高于集体单位, 1993 年甚至还超过了国有单位。集体单位职工的工资水平最低。

表 5-1 不同所有制单位职工工资 单位:元/人

年 份 所 有 制 形 式	1975 年	1984 年	1991 年	1993 年	1996 年
全民所有制	594.79	893.96	2111.08	2888.28	4950.79
集体所有制	368.30	725.59	1470.06	2143.39	3355.58
其它经济类型				3019.19	3734.51

资料来源:福安市统计局。

2. 隶属关系差异。表 5-2 显示:在国有单位中,1991 年以前,福安的中央属单位人均工资高于省属单位,省属单位高于地属单位,地属单位高于县及县以下单位,基本上呈逐级递减的趋势。90 年代以后,县及县以下属单位职工工资增长速度较快,1996 年,县及县以下属单位的职工工资比 1975 年增长了 7.5 倍,高于省属单位增长 6.5 倍、地属单位增长 7.1 倍的速度。1993 年以后,县及县以下属单位职工工资已超过地属单位职工,居中央和省属单位职工工资水平之后。

表 5-2 福安市不同隶属关系职工工资 单位:元/人

年 份 指 标	1975 年	1984 年	1991 年	1993 年	1996 年
中央		997.92	2597.14	3798.21	6214
省属	741.28	976.41	2426.18	3648.89	5582
地属	566.13	954.24	2292.95	2439.53	4607
县及县以下属	573.05	838.30	1984.95	2870.96	4857

资料来源:福安市统计局。

3. 企业、事业和机关差异。表 5-3 显示:90 年代以后,职工

人均工资以事业单位为最高、机关次之、企业为最低。事业单位的工资优势比较明显。而企业职工工资的稳定性相对较差,要直接受到企业经济效益和市场状况的影响。

表 5-3 福安市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工资 单位:元/人

年 指 标	1991 年	1993 年	1996 年
企业	2073.34	2626.12	4270
事业	2176.86	3409.20	5990
机关	2155.42	3024.34	5445

资料来源:福安市统计局。

(二)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及构成 1975 年,福安县农民人均收入 46 元。1983 年,在全县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收入迅速增长,1984 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到 313 元。此后,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向多种经营的转化以及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1996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2231.72 元,是 1975 年的 48.5 倍。

从收入来源看,集体经济时期福安农民几乎没有家庭经营收入。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家庭重新成为农村社会的最基本生产单位,家庭经营收入所占的比重迅速上升。到 1984 年,农民的家庭经营收入已占其总收入的 92.06%。进入 90 年代以后,随着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以及多种经营方式的推行,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占其全年总收入比重有所下降,1993 年为 84.41%,1996 年降为 78.28%。而且在农民的家庭经营收入中,农业收入所占的比重则一直在下降,已从 1984 年的 57.20% 降至 1996 年的 47.22%。从收入类别看,农民收入主要为生产性收入,非生产性收入比重较小。1984 年,农民的非生产性收入仅占其总收入的

6.9%, 1991 为 7.5%, 1996 年上升至 9.0%。

福安市农民收入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地理区位和自然资源占明显优势的乡镇收入水平较高。由于市内多山地丘陵,交通状况对农民收入起着关键性的影响。交通便利地区的农民收入水平较高,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民收入水平较低。据 1990 年~1996 年乡镇统计资料分析,全市以穆阳镇、赛岐开发区、甘棠镇、赛岐镇、社口镇的农民收入水平最高;其次为潭头镇、湾坞乡、溪潭镇、坂中乡、溪柄镇、上白石镇、城阳乡、下白石镇、溪尾镇、松罗乡、穆云乡;范坑乡、晓阳镇、康厝乡农民的收入水平最低。1996 年,穆阳镇农民人均纯收入 2605 元,比康厝乡农民人均收入高 1005 元。

(三) 城乡比较 福安市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比较显著。1991 年,全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730.20 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 1351.32 元,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仅为城镇居民的 54.04%;到 1996 年,福安市农村人口平均收入为 2231.73 元,城镇人口平均收入为 3691.44 元,农村人口的平均纯收入为城镇人口的 60.46%,城乡收入的差距比 1991 年有所减小。这主要是由于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的人数不断增加以及乡镇企业的发展给农村人口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尽管如此,城乡人口的收入差距依然很大,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与生活条件还有较大差别。

二、居民消费

(一) 消费水平 人民公社时期,福安县人均每年的生活消费支出不足 100 元。改革开放后,居民收入持续快速增加,商品消费总量和人均消费水平都随之增长。1984 年,全县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品支出为 249.59 元,1991 年即增长至 678.34 元,1996 年已达 1549.63 元,是 1984 年的 6.21 倍。

(二) 消费结构 居民消费依据其用途可分为消费品消费及

生产资料消费。农村居民的生产活动以家庭为基本单位,每年都要根据生产需要购置农具、化肥、农药、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城镇居民的生产活动主要依赖于企事业单位而不是家庭,因此居民消费中的生产资料消费主要集中在农村。1996年,在全市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中,生产资料消费占 17.87%,消费品消费占 82.13%。

表 5-4 显示,福安市城乡居民的食品消费在社会消费品结构中所占比重最大,其次为衣着、日用品和文娱用品。

表 5-4 社会消费品构成 单位: %

类 年 份	合 计	食 品	衣 着	日 用 品	文化娱 乐用品	书报 杂志	医疗 用品	燃料 及其它
1984	100	52.78	24.00	13.58	1.59	0.55	4.13	3.37
1991	100	44.16	22.00	17.00	3.00	1.11	8.42	4.31
1992	100	42.32	25.00	15.69	2.81	1.00	8.67	4.51
1994	100	61.54	15.38	5.16	5.86	0.14	0.88	11.04
1995	100	61.13	10.61	3.69	5.76	0.11	1.29	17.41
1996	100	63.51	11.84	5.37	6.53	0.12	1.52	11.11

表中 1984、1991、1992 年为全县人口社会消费品构成统计,1994、1995、1996 年为城镇居民社会消费品构成统计。资料来源:福安市统计局。

(三) 城乡差别 根据福安市城乡调查资料:1991 年,福安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 466.30 元,仅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水平(1209.8 元)的 38.54%;到 1996 年,福安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 1549.04 元,相当于城镇居民的 46.97%。表明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城乡差距已有所缩小。但目前城乡居民在收入、消费上的差距仍然很大。1996 年,福安农村百人拥有电视机 17 台(其中 5 台为彩色电视机)、电冰箱 2 台、洗衣衣 12 台,而城镇居民

百人拥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分别为 32 台(其中 18 台为彩电)、8 台、27 台。生活质量上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三、居民储蓄

1950 年~1978 年,福安城乡居民的储蓄虽然是在波动中缓慢增长,但居民储蓄总量很小,农村居民储蓄更是微乎其微。改革开放后,居民储蓄的增长速度加快,1978 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 478 万元(表 5-5),到 1996 年已增长到 68,018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了 141.3 倍。其中,90 年代后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长尤为迅速:1991 年,农村居民人均储蓄存款 4.40 元,1992 年为 7.23 元,1993 年达到 28.02 元,1996 年已增加到 103.95 元,是 1991 年的 23.63 倍;城镇居民人均存款则从 1991 年的 39.84 元,增长到 1996 年的 622.56 元,是 1991 年的 15.63 倍。

表 5-5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单位:万元

年 份	1978 年	1980 年	1985 年	1990 年	1995 年	1996 年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478	626	2750	8473	47,580	68,018
以 1978 年为 100%	100	131	575	1773	9954	14,230

资料来源:福安市统计局。

从总体上看,进入 90 年代以后,农村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城镇居民。尽管如此,农村居民的人均储蓄存款仍然大大低于城镇居民,1996 年仅为城镇居民人均存款额的 16.70%,城乡差距依然十分显著。

典 型 篇

第一章 坂中畬族乡调查

第一节 概 况

一、人口与政区

坂中畬族乡位于福安市区的西北部,地处长溪中游的富春溪畔。东与韩阳镇、城阳乡毗边,西与穆云畬族乡交界,南与溪潭乡、康厝畬族乡相邻,北与社口镇接壤。1984年9月,经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坂中畬族乡。乡政府驻地设于坂中村,现辖19个行政村,3个街道居委会,150个村民小组,89个自然村。1996年,全乡共有5077户、20,677人,其中畬族1956户、7977人,分别占全乡总数的38.53%和38.58%。畬族人口遍布全乡的每一个行政村,其中畬族人口占60%以上的行政村有仙岩、大林、和安、后门坪、井口、林岭、日宅、彭家洋等8个,占全乡行政村总数的42.11%;畬族自然村59个,占全乡自然村总数的66.29%。坂中是全国畬族人口比例最高、聚居最集中的乡镇。

二、自然资源和物产

全乡总面积67.7平方公里,南北相距21公里,东西相距5公里。地形为“二分平原八分山,一条大溪贯北南”。南北除了富春溪沿岸是小平原外,大都是群山起伏,重峦叠嶂。坂中畬族乡地处

亚热带,全年气候温暖宜人。最高气温 38℃,最低气温 4℃,年平均气温 20℃~22℃,无霜期 280 天~300 天,年平均降雨量 1600 毫米~1850 毫米,适宜多种农作物的生长。其中,河谷平原地带适宜“麦—稻—稻”三熟生产,山区适宜“麦—稻”两熟生产,也适宜于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1996 年,全乡土地面积 106,245 亩,其中丘陵山地 61,324 亩,占 57.72%,耕地面积 14,487.5 亩。在耕地面积中,水田 11,845 亩,旱地 2642.5 亩,分别占耕地面积的 81.76%和 18.24%。粮食作物以水稻和番薯为主,经济作物以茶叶、茉莉花、甘蔗、香茅草、橄榄为主。林业以松、杉为主,全乡有林地 55,295 亩,林木总蓄积量 64,015 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 63.5%。此外,全乡的水能资源也十分丰富,交溪水系在福安市境内流域面积为 1658 平方公里,其中坂中畲族乡占 33 平方公里,水能蕴藏总量达 8000 千瓦。

三、风景名胜

坂中畲族乡环境秀美,风景名胜颇多。“韩阳十景”中的“仙岫晴云”,即在仙岩畲族村地界;江家渡文笔峰上建于明崇祯二年(1629)的凌霄塔,又名风沙塔,与韩阳镇天马山塔隔岸相望,雄伟壮观;富春溪畔长 1000 米、宽 150 米的坂中森林公园,树木葱茏,野趣盎然;坑下崇福寺幽清的环境,秀丽的景致,使人流连忘返;松潭村的福庆阁、汤洋村的福禄庵、南岸村的西兴庵、亭兜村的华岩寺、江家渡村的红石碑等均独具奇风异彩;松潭村桃花岛的水色山光,是引人入胜的游览胜地;大林村畲族钟氏祠堂供奉有雕龙刻凤、形态各异的历代祖先神牌,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第二节 乡村经济

一、经济结构

坂中乡曾是全市、全地区乃至全省有名的贫困乡。1979 年以前,受当时全国农村经济政策的影响,种植业结构单一,副业、手工业发展受到抑制。1982 年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变化。进入 90 年代后,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带动全乡的经济结构出现了较大的调整。坂中乡地处福安市区西北部,受市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现在已经成为福安市三个畚族乡中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最高的乡,工业产值已远远超过农业,全乡已初步呈现出农村城镇化、农业郊区化的雏形。

(一)种植业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坂中畚族乡的粮食种植面积在经过 80 年代的下降之后,90 年代又开始回升(表 1-1)。1996 年,全乡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比 1975 年增加了 4026 亩,增幅为 14.07%,这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和提高了粮食作物的复种指数所致。随着农业技术的推广及农民技术水平的提高,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也稳步增长,1996 年,全乡尽管遭受了台风、洪涝等严重自然灾害,粮食产量有所下降,但是粮食的平均亩产仍然比 1975 年提高了 32.75%,总产则是 1975 年的 1.5 倍。与粮食种植业相比,茶叶、水果和蔬菜等主要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的增长幅度更大。1996 年,茶叶的种植面积比 1975 年增加了 90.66%,产量提高了 7.2 倍;水果种植面积比 1975 年增加了 5 倍,产量提高了 13.1 倍;蔬菜种植面积比 1975 年增加了 15 倍,总产达 12,518 吨。

表 1-1 坂中畲族乡种植业结构 单位:亩、吨、公斤

项 年 份	粮食作物			茶叶		水果		蔬菜	
	面积	总产	亩产	面积	总产	面积	总产	面积	总产
1975	28,604	5962	208.44	4027	36.6	537	52.85	946	
1984	23,217	6644	286.18	5011	55.1	1083	148.55	1682	
1991	25,479	7870	308.89	6196	124	2742	402	6852	4868
1992	31,310	8897	284.16	6851	220	2943	578	7500	5065
1993	31,300	8590	274.44	7653	284	3206	708	8800	7490
1996	32,630	9029	276.71	7678	300	3235	746	15,150	12,518

资料来源:福安市统计局。

(二) 农业经济结构 1996 年, 全乡农业总产值 6354 万元。其中种植业产值 3600 万元, 占农业总产值的 56.66%; 林业产值 763 万元, 占农业总产值的 12.01%; 畜牧业产值 1132 万元, 占农业总产值的 17.82%; 渔业产值 103 万元, 占农业总产值的 1.62%; 其它农业产值 756 万元, 占农业总产值的 11.89%。从林业、畜牧业和蔬菜种植业的发展情况看, 山地农业和城郊型农业的特征比较明显。

(三) 非农产业 1996 年, 全乡非农产业产值达 38,280 万元, 是农业产值的 6 倍。其中工业产值 35,291 万元, 占非农产业总产值的 92.19%。主要是福安市的工业区设在坂中乡所致。在全乡的工业总产值中, 乡办工业总产值 17,580 万元, 占 49.81%, 村办工业产值 981 万元, 占 2.78%, 村以下办工业产值 16,730 万元, 占 47.41%。此外, 全乡 1996 年批发零售贸易业和餐饮业产值为 2002 万元, 运输业产值 797 万元, 建筑业产值 190 万元, 分别占非农产业总产值的 5.23%、2.08% 和 0.50%。

(四) 农村产业结构 1996 年, 坂中畲族乡农村社会总产值

为 4.46 亿元。其中第一产业产值 6354 万元,占 14.24%;第二产业产值 35,482 万元,占 79.49%;第三产业产值 2799 万元,占 6.27%。目前,坂中畚族乡确定了“科技兴乡”、“工业富乡”的发展战略:第一产业走城郊型农业的发展模式,朝“种、养、加、产、供、销”一条龙服务的农业产业化方向迈进,并且确立了以粮食为主体,蔬菜为支柱,茶、果、蔗、竹、花并进的多元化生产布局,开辟形成橄榄、绿竹、蔬菜、茶叶、林业、食用菌六大生产加工基地,通过加强农业科技的普及推广,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第二产业以“闽东电机电器工业区”和“民族经济开发区”为龙头,形成以电机电器、建筑建材、彩印装璜、食品加工、铸造、电力、制茶等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第三产业侧重发展服务业、商业及餐饮业。1996 年,全乡共有商业网点 403 家,由于坂中工业区正处在发展阶段,第三产业的发展潜力很大。

二、农业生产技术

(一) 生产工具 1949 年以前,坂中农村的主要生产工具有犁、耙、锄头、木锄、山锄、田锄、牛粪耙、齿耙、砍刀、刈刀、镰刀等十多种,还有粮食加工、收谷、晒谷等用具。50 年代以后,先后推广了人力车、独轮车、步犁、水稻插秧机、中耕机、打谷机、脱粒机等新式农具。随着包产到户的实施,很多当年推广的新式农具已经被淘汰,而大多数传统农具和与家庭经营相适宜的农业机械则被保留下来。

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喷雾器、农用水泵、脱谷机、农产品加工机械等的广泛使用。80 年代以来,耕作机具中的小型轻便的东风—12 型手扶拖拉机受到普遍欢迎,与之相配套的机具有南方水田系列犁、系列耙、IG—100、IG—150 型旋耕机等。在植保机具中,手摇喷雾器仍然是农村使用的主要机具,1979 年引进的东方红弥雾喷粉机,配备 1 马力汽油机,背负式单人操作,使用

方便,也比较受农民的青睐。水稻收割则仍以传统的平口镰刀为主。脱粒机具中,山区较多地使用人力打谷机,也有使用传统打谷梯或谷桶的,河谷平原则普遍使用动力脱粒机。粮食加工已基本实现了机械化。90年代以后,坂中畲族乡的电气化事业发展很快,1996年,全乡农村用电量达950万千瓦时,是1990年的18.16倍,其中农业用电量为245万千瓦时。

坂中的畲族人口大多分布在边远山区或高丘陵地区。1949年以前,由于经济落后,畲族居民连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农具都无力购买,生产工具严重缺乏,作为畜力的耕牛在畲族村更是少有。自50年代开始,人民政府除了发给畲族居民生活补助款外,还投放农业贷款和生产补助款,用以支持畲族农民购买耕牛和农具等生产资料。至60年代后期,畲族村农具短缺问题已基本解决。60年代,畲族生产队开始修筑积肥用的粪池和储粮用的仓库,以及集体牛、羊栏等,并开始购买人力打谷机等简易农业机械。70年代,畲族村出现了手扶拖拉机,逐渐推广使用喷雾器。80年代,引进了碾米机、淀粉机,小型抽水机、水泵也开始为畲族村的生产服务。90年代,随着畲乡茶叶贸易的发展,制茶机开始进入畲家。但是,由于大多数畲族村地处偏远山区,农村电气化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面临着许多困难。例如,畲族村虽然已实现了村村通电,但因架线费用高和低压送电损耗大,致使电费普遍高于全乡平均电费,畲族居民因电费太贵而不敢多用电;畲族村的土地多为梯田,机耕十分不便,有些小块水田甚至都无法使用畜耕,导致生产中的人力成本普遍高于河谷平原地区。此外,目前畲族村居民基本上都是从事小规模的家庭经营,什么都种一点儿,难以承担过高的农机和电力费用。这些状况制约着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在畲族村的进一步发展。

(二)用肥技术 1949年以前,农作物主要施用农家肥。1937年的农业调查表明,乡内使用的肥料主要有8种:菜油饼、人畜粪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千瓦,可灌溉农田 1500 亩。70 年代,电灌站的建设发展较快,其间新建的长汀电灌站装机 33 千瓦,可灌溉 1000 亩农田。1979 年以后,坂中乡开始兴建茶果喷灌工程,在主要的茶叶、茉莉花种植区安装喷灌机械,改善灌溉条件。至 1996 年底,全乡共有水轮泵站两处,电灌站 12 处,引水渠总长 8000 米,灌溉面积 5000 亩。

(四) 耕作技术 1949 年以前,富春溪沿岸平原的汉族农民基本上以“麦一稻”、“豆一稻”、“稻一菜”等耕作制度为主,山区的畲族农民大多在山垅水田种植水稻,一年一熟,水稻收割后田地蓄水浸冬,不再种植其他作物。旱地则以种番薯为主,肥力较好的旱地挖完番薯后常种冬小麦,实行旱地一年两熟;山区旱地则在番薯收后种大麦或马铃薯。50 年代后,全乡开始普遍推广双季稻种植及水稻优良品种,加之化肥、农药、良种和地膜的广泛使用,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技术的普遍推广,有效地提高了土地的使用效率和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畲、汉农民的耕作技术有了很大提高。

1. 农作物品种改良。1949 年以前,水稻品种有 34 个,其中“白米仔”种植历史长达八十余年之久,亩产通常只有 100 公斤。经过四十多年的不断改良优化,水稻的当家品种已经过多次更新。1996 年,全乡推广杂优水稻面积 14,000 亩,占水稻种植面积的 82.4%,良种覆盖率达 90% 以上。目前,坂中畲族乡种植的双季早稻品种以威化 77 早杂优为主,占双季早稻种植面积的 50% 以上;双季晚稻以汕优 63、汕优 70、特优 63 等组合为主,占双季晚稻种植面积的 90% 以上。1996 年,全乡早稻、中稻、晚稻的平均亩产分别为 381 公斤、484 公斤和 330 公斤。粮食总产则达 9029 吨,创下了历史最高水平。

坂中畲族乡的地势高度相差较大,很多自然村,特别是畲族自然村大多地处较高的山区。在这些地区种植单季稻温光有余,种两季则温光不足。为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农业产出,乡农技站经过多年的试验,开始向广大山区农民推广再生稻和早中稻种植技术。

1996年,全乡以许洋、林岭(畲村)及日宅(畲村)两个示范片为重点,种植再生稻2600亩,亩产180公斤,总产达46.8万公斤;以彭加洋(畲村)、铜岩、后门坪(畲村)、汤洋为示范片,发展早中稻4400亩,亩产达510公斤。发展再生稻、早中稻不仅省工、省肥、省种、增谷、增钱,而且还解决了部分山区的粮食不足问题,是一项有效的技术。

2. 病虫害防治。1974年,坂中乡建立病虫测报点,测报员是经乡政府推荐,由县植保站经过多次培训,能独立发布“病虫情报”和面积防治病虫害的技术指导员。在防治策略上,70年代推广用汞类农药“西力生”或“赛力散”、石灰水、多菌灵等浸稻种;用“401”大蒜素农药消毒处理薯种和薯苗,防止番薯病虫害;用砒霜拌麦种,确保全苗,增强作物抗病能力,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进入90年代,植保综合防治成为农业技术推广的重点。针对全乡主要病虫害“二病三虫”,即稻瘟病、纹枯病、螟虫、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的特点,在防治策略上,首先选用高、抗品种水稻良种,其次秧苗带药下田,普遍采用了“强氯精”浸种,基本控制了病虫害发生面积。1996年,全乡早稻防治示范面积3200亩,亩产达385公斤,比非综合防治区每亩平均增产25公斤;单季稻防治示范面积2000亩,亩产达490公斤,比非综合防治区平均每亩增产30公斤,晚稻防治示范面积3400亩,亩产332公斤,比非综合防治区平均每亩增产20公斤。三季水稻共增产20.8万公斤。植保综合防治技术的配套性较强,在畲族村推广时技术力量显得不足。因此,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对畲族村文化教育的发展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育秧技术。坂中畲族乡农技站从1992年开始推广早稻旱育秧技术。旱育秧与常规育秧相比具有明显优势:秧苗耐寒、耐旱、生长健壮、分蘖节位低、抗逆性强,遇10℃以下低温不受冻、不烂秧,能有效克服和解决早春育秧期间低温阴雨和日照不足等不良气候带来的烂秧威胁,每亩可节省杂优种0.5公斤至1公斤,同

时还省秧地、省农膜。1996年,全乡推广早稻旱育稀植栽培4000亩,平均亩产403公斤,比普通育秧平均每亩增产45公斤。育秧技术的进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坂中畲族乡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

三、畲族农户家庭经营

坂中的畲族村主要分布在较为偏僻的山区或高丘陵地带,农业耕作条件较差,要想获得同样的产出,必须比河谷平原农村付出更多的劳动投入。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广大畲族村已基本解决了粮食问题。由于环境等因素,坂中的畲族村基本没有工业,因此在解决粮食问题的基础上,增加货币收入的途径大体上只有两条:其一是开展农业多种经营;其二就是外出打工。而后者则是畲族农户家庭经营的普遍形式,即所谓“种田吃饭、打工挣钱”的家庭经营模式。

上和安村属交通条件比较好的畲族村。因为坂坪公路横穿村庄,交通比较便利,外出打工及做买卖都比较方便。该村传统副业为建筑业,多数男劳力在农闲时都外出做泥工或木工,每天能收入40元。该村还有3人长期在外做建筑工地的包工头,为该村最富裕的农户,年收入都在2万元以上,家里的耕地由妻子耕作或转包给亲友耕种。

上和安村农民雷梅玉一家7口人,夫妇两人有3个孩子并且奉养着年迈的父母。全家主要农业劳动力就是夫妇两人。儿子去浙江跟人学习做蛋糕并在浙江工作,一年回来两次;大女儿在坂中工业区的工厂做工,一个星期回家一次,也不下地劳动;还有一个女儿在读书。因需要照顾老人和读书的孩子,雷梅玉夫妇只能在家务农。1996年,雷梅玉一家收获稻谷30多担,吃饭已不成问题。其它经营收入为:卖茶叶收入900元,种菜卖菜收入1000多元,卖西瓜收入约1000元,种黄豆约收入200元。全家每年出栏

两批猪共 5 头,卖猪收入约 3000 多元。若不计儿女的打工收入,1996 年全家共收入约 8000 元。雷梅玉一家的收入和生活均属于畲族农户中的中上等水平。

大林村农民钟乃康家共 6 口人,有两个劳动力。丈夫钟乃康上半年在家种田,下半年出去打工。种田一年能收 25 担稻谷。打工主要是干泥工,一天能挣 35 元,一年下来打工收入有 3000 多元。另外夫妇两人还种一些蔬菜,一年能收入 1000 元。因为 3 个孩子均在学校读书,而且其中一个孩子因大脑患病需医治,因此家庭开销较大,生活比较困难。

幸福新村农民钟梅弟一家 4 口人,有 2 个劳动力,3 亩责任田,全部种水稻,一年能收大约 30 担稻谷。从 1994 年起,全家承包了两亩山地种植水蜜桃 100 多株,1996 年开始挂果,当年收入 1000 多元;在田边地角种植茶树,每年也能卖茶叶收入 300 元。1994 年以后,钟梅弟在冬季空闲的稻田种蔬菜,每年卖菜能收入 1000 多元,1996 年仅丝瓜一项就收入 600 多元。另外,农闲时节钟梅弟经常到福安市的建筑工地打工,一天也能挣 35 元钱,一年累计的打工收入有 3000 元左右。1996 年,全家总收入约 8000 元,在畲族农户中属中上水平。

上述农户只是我们走访的畲族农户中的一小部分。但与上述农户一样,其家庭经营表现出一些共同特征:(1) 普遍重视粮食生产,立足于自己解决吃饭问题;(2) 由于农业的收益较低,中青年劳动力普遍都外出打工,务农的多为家中的老人和需要照顾老人及孩子的中年人;(3) 比较富裕的畲族农家大体上都是有一定技术专长的外出打工者或包工头家庭,通过精耕细作发展多种经营的也能过上较好的生活,但这类农户太少。从总体上看,目前畲族农户生活水平的高低,基本上是取决于家庭成员中外出打工者的数量和技术,或者是兼顾精耕细作和外出打工的家庭。值得注意的是,有一定文化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务农,这将会制约畲族村农业产

业化的发展,使畚族村的发展陷入停滞状态。

四、乡镇企业

由于历史原因,坂中乡长期以农为本,仅有一些小规模的林、茶简单加工和建筑业。1978年,社队企业管理站成立时,只有两家社办企业,即坂中乡民族木器厂和坂中建筑公司,年产值仅几十万元。当时还没有公路,只能靠小船沿富春溪把材料运进来再把产品运出去。改革开放以后,坂中乡镇企业的发展较为迅速。1990年,全乡已有乡镇企业109家,从业人员1309人,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596万元,出口值达89万元,年创利润104万元,上缴税收62万元。但全乡的乡镇企业依然未能摆脱规模小、资金少、品种分散的局面。

1992年,坂中畚族乡抓住市委为“闽东电机电器工业区”选址的有利时机,积极参加了与其他乡镇及街道办事处的竞争,大胆划出300多亩沙质地,采取优惠政策(以每亩1.5万元的地价并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卖给企业作厂址,用乡财政投资包下区内的“三通一平”,而且企业可以享受畚族乡减免税的一切待遇)和优质服务(一条龙办公为企业承办营业执照、税务登记、土地审批等等),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引进企业49家,投资近亿元,建成了“闽东电机电器工业区”。产值上千万元的华松电泵厂、玻璃卡纸厂、金属铸造厂、闽通电机厂、康华电子仪器厂等骨干企业都是在一年内完成了从投入到正常的生产,创造了为人称道的“坂中速度”、“畚乡模式”。虽然电机电器工业区由福安市直接管辖,坂中乡不能从工业区内的企业获得利税,但是“工业区效应”带动了全乡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1993年,全乡共新办企业123家,创产值1.23亿元,比上年增长117.28%,解决了3000多名农村富余劳力的就业。

湖口村依托“工业区”，发动群众以集资入股的形式兴办了 10 多家以电机电器为龙头的企业；村民们还先后购进 48 部拖拉机，为厂家运砂石、水泥、钢筋和电机电器原材料，年创产值 400 多万元，成为畚乡的首富村。

经过 5 年的建设，坂中畚族乡先后投资上千万元将坂中街拓宽为 24 米水泥大道，并且实现了全乡行政村通路（机耕路）的目标，还扩大了自来水管网，开通了程控电话，并将松潭电站的装机容量从 500 千瓦扩大到 1700 千瓦，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投资环境。1996 年，坂中乡乡镇企业总产值达 3.68 亿元，是 1990 年的 23 倍，其中工业产值 3.35 亿元，实现出口产值 1290 万元，是 1990 年的 14.5 倍；全年实现利润 1730 万元，是 1990 年的 16.6 倍；实现税利 2926 万元，是 1990 年的 17.6 倍。

（一）所有制结构 90 年代以来，坂中电机电器工业区周边地带，富春溪沿岸村个体、联户及股份合作制等民营企业的发展十分迅速，成为坂中畚族乡经济的新增长点。1996 年，全乡民营企业达 360 家，产值达 18,636 万元，分别占全部乡镇企业的 91.6% 和 50.64%（表 1-2）。其中 1996 年新办民营企业 18 家，新增产值达 4000 万元，成为坂中乡企业发展中的产值和利税的大户。乡办企业的数量虽然不多，但企业的规模较大，市场竞争力较强，其产品可销往全国各地并远销海外，但近两年由于体制问题，上缴利税较多，企业发展的自有资金紧张，使其进一步发展受到很大的约束。相对而言，坂中的村办企业比较弱小，企业数量和产值分别只占总数的 2.04% 和 2.53%。从总体上看，民营企业是坂中乡镇企业中发展速度最快和最有活力的企业。

（二）主要行业 目前已初步形成以电机电器、茶叶和石板材加工三业并举的发展格局，体现了坂中乡镇企业的特点和优势所

表 1-2 1996 年坂中乡镇企业所有制结构

项 目 所 有 制	企业单位数 (个)	总产值 (万元)	出口产值 (万元)	年平均人数 (人)
总计	393	36,800	1290	3470
乡办	25	17,232	1060	1235
村办	8	932	230	203
联户	70	8272	—	1452
个体	290	10,364	—	580

资料来源:坂中畲族乡企业管理站。

在。1992 年以来,坂中畲族乡依托电机电器工业区,先后创办起一批电机电器配件企业。至 1996 年,全乡已有电机电器企业 40 家,实现产值达 2.6 亿元,从而使电机电器成为全乡乡镇企业的支柱产业。

茶叶生产则以坑下为中心,1996 年共有茶叶生产企业 7 家,产值达 1123 万元。目前全乡的茶叶生产已初步形成了产业化,产、供、销方面基本实现了对接,即全乡的茶叶生产以富春茶厂等七家精制厂为载体,充分发挥各村茶叶初制厂的配套作用,通过不断开拓全国市场,带动山区、半山区茶叶生产的发展。

石板材行业的发展以长汀为中心,1996 年,全乡共有石板材企业 10 家,年产值达 1540 万元。目前,该行业正在努力开拓异地直销市场,同时结合行业的污染治理,狠抓技术革新,力求在产品品种、质量及生产规模上实现突破。

(三)从业人员 坂中乡镇企业的职工以男性为主,特别是传统农业企业、建筑企业、交通运输企业以及近年发展起来的石板材

企业中,男性职工占绝大多数。但随着 90 年代电机、电器、电子、食品、工艺美术等企业的迅速兴起,吸收了大量的女性职工。1996 年,乡镇企业职工队伍中女性职工所占比例已达 34.47%。这是一个较高的比例。

表 1-3 1996 年坂中乡镇企业职工队伍文化构成

文化程度	合计	大专	中专	技工	高中	初中	初中以下
总计	3470	18	62	159	455	1922	854
乡办企业	1235	18	58	121	236	547	255
村办企业	203			7	34	93	69
联户企业	1452		4	31	68	867	482
个体企业	580				117	415	48

资料来源:坂中畚族乡企业管理站。

从文化构成来看,乡镇企业职工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占职工总数的 80%(表 1-3)。相对而言,乡办企业职工的文化程度最高,全部 18 名大专文化程度者以及绝大多数中专、技工和高中文化程度者都集中在乡办企业。技术员和工程师大多是根据生产技术的需要由外省市高薪聘请而来。乡镇企业中的畚族职工数量没有明确的统计数据,但估计要低于畚族人口占全乡总人口的比例。这主要是因乡镇企业多创办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交通比较便利的地区,而这些地区鲜有畚族村。同时,由于畚族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及文化程度普遍低于汉族人口,能够通过考试进入乡镇企业当工人的畚族居民也相对较少。虽然乡政府在建设“闽东电机电器工业区”和坂中民族开发区时要求企业应优先招收和培养畚族职工,但企业注重的是经济效益,并不太关

注职工的民族成分。因此,乡政府的有关规定在实践中很难落实。

第三节 社会与文化

一、居民生活

坂中畬族乡曾是全省有名的贫困乡。全乡几乎有一半的行政村无公路、无电灯、无广播、无电话、无校舍、无医疗站、无加工厂、无村委办公地点、无村级集体经济。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全乡人民经过艰苦创业,在短短几年时间就告别了贫穷。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013元,居全市的3个畬族乡之首。

(一)居住 80年代以前,坂中畬族村的房屋与当地汉族民居格局大致相同,为土木结构瓦房,屋顶为歇山式。房内用木板分为左、右、中三处,中间又分为前厅两个部分,前为中庭,供有祖位和神位。房屋内外大都朴实无华,极少装饰品,并注重土墙体的厚实,墙上一般不开窗或者开小窗,以便避风防盗。畬族村落聚居的特点,除了集聚型外,还有不少零星分布的散漫型住宅点,俗称“单座楼”或“几栋厝”。集聚型村落住宅位置坐向主要依照宅基地地势呈不尽相同的格局,如后门坪畬族自然村,村落建于山间洼地,村民称为“八卦地”,住宅在洼地四周沿地势而建,大门朝向不一。

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坂中畬族乡新建房屋的数量明显增多,钢筋混凝土民居开始出现,但这类结构的房屋在畬村还为数甚少。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民的收入不断提高,大多数新建民居开始采用砖瓦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不少畬家人在建房时打破了传统式的布局,厨房的灶台贴上了瓷砖,有些居民十分注意环境的美化,楼上养起了盆花。住房面积也大为增加,

1996年,全乡人均住房面积为16平方米。

为了使缺乏基本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村落居民彻底摆脱贫困,坂中畚族乡政府对一些畚、汉自然村实施了“造福工程”。乡政府无偿划出土地,进行认真的规划设计,制定优惠政策,投资解决基础设施,使不少贫困山区的农户在交通便利、自然条件好的地方建起了新房,在新的地方安家落户。

(二)衣饰 50年代中期以后,坂中畚族男女着装逐渐与当地汉族趋于一致。60年代~70年代流行中山装、军装。80年代以后,服装式样和质地渐趋多样化。邻近城关一带的居民穿着比较时髦,目前男子多穿西服、夹克衫、牛仔服等,女子多穿套裙、绒线衫。住在山村的村民穿着相对差一些,但年轻人在穿着方面也很接近城镇青年,他们在服装式样上比较讲究,对衣料的质地不甚挑剔,有些山村的女孩还特别喜爱穿高跟鞋,虽然美观,却不利于在山间行走和劳动。如今,除了个别老年畚族妇女外,畚族男女已基本上没有穿传统民族服装的了。

(三)饮食 历史上以番薯为主食。即将番薯刨制成丝做成番薯米饭。80年代以后,随着稻谷产量的提高,坂中的畚家人基本上都只吃白米饭,很少再吃番薯丝饭,偶尔食之,也只是为了换换口味而已。畚家的副食主要有芋头、芥菜、马铃薯、萝卜、白菜、鸡肉、鸭肉等,基本上是自家种植或饲养的。有的人家为了能吃到鲜鱼,还在房前屋后开辟了小型的养鱼池。坂中畚族乡的村庄一般都设有小卖店。这种小卖店除供应油、盐、酱油、味精等日常调味品外,隔几天还杀一头猪,为村里人家提供新鲜的猪肉。此外,畚家人还喜食咸鱼。

近年来,坂中畚族乡在居民饮水卫生方面加大了投入,进行安全饮用水改造。目前,居民们饮水一般以自来水为主,也有一些地处高山的畚族村靠水管引山间泉水饮用,但均已通过了市卫生防疫部门的检测,达到了饮水卫生合格标准。

(四) 家庭设施 过去,坂中农户家中设施十分简单。70年代以后,坂中的农户逐渐开始使用电风扇。80年代以后,90%以上的农户用上了鼓风机和简便式电扇,少数农户开始有了黑白电视机和录音机。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各种现代化生活用品越来越多地进入农户家中,如今,不少家庭都购买了落地扇、黑白电视机、洗衣机、录音机、罐装液化石油气灶等,富裕一些的家庭还拥有彩色电视机、VCD机等。过去用了几十年的旧式家具也逐渐被席梦思软床、组合多用柜、塑料简便衣柜、沙发等新式家具所取代。

(五) 通讯和交通 1978年,坂中成立了邮电所,居民的通讯方式主要是邮寄信件。近年来,福安市和坂中畲族乡政府加大了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迅速改变了农村的交通及通信状况。到1997年,全乡22个行政村都已架设线路,开通了程控电话,并安装电话机336部,给畲乡人民传递信息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此外,乡政府还投资安装闭路电视线路和电视差转台,使电视信号覆盖率达到了100%。

在交通运输方面,坂中乡近年来也发展很快。1982年兴建了坂中桥,大桥全长308米,高28.5米,桥面宽7米。继此之后,又先后修通了福穆、坂岭、坂井3条乡级公路,并于1997年实现了19个行政村村村通公路的目标。目前,坂中乡居民能够利用的交通工具有汽车、拖拉机、摩托车等。居民生活在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改善。

二、乡村教育

近年来,坂中畲族乡的教育事业发展较快。乡政府努力贯彻依法治教,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扫除文盲作为教育工作的重点来抓,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 小学教育 1997年,坂中畲族乡共有51所小学。其中

中心小学 1 所,完全小学 13 所,初小(包括教学点)36 所,市民族实验小学 1 所,在校学生 2667 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99.56%。1996 年,全乡小学毕业年级生有 381 人,毕业率达 100%。全乡小学教师共有 245 人,其中民办教师 47 人(1979 年以前国家承认但未转正的有 12 人,临时代课教师 35 人)。1997 年,小学专任教师任职合格率和学历合格率分别达到 100%和 96.3%。

在全乡的 51 所小学中,有 27 所是民族小学。90 年代初,畲乡少数民族学生的小学入学率仅有 70%。主要原因:一是畲族家庭负担重,孩子参加家务劳动的较多;二是居住分散,上学路途遥远;三是生活水平低,经济条件差,无力支付上学费用。近几年,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抓教育,集中精力办好完全小学,使民族小学布点合理,同时努力宣传《义务教育法》,并制定了乡规民约,对不入学的家庭予以罚款处理,对无一定知识文化的人不予以招工等等,使全乡上下形成了重教育的良好风气。乡政府在开发畲山经济、提高畲族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还对生活较困难的学生采取减免学费的资助措施,使该入学的儿童都得以入学。1997 年,畲族小学在校生 765 人,适龄儿童入学率提高到 99.4%,巩固率也达到了 99%。坂中乡的民族小学中最为突出的是位于仙岩畲族村的福安市民族实验小学。该校不但教学质量高,而且十分重视对小学复式教学的研究工作。1997 年,该校在坂中乡进行了畲族复式教学的试点工作,有 60 多位来自民族地区和老区复式教学点的教师接受了培训,对全乡 25 所复式教学点的教学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 中学教育 坂中乡的中等教育始于 1970 年。当时,福安县革委会提出“读初小不出村,读高小不出大队,读初中不出公社”的口号,坂中乡办起了一所小学戴帽初中班。1979 年,坂中正式建立初级中学。1997 年,坂中畲族乡中学共有 3 个年级,18 个班,在校学生 1001 人,其中畲族学生 302 人,占学生总数的 30%

左右。畲族学生大都被安排在两个独立的班级中学习,也有一些分插到其它班级。坂中畲族乡中学的教师整体素质较好,现有教职工 59 人,其中专任教师 46 人,行政人员 10 人,工勤人员 3 人。专任教师的任职合格率为 100%,学历合格率为 89.13%。

近年来,坂中畲族乡中学十分重视提高教师素质,为提高教学质量,制定了一系列教职工职责、规定、制度和条例,并严格按照省教委颁发的课程教学计划,开足开齐规定的各门课,排足课时,按照各科教学大纲,落实素质教育。1997 年,该校升入中专、高中、职高等各类学校的学生有 27 人,取得了较好的办学成绩。

(三) 成人教育 坂中畲族乡成人教育的重点是抓扫盲和农村实用技术培训。扫盲工作是“两基”的重点之一,为此,乡政府采取政策扶持和多种形式办学等措施,成立了 22 所农民文化学校。1996 年,全乡共扫除文盲 303 人,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 2.5%。到 1997 年,全乡已基本完成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任务,并通过了福建省有关部门的验收。在农村实用技术培训方面,乡政府通过鼓励多层次、多形式办学,进一步巩固和健全了乡、村二级成人教育网络。1996 年,参加乡、村两级成人文化技术培训班、接受实用技术培训的农民达 6000 人次,为农村奔小康培训了大批实用技术人才。

(四) 特殊教育 坂中畲族乡建立于 1997 年的特殊教育学校,是全市惟一的一所特教学校。该校现有 5 个班级,学生 48 人,主要为聋哑儿童。由于全市只有这一所特教学校,其它乡镇的家长也将自己的孩子送到这里读书。该校的老师都经过特殊教育专业培训,不但要教这些有残疾的孩子们识字、算术,还要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需付出更多的爱心和精力。目前该校面临的困难主要是办学经费不足,无力扩大招生。一个学生每年 200 元的学费和每月 100 元的伙食费,对贫困山区的农民家庭来说还是难以承担的。

(五) 办学条件 为了加快实现“两基”的步伐,坂中畲族乡政府制定了“三年改善办学条件”的计划,加大教育投入,甚至举债办学,三年来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至 1997 年,全乡中小学已无危房校舍,校园总面积(不含初小)达到 39,072 平方米(其中:中学 7887 平方米,民族实验小学 5160 平方米,中心小学 14,477 平方米,完小 11,548 平方米)。中学生人均校园面积 4.96 平方米,中心小学和完小在校生人均 13.4 平方米,民族实验小学人均 19.6 平方米。全乡中小學生人均校园面积 12.2 平方米。全乡校舍总面积(不含初小)达 14,446 平方米(其中:中学 4345 平方米,民族实验小学 1941 平方米,中心小学 2700 平方米,各完小 5460 平方米)。中学生人均校舍面积 8 平方米,民族实验小学学生人均 7.4 平方米,中心小学、各完小在校生人均 4.2 平方米。全乡中小学人均校舍面积 4.5 平方米。

在学校配套设施方面,除建立在山坡地的日宅、和安等 4 所小学无围墙、校门以外,各二类、三类中小学均有围墙、校门、厕所、课桌椅、操场、旗杆、旗台等,配套齐全。学校的运动场所:全乡共有 60 米直跑道 10 条,100 米直跑道 2 条,250 米环形跑道 1 条,篮、排球场 12 个。教学仪器:坂中中学,中心、长汀、湖口、铜岩、松潭、坑下小学按Ⅱ、Ⅲ类标准配备,其它完小也均按Ⅲ类标准配备,没有达标的仅有 2 所完小。图书:全乡小学生人均图书 11.9 册,中学生人均 10 册,中心小学和民族实验小学学生人均拥有图书 15 册。

目前,在办学条件中还存在着教师住房困难等问题。许多教师因无宿舍,只好寄宿在寺庙、祠堂,条件比较艰苦。

三、医疗卫生

(一) 卫生组织 坂中畲族乡现有乡办卫生院 1 所,职工 35 人,其中医师 16 人(仅有 2 名主治中医师),技术力量较为薄弱。全乡的村级卫生所共有 23 个,有村医 34 人。乡村的个体门诊较

多,1997年开始进行整顿,不合格的将予以取缔。宁德地区卫生学校也设在乡政府驻地。

(二)设施与经费 乡卫生院拥有一幢新建的综合门诊楼,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设有10余张病床,2间布置整洁的手术室。但目前医疗设备还很缺乏,全院仅有1台X光机和血压计、听诊器等最简单的医疗器材。卫生院的经费主要靠市财政部门拨款,每年2万元左右,1997年改为由乡财政拨款。由于资金缺乏,村级卫生所一度受到冲击,村医收入入不敷出,群众医药钱款欠多,原本甚少的资金无法周转。由于村医的报酬难以落实,他们也不安心工作,离开村卫生所到市区医院工作或改行的情况时有发生,有些村级卫生所已名存实亡。

(三)业务状况 乡卫生院为综合性卫生院,主要收治常见病。坂中畲族乡政府驻地与福安市区仅一桥之隔,有市内公共汽车相通,故重病患者多到福安市区的医院就诊。卫生院每年的门诊量约8万人次,医师大多一专多能,兼治各科疾病。计划生育结扎手术一般由市计划生育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下乡免费操作,乡卫生院只负责给育龄妇女上环和做人工流产手术。

儿童保健工作以计划免疫和体检为主。免疫工作以乡镇为单位进行。1997年,坂中畲族乡的儿童“四苗”接种率(小儿麻痹、百日咳、麻疹、卡介苗)已达到96%,大大高于全市85%的平均水平。

四、文化与宣传

(一)文化设施 坂中畲族乡共有两个文化站,即乡文化站和仙岩畲族村文化站。乡文化站创办于1973年,隶属乡政府和县(市)文化馆。1985年以前,乡文化站设在黄氏祠堂内,设有图书室、棋艺室等。图书室藏书3000余册,其中一部分由市图书馆赞助。1985年以后,黄氏祠堂被老年人活动站占用,乡政府计划盖一座至少400平方米的新文化站,内设阅览室、乒乓球室、棋艺室、

录像厅、台球厅和畬族简史陈列厅。虽然早已完成了规划图设计,市财政部门也同意拨款2万元,但到位的却只有5千元,因此新文化站至今(1997年底)都未能动工兴建,致使图书阅览等也无法对外开放。仙岩畬族村文化站建于1957年,一直是公办文化站,在福安的畬族村中很有名气,备受各级文化部门的重视。1982年,省、地、县的文化、民政部门共拨款1.05万元,新建仙岩村文化站。新文化站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使用面积100平方米,内设阅览室、电视收视厅、棋艺室、乒乓球室、舞台等。1983年冬,国家文化部民族文化司派员到仙岩文化站检查工作,赠送该站24寸彩色电视机1台。该站还重视购置书报,目前有藏书1200册,订阅报刊29种。

近年来,坂中畬族乡在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拨出专款、划出地皮建立了乡宣传教育中心,并在坂中、仙岩、湖口等村创办了村史教育室,作为加强农村宣传教育的阵地。各行政村还成立了宣传教育站,其职能与文化站相似,设有报刊架、台球室、乒乓球桌等。此外,乡政府还投资建立闭路电视网,目前已有8个行政村开通了闭路电视。

(二) 文体活动 坂中乡的文化与宣传活动开展得较好。早在50、60年代,仙岩畬族村文化站就配合形势,放映幻灯,出黑板报,演唱畬歌、戏曲等。80年代以后,全乡的文化活动丰富多彩,乡团委与文化站经常联合举办各种文娱活动。如:“二月二”后门坪“会亲节”,组织少数民族群众近千人表演了富有畬族特色的舞蹈、武术、对歌等;“三月三”组织歌咏队参加市里举办的畬族民俗节;端午节自己举办或参加市里主办的富春溪龙舟赛;国庆节举办文艺晚会,表演歌舞、古戏等文艺节目,同时还有猜谜、放映电影等活动;每逢“九月九”重阳节,组织老人举办棋、牌比赛及游园活动,以庆祝老人节。此外,乡政府还经常组织各项体育活动,如篮球、乒乓球、游泳、拔河、棋类、自行车慢骑等各种比赛,丰富了乡村居

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三) 宣传活动 坂中畚族乡近年来在加强宣传、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乡村两级建立健全了精神文明建设网络。利用培训、讲座、广播、标语、专栏、黑板报等多种形式进行计划生育、普法、国防、科学技术、征兵等各方面的宣传。为了提高坂中畚乡的知名度,乡政府还积极参加与筹办“中国闽东福安茶文化交流会”,不断挖掘畚族文化和古文化,先后组织撰写了《畚乡风情录》、《畚乡的魅力》、《畚乡璀璨的明珠》、《春潮涌动畚乡行》等,还拍摄刊发了大量反映畚乡风情和大林钟氏神牌的照片,利用广播、电台、电视、报刊加强对外宣传,使更多的人了解了坂中,了解了畚乡。

第二章 康厝畚族乡调查

康厝畚族乡位于福安市西部的穆阳溪南侧,东连坂中畚族乡,西邻周宁县的七步镇和玛坑乡,南靠潭溪镇,北接穆云畚族乡和穆阳镇。全乡南北相距 9 公里,东西相距约 20 公里,总面积 110.2 平方公里;共辖 32 个村委会,185 个村民小组,121 个自然村。乡政府所在地康厝村,距离福安市区的公路里程约 43 公里,目前已与穆云畚族乡及穆阳镇政府所在地连成一片。三个乡(镇)政府相距不足 2 公里,以穆阳镇为中心形成了两乡一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第一节 基本情况

一、地理和环境

康厝畚族乡的土地以山地为主,全乡除穆阳溪沿岸有小块平原外,其余的土地都是群山起伏。西南部的牛板头山,海拔 998.9 米,为全乡的最高峰;东南部的南头山海拔 521 米,蛤蟆石海拔 616 米。穆阳溪从周宁县七步镇流入,在康厝畚族乡西北部与山溪会合,自西向东流经渡头、梧溪等 8 个行政村后注入廉溪。穆阳溪全长 35 公里,平均水深 2.5 米,最宽处 60 米,是穆阳地区通往赛岐港的水上通道。省道赛(岐)(霞)浦公路沿穆阳溪畔自东向西经过羊溪、岭尾等 8 个行政村,是通往周宁、闽北的交通要道。

二、民族与人口

据 1990 年的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全乡总人口 24,291 人,其中汉族 18,767 人,占全乡总人口的 77.26%;畲族 5487 人,占 22.59%;回族 37 人,占 0.15%。根据康厝畲族乡经管站提供的数据,1995 年全乡共有 5938 户、24,906 人,分别比 1990 年增加了 171 户、619 人。其中,少数民族共有 1345 户、6295 人,分别占全乡总户数和总人口的 22.65% 和 25.28%。在全乡的 32 个行政村中,共有 18 个行政村有畲族聚居。其中,凤洋、长潭、红坪、半山、金斗洋等 5 个行政村的畲族户均占这些行政村总户数的 98% ~ 100%;秋岭、东山、竹沃、彭洋 4 个行政村的畲族户分别占总户数的 66.32%、47.74%、36.43% 和 21.14%;大坑、施洋、渡头 3 个行政村的畲族户分别占总户数的 14.61%、16.99% 和 16.86%;其余 6 个村的畲族户均占行政村总户数的 5% 以下,其中康厝、象地、洋溪、西铭等 4 个行政村的畲族分别只有 1 至 4 户。全乡汉族与少数民族混合户家庭 191 户。

根据 1997 年 6 月 10 日康厝畲族乡争创小康村 10 项指标验收调查汇总表的数据,全乡总人口 25,313 人,其中农业人口 24,055 人,占 95.03%,少数民族 6012 人,占农业总人口的 24.99%。

1996 年,康厝畲族乡农村劳动力资源总数为 8213 人,比 1992 年增加了 413 人,4 年累计增长了 5.28%。在全乡的农村劳动力资源总数中,劳动年龄内人口 7944 人,其中:劳动年龄内上学的学生为 530 人,劳动年龄内丧失劳动能力者 92 人。不足劳动年龄而参加劳动的人口 185 人,超过劳动年龄而参加劳动的人口 173 人。农村实有劳动力 7680 人。其中,男劳动力 5574 人,女劳动力 2106 人,男女劳动力之比为 100:37.97,劳动力的性别差过于悬殊。与 1992 年相比,劳动年龄内上学的人口增加了 6.36 倍,不足

劳动年龄参加劳动的人口下降了 1.6%，表明劳动人口接受教育的趋向增强；女劳动力比 1992 年增长了 11.43%，大大超过了劳动力资源的增长速度，表明妇女参加劳动的人口在增加。

三、自然资源

(一)气候与物产 康厝畲族乡地处亚热带，全年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 17℃～20℃，最低气温 10℃，最高气温 40℃。年平均降雨 1650 毫米，无霜期 329 天，土地肥沃，适宜于农、林、茶等多种经营。主要物产有水稻、番薯、马铃薯、茶叶、芙蓉李、水蜜桃、枇杷、葡萄、杉木、松木、油桐、毛竹等。

(二)矿产资源 主要矿产资源有辉钼矿和花岗岩。辉钼矿的蕴藏量约 800 万吨，福安市国有的辉钼矿之矿址就在该乡龙甲山麓的赤路村。康厝畲族乡的花岗岩资源比较丰富，而且质量属上乘，可加工成各种规格的石料和板材，经打磨抛光后的石板材颇似水磨石米面，但其自然的花纹远非水磨石米板材可比。石板材加工现已成为乡村工业的主要行业。

(三)水利资源 康厝畲族乡的水资源比较丰富，大多数村落都有山涧小溪流经。最大的河流为穆阳溪，流经 8 个行政村。全乡建有 2 座水库，可蓄水 33 万立方米。至 1996 年底，全乡共有村及村以下兴建的小水电站 6 座，为福安市各乡之首，装机容量 920 千瓦，年发电量 80 万千瓦/小时。

四、民族乡

1984 年 9 月，福安县人民政府遵照 1983 年《国务院关于建立民族乡问题的通知》，“凡是相当于乡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应当建立民族乡”，“建立民族乡，少数民族人口在全乡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一般以百分之三十左右为宜；个别情况特殊的，可以低于这个比例”的精神，决定在畲族主要聚居地建立民族乡，于同年 9 月至

10月先后撤销了坂中、康厝、穆云3个公社,成立坂中、康厝、穆云3个畲族乡。其中,康厝畲族乡的畲族人口占全乡总人口的比例是3个畲族乡中最低的。

按照有关法律的规定,畲族乡的乡长由本民族的公民担任,此外在其它方面无明确法律规定。因此在执行过程中,民族乡与一般的乡并无明显区别。1997年11月,康厝畲族乡共有各类干部107人,其中畲族7人,占干部总数的6.54%。在乡党委书记、副书记和乡长、副乡长一级的干部中,只有2名畲族干部。

第二节 农业经济

一、耕作条件

1987年,康厝畲族乡共有耕地面积24,396亩,其中水田21,975.68亩,占耕地总面积的90.01%,水田稻作农业的特征十分明显;农地(旱地)2420.32亩,占耕地总面积的9.99%。在全乡的耕地总面积中,畲族农户耕作的土地6357.5亩,占耕地总面积的26.06%,其中水田5884亩,占全乡水田总面积的26.78%;旱地473.5亩,占全乡旱地总面积的19.56%。畲族农户的人均耕地面积和人均水田面积都超过了全乡的人均水平。1987年~1996年的10年间,康厝畲族乡的耕地面积变化不大,1996年为2.44万亩,与1987年相差无几。

全乡水田的总面积中:平洋田(河谷)占16.54%;山垅田占37.18%;梯田占46.28%。山垅田、梯田合计所占的比例高达83.46%,山地稻作农业的特征也十分明显。在旱地的总面积中:坡地占88.65%,平地占11.35%,亦显示了山地农业的特征。全乡耕地海拔高度的分布情况为:海拔10米~100米的占31.53%,海拔100米~300米的占29.78%,海拔300米~500米的占

15.90%,海拔 500 米~800 米的占 22.79%。全乡 95.73%的茶园和果园面积也分布在坡地。

全乡耕地的有效灌溉面积为 11,294 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46.29%。其中旱涝保收的高产稳产田 6615 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27.12%。电灌面积仅 280 亩。表明农业耕作对自然降水的依赖程度较大。

二、耕作技术

由于全乡的耕地以水田为主,而水田又明确地分为平洋田、山垅田和梯田,因此,不同村庄之间的农耕技术差别较大。穆阳溪沿岸小块平原水田(即平洋田)均可使用畜耕或机械耕作,而山垅田和梯田中有相当部分都是狭小分散的水田,有的甚至只有吃饭桌般大小,耕牛转弯都困难,故只能靠人力耕作。较大块的山垅田和梯田,则是以畜耕为主。康厝乡的畲族聚居村,大多数都分布在海拔较高的山区,虽然畲族人均水田面积高于全乡的平均水平,但其水田的质量相对较差,海拔一般都在 200 米以上,部分在 500 米以上,而且多数都是小而分散的水田。如畲族人口最多的凤洋村,80%的水田都靠人力耕作。这种耕作方式一般都使用传统的劳动工具,如用于犁田的田锄,收割用的镰刀,打谷用的谷桶、竹围帘等,与 50 年代相比没有什么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滑坡和 90 年代后实施的“造福工程”,一些畲族自然村已搬迁到山下,如东山村委会是整个行政村(其中有两个畲族自然村)搬迁到山脚下的河谷平原,新的村落仍然保留着原来的村名,其居民也仍然耕种原来在山上的土地,使用原来适合山地水田的生产工具,按原来的习惯种植单季稻。然而,村庄的搬迁毕竟给村民们带来了新机会和新希望,村民们因此也比居住在山上更勤快,一些畲族村民在耕种山上土地的同时,还租借其它村的平洋田种双季稻,而且也采用畜耕或机耕等适应在河谷平原种

植双季稻的耕作技术。因此,耕作技术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环境的差别所造成的。

与 50 年代相比,农业耕作中技术进步最突出的是植保技术,这主要表现在良种、化肥和农药的广泛使用以及作物栽培技术的提高。目前,水稻种植已普遍采用以汕优 63 为主的杂优品种,番薯“瑞薯 1 号”、马铃薯“克新 3 号”等优良品种的覆盖面也正在扩大。水稻育秧已比较普遍采用农膜育秧和旱地育秧技术。化肥的使用曾大幅度地提高了作物的产量,至 80 年代中期,化肥的施用量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后已基本稳定。1996 年,全乡施用化肥的实物量为 2960 吨,按耕地面积计算平均每亩 121.31 公斤,施用化肥的实物总量比 1986 年的 3009.8 吨略有下降。1986 年~1996 年各年度化肥使用量的波动幅度还不到 10%。然而,在此期间,农民使用的化肥结构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氮肥使用量的大幅度减少和复合肥的使用量大幅度增加。1996 年,全乡氮肥使用量 1680 吨,比 1986 年的 2373.65 吨减少了 29.22%;复合肥使用量 746 吨,比 1996 年的 18.05 吨增加了 40.33 倍,表明农民施用化肥的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非常注重科学施肥,注重平衡施肥。

此外,康厝畲族乡的农民也很注重使用农家肥,以保持和提高土壤的有机质含量。近几年来,康厝乡的许多农民从 11 月至次年的 3 月都用畜禽粪肥种植蘑菇,1996 年,全乡的蘑菇种植面积达 12.2 万平方米,总产 800 吨,比 1990 年的总产增长了 21.22 倍。蘑菇的种植不仅直接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而且在其种植的过程中还可以为其它农作物的种植提供丰富的有机肥,农家肥的使用量也随之增加,从而形成了具有良好生态效应和经济效益的用肥方法。

三、农业经济结构

农业依然是康厝畲族乡的支柱产业。1996年,农业劳动力占全乡劳动力资源总数的75.44%;农业总产值3280万元(1990年不变价,下同),占全乡工农业总产值的29.40%;农业收入4972万元,占全乡经济总收入的37.25%。90年代以来,康厝畲族乡农业的发展速度较快:1983年,全乡的农业总产值仅604.95万元(当年价,速度按可比价,下同),1990年提高到1498.32万元,年均增长2.69%;1996年达6387万元,1991年~1996年平均每年递增12.84%,年均递增速度比1983年~1990年快3.77倍。

(一)种植业 康厝畲族乡的传统种植业以粮食种植为主。在70年代的“以粮为纲”时期,粮食生产更是占有突出的地位。1983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粮食种植面积在农作物播种面积中的比重虽然有所下降,但依然保持着以粮食为主的种植业格局。

1. 粮食生产。康厝畲族乡的粮食生产以水稻为主,其它较重要的粮食品种还有番薯、马铃薯和芋头,其中马铃薯和芋头还作为蔬菜用。传统的小麦、大麦等已较少种植。水稻的种植面积在50年代~60年代曾大幅度增加,70年代中期达到了顶峰,甚至连海拔500米以上不适宜种双季稻的山区也种上了双季稻。80年代初,水稻的种植面积有所下降,但种植业以粮食为主的格局则变化不大。1983年,全乡的粮食种植面积35,288亩,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88.15%。至1996年,粮食种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虽然降至83.49%,下降了4.66个百分点,然而粮食的种植面积和农作物播种面积也分别增加到39,800亩和47,670亩,分别比1983年增长了12.79%和19.07%,粮食种植面积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1996年,全乡的粮食种植结构为:水稻种植面积25,900亩,占粮食种植面积的65.08%,与1990年基本持平,比1983年减少

了2860亩;番薯种植面积5500亩,占粮食种植面积的13.82%;马铃薯种植面积3100亩,占7.79%;大豆种植面积1700亩,占4.27%;杂粮、大麦、小麦等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合计占9.04%。而在粮食产量的构成中:稻谷占84.68%(即以68.05%的粮食种植面积生产了粮食总产量的84.68%);番薯占7.87%^①;马铃薯占3.74%;大豆占0.87%;其它粮食合计占2.84%。水稻种植在粮食生产中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

1983年~1996年,康厝畲族乡的粮食平均亩产和总产分别增长了12.5%和26.92%,已彻底解决了粮食问题,从而为全乡的脱贫致富奔小康奠定了基础。1996年,全乡人均产粮424.52公斤,在交交给国家1050吨粮食、提留(集体提留和生产留粮)763吨粮食后,人均口粮357公斤。在全乡的32个行政村中,人均口粮最低的为251公斤,最高500公斤,均足以解决吃饭问题。

2. 经济作物。主要的经济作物品种有花生、油菜籽、糖料蔗、果蔗、黄红麻等,绝大多数都属于零星种植,尚未形成规模生产。1996年,全乡经济作物种植面积1520亩,占当年农作物播种面积的3.19%,与1983年的种植面积大体相当。种植面积较多、产量较大的主要有:花生660亩,总产125吨;油菜籽60亩,总产3吨;糖料蔗320亩,总产1171吨;果蔗420亩,总产1441吨;麻类60亩,总产5吨。与1983年相比,甘蔗(糖料蔗和果蔗)的种植面积增加了近一倍,花生的种植面积大体持平,其它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3. 其它作物种植。主要包括蔬菜、瓜类(西瓜)、紫云英(绿肥)等。1996年种植面积6350亩,占全乡农作物播种面积的13.32%。其中蔬菜种植面积4800亩,西瓜50亩,紫云英1500亩。蔬菜种植在康厝畲族乡的农业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1996年

^① 薯类(番薯、马铃薯)按4公斤鲜薯折1公斤粮食计算。

的种植面积占全乡农作物播种面积的 10.1%，总产 3240 吨，除满足农户自身的需求外，还大量地供应市场。该乡的风洋畲族村以生产蔬菜的“三辣”（姜、葱、蒜）最为有名，种植“三辣”已成为风洋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4. 食用菌生产。康厝畲族乡食用菌的人工栽培始于 70 年代初，此后逐渐形成规模，至 1990 年蘑菇的年产量已达到 36 吨。1990 年以后，全乡的食用菌生产发展很快，1996 年，食用菌总产达 1075 吨，居福安市各乡镇的第 8 位，其中蘑菇总产 800 吨，比 1990 年增长了 21.22 倍。食用菌的种类也迅速增加，除蘑菇外，1996 年生产香菇 264 吨，白木耳 3 吨，黑木耳 4 吨，金针菇 2 吨，草菇 2 吨。其中，香菇产量居全市各乡镇之首，占全市香菇总产量的 38.65%，白木耳产量占全市总产量的 75%。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间，食用菌生产已成为康厝畲族乡农业生产的重要支柱之一，也是全乡极少数能形成产业化的农产品。

5. 茶叶和水果。康厝畲族乡各族居民种植茶叶有悠久的历史。茶叶也历来是全乡最重要的农产品之一。即使是在“以粮为纲”的 1975 年，全乡的茶叶种植面积也有 3888 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茶叶生产发展较快，1983 年，全乡的茶园面积达 5093 亩，比 1975 年增加 1205 亩，增长 30.99%。此后各年度的茶园面积大体上都保持在 5000 多亩，1990 年为 5080 亩。1996 年，全乡的茶园面积 5010 亩，其中当年新植面积 10 亩，可采摘面积 4065 亩，茶叶总产 400 吨，均为绿毛茶。

康厝畲族乡的气候属于热带小气候区域，适宜种植各种热带和亚热带果树。主要的水果品种有柑橘、香蕉、枇杷、橄榄、无核柿、葡萄、梨、水蜜桃、芙蓉李、杨梅等。其中最为有名的是水蜜桃，其味香甜可口，属高档水果，3 只水蜜桃即重达 1 斤，1996 年的市场销售价每斤达 16 元，如能解决保鲜问题还很有发展潜力。近两年拟推广种植的水果还有无核柿、荔枝和晚熟龙眼等。改革开放

以来,康厝乡的水果生产发展较快:1975年全乡仅有水果种植面积151亩,1996年增加到2438亩,增长了15.15倍;产量由29.2吨增加到1518吨,增长了50.99倍。1996年,全乡主要水果的种植面积及其产量分别为:水蜜桃1100亩,总产316吨;柑橘510亩,总产375吨;芙蓉李289亩,总产235吨;枇杷220亩,总产260吨;葡萄105亩,总产60吨;无核柿100亩,总产170吨;香蕉64亩,总产50吨;杨梅34亩,总产40吨。

(二)林业 康厝畲族乡的土地以山地为主,山林和宜林面积约占全乡土地总面积的70%以上。主要林木资源有松、杉、樟、毛竹、绿竹等数十种,是福安市杉木的主要产地之一。1996年,全乡共造林2200亩,幼林抚育面积800亩,成林抚育面积100亩。在当年的造林面积中:用材林1400亩(其中速生丰产林200亩),占当年造林面积的63.64%;经济林500亩,占22.73%;防护林100亩,占4.54%;薪材林200亩,占9.09%。1996年的林业产出情况为:棕片22吨,竹笋干(鲜笋10比1折干)8吨,村及村以下木材采伐量550立方米,毛竹采伐量5万根;当年林业总收入478万元(其中出售林产品收入156万元),占全乡农业总收入的9.61%。康厝畲族乡政府在消灭荒山的基础上把林业开发转向加强林地管理和低产林改造,并认真抓好“两竹”种植,1996年,新植毛竹1000亩,绿竹500亩。畲族村居民大多靠山吃山,林业的发展仍有很大潜力。

(三)畜牧业 主要是肉猪、家禽、家兔及耕牛的饲养,以家庭的零星饲养为主。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康厝畲族乡的畜牧业发展较快。1996年,全乡年末生猪存栏7115头,全年出栏肉猪1.3万头(户均约2头),分别比1983年增长了70.5%和3.95倍,亦即在存栏数量仅增长70.5%的情况下,出栏的数量增长了3.95倍,表明农民的养猪技术有了很大提高。1996年末牛的存栏822头,比1983年增长了95.23%;家禽年末存栏61,345

只,家兔存栏 2439 只,分别比 1983 年增长了 1.82 倍和 28.37%;肉类总产 849 吨,比 1983 年增长了 3.19 倍。此外,1996 年还生产了禽蛋 38 吨,牛奶 30 吨。在 1996 年的肉类生产中:猪肉产量 800 吨,占全乡肉类总产的 94.23%;禽肉 39 吨,占 4.59%;其它牛肉、羊肉、兔肉等合计占 1.81%。1996 年,全乡畜牧业收入 857 万元,占全部农业总收入的 17.24%,仅次于种植业,在农业收入中位居第二。

(四)副业 主要包括砍柴、割茅草、捕猎和农户家庭兼营的商品性手工业。据康厝畲族乡经管站提供的数据,1996 年,全乡农村居民共砍柴 7200 吨,割茅草 9500 吨,捕获山兔 1875 只。农户家庭兼营手工业的主要产品及产量为:扁担 2500 把,箩筐 460 个,菜篮 500 只,扫帚 5000 把,采罩 900 个,草绳 25 万米,草席 1650 条,草垫 1500 块,竹笼 470 只,竹筛 900 个。副业生产具有浓厚的山区农村传统色彩。

(五)渔业 康厝畲族乡虽属不靠海的山区,但全乡的河流、小溪较多,渔业的发展也有较大潜力。过去,该乡的渔业发展长期受到忽视,渔业主要是在穆阳溪中的自然捕捞和养殖少量的淡水鱼,1983 年全乡渔业产值仅 1.37 万元(当年价,速度按可比价,下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不少农户开始利用荒水发展渔业,使渔业生产获得了一定的发展,1990 年的渔业产值增加到 10 万元。90 年代后,渔业生产明显加快,1996 年渔业产值达 544 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 1990 年增长了 28.74 倍。按当年价格计算,渔业产值在全乡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已由 1983 年的 0.23% 提高到 1996 年的 8.52%,在农业生产中已居重要地位。1996 年,全乡的水产品产量为 360 吨,主要水产品有青鱼、草鱼、鲤鱼、鲫鱼等传统淡水鱼品种。

康厝畲族乡政府现已将淡水养殖业作为农业综合开发的一项重要内容,并采取措施使淡水养殖业向优质高效的方向转化,1996

年发展养殖美国蛙、中华蟹、淡水鳗共 30 亩,已取得了初步成效。该乡水溪中生长的淡水鳗,经济价值极高,目前在福安市的一些乡镇已开始人工养殖。1996 年,全市的淡水鳗总产 718 吨,虽然其产量只占全市淡水鱼总产量的 14.02%,但因其经济价值高,产值达 5746.7 万元,占全市淡水鱼总产值的 65.29%。随着淡水鳗等优质淡水养殖业的发展,将使全乡的渔业生产迈上新台阶。

第三节 乡镇企业

康厝畲族乡历史上长期以农为本,只有很少一些简陋的茶叶和竹木加工作坊。改革开放后,全乡的乡镇企业开始崛起,其发展速度也逐渐加快。1983 年,康厝只有社队企业 26 家,产值 183 万元;1990 年,企业的数量则增加到 189 家,产值达 1693 万元(当年价,速度按可比价,下同)。1996 年,全乡的乡镇企业虽然减少到 152 家,但产值却突破了亿元大关,达 11,969 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 1990 年增长了 6.36 倍,年均递增 39.47%,产值和收入都远远超过了农业,成为农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企业结构

(一)所有制结构 从统计数据看,康厝畲族乡的企业以乡办、个体和联户办企业为主,村办企业相对较少(表 2-1)。1996 年,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为:乡办企业占 13.82%,村办企业占 15.79%,个体及联户办企业占 70.39%,个体及联户办企业占乡镇企业数量的绝大多数。从企业职工的分布看:1996 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总数 1706 人,其中乡办企业占 46.95%,村办企业占 13.95%,个体及联户办企业占 39.10%。乡办企业的职工最多。从产值形态看:1996 年,乡镇企业总产值 11,969 万元,其中乡办

企业实现产值占 47.56%，村办企业实现产值占 8.18%，个体及联户办企业实现产值占 44.26%，与乡办企业基本相同。

表 2-1 1996 年康厝畲族乡企业所有制结构

	合计	乡办	村办	联户办	个体办
企业数(个)	152	21	24	11	96
职工数(人)	1706	801	238	151	516
产值(万元)	11,969	5692	979	2226	3072

资料来源:康厝畲族乡企业管理站。

但是从调查的实际情况看,康厝的乡办或村办企业基本上都是由私人承包,或是私营企业挂靠而成的“乡办”、“村办”企业,或者是由私人与乡、村合股办的企业,真正属于乡办或村办的企业极少。因此,康厝的乡镇企业最普遍的形式应当是个体私营企业及股份合作制企业。

表 2-2 1996 年乡镇企业行业结构 单位:个、人、万元

项 目	企业数量	职工人数	总产值
农业企业	7	68	53
工业企业	105	1071	9913
建筑企业	1	410	1250
交通运输业	15	26	285
商品流通业	11	91	308
餐饮服务业	13	40	160
合 计	152	1706	11,969

资料来源:康厝畲族乡企业管理站。

(二)行业结构 康厝畚族乡的乡镇企业以工业企业为主(表 2-2)。1996 年,全乡工业企业的数量、职工人数和实现的产值分别占全部乡镇企业总数的 69.08%、62.78% 和 82.82%。建筑企业仅 1 家,即乡办的康厝建筑公司,也是康厝畚族乡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职工人数和产值分别占全部乡镇企业的 24.03% 和 10.44%。从康厝畚族乡企业管理站提供的数据看,农业企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餐饮业和服务业的规模都比较小。

二、乡村工业

康厝畚族乡的乡村工业以当地的资源开发与加工为主。1996 年,全乡的 105 家工业企业中:乡办企业 15 家,村办企业 11 家,个体及联户办企业 79 家。主要的工业行业有石材加工、制茶、饮料生产、文体用品和玩具制造 砖瓦生产、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电力生产及供应等。其中最主要的是石材加工、制茶和电力生产。

康厝畚族乡的花岗岩资源非常丰富。近几年,乡党委和政府实施了“以电兴乡、石材富乡、劳务脱贫、种养富民”的发展战略,把石材开发提到一个很高的位置,推动了花岗岩开采与加工业的发展。至 1997 年,全乡共开办了各类石板材厂 36 家。其中,乡政府与港商合资办的 2 家企业规模较大,其余的多属个体私营企业,规模都比较小,一般只有一两台电锯。加工后的石板材主要销往浙江,本地区亦有部分销售。目前,石板材加工还属于比较赚钱的行业,所需的投资不大,只需购买一台电锯即可生产,故目前此行业仍在兴起之中。然而,由于石板材加工产生的粉尘污染较大,福安市政府已开始限制开办新企业,不少石板材厂未经工商管理部门注册就开工生产,所以企业的实际数量要多于统计的数量。

全乡共有 6 家电力企业,1996 年实现产值 530 万元,实现增加值 76 万元。为实现“以电兴乡”的发展战略目标,乡政府计划与

穆阳水电站及本乡的 17 个行政村联合投资, 扩建渡桥水电站工程, 使该水电站的装机容量达到 960 千瓦, 届时每年可为各村带来近万元的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康厝畲族乡是福安市比较重要的茶叶产区, 故茶叶加工有悠久的历史。1996 年, 全乡有制茶厂 20 多家, 以私营和集体企业为主, 仅有一家乡办茶厂。近几年, 茶厂大多不太景气, 1997 年亏损的茶厂居多。

值得注意的是, 康厝畲族乡中的畲族聚居村一般均无工业。

三、建筑业

全乡统计的建筑企业只有一家乡办的康厝建筑公司。其前身是 60 年代以该乡凤洋畲族村居民为基础组建的康厝建筑社。改革开放以后, 康厝建筑公司发展很快, 职工人数最多时曾达数百人, 承建过福安市机电商场、武装部大楼、国税局和地税局大楼、闽东水电站 10 万千瓦扩建工程等一批重要工程。1996 年实现产值 1250 万元。该公司改制以后, 在职的 50 多人中有 30 多人拥有专业技术职称, 其中工程师 6 人, 经济师 6 人, 会计师 3 人。1997 年, 由该公司承建的即将竣工的福安市政府大楼, 采用了大面积的玻璃幕墙, 显示了其雄厚的技术实力, 预计全年将实现产值 1500 万元~2000 万元。

四、第三产业

康厝畲族乡政府所在地与穆云畲族乡及穆阳镇政府所在地几乎连成一片。其中, 穆云畲族乡政府与穆阳镇政府仅一墙之隔, 都在穆阳镇。康厝畲族乡政府与之隔河相望, 且有桥梁相通, 步行十几分钟即可达穆阳镇。为统一规划穆阳镇的发展, 1992 年, 福安市人民政府成立了穆阳民族经济开发区, 由穆阳工商所负责两乡一镇的工商企业及个体私营业主的工商注册, 康厝和穆云不再设

工商管理机构。由于个体私营商业、摊贩等第三产业规模小且比较分散,穆阳工商管理部门并没有按乡镇分别注册登记。此外,在一些村庄开办的商店、村民在乡村间从事运输等不需办理工商注册手续便可营业。所以,康厝畲族乡企业统计中的交通运输业、商业及餐饮服务业,大体上只是政府驻地附近以及在穆阳镇农贸市场营业的部分,并没有真正包括全乡的第三产业。

康厝畲族乡的交通网络包括省道赛(岐)(霞)浦公路和乡村简易机耕路。前者穿过该乡的8个行政村,后者则贯通全乡的行政村和大部分自然村。根据该乡企业管理站的统计:1996年,全乡共有交通运输企业15家,职工26人,年产值285万元^①。1997年是康厝畲族乡交通事业大发展的一年,1996年末尚有46.88%的行政村不通车,至1997年11月,全乡行政村的通车率即达到100%,一些刚刚通车的村庄迅速出现了运输专业户,交通运输业发展很快。乡村之间的主要运输工具是“三叉车”,这是一种以195柴油机为动力、以手扶拖拉机车厢为机身、形似三轮摩托又似拖拉机的农用运输车,多为福安市甘棠镇的一些企业制造,焊接和安装等工艺都相当粗糙,但售价很便宜,每辆新车只需约8000元,且适合山区的简易机耕路。“三叉车”一般均为村民私人所有,可从事客货运输,每天往返于各村与穆阳镇之间,有点类似于城市里招手即停的“小公共”。

福安没有定期的农村集贸市场,穆阳镇是两乡一镇的商业贸易和服务业中心。康厝畲族乡的商业和餐饮服务业大多分布在乡政府门前的公路两侧及附近,还有部分摊点长年设在穆阳镇农贸市场内。该乡企业管理站的统计显示:1996年,全乡共有商业企业15家,从业者91人;餐饮服务业13家,从业者40人。但该统计显然没有包括各村的众多小商店。全乡最大的商业企业当属康

^① 从该统计数据看,每家企业尚不到2人,称之为运输户可能更恰当些。

厝畚族乡供销社,该供销社开设的农业生产资料、五金、文化用品和日用百货等几家门市部,均属全乡营业面积最大、经营品种最多的商店。

康厝畚族乡的所有行政村和绝大多数自然村都有小商店,有些村还开有数家小商店,如人口较多的凤洋畚族村,由村民开办的商店多达8家。这些小商店有点类似过去的代销店,但远非过去的代销店可比。一般的村庄小商店均出售油盐酱醋、糖烟酒、点心和一些日用品,有相当部分的商店还备有冰柜,可储藏鱼肉、冰激凌或冷饮出售。小商店一般还收购村民的零星农副土特产品,收购到一定的数量即雇车运往穆阳镇、福安或其它地方销售。因此,村庄小商店对村民的生产生活具有重要影响,解决了当地无定期农村集贸市场的问题。

第四节 社会与文化

一、居民收入与生活

根据福安市统计局的统计数据,1996年,康厝畚族乡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为1600元,是全市农村人均纯收入的71.68%,还不到城南街道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一半,居全市各乡镇的倒数第一。在全乡的32个行政村中,人均纯收入最高的康厝村为1843元,最低的大坑村1416元,各行政村居民之间的最大收入差仅为30.16%,亦即全乡各行政村之间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差距不大。畚族人口占98%以上的凤洋、长潭、红坪、半山和金斗洋5个行政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531元、1496元、1535元、1673元和1496元。除了半山村外,其他4个畚族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均低于全乡水平。

康厝畚族乡居民的主食以大米为主。1996年,全乡农村居民

的人均口粮为 357 公斤。其中,人均口粮最多的赤路村为 500 公斤,人均口粮最少的半山村也有 251 公斤。亦即全乡已较好地解决了吃饭问题。凤洋、长潭、红坪和金斗洋村的人均口粮分别为 318 公斤、346 公斤、357 公斤和 280 公斤。

以上数据表明,康厝畲族乡从整体上已较好地解决了农村居民的温饱问题。1997 年,全乡加快了奔小康的步伐。1996 年底,康厝乡还有 15 个行政村不通公路,14 个行政村不通电话,但到 1997 年 11 月,全乡的 32 个行政村已全部实现了通公路和通程控电话,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根据乡党委办公室提供的数据:至 1997 年 6 月,全乡农村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为 18.2 平方米,人均动物性食品年消费 46.8 公斤;全乡农村拥有电视机 4293 台,农户的电视机普及率为 78.2%;用电户 5471 户,用电户比例达 99.7%。

二、学校教育

(一)小学教育 1997 年,康厝畲族乡共有 31 所小学和 15 个教学点,学生 3155 人,适龄儿童入学率为 99.7%。康厝学区共有教职员工 194 人,其中专任教师 182 人,行政与工勤人员 12 名。全乡各行政村有独立设置的畲族小学 15 所,学生 759 人(包括汉族学生),教师 46 人。1997 年,全学区共有畲族在校生 718 人;当年毕业生 107 人,全部都升入了中学。

康厝中心小学是全乡最完备的一所小学,设在乡政府所在地。1997 年,该校共有在校生 777 人;教职员工 40 人,其中专任教师 37 名(4 名畲族教师),行政与工勤人员 3 名。康厝中心小学是福建日报社的扶贫挂靠点,近几年在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帮助下,除了利用群众交纳的教育附加费外,还由福建省希望工程办公室投资 5 万元,长乐教育局赞助 10 万元,新建了一座建筑面积达 2060 平方米的 4 层教学楼,从而极大地改善了教学条件。1997

年,已有部分班级进入了新教学楼上课。

近几年来,福建省和福安市的机关单位和社会各界对康厝乡畬族村的小学建设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如福建省政协的一名澳门委员捐资 10 万元新建半山村民族小学的一座两层教学楼,福安市检察院向金斗洋村民族小学捐资 6 万元,福安市政协、市民委也分别资助了红坪村民族小学和长潭村民族小学。此外,福安市党委办公室、市交警大队、福安商品开发公司、闽东水电站等单位也分别向康厝畬族乡的界竹村完全小学、湖洋村小学、填秦完全小学、象地完全小学和岭尾小学捐资,扶持这些学校发展教育事业,在当地乡村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形成或强化了全社会重视教育的风尚。

目前,康厝畬族乡还有部分山村小学的办学条件较差。如凤洋畬族村民族小学的校舍不足且已很破旧,学前班的儿童只能在村祠堂上课。为建新教学楼,村委会的干部正在四处奔波,寻求政府部门的支持和社会各界的资助。

(二)中学教育 康厝畬族乡的中学教育始于 1970 年,当年开办了小学戴帽初中班一所,1975 年投资扩建初中班校舍,次年将初中班升格为“康厝初级中学”,1978 年,根据教育部《关于办好一些重点中小学的试行方案》的精神,在康厝初级中学开设了高中部。1985 年,福安县政府为解决畬族小学生升学难的问题,在当时的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同志的支持下,决定将康厝初级中学扩办为“福安民族中学”,面向全县招收畬族初中毕业生,为畬族乡村脱贫致富培养人才。福建省财政厅拨出专款 15 万元,在康厝畬族乡的苏板村征地建设新校舍。

1989 年,福安市教育局将福安市民族中学改为“福安市民族职业中学”,其初中部继续面向全市招收畬族小学毕业生,其高中部改为农林类职业高中,以招收畬族学生为主,兼收汉族学生。该校对畬族学生实行优惠政策,主要表现在:录取畬族学生的分数线

低于一般的汉族学生;对家庭困难的畬族学生减免学杂费;畬族学生可享受人民助学金。福安市民族职业中学目前是宁德地区惟一的一所农村民族职业中学。教学条件和教学设备都很不错。1997年,全校的建筑面积达9800平方米,建有教学楼、综合试验楼、学生宿舍楼,拥有卫星电视地面接收站。全校的教学仪器设备总值约30万元,拥有电脑、高速电动缝纫机、录像机、投影仪等先进的教学设备;有养殖场、苗圃、茶园等农业生产实习基地,还有汽车驾驶训练场、健身房、舞蹈室等设施。办学的各种配套设施基本齐全。学校先后开办过农业经营、服装、编织、公关、财会、汽车驾驶等12个专业。目前,该校的职专分为三个体系:即汽车维修、驾驶;服装加工与设计;农村后备干部的培养(乡村行政管理后备人才)。1997年,全校有教职员工107人(其中畬族教师4人),其中中学高级职称2人,一级职称25人,专任教师的学历达标率为98%。

从1972年~1990年,该校(包括其前身初中班、康厝初级中学和福安市民族中学)历届畬族毕业生合计108人,占毕业生总数的8.31%;1991年~1997年,该校每年招收的学生从300人逐渐增加到465人,7年共招生2449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886人(初中792人,职高专业94人),占招生总数的36.18%;在同期该校招收的少数民族学生中,来自康厝畬族乡的畬族学生234人,占少数民族学生总数的26.41%^①,其中1997年在康厝畬族乡招收了94名畬族学生,占当年招收少数民族学生总数的65.28%。该校在本乡招收畬族学生的比例有逐渐增加的趋势。1991年和1992年畬族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的比例约为50%,职高专业历年的毕业率均为100%。由于该校坚持教学与实践相结合,职专毕业生的就业率高达97.8%。至1997年底,学校共为福安市培养了约

^① 少数民族学生中约有2%~3%的回族学生。

2000 名具有一专多能的专业人才(不包括初中毕业生),有部分学生已到北京、杭州、青岛等大城市工作和劳务出口到新加坡、澳门。

三、医疗卫生

康厝畲族乡的医疗卫生网络由乡卫生院和行政村卫生所构成。此外,乡村居民中略懂中草药的人不少,可以利用当地草药治疗一些常见病。多数畲族群众也能掌握一些应用草药防病治病的方法^①,这对乡村居民的医疗保健起了很大作用。

康厝畲族乡卫生院的前身,1949 年~1968 年是由私人行医组成的联合诊所。1968 年,县卫生局调配了 18 名医务人员,在联合诊所的基础上建立了康厝卫生院。1972 年新建了一座两层的门诊楼,1978 年增添了 X 光机、心电图仪等医疗器械。1989 年,卫生院共有 28 名职工,年门诊量 3.51 万人次,总收入 12.22 万元。1997 年,康厝畲族乡卫生院建筑面积 260 平方米,共有职工 35 人,其中在职人员 26 人,退休人员 9 人。在职人员中,只有 1 名中级职称(主治中医师),初级职称 7 人(中医师 2 人,西医师 1 人,药剂师 1 人,护士 2 人,公卫医师 1 人),还有西医士 4 人,中药剂士 5 人,其余均无职称。卫生院无病床,只有门诊、妇产科和注射室。除了在卫生院内设门诊部外,还在苏板村、康厝村、南洋村和洋溪村各设了 1 个门诊部。门诊为卫生院收入的主要来源,一年的门诊费收入约 25 万元。收费标准为:挂号费 0.5 元,出诊费 1 至 2 元,一般一张处方(包括药费、注射费等)平均约 5 元。卫生院每天的就诊人数约 30 人~50 人。

由于康厝畲族乡政府所在地与穆云畲族乡及穆阳镇的政府所在地相距不远,穆云畲族乡卫生院和福安市民族医院均设在穆阳镇,后者为市属医院,还设有畲医研究所,医疗设备、医疗条件等都

^① 参阅《福安畲族志》第 491 页,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要比康厝卫生院好得多,因此康厝乡居民看病多到穆阳镇的医院,使康厝卫生院显得很萧条。

全乡的 32 个行政村中,除了苏板、康厝、南洋、洋溪有卫生院设的门诊部外,其余的 28 个行政村均设有卫生所。卫生所一般都由拥有学历与从业证书的医师或医士承包,财产和药品均属个人所有,收入归己,承担卫生院下达的防疫、妇幼保健等任务。此外,乡卫生院每年还定期培训各村的接生员,并发放证书,这对保护山村产妇健康,降低婴儿死亡率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四、文化生活

(一)管理机构 康厝畲族乡党委和政府十分重视全乡的精神文明建设,为丰富全乡居民的文化生活,在文化事业方面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网络。乡党委设有宣传文化中心,由党委书记和宣传委员担任主任和常务副主任,领导成员还包括乡政府各部门的 14 名负责人。“中心”为常设机构,下设办公室、村宣传教育站、广播站、有线电视站、文化站、图书馆、电影院、文化市场、科技宣传服务站、《福安报》通讯联络站、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文化技术学校、人口教育学校、文明市民学校、文化艺术协会、体育协会等机构或团体。宣传文化中心在福安市委宣传部和乡党委的双重领导下,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负责组织、引导、协调全乡文化宣传的各项活动,领导、管理和发展文化产业,管理农村宣传工作,组织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活动,努力提高全乡居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

(二)文化站 康厝畲族乡现有两个文化站,即乡政府所在地的康厝乡文化站和凤洋村文化站。乡文化站成立于 1986 年,为民办公助性质,1990 年福安建市后为市属文化站。乡文化站设图书馆和阅览室,图书馆藏书约 3000 册,阅览室订阅报纸 10 种,每天到文化站借书看报的读者约数十人。1994 年,康厝老人活动中心

落成,该中心为琉璃瓦的三层亭阁式小楼,同年乡文化站搬入老人活动中心。楼的一层为图书馆和阅览室,二三层为老人活动中心。1997年,乡文化站正式编制1人。

凤洋畬族村文化站建于1955年,是闽东地区最早成立的畬族村文化站。该文化站成立之初除开展文化宣传外,还负责扫盲工作。80年代是凤洋村文化站的最活跃时期,节假日期间经常举办畬族歌会,开展传统民族文化活动,还牵头创办了凤洋村业余剧团、电影放映队等,对丰富畬族村居民的文化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凤洋村也因此被誉为“畬歌艺术之乡”。此外,文化站还成立了农技小组,向村民们传播农业科学知识。进入90年代,凤洋村成为福安市举办畬族大型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如1997年3月在凤洋村举办的福安市第四届畬族民俗节,各地来参加的畬族同胞约达1.5万人,仅新闻记者就有四五十人,宁德地区和福安市政府的领导也参加了这次盛会,场面颇为壮观^①。

(三)民族体育 康厝畬族乡的体育活动以金斗洋村居民的畬拳最负盛名。金斗洋畬族拳是南少林武功中的一支流派,其动作朴实无华,招招讲究实用,具有独特的风格,广泛流传于福安畬族聚居地,该乡的畬族聚居村中会几招畬拳的居民尤为普遍。畬拳有很强的健身价值,强调练筋骨、养性,讲究习武修德。过去,各地慕名来金斗洋村拜师求艺者络绎不绝,金斗洋村的拳师也外出传艺,畬拳不仅在畬族聚居地广为流传,而且还在闽东、闽北一带的汉族人中传播。50年代后,金斗洋村多次派人参加福建省和全国性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如1982年举行的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和1986年福建省首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金斗洋村分别派了3人和4人参加武术比赛。1987年,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武术文库《畬族拳》一书,即是以金斗

^① 参阅本书典型篇第四章《凤洋村调查》的有关内容。

洋村拳术作为研究对象。1984年,金斗洋村被评为福建省体育先进村,享有“畚族武术之乡”之美誉。

五、老年人活动

康厝畚族乡的老年人活动颇具特色,其组织形式是群众性的民间组织——老人长寿会。该组织在发扬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为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发挥老年人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再作贡献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康厝畚族乡现有3个老人长寿会,分布在康厝、苏板和界竹村。此外,洋溪、凤洋等7个行政村也办有老人活动室。

康厝乡老人长寿会成立于1982年,在册会员1700余人,是全乡会员最多的老人长寿会。该会有严密的组织机构和会员章程,入会需交纳入会基金和按月交纳互助金。此外,老人会还通过各种渠道创收。至1997年底,康厝乡老人会已拥有固定资产55万元。老人会的收入除补助会员丧葬所必须的正常开支外,还为老年人的福利事业、社会公益办了不少好事。如1996年7月由康厝老人会牵头,发动康厝村群众投劳捐资,在各方的支持下集资6万多元,投工500多个,铺设了康厝至苏板的767米水泥路面及康厝村内的十多条水泥巷道,改善了康厝村的村容村貌;1997年,康厝老人会又牵头多方集资,投入60多万元拓展苏板至穆阳镇的1.5公里水泥路面。此外,1996年,康厝老人会还投资6000多元,为民政部门在康厝、洋溪两个“敬老院”的养老基地种植柿子树苗300多株,其将来的收益归敬老院。为解决部分特困老人就医难的问题,康厝老人会发起成立“爱心互助会”,仅康厝村就有36人捐资,集资2万多元。“爱心互助会”以“以本生息,以息济贫”为宗旨,以接济特困重病户为己任,1996年已用生息款帮助28户特困重病户渡过了难关。

1994年,康厝乡老人长寿会发动群众集资16万元,建成了一座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老人活动中心”。该中心占地面积560平方米,是一座三层的琉璃瓦亭阁式建筑,院内建有鱼池和水泥拱桥,整体设计颇为典雅,可谓是全乡最漂亮的建筑之一。该中心内设图书馆、书报阅览室、书画室、棋牌室、琴乐室等,全日开放,供老年人学习和娱乐。每天早晨,康厝的老人锻炼完身体,都要到活动中心泡上茶,或下棋,或聊天,悠闲自得,许多老人都把“中心”当成自己的第二个家。1996年,康厝乡老人会创办了老年学校,并建立了一套较健全的学习和管理制度。

在老人长寿会的组织下,康厝畲族乡的老人文化活动相当活跃。每逢过年过节,老人会都要组织老年人开展各种文体活动,如棋类比赛、书画展览等。平时也组织气功、拳术等培训班,以增强老年人的体质。目前,全乡常年坚持各种功、拳、操锻炼的老年人有200多人。康厝老人长寿会还专门购置了一批乐器,组织起民乐队和管弦乐队,平日自奏自乐,逢年过节则公开为群众义演,向本村的老寿星拜寿贺年。自1995年以来,民乐队已为本村辞世的5位五保户老人举行了葬礼,有人为“单身哥死冷冷清清”的五保户热热闹闹送葬,对改变一些人的“养儿防老”观念起了一定的作用,推动了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此外,每逢“九九”老人节,老人会还组织老年人外出参观旅游,开阔老年人的视野,使其亲自感受到改革开放给祖国带来的繁荣景象,让老年人的晚年过得更加充实。

六、宗教信仰

康厝畲族乡居民信仰的宗教主要有天主教、佛教与道教,畲族基本上为祖先崇拜、多神崇拜和自然崇拜,但也深受佛教和道教的影响。

天主教自明末从国外传入,福安在长达二百年的时间里一直

是福建省的天主教中心,出现过全国第一位华裔主教,教徒多时达万余人。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福安县有教堂37座。而康厝一带则是天主教徒比较集中的地区。1949年以后,康厝乡一带的天主教活动曾绝迹。1979年以后,天主教堂在原址上相继耸立,至1997年,康厝乡境内已有5座天主教堂,分布在康厝、苏板、秋岭、南洋和邮亭5个行政村。新建的天主教堂富丽堂皇,外墙均采用白瓷砖贴面,高高的教堂塔尖在低矮的村舍民居中显得格外醒目,成为当地的一大景观;教堂的规模也比较大,其中康厝、苏板的天主教堂可容纳上千人作弥撒。新建一座教堂约需几十万至百余万元,显然是当地的天主教徒们无力承担的,据称修建以上教堂是得到了国外教会的资助。据乡党委的统战委员介绍,常驻康厝天主教堂的是罗马教皇派驻赛岐罗江闽东教会的未经注册的神甫,天主教活动的经费也得到了国外教会的资助。1997年,全乡共有3700多名天主教徒,其中16岁以上的约2300多人,分布在全乡13个行政村的20个自然村,基本上都是汉族。

与天主教相比,佛教和道教的规模较小且分散,但信奉佛教和道教的居民比较广泛。1997年,全乡共有寺庙道观10座,其中寺庙8座,道观2座。较大的寺庙有慈云禅寺,70年代末由乡民集资重建,寺中有1僧1尼和几名杂工;洋弥陀寺和普照寺均有1僧2尼;罗汉寺有1尼和1位半路出家的僧人。两座道观,一称三清观,一称景云观,观中均有道士,其中一名道士担任福安市道教协会副会长。三清观中还有二三名女道士。

宗教信仰对康厝畬族乡的居民有很大影响。天主教信徒基本上是以户为单位,住房门口都贴有醒目的标志。每天傍晚,康厝天主教堂都有四五百人做祈祷,听神甫布道,直到八九点钟才散去,周末做弥撒的信徒更多。分布在各村的寺庙、道观的香火也比较旺盛。由于康厝、苏板、邮亭等行政村几乎连成一片,这几个村既有天主教堂也有寺庙,村中的居民既有佛教徒也有天主教徒,各自

都按不同的信仰生活,相安无事。如佛教徒人家办丧事请和尚念经超度亡灵;信奉天主教的人家办丧事则按天主教的教规在门口贴“告白”,祈祷天主饶恕自己的罪孽。不过,康厝的无神论者也不少。有意思的是,在康厝村,对天主教最具挑战性的则是老人长寿会。老人活动中心建在天主教堂对面,两座建筑相距仅十余米,琉璃瓦的亭阁式建筑与西式的天主教堂形成了鲜明对照。每天傍晚,教堂里都会传出信徒们的祈祷声,而老人会的管弦乐队则似乎毫不相让地演奏进行曲。如果恰好有佛教徒人家办丧事,还会听到和尚念经和敲木鱼的声音。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似乎都在证明康厝的宗教信仰自由。

第三章 穆云畬族乡调查

穆云畬族乡位于福安市西部,东与坂中畬族乡相邻,西与周宁县交界,南与康厝畬族乡毗邻,北与社口镇接壤。全乡总面积 116.80 平方公里,东西相距 27 公里,南北相距约 13 公里。境内地形大部分为山区丘陵,小部分为河谷平原。穆阳溪、龙首溪和嘯溪贯穿全乡,农业用水比较便利。1997 年,穆云畬族乡辖 33 个行政村,其中有 13 个畬族聚居村、7 个畬汉杂居村和 1 个回族聚居村。乡政府驻地穆阳镇,距福安市区 41 公里。1996 年,全乡工农业总产值 1.25 亿元,占全市工农业总产值的 3.17%,在宁德地区的 8 个民族乡中居第 6 位。

第一节 资源与人口

一、自然资源和物产

穆云畬族乡的地形地貌以丘陵和山地为主。1996 年,全乡有耕地 1.95 万亩。在耕地面积中,水田 1.50 万亩,占 76.92%;旱地 0.45 万亩,占 23.08%。其中:畬族居民耕地 8144 亩,占全乡耕地总面积的 41.76%;水田 7306 亩,占全乡水田总面积的 48.71%;旱地 838 亩,占全乡旱地总面积的 18.62%。畬族居民的人均耕地面积和人均水田面积都高于全乡的平均水平。

穆云畚族乡地处亚热带。全年气候温和,年最高气温小于40℃,最低气温高于5℃,无霜期250天,适宜于农、林、茶、果等多种作物的生长。粮食作物以水稻、番薯为主,河谷平原水田适宜种植双季稻,而大多数山区水田只适宜单季稻的生长。经济作物则以茶树为主。茶叶是畚族村居民农业收入的重要来源。80年代以后,茶树及荔枝、枇杷、葡萄、李、香蕉等果树的种植发展较快。近几年发展起来的福安大白茶(发源地为穆云乡高岭村)、穆阳水蜜桃、晚熟龙眼、荔枝、芙蓉李等均为优良品种,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乡境内的矿产资源有辉绿岩、银矿、花岗岩、高岭土等。近几年勘测到有大面积的火山喷发流纹气泡岩,有很高的开发价值,可加工成高档建筑装饰材料。已开发的矿产资源主要是花岗岩,目前已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石板材加工业。

主要的林木资源有杉、松、绿竹、毛竹等。据1990年的统计:全乡共有林业用地105,613亩,占土地总面积的68.71%。其中用材林48,395亩,油茶林279亩,竹林5579亩,疏林地2478亩,未成林地6038亩,荒山宜林地42,844亩;活立木蓄积量为75,368立方米,其中用材林蓄积量为70,179立方米,占总蓄积量的93.12%;森林覆盖率为40.5%,比全市的森林覆盖率高3.6个百分点。1996年,穆云畚族乡的森林覆盖率达63%,比1990年提高了22.5个百分点,表明全乡的生态环境仍在不断改善。

乡境内著名的游览区白云山,因白云常绕而得名,为闽东第一山,距福安市区仅55公里。白云山群峰累列,方圆约百里,最高峰为仙顶峰,海拔1448.7米,为闽东北最高峰,晴晨可观东海日出奇观,千变万化的云海奇景时常可见,以春夏为最佳观景季节。以白云山为中心,环绕其周围的还有鲤鱼溪、八仙过海、九龙洞、锁泉寺

等旅游景点。

二、人口与民族

穆云畲族乡的居民以农业人口为主。1996年,全乡共有6061户、26,007人,其中农业人口25,508人,占全乡总人口的98.08%,非农业人口仅499人。全乡的劳动人口10,346人,占人口总数的39.78%。其中,农林牧渔业劳动力8460人,占劳动力总数的81.77%;工业劳动力353人,占劳动力总数的3.41%;建筑业劳动力274人,占劳动力总数的2.65%;从事第三产业和其它工作的劳动力合计1259人,占全乡劳动力总数的12.17%。

全乡的民族人口由畲族、汉族和回族构成。1996年,全乡共有畲族1755户、7902人,畲族人口占全乡总人口的30.38%;汉族17,245人,占全乡总人口的66.31%;回族860人,占全乡总人口的3.31%。80年代以来,畲族人口占全乡人口的比例变化不大,大体都保持在30%左右。

穆云的畲族人口以自然村落聚居。根据1990年的第四次人口普查,在全乡的33个行政村中,有13个行政村的畲族人口比例在70%以上,其中有10个行政村的畲族人口比例超过了90%(表3-1)。13个行政村共有畲族人口7011人,占全乡畲族人口的88.72%,小聚居的特征十分明显。

穆云畲族乡的畲族均是由外地迁徙而来。根据有关记载,穆云乡境的畲族大体是明清时期迁入的。据溪塔村的蓝氏祠堂(1997年落成)记载,该村的蓝氏后裔现已居住十八代,是明朝年间从今寿宁县托溪迁入的;竹洲山畲族居民的族谱记载,该村的钟姓是清乾隆年间迁入的,蓝姓为清嘉庆年间迁入的,而雷姓则是清道光年间迁入的。由于历史原因,畲族村主要分布在山区,少数分

表 3-1 1990 年穆云乡畚族村基本情况 单位:人、亩、%

村委会	总人口	畚族人口	畚族比例	耕地面积	人均	山场面积	人均
虎 头	680	559	82.21	597	0.88	2189	3.22
科 后	525	517	98.48	522	0.99	2004	3.82
竹洲山	265	261	98.49	230	0.87	500	1.89
燕 坑	592	578	97.64	502	0.85	2451	4.14
中 沃	504	475	94.25	569	1.13	1224	2.43
梨 田	406	394	72.56	354	0.87	2388	5.88
玉 楼	555	549	98.92	540	0.97	2945	5.31
岭 坑	543	391	71.01	526	0.97	3087	5.69
南 山	763	562	73.66	397	0.52	3726	4.88
高 岭	399	396	99.25	478	1.20	3657	9.17
溪 塔	494	452	91.50	468	0.95	3189	6.46
洋 坪	641	620	96.72	699	1.09	1469	2.29
燕 科	644	613	95.19	763	1.18	2882	4.48
总 计	7011	6367	90.81	6627	0.95	31,711	4.52

资料来源:福安市统计局 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资料。

布在山脚和低山丘陵,表 3-1 显示,畚族村的人均耕地面积仅在 0.52 亩~1.2 亩之间,而人均山场面积则是其人均耕地面积的 2 至 8 倍,山地特征十分明显。1994 年以后,随着“造福工程”的实施,部分山区畚族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1995 年~1997 年,穆云畚族乡把 104 户、520 人从生存条件恶劣的山区搬迁到交通便利、经济环境较好的地方,其中半数以上是畚族居民,此举为畚族社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节 农业经济

穆云畚族乡的经济以农业为主。1996 年,全乡农业产值 6020 万元(当年价),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48.16%,吸纳了 81.77% 的劳动力。对于很少有工业的畚族聚居村来说,农业更是具有特殊的

重要地位。

一、农业耕作技术

(一)生产工具 穆云畲族乡传统的耕作农具主要有:山锄、田锄、田刀、犁、耙、田踏等。50年代后,人民政府先后推广过旋耕船、新式铧犁等耕作机具,但因综合利用性能差等原因先后被淘汰。小型和中型拖拉机因水旱耕作及运输皆宜,曾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广泛用于河谷平洋田耕作,但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农民非常注重耕作的经济效益,由于人均耕地较少,故农户逐渐放弃机械耕作。目前,穆云畲族乡的河谷平洋田多采用畜耕,机耕较少;而山区梯田因面积较小,相当部分的水田仍以人力耕作为主,传统的耕作农具也仍然在广泛使用。与上述情况相似,部分山区仍然以使用打谷梯、谷桶加竹围帘等传统脱粒农具为主,而河谷平原和低丘陵地区则广泛地使用动力脱粒机和人力打谷机。农业排灌、粮食加工等方面已基本上实行了机械化。1996年,全乡农村用电量达89万千瓦小时。

(二)用肥技术 1949年以前,农户基本上都使用农家肥,主要有菜油饼、人畜粪尿、草木灰、绿肥等。50年代开始使用化肥,但农家肥仍然是最重要的肥料。70年代,化肥的使用量急剧增加,80年代中期,化肥的使用量已达到一个较高水平,而草木灰、绿肥的使用量则急剧减少,人畜粪肥亦主要在村落附近的稻田或果树及蔬菜的种植中使用,在农户的用肥结构中已退居到非常次要的地位。1996年,全乡化肥使用量为1274吨,按耕地面积计算平均每亩65.33公斤。在化肥的使用结构中,氮肥510吨,占40.03%;磷肥310吨,占24.33%;钾肥26吨,占2.04%;复合肥428吨,占33.60%。乡农技站根据当地土壤缺磷钾的状况和水稻的需肥特性,向广大农户推广科学配方施肥,基本上保证了农业的平衡施肥。

(三)作物品种和种植技术 50年代初,穆云乡的重要农作物有水稻、番薯、木薯等。水稻基本上只种植单季稻,亩产70斤~400斤不等。50年代后开始大面积推广双季稻种植,其种植方式也由间作稻改为连作稻,高秆品种改为矮秆品种,稀植改为密植,双季稻的种植范围逐渐由河谷平洋田向低丘陵地区的畚族村扩展。70年代“以粮为纲”时期,全乡的水田基本上都种植了双季稻。80年代,杂交水稻在单季稻和连作晚稻的种植中推广,使水稻的单产和总产都达到了较高水平。90年代,杂交水稻的品种主要有威优63、威优64、汕优63和白优63等,亩产可达800斤~1000斤。在畚族村,番薯仍然是仅次于水稻的粮食作物,其品种也经过多次引进和改良,目前种植的品种主要有出粉率较高的颜粉一号,产量较高的潮薯一号、瑞薯一号,以及抗瘟薯种华北48、广薯16等优良品种,由于品种的更新和农户种植技术的提高,番薯的平均亩产已由50年代初的150公斤提高到目前的300公斤左右。

二、农业经济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穆云畚族乡的农业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6年,全乡农业总产值6020万元(当年价,下同),其中种植业(包括食用菌栽培,茶叶和水果)产值3564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59.21%;畜牧业产值1649万元,占27.39%;林业产值418万元,占6.94%;渔业产值389万元,占6.46%。与1975年相比,种植业在农业总产值的比例大为降低,畜牧业产值的比重增加了17.93个百分点。农业的多种经营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并初步形成了粮食、茶叶、水果、蔬菜和畜牧业等为主的支柱产业。

(一)种植业 种植业在穆云畚族乡的农业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土地开发力度的加大及复种指数的提高,全乡的农作物种植面积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了较大幅度的增

加,1996年,全乡的农作物播种面积49,312亩,比1975年的40,636亩增长了21.35%,与其它地区农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1. 粮食生产。1996年,全乡的粮食种植面积37,722亩,占当年农作物播种面积的76.50%。其粮食种植结构为:水稻种植面积21900亩,占粮食种植面积的58.06%;番薯6000亩,占15.91%;马铃薯4000亩,占10.60%;小麦3400亩,占9.01%;大豆1800亩,占4.77%;杂粮等合计种植622亩,占1.65%。其中稻谷总产8013吨,占粮食总产的74.53%,为最重要的粮食品种。与“以粮为纲”时期的1975年相比,粮食种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降低了11.13个百分点,但由于同期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增加,粮食的种植面积仍然比1975年增加了2115亩,增幅为5.94%。1996年,穆云畚族乡粮食的平均亩产为285公斤,总产10,752吨,分别比1975年增长了38.35%和46.56%,人均产粮433公斤,有效地解决了全乡的粮食问题。

2. 经济作物。种植的种类较少,且属于农户的零星种植。种植面积较多且列入统计的仅有花生、油菜籽、芝麻等油料作物,以及糖料蔗、果蔗和席草。1996年,全乡经济作物种植面积1790亩,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3.63%,在种植业结构中居相当次要的地位。1996年,主要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及产量为:花生500亩,总产65吨;油菜籽300亩,总产24吨;芝麻110亩,总产4吨;糖料蔗200亩,总产800吨;果蔗500亩,总产1750吨;席草180亩,总产40吨。席草的种植主要是满足农户编织草席出售,其它经济作物的种植基本上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

3. 其它农作物。主要是蔬菜和绿肥的种植。1996年,种植面积9800亩,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19.87%。其中,蔬菜的种植在种植业结构中具有比较重要的地位。80年代中期以来,穆云畚族乡人民政府为了充分发挥当地冬季温暖的气候优势,专门聘请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向农民传授种植反季节蔬菜的技术,为部分山

区、半山区的脱贫致富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96年,全乡的蔬菜种植面积达9000亩,为1984年的2.26倍,产量达5850吨。蔬菜的种植已成为部分畲族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4. 茶叶和水果。穆云畲族乡的茶叶生产历史悠久,每个自然村都种植茶树,尤其是畲族村,茶叶生产长期是其主要的收入来源。1952年以前,畲族村与当地社区的其它自然村一样,均是在山区的梯田栽培“福安菜茶”(又名“坦洋茶”),田园内以种植番薯为主,沿梯田边栽茶树为辅。这种老式的篱笆茶每亩不到300株茶树,且管理粗放,仅农历八月至十月中耕除草一次,常年不施肥,故茶叶的产量很低。1958年后,推广新式茶园的栽培与管理,提倡条栽和密植,出现了专业茶场,初步形成了专业化管理。推广的技术主要有:栽茶时下基肥,三春下追肥;在茶树的幼龄期修剪、培养树冠,留叶采摘,每春茶梢摘一芽二三叶;以草皮或叠岩护坡,防止水土流失。新式茶园每亩可种植千余株茶树,亩产可达50公斤~100公斤。70年代,由于强调“以粮为纲”,茶叶生产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后,茶叶从二类物资改为三类物资,由统购统销改为自产自销,其购销价格完全放开,从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些村庄相继办起了茶叶加工厂,刺激了茶叶生产的发展,茶树的种植区域也由山区扩展到河谷平原。80年代,茶叶的新品种“福安大白茶”、福云品系茶等推广很快,农户也主要是通过引进新品种和提高采摘技术来提高茶叶的产量和质量。畲族聚居的高岭村为“福安大白茶”的主要产地,该村5年生的茶树平均亩产鲜叶261.78公斤,制成的白毫银针品质优异,芽壮毫显;制成功夫红茶则条壮实,白毫多,色泽油润,香、味浓醇,为全国茶树品种审定委员会认定的国家良种茶之一。1996年,全乡的茶树种植面积8376亩,总产610吨,分别是1975年的1.96倍和9倍。

穆云畲族乡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十分有利于果树的生长。

全乡共有果树种类 40 多种,种植面积较多和产量较大的果树主要有水蜜桃、芙蓉李、枇杷、柑橘、无核柿、杨梅等,其中尤以穆阳水蜜桃最负盛誉。穆阳水蜜桃以果味清香、果大汁多、肉厚皮薄、营养丰富等独特的品质闻名,1995 年开始销往香港及东南亚等地,属高档水果,在国内外市场均很受欢迎,每年都供不应求,目前全乡每年的水蜜桃生产可创产值 500 万元以上。种桃也是该乡溪塔、虎头等畲族聚居村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1996 年,全乡共有果树种植面积 4832 亩,水果总产 1533 吨,分别比 1975 年增长了 7 倍和 22 倍。主要水果的种植面积和产量为:桃 1963 亩,总产 482 吨;芙蓉李 577 亩,总产 160 吨;枇杷 434 亩,总产 146 吨;柑橘 399 亩,总产 150 吨;无核柿 430 亩,总产 218 吨;杨梅 237 亩,总产 92 吨。

5. 食用菌栽培。主要是蘑菇和香菇栽培。蘑菇的栽培始于 70 年代,80 年代后有所发展。主要是在冬季空闲的农田或村中的空地搭棚,用牲畜粪便和垫猪栏牛栏的稻草经堆积腐烂后作营养基栽培。1996 年,全乡的蘑菇产量为 100 吨。香菇主要采取 1987 年后推广的袋料栽培方式,90 年代初,穆云畲族乡人民政府多次聘请福建省农科院的专家和寿宁县“花菇大王”给畲、汉族农民传授香菇栽培技术,使香菇生产发展较快。1995 年,全乡栽培香菇 30 万筒,1996 年底即增加到 100 万筒,产量达 80 吨。食用菌栽培也已成为部分畲族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二)养殖业 包括畜牧业和淡水养殖业。1996 年,全乡畜牧业和渔业总产值 2039 万元(当年价),占农业总产值的 33.87%。在养殖业中,最重要的是养猪业,全乡的农民基本上家家养猪,养猪也一直是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90 年代以来,穆云畲族乡居民的养猪业有了很大的进步,普遍购买从上海运来的猪苗,而不再饲养本地猪,使其生产的肉猪在质量上有了很大的提高。1996 年,全乡共出栏肉猪 1 万头,户均近 2 头。家禽的饲养亦很普遍,

但仍属于零星饲养,一般家庭都饲养几只鸡鸭,尚未出现规模化的专业户,1996年末,全乡家禽存栏5万只,户均仅8.25只。在部分山区,其中包括一些畲族聚居村,也利用山区的草场等自然资源发展养羊业,其中以温岩、里楼、占溪和洋坪4村的居民养羊的数量较多。1996年末,全乡存栏山羊1500只。

淡水养殖业以嘯溪、下逢溪沿岸的村庄为主。近几年来,嘯溪沿岸的虎头、溪塔等畲族聚居村,开始发展淡水鳗、毛蟹、美国蛙等具有很高经济价值的淡水养殖业,并显示了良好的发展前景。

三、典型畲族村

穆云畲族乡的畲族聚居村经济都是以农业为主。在目前粮食问题已经解决的情况下,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基本上取决于农业多种经营的发展水平。从我们实地调查的情况看,经济状况较好的也都是那些能够根据本村自然条件发展高产优质农业的畲族村。

(一)虎头村 该村是穆阳水蜜桃的主产地,有悠久的种植历史,村中家家户户都种水蜜桃。1997年,全村共有水蜜桃果园500多亩,总产400多吨,收入290万元,仅此一项就使全村(716人)人均增加收入约3500元。村民缪树仔是虎头村种植水蜜桃面积最多的专业户,全家共有8亩果园,1997年因降雨量大,使桃树的坐果受到影响,收入约4万多元,若是正常年景(如1996年),可收入6万多元;村民吴木兰家种了3.5亩水蜜桃,年收入约3万多元,扣除化肥、农药等费用,纯收入可达2.5万元。该村种桃最少的几户居民,每年的卖桃收入也有3000多元。该村还有一些农户在半山区种植反季节蔬菜,收入也颇为可观。水蜜桃的生产使虎头村成为全乡最富裕的畲族村,全村96%的农户都达到了小康生活标准。穆阳水蜜桃是很有特色的优质品种,产区非常狭小,1997年,在水果价格普遍大幅下跌的情况下,其市场价格仍然坚挺,当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元;茶叶收入约 1000 元;种水稻收入约 2000 元。全家合计全年纯收入约 11,000 元,在全村属中上水平。

上述三个村的情况表明了畲族社区经济发展对土地和农业的依赖程度。耕地条件和自然环境较好的虎头村,充分利用本村有利于发展穆阳水蜜桃的特有优势,通过发展水蜜桃生产步入了全乡最富裕的行列;耕作状况一般的溪塔村则通过精耕细作,甚至在溪边的鹅卵石滩地都精心地种上了葡萄,在小溪上空搭起葡萄架,充分利用资源发展农业多种经营,使全村绝大多数居民生活进入了小康水平;而洋坪村的居民大多由山区搬迁而来,尽管离穆阳镇较近,但村舍周围的耕地都是其它村的,本村居民的土地仍然在山上,不仅距离较远,耕作条件也比较差,故众多洋坪村的居民外出打工也有其合理性。

第三节 乡镇企业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地理特点,穆云畲族乡的居民长期以来均以农为本,仅有一些规模很小的林、茶场和农村“四匠”(竹、木、铁、泥)组成的简单加工业和建筑业。80 年代以后,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穆云的乡镇企业才逐渐发展起来(表 3-2),企业数量由 1984 年的 2 家增加到 1990 年的 119 家。进入 90 年代,穆云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其中以个体及联户办企业和村办企业的增长尤为迅速。1996 年,全乡的乡镇企业产值达 8166 万元,分别比 1984 年和 1990 年增长了 101 倍和 6.6 倍。

穆云乡镇企业的发展状况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乡镇企业的发展比较注重立足于本地资源,发挥优势,积极开发本地特产,发展多层次的加工增值。穆云是茶叶的重要

表 3-2 穆云乡镇企业发展状况

项 目	1984 年	1990 年	1996 年
乡镇企业总收入(万元)	76	1017	7758
乡镇企业总产值(万元)	80	1071	8166
企业数量(个)	2	119	226
从业人员(人)	- -	641	1263
其中:乡办企业数(个)	2	11	15
从业人员(人)	- -	296	246
乡办工业总收入(万元)	76	327	1856
乡办工业产值(万元)	80	344	1954

资料来源:穆云畲族乡企业管理站。

产区之一,茶叶中的优良品种“福安大白茶”即产自该乡的高岭村,利用这一特有资源发展制茶业,所产的精制茉莉花茶畅销国内外市场,亦使茶叶加工成为其乡镇企业的产业支柱之一。1996 年,全乡的茶叶精制厂合计实现产值 2562 万元,占全部乡镇企业总产值的 31.37%。利用本地资源发展起来的企业还有花菇加工厂、水蜜桃包装厂、竹笋加工厂、丝面加工厂等等。

第二,乡镇企业的行业分布以工业为主,其它各业的规模较小。1996 年,乡镇工业实现产值 7390 万元,占全部乡镇企业总产值的 90.50%;农业企业实现产值 265 万元,占 3.24%;建筑业产值 230 万元,占 2.82%;商业饮食业产值 148 万元,占 1.81%;交通运输业产值 133 万元,占 1.63%。第三产业的发展明显不足。

第三,在乡镇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个体和联户办企业后来居上,并且成为乡镇企业发展的主要力量。以茶叶加工业为例:1984 年,全乡仅有一家乡办的茶叶加工厂,而到 1996 年,全乡的茶叶加工厂已增加到 29 家,其中个体和联户办茶叶加工厂 21 家,实现产值 2005 万元,分别占全部茶叶加工企业数量和企业产值的 72.41% 和 78.26%(表 3-3)。实际上,在乡、村办的企业中,也有

相当部分是私人承包或是私人开办、挂乡村集体牌子的企业,因此,个体私营企业比实际统计的数量要多许多。

表 3-3 1996 年穆云畚族乡茶叶加工业所有制构成

所有制类型	企业数量	产量(吨)	产值(万元)
乡办	1	148	91
村办	7	798	466
联户	17	3119	1657
个体	4	530	348
总计	29	4595	2562

资料来源:穆云畚族乡企业管理站。

第四,外向型经济已开始起步,并且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如穆云畚族乡与港商合资创办的闽东福良机电有限公司,引进了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办法,通过强化企业的全面质量管理,产品不仅打入了国际市场,同时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该公司 1996 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达 48,648.21 元,人均创利润 6052.63 元,成为全乡经济效益最好的企业之一。该公司的安全生产、能耗和物耗、职工教育、产品质量等项管理指标均达到地区级先进水平,1996 年被宁德地区企业局授予“地区先进企业”称号,并成为福安市 20 家重点企业之一。

第五,乡镇企业在引进资金发挥本地资源优势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穆云畚族乡的石材资源十分丰富,花岗岩的石质优良,色彩斑斓,是加工建筑装饰材料的极好原料,但由于缺乏资金,难以进行合理的规划与有效开发,长期都是由个体私营的小石材厂自行开采加工,不仅容易造成矿体的破坏,还造成了一定的环境污染。为治理石材加工行业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合理有效地开发利用石材资源,尤其是合理开发新发现的火山喷发流纹岩资源,并且把石材加工业发展成为本地的支柱产业,穆云畚族乡人民政府多次组织外商来本地考察,同时也多次组织人员到外地招商引资,取

得了明显的效果。目前已吸引了 2000 万元的外商协议投资,其中有 300 万元资金已经到位,主要用于火山喷发流纹岩矿体的勘察和产品的初加工检测,经过勘察、检测和论证,表明穆云乡蕴藏的火山喷发流纹岩资源具有极高的开发价值,有望吸引更多的外资进行开发和加工生产。此外,穆云乡还引进浙江台州客商投资 600 万元,联合开发占溪水电站,预计 1999 年 4 月可建成投产,届时将结束穆云畲族乡无水电站的历史。

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穆云畲族乡的乡镇企业已初具规模,1996 年,企业的数量已达 226 家,主要产品包括电机、铸钢、机制砖、玩具、竹木工艺品、食品、茶叶等几大类,显示了良好的发展前景。但是,穆云乡镇企业的发展也存在着明显不足,主要表现在:

1. 企业的规模小。除茶叶加工外,尚未形成有一定规模的支柱性产业,多数企业都是些分散在各村的零星小加工业,难以形成产业规模。

2. 除个别企业外,绝大多数企业的技术含量低,难以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

3. 由于畲族村主要分布在山区、半山区,长期以来,绝大多数畲族村均无工业。

1995 年以后,在福建省和福安市的统一部署下,穆云畲族乡加大了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先后修建和开通了福穆公路、穆占公路、留洋公路、贵里公路、玉林公路和龟凤公路等多条公路,1997 年,有 30 个行政村实现了通车,占全乡行政村总数的 91%。基础设施的改善为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改变畲族村无工业的状况,乡政府在溪塔村创办了民族工业小区,两年来先后引进了石板材加工、木制品加工、铸钢、橡胶回收等 6 家企业,以此来促进畲族村工业的发展。

第四节 社会与文化

一、居民生活

1996年,穆云畚族乡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780元,在福安市的全部乡镇中位居第16位,比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低452元。

(一)家庭财产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穆云畚族乡经济发展较快,目前已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各种现代的物质生活用品逐渐进入农村普通居民的家庭。农民家庭在家具摆设等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的木箱、条凳、矮凳等旧式家具逐渐被大衣柜、沙发、写字台、组合柜等新式家具所取代。1996年,全乡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大衣柜90个,沙发88个,写字台116张。随着农村用电的普及(1996年已实现了村村通电),各种家用电器也迅速进入农民家庭。根据我们对畚族聚居的洋坪村的调查,1997年,全村100%的居民家庭拥有电风扇和电饭锅,98%的家庭拥有电视机,近几年结婚的年轻人家庭通常都有洗衣机。此外,作为农村主要代步工具的自行车也十分普及,100%的家庭都拥有自行车,有的家庭甚至有2至3辆,全村还有8户居民拥有摩托车,一户居民拥有一种在当地称作“三叉车”的三轮农用运输车。

(二)衣饰 目前,除了部分老年妇女外,穆云畚族乡的畚族居民平时已基本上不穿传统的民族服装,在穿着打扮方面与当地的汉族居民基本相同。每逢传统节日,如“三月三”民族歌会等,亦有些畚族群众会穿上传统民族服装,但更多的是为了展示和表演,且只有极少数人有自己的传统民族服装。福建省的服装业比较发达,一般服装的价格也很便宜,故居民们买成衣的居多,穿着普遍较好。年轻人多穿牛仔裤、夹克衫、运动服等流行服装,十分时髦。

随着经济的发展,穆云畚族乡有相当部分居民的饮用水为自

来水,亦有的饮用压力井水,还有部分山区居民饮用山泉水。畲族村在70年代就开始进行全面的水改工作,主要是打井、安装简易水塔,以及通过架设水管把泉水引入家中。经检测,1996年,全乡有80%的居民饮用的是卫生合格的水。

二、教 育

穆云畲族乡的教育体系比较完善,从学前教育到中等教育基本齐全。但是,部分畲族村受经济条件和自然条件的制约,教学设施还相当简陋,在学校的分布上也不能满足畲族村的需要,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

(一)学前教育 1996年,全乡的33个行政村已有29个幼儿教学点,接受学前教育的儿童达643人,占学前适龄儿童的45.93%。但由于畲族村大多分布在山区或半山区,畲族居民的居住也比较分散,加之师资力量不足,故部分畲族村的学前教育还比较落后,有些畲族自然村还谈不上开展学前教育。

(二)小学教育 至1997年9月,全乡共有64所小学,其中有21所完全小学,43所初小教学点,小学生3003名,适龄儿童入学率为99.48%。同期全乡共有少数民族学龄儿童1160人,已入学1156人,入学率达99.65%,已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1997年,全乡共有小学教师251名,其中的132人为公办教师,3名民办教师,其余的116人为民办代课教师,小学师资力量明显不足。

由于多数畲族村都分布在山区,且自然村比较分散,有些自然村的人口很少,难以集中办学,因此,畲族村小学的单人校(仅有1名教师的学校)较多。全乡的64所小学中,单人校多达31所,而且在单人校中任教的多为民办代课教师。由于一些畲族村的条件比较艰苦,师资力量薄弱,对外交流难度较大,故民族小学(教学点)的教学质量普遍较差。此外,不少畲族村小学的校舍非常简陋,缺课桌凳的问题也比较严重。90年代以来,穆云畲族乡政府

加大了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仅 1996 年全乡就新建校舍 500 平方米,扩建校舍 200 平方米,修缮校舍 150 平方米,添置课桌椅 120 套,购置图书 3000 册,使一些民族小学的办学条件有了明显改善。1997 年,全乡 35 所民族小学的校舍总面积达 5181 平方米,平均每个民族小学的学生拥有校舍面积增加到 4.48 平方米。教学条件的改善,为畲族村普及 9 年制义务教育创造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三)中学教育 穆云畲族乡的中学教育比较薄弱,还远远不能满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全乡仅有一所初级中学,即穆阳开发区中学。该校建于 1992 年,并于当年开始招生。此前,本乡的小学生毕业后,只有少数学生能够到福安市中学、闽东地区民族中学和康厝初级中学继续上学,大多数小学毕业生因失去升中学的机会而回家参加劳动。由于到市区或外乡上中学路途较远,学生多为住读,花费相对也较大,使一些农村学生的家庭难以承受。这种状况使全乡小学升初中的升学率长期偏低,严重地影响了全乡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

1996 年,乡财政投入教育基金 70 万元,并发动社会集资 14 万元,改建和扩建了穆阳开发区中学,同时,福安市民族职业中学特地为民族地区培养的师资力量也充实了穆云畲族乡中学教育的师资队伍,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全乡中学的办学条件。1997 年,穆阳开发区中学已有教职员工 59 人,其中专职教师 52 人,初中在校生达 1238 人,小学升初中的升学率提高到 76%。针对一些畲族村上中学难的状况,1996 年,福安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市教育局投资 8 万元,在畲族聚居的虎头村创办民族初中班。至 1997 年 11 月,民族初中班的一幢三层 12 间的教学楼已建成一半,该工程完工后有望解决邻近十余个畲族行政村约 2600 多户居民子女的升学难问题。

(四)成人教育 穆云畲族乡的成人教育已基本上形成了乡

村网络。乡教育管理委员会专设成人教育干事一名,负责全乡的成人教育工作。目前,该乡设有1所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共有专职教师3人,此外,每个行政村都有乡文化技术学校的分校,一般都由村小学教师担任分校的教师。村文化技术学校教师定期到乡文化技术学校学习或领取资料,配合乡干部一起向农民进行科技宣传,推广普及实用技术及开展扫盲工作。据第四次人口普查的统计,1990年,全乡的文盲率为18.8%,其中畲族人口的文盲率高达36.9%,90年代经过各村文化技术学校多次开展扫盲活动,1997年,全乡的青壮年文盲率已降至10%。

成人教育的最重要工作是开展科技普及。仅1997年1月至11月,乡文化技术学校就举办了24期农业技术培训班,培训的内容包括水稻栽培技术,水蜜桃、晚熟荔枝和芙蓉李等名优水果的栽培与管理,花菇栽培技术等,参加培训的农民达1606人。通过技术培训,全乡建立了10个科技示范村,培养了1000多户科技示范户。此外,乡妇联还举办了多期保姆培训班,并把经过培训的劳动力组织起来,向福州、石狮、晋江等地输出劳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三、医疗卫生

1984年穆云畲族乡成立之前,与现今的穆阳镇合为一体称穆阳人民公社。穆云畲族乡成立后,乡政府所在地仍在穆阳镇,与穆阳镇政府仅一墙之隔。此外,康厝畲族乡政府所在地与穆阳镇也是隔河相望,且有桥梁相通。因此穆阳镇实际上是两乡一镇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商贸活动中心。但是按照传统的管理体制,穆云畲族乡也设置了一个乡卫生院,称穆阳卫生院。这样,在穆阳镇这块不大的地方就有福安市民族医院、穆阳卫生院和康厝卫生院3所市、乡级的医疗卫生机构。

穆阳卫生院为综合性卫生院,现有一座两层共486平方米的

门诊楼,此外在桂林村和穆阳镇还开设了 6 个门诊部。1997 年,卫生院共有职工 33 人,其中中级职称 4 人,初级职称 21 人。该院主要收治常见病,业务主要由 6 个门诊部承担,年门诊量约 5 万人次。同时,卫生院还承担着全乡的妇幼保健、卫生防疫、计划生育等卫生行政管理工作。1996 年,全乡农村计划生育管理员的上岗率达 100%,育龄妇女的计划生育率为 80%,长效节育率达 92.3%,人口出生率控制在 11.3‰。

与同在穆阳镇的市民族医院相比,穆阳卫生院的医疗设施和技术力量显然都相去甚远。民族医院设有内科、外科、儿科、妇科、传染科,拥有住院部和 80 张病床,医疗设备也比较好。而穆阳卫生院的医疗设备只有体温计、听诊器、血压计老三件,没有任何大型医疗设备,不具备手术条件,也没有住院处和病床,卫生院内没有明确的专业分科。乡财政每年仅给卫生院拨款 8 万元,而该院目前每月的工资支出即达 3 万元(其中包括 14 名退休职工的月退休金 8500 元),远不能满足需要,不足部分只能靠门诊业务自行创收,根本无力购置新型医疗设备,致使很多医疗业务都无法开展,较复杂的病例和手术都必须转院治疗,这种状况反过来又严重影响了卫生院的业务收入。另一方面,卫生院的不景气也影响了医务人员的稳定性,不少业务人员流向民族医院,加剧了卫生院的不景气状况。不过,对于穆云畲族乡的居民来说,到穆阳卫生院或到民族医院就医没有任何区别,医院之间的竞争对需要就医的患者来说绝对是一件好事。

除了乡卫生院外,穆云畲族乡有 25 个行政村设有卫生所(医疗站),共有 28 名卫生员。乡卫生院和行政村卫生所即构成了全乡的医疗卫生网络。

四、文化活动

(一)组织与设施 1984 年 10 月穆云畲族乡成立后即设立了

乡文化站,负责组织本乡节日的娱乐活动及党的政策和科技宣传活动,为全乡农民开设报刊阅览室。乡文化站还拥有一支电影放映队,80年代末开始实行承包,自负盈亏。因多数畲族村比较偏远,村民居住相对分散,所以放映队也很少光顾畲族村。进入90年代后,电视机的普及已使电影放映队显得很不景气。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穆云畲族乡的文化娱乐设施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1995年,全乡各村之间的广播线路铺设竣工,从而实现了村村通广播;1997年,全乡的电视信号覆盖率达到100%,农村居民家庭的电视机普及率已达80%,有一半的行政村开通了有线电视。电视机的普及极大地丰富了全乡居民的文化生活,一些农村居民还添置了卡拉OK、VCD等娱乐设备,在家里就可以自娱自乐。

(二)活动与影响 穆云畲族乡文化活动的群众基础较好,不少村庄还有村民自发组织的群众性文艺团体。这些团体一般无编制,人员也不固定。每逢“三月三”和“分龙节”等民族传统节日,穆云乡都组织歌会、文艺演出或体育比赛。“三月三”歌会的地点每年不固定,而畲族“分龙节”则固定在牛池岗举行,演出的文艺节目和歌曲内容多与现行党的政策和现实生活有关,涉及到计划生育、科学种田许多方面,乡土气息浓厚,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近几年来,穆云畲族乡看书读报的农民逐渐增多。在穆阳的集镇街道上,被称为“黄金屋”的书店和出租书店已应运而生。乡文化站的报刊阅览室常常读者云集,门庭若市。为满足全乡居民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乡政府计划在桂林村兴建一座穆云文化中心楼,以增加文化娱乐场所和设施。不少农民家庭的藏书也在增加,我们在一户农家的书橱里看到,除中外文学名著外,还有《农民文摘》、《中国果树》、《西瓜栽培》、《蔬菜栽培》等科技书籍和刊物,表明不少农民已经在自觉地提高科技知识水平,这是穆云畲族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动力。

第四章 凤洋村调查

凤洋村又名“凤翔村”，位于康厝畲族乡东北部，海拔 225 米，距乡政府驻地约 9 公里，因村庄位于凤翔山而得名。行政村辖凤洋、占阳、太阳山、半岭、牛石板和大枝林六个自然村，面积东至大丘山，西至铁镐山，南至水尾山，北至黄楼山、铁叠垄。主村凤洋村，由上村、下村和里村组成，村落坐北朝南，房屋沿山势叠建，为典型的山区农村。凤洋村是中共福安县党组织早期活动的地方，早在 1929 年 9 月就建立了党支部，是福安县第一个建立党支部的畲族村。凤洋村又是福安畲族文化色彩最浓厚的畲族村之一，被称为“畲歌艺术之乡”，不仅保留有 1955 年创办的福安县第一个畲族村文化站，而且也是福安县(市)举办大型畲族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1997 年 3 月在该村举办的“三月三”民俗节，各地来此参加活动的群众多达 1.5 万人，场面颇为壮观。50 年代开展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凤洋亦是当时的调查点之一。

第一节 基本情况

一、历史和沿革

凤洋村主姓钟，为今坂中乡大林村钟姓的一支，于清康熙年间由芹菜洋迁入。该地方原为李姓和彭姓人家的旧址，钟氏三兄弟迁入后遂逐渐形成村落，至今已有三百二十多年。钟氏三兄弟为

大林村钟姓的第13代,迁入凤洋后至今已有38代。

清光绪十年(1884年),凤洋村属用儒乡钦德里十六都,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属穆阳镇凤曹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6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确定“畚族”族称,1957年,凤洋村改为凤洋畚族乡,属穆阳区。人民公社化时期初为凤洋大队,1961年~1965年为凤洋公社,属穆阳区;后改为凤洋大队,属康厝人民公社。今属康厝畚族乡。

二、民族及人口

凤洋村是福安市畚族人口最多的行政村之一。1990年,行政村总人口1118人,其中畚族1035人,占92.58%。1995年,全村共有245户、1190人,其中少数民族239户,占全村总户数的97.55%,汉族仅有6户,占2.45%。少数民族户中除畚族外,还有几户回族。1996年,全村则为235户、1156人,分别比1995年减少了10户、34人,主要是因实施“造福工程”,这些人口搬迁到其它地方所致。凤洋主村共有185户近900人,占行政村总户数的78.72%,是福安市畚族人口最多的自然村。

根据康厝乡经管站提供的报表数据,1996年全村劳动力总数351人,其中从事家庭经营者300人,其余为外出劳动力;在从事家庭经营的劳动力中,从事第一产业(农业)者280人,占全村劳动力总数的79.77%,从事第二、三产业者20人,占5.70%;而在外出的劳动力中,长年外出的劳动力20人。

三、土地资源和物产

凤洋村委会所辖的自然村共有耕地1249亩,以水田居多,山场面积5501亩,人均分别为1.08亩和4.76亩。主村有耕地915亩,其中水田865亩,占94.54%。大多数水田均能灌溉,其中水尾坝水利工程为本世纪40年代以前修建,水渠长约200米,有效

灌溉面积 101 亩。因地处山区,故耕地小而分散:大块的水田不过 2 分,小块的仅桌面大小;耕作地点近的就在村前,远的距离 4 公里,而且 40% 的耕地均处在这么远的位置。

农业物产主要有稻谷、小麦、大麦、番薯、马铃薯、葱、姜、蒜、茶叶、芙蓉李、桃、枇杷、柿等,其中尤以“三辣”(葱、姜、蒜)最为著名。林业资源主要有松、杉、樟、桐、油茶等用材和经济林木种类,目前开发利用的程度还很低。

第二节 农业生产

一、耕作技术

(一)生产工具 由于土地小而分散,凤洋村的农业生产现仍以手工劳动为主:80% 的水田靠手工锄田完成,20% 的水田靠畜耕,旱作农业则完全是手工劳动。故与 50 年代相比,主要的农业生产工具变化不大。传统的犁、耙、山锄、田锄、齿耙、砍刀、镰刀,收割用的谷桶,晒谷用的竹帘,运输用的扁担、箩筐等现今仍然是凤洋畲族农户使用的主要生产工具。全村无一辆拖拉机。与耕种相比,农作物的管理比 50 年代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主要是体现在喷雾器及农业化学药品的广泛使用等方面。

(二)农事安排 根据 50 年代的调查资料,凤洋村种植的粮食主要有水稻、番薯、小麦、芋头和黄豆。水稻只种一季,每年 2 月下半月至 3 月上半月播种、育秧,4 月插秧,5 至 6 月上半月耕除草,8 月水稻扬花,9 月收割。番薯的种植和收获时间与水稻相同。小麦为 10 月上半月种,12 月除草,次年 3 至 4 月扬花,5 月收割。芋头为 4 月种,9 月收。凤洋村 1969 年开始种植双季稻,至 70 年代“以粮为纲”时期,全村 80% 的水田都种植双季稻。双季稻的早稻种植为 2 至 3 月播种、育秧,清明前后至 5 月 1 日前完成早稻插

秧,7月中下旬至8月初收割早稻,立秋前完成晚稻插秧,11月初可收割晚稻。80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户有了自主权,凤洋村由于山高水冷,种双季稻常发生烂秧、遭受寒露风袭击,其产量很低,故双季稻种植面积逐渐减少,近几年只是在山下地势低的水田种了约20亩双季稻,牛石板和半岭两个自然村因地势较低,现仍以种双季稻为主。

目前,凤洋自然村畲族农户以种植单季稻为主,季节的安排与50年代大体相同。但由于采用了良种和科学种田方法,单季稻亩产可达800斤左右,比50年代提高了2至3倍。单季稻的亩产略低于种两季水稻,但收割单季稻后还可种植马铃薯和蔬菜,土地的使用效率也比较高。

(三)种植技术 凤洋村畲族历史上以番薯为主食,番薯的种植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但自60年代后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水稻的种植面积已占粮食播种面积的70%左右,居绝对重要地位。

1. 种子。至50年代仍习惯用片选,即每年收割时,将谷粒长得饱满的稻田作为留种田,在打谷时又挑选落在打谷槌前的饱满谷粒,将其留起来作为下一年的稻种。而今的种子由专门的种子公司提供,均为优良品种,目前的当家品种有汕优63、甘优等。亩产可达800斤左右。番薯的当家品种为霞浦薯,马铃薯主要为科星1号、科星2号,均为优良品种。

2. 耕作方法。(1)犁田耙田。50年代一般是正月初六至十五开始挖稻根,砍田草,犁田和耙田,因大多数田地无法用畜耕,故犁田多为人力锄田,耙田亦然。由于人工锄田费时费力,一般均为一犁一耙。受自然环境的约束,现今的犁田耙田仍与50年代基本相同。(2)育秧。过去一般选择较肥沃的稻田作秧田,将秧田锄耙使土疏松,然后留水1寸深,施以水粪,再耙一次,将秧田踏平即可播撒经冷水浸泡过的稻种。现在的水田育秧需要开成约1.5米宽的行,以加盖农膜。此外还采用旱地育秧。水稻育秧加盖农膜可以

保持温度和湿度,避免气候的影响,使秧苗的长势更好。(3)插秧。50年代每兜约40棵秧苗,将秧苗沾上由草木灰、牛骨灰、肥料盐等混合物插下,株行距0.4至0.53米不等。现今仍是手工插秧,但由于使用了良种,每兜只需七八棵秧苗,行间距比过去密得多。(4)中耕。过去多用手耘田、拔草,很少用耘田耙,一般为插秧后30天第一次中耕,再过20至30天进行第二次中耕、施肥,肥料多为草木灰与人尿粪混合,每亩约6至8担^①。现今还是主要靠手工耘田,但1997年已有30%~40%的水稻用化学除草剂代替了手工耘田。除了靠近村庄的稻田外,多数稻田都使用尿素、碳氨等化学肥料施肥,故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5)收割。仍用镰刀,无明显变化。

3. 肥料。50年代主要使用人尿粪、草木灰、牲畜粪等农家肥,现今除使用农家肥外,主要是使用尿素、碳氨、过磷酸钙、钾肥、复合肥等化学肥料,平均每亩施用的化肥已超过了100斤。近几年来,凤洋村的一些农户已开始使用叶面宝等农作物生长激素,效果不错,但因市场上假冒伪劣植物生长激素太多,很多农户想用但都不敢用。

二、种植业结构

(一)粮食生产结构 90年代以后,凤洋村的粮食播种面积和种植结构均变化不大。1995年,全村的农作物播种面积1660亩,其中粮食种植面积1445亩,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87.05%。粮食平均亩产271.03公斤,总产391.64吨。1996年,粮食生产取得较大丰收,总产达484吨,比上年增长23.58%。

1. 水稻。水稻目前全村最重要的粮食作物,1996年,水稻种植面积990亩,占粮食种植面积的60.89%,平均亩产326.26

^① 参阅《福安畲族志》第94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公斤,总产 323 吨,占全村粮食总产量的 66.74%。在水稻的种植结构中,早稻面积 340 亩,平均亩产 305.88 公斤;晚稻 350 亩,平均亩产 268.57 公斤;单季稻 300 亩,平均亩产 416.67 公斤。单季稻的平均亩产比双季稻高 45.06%。

2. 番薯。历史上曾是畚族农村种植的最重要粮食作物,目前其重要性已经下降。1996 年种植 370 亩,平均亩产 159.46 公斤(按四斤鲜薯折一斤粮食),总产 59 吨,占全村粮食总产的 12.19%。

3. 小麦。历史上也是畚族农民种植的重要粮食作物,因其产量低、耗肥多而种植面积逐渐减少。1996 年种植 110 亩,平均亩产 99 公斤,总产 10.9 吨,占全村粮食总产的 2.25%。

4. 其它粮食作物。主要有马铃薯、大豆、杂粮等。马铃薯主要是在单季稻收割后种植,1996 年,种植 120 亩,总产 137 吨;大豆 30 亩,总产 1.8 吨;杂粮 6 亩,总产 312 公斤。

(二)经济作物 凤洋村农户种植的经济作物较少,并且以满足自身的需求为目的,故商品率较低。主要经济作物有花生、糖蔗、果蔗等,1995 年种植花生 200 亩,总产 2 吨;果蔗 15 亩,总产 55 吨;糖蔗 5 亩,总产 18 吨。

(三)其它作物 主要有蔬菜、紫云英(绿肥)以及食用菌生产。1996 年,全村蔬菜种植面积 104 亩,紫云英 10 亩,蘑菇 3444 万平方米,总产分别为 104 吨、15 吨和 22 吨。凤洋村以种植“三辣”出名,故蔬菜的种植尤其是葱的种植在农户的家庭经营中占有重要地位。凤洋自然村 80% 的农户都在冬闲的田里种小葱,1996 年仅种小葱一项,收入多的农户可达七八千元,甚至上万元,收入少的亦有七八百元,种葱已是农户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蘑菇的种植由于销售价格下滑,1997 年的种植面积大为减少。

(四)茶叶和水果 凤洋村是康厝乡种植茶树最多的畚族村之一,1996 年,全村有茶园面积 300 亩,其中可采摘面积 270 亩,茶

叶总产 24 吨,居康厝乡各村之首。但因近两年茶叶价格下滑,农民也渐疏于管理,造成不少茶园荒废,1997 年只有茶园 122 亩,其中村集体 62 亩,农户 60 亩。水果多属农户房前屋后的零星种植,全村合计有柑橘 18 亩,香蕉 2 亩,枇杷 7 亩,桃 36 亩,其中可采摘面积分别有 10 亩、1 亩、0 亩和 16 亩,产量较大的只有柑橘和桃,年产分别为 5 吨和 1.7 吨。

三、畜牧业

畜牧业主要是肉猪、家禽和耕牛的饲养,其饲养方法仍然采用传统习惯。家禽的饲养还是用稻谷、米糠,每家喂养几只鸡鸭;养猪也还是每户养一二头,把青饲料、番薯藤切碎后混合米糠或粮食经熬煮后喂养。1996 年,全村出栏肉猪 352 头,平均每家 1.5 头,其中自宰自食 70 头,商品率为 80.11%;全年猪肉产量 25 吨,年末存栏肉猪 267 头,其中 120 斤以上 172 头。年末家禽存栏 2624 只,平均每家存栏 11.17 只,其中鸡 1298 只、鸭 1326 只,全年自宰自食 1765 只,商品率为 32.74%;年末家兔存栏 58 只,当年自宰自食 38 只。牛的饲养主要是役用,1996 年年末,全村存栏水牛 23 头,其中劳役耕牛 8 头,繁殖用水牛 11 头,当年生的小牛 4 头。

从总体上看,凤洋村的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已经有了比较好的基础。1996 年上缴国家公粮 6 吨,交售给国家粮食 48 吨,提留集体和农户个人的 27 吨粮食后,村民人均口粮 349 公斤,不仅为国家作出了贡献,也满足了自己对粮食的需求。

第三节 经济结构

畲族历史上是以山地农业为主,凤洋的村民亦然。因凤洋山区耕地少,畲族农民过去需租种七八里外的穆阳镇桂林和苏堤村

地主的土地。^① 50年代~70年代,凤洋村一直以农业为主,而在农业生产中又以粮食种植为主,尤其是70年代“以粮为纲”时期,把搞副业生产也当作“资本主义”加以批判,经济结构更是单一。80年代初,凤洋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压缩了粮食的播种面积,将不适应种双季稻的山区水田改种单季稻,多种经营逐渐得到发展,经济结构才开始发生变化。1996年,凤洋行政村经济总收入417万元,其中农业(包括林牧渔业)收入168万元,占全村经济总收入的40.29%;非农产业收入249万元,占59.71%,非农产业的收入已超过了农业。

一、农业结构

根据康厝畲族乡经管站提供的统计资料,在1996年全村的农业总收入中,种植业收入125万元,占74.41%(其中蘑菇栽培等收入24万元,占农业总收入的14.29%);林业收入13万元,占7.74%;畜牧业收入30万元,占17.85%。从总体上看,相对于地处山区、人均山场面积较多这一基本特征,林业的发展还显得不足,在农业收入结构中的比例太低,但同时也显示了林业的发展还有很大潜力;而种植业依然在农业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其中以粮食和葱的种植尤为重要。

二、非农产业

凤阳村畲族以建筑业方面的能工巧匠众多而著名。现今在福安市颇有影响的康厝建筑公司,最初就是以凤洋村农民为班底组建起来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凤洋村农民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推动了非农产业的发展,使全村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

^① 参阅《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37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变化。

根据康厝畚族乡经管站的统计资料,1996年,行政村非农产业总收入249万元,其中工业收入206万元,占82.73%;建筑业收入3万元,占1.20%;运输业收入12万元,占4.82%;商业、饮食业收入10万元,占4.02%;服务业收入13万元,占5.22%;其它收入5万元,占2.01%。但该统计的非农产业收入结构有很大的误差。根据我们与村干部和农户的访谈,凤洋村其实并无工业,故也就不存在206万元的工业收入,但是剔除这部分不存在的收入后,全村的非农产业总收入估计也不会低于249万元。

实际上,凤洋村非农产业收入应该是以农民的外出务工收入为主。在全村的351名劳动力中,常年外出打工者达200多人,农闲时全村80%的劳动力均外出打工,远远多于康厝乡经管站统计报表上的20人。与其它畚族村不同,凤洋村外出打工的农民大多有泥瓦、木工、石料加工、竹编等方面的一两门技术,主要靠手艺赚钱,这要比无技术者挣的钱多许多。常年外出的打工者主要是从事建筑业,去的地方也比较远,除了本地的福安市区(距离凤洋村40多公里)外,还到本省的福州、厦门,以及福建相邻地区的浙江、上海,远的甚至去广西、四川等省区。有4名凤洋村的农民在广西的柳州市购买了房屋,已有长期安顿下来的打算。

由于有技术,一些常年外出的打工者有的成了工头、老板或建筑公司的经理,也有的取得了建筑业方面的专业技术职称。至1997年,在外地工作的凤洋村籍人中,有高级职称者4人,中级职称2人,初级职称8人,这些有职称者主要从事建筑业,其中有一部分就是从常年外出打工者中产生的。由于一批工头、老板或经理及技术人员的产生,这些人在取得工程承包后也喜欢用本村人,故凤洋村农民外出找工作要比其他畚族村的农民容易得多。按照福安市的行情,无技术的打工者一天可挣20多元,有技术的每天可挣30元~40元,技术人员、工头、老板或经理挣的钱更多。外

出打工实际上已成为凤洋村居民经济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只是难以客观、准确地统计出这方面收入的量罢了。

其它非农产业收入的量虽然不大,但对全村居民的生产生活则有重要影响。

凤洋自然村有 8 家小商店(无饮食业),均为村中居民私人所有,其中两家是 1990 年以后才开办的。小商店主要销售油盐酱醋、烟酒、糖果点心以及一些日用品、鞋袜等小商品,其中有 3 家商店配有冰柜,可储备些肉类和冻鱼,亦方便销售冰棍、冰激凌和乳制品。小商店同时也收购村里生产的零星农副土特产品,如农民采集的零星山货、自己编织的草席等,当收购到一定的数量后再运到其它地方出售。由于福安无农村集市(圩日),若村中无小商店,购买日常用品和出售零星农副土特产品就需要到 9 公里外的穆阳镇,这自然有所不便。

三、居民收入结构

根据康厝畲族乡经管站的统计,1996 年,凤洋行政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为 1531 元,在全乡的 32 个行政村中居第 20 位。这一数据与实地调查的情况基本相符。收入的构成主要为:外出打工收入,粮食收入和种蔬菜(种葱)收入。其中粮食为实物收入,外出打工和出售蔬菜为货币收入,总体上还是一种“种田吃饭、打工挣钱”模式。

第四节 居民生活

50 年代以来,凤洋村居民的生活得到逐步改善,尤其是进入改革开放的 90 年代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凤洋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居民的饮食和衣着质量、居住条件等均发生了很大变化,家庭财产不断增加,文化生活也日趋丰

富。但由于地处山区,经济发展或多或少地受到环境制约,居民的生活水平在福安市仍属偏低,1996年,凤洋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只相当于全乡农民人均纯收入1600元的95.69%,相当于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2232元的68.59%。

一、衣 着

50年~60年代,凤洋村还存在缺衣少被现象。1961年~1965年期间,人民政府向凤洋发放的救济物资有:单被80床、棉被89床、棉衣45件、卫生衣109件、卫生裤4条、棉毛衣33件、单衣裤168件(条)、棉布6尺、布票7931尺、棉花票379斤、棉花130斤。^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凤洋村缺衣少被的问题已得到彻底解决。

与50年代相比,凤洋村畬族居民的衣着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今除了极个别老年妇女还穿传统的民族服饰,保持头发向上梳圈、绕着头的周围束红线的传统习惯外,已很难看到身着传统民族服装的畬族村民。凤洋村居民的衣着一般都有较强的时代感,如70年代也流行黄布军装,80年代后服装的式样开始多样化。现今男女青年衣着讲究式样,都市化特征比较明显:男青年或西装或夹克,多穿皮鞋或旅游鞋;女青年或西装或紧身衣或裙,式样繁多,多穿旅游鞋、皮鞋或高跟鞋。少年儿童则注重色彩鲜艳,基本上与都市的同龄人无异。中老年人的衣着则以实用为主,穿夹克衫、干部服、中山装的都有,看上去式样显得有些陈旧,却很方便生产劳动。

众多的外出打工者对畬族村民服饰的变化起了重要作用,他们把城市居民衣着的审美观带到了偏远山村。由于人多耕地少,加上种田的收入与打工相比相差太远,故外出打工归来的年轻人一般都不愿意干农活,甚至连上山砍柴、挑水之类的活也不愿干

^① 参阅《福安畬族志》第367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其穿着已不适合干这些活),而由于他们外出打工的收入较高,长辈们也没有太多的怨言。这就使得不适应干农活的都市流行服装也能够山村流行开来。

二、饮 食

凤洋村居民历史上是以番薯为主粮,而且缺粮的问题比较严重,遇到灾荒年景只好以野菜充饥。1950年以后,粮食问题虽然逐步得到解决,但某些年份依然有不少农户缺粮。如1956年即有58户178人缺粮,政府为此供应原粮6232.5公斤,折合成品粮4487公斤。1966年,当时的凤洋大队全年粮食总产2969担(148.45吨),在交售给国家783担公粮、公余粮和议价粮,以及留足种子和集体用粮后,人均口粮276公斤,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但粮食生产的基础并不牢固,1968年粮食总产2123担(106.15吨),比1966年减产了28.49%,可供社员分配的口粮只有1189担,比1966年减少了38.99%,亦即社员的人均口粮不会超过168公斤^①,仍然存在缺粮问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凤洋村的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产均稳步提高,从而彻底解决了粮食的短缺问题,1996年,人均口粮已达349公斤,比1968年增加了一倍多。不仅如此,随着粮食种植结构的变化,稻谷产量的增加,村民的主食也发生了根本变化,由过去(70年代末以前)的以番薯米饭为主食变成以大米饭为主食。居民的饮食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从村中小商店这些年配备的冰柜就不难看出,村民们对鱼肉的需求正在扩大,一般的家庭一周或十天都能吃得上一两次鱼肉,收入高的家庭吃鱼肉已是比较平常的事,不再是节日的专有食品。根据1997年11月康厝畲族乡

^① 参阅《福安畲族志》,第351页、第355~358页表格。

人民政府“小康办”提供的资料,凤洋村居民人均年消费动物性食品为 45.8 公斤,达到了福建省制定的该项小康标准。

三、居住条件

根据《福安畚族志》所载,80 年代末,凤洋自然村共有房屋 83 座,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为 1979 年以后新建,除了 2 座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外,其余均为土木结构。从 1990 年~1997 年,全村共有 40 多户新建了住房,其中有 32 户建的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房,有 3 户建的是砖木结构房,仅有 7 户建的还是土(土坯墙)木结构房。建房质量的提高表明农户的经济实力明显增强。由于房屋是随山势叠建,新建的住房很多都是因地制宜,这就摆脱了传统的式样和结构。在北京某大学任教(凤洋村籍)的一位画家在村中建的一幢三层楼房,设计别致,有很强的艺术感,外墙均采用青砖,显得特别典雅;在村中开商店的人家盖的住房,则采用了实用的前店后堂(厨房加饭厅)格局,这样即使是吃饭时也不会耽误卖东西。

不过,全村的大多数房屋还是传统结构。但“四檐厝”的房屋极少,多为两檐木板加左右两侧土坯墙或砖墙,楼层以两层居多。房屋内部的“中庭壁”及前厅、后厅、卧室、灶屋、天井等的布局与其它畚族村的传统住房完全一样。^① 厨房的灶台是福安市在农村统一推广的式样,均有两口大的锅眼,烧火的口和放茅柴的地方设计都很合理,大多数人家的灶台都砌上了白磁砖,看上去干净、整洁。

凤洋村保留有许多老房屋,迁入该村第一代入建的房屋至今仍然保留着,其中一座现在还住有人家,已经传了 38 代。有一座第一代入建的房屋虽然四壁的土坯墙早已倒塌,屋内相隔的木板也全无,但被烟火熏得发黑的杉木房柱、房梁以及屋檐上的木雕虽然历经三百余年的风雨,却依然基本完好,仍然顶着黑瓦挺立在荒

^① 参阅本书综合篇第四章有关内容。

废的宅地上,像是在诉说凤洋村三百余年的沧桑。杉木在这里如此耐用,真是奇迹。

四、婚姻和家庭

50年代,畲族家庭内部重男轻女、包办婚姻和抱童养媳的现象还很普遍,结婚年龄一般为15岁~19岁,忌同姓结婚,亦不与外族通婚,寡妇可以再嫁。^①50年代末,抱童养媳的现象已经根除,但其它习俗依然程度不同地保留着。改革开放以后,凤洋村居民由于生产经营空间的扩展,对外交往的增多,使传统的婚姻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包办婚姻的现象已基本绝迹;早婚的现象极少,绝大多数青年人都是在法定年龄结婚;老年人对年轻人的婚姻一般都持比较开明的态度,已不太忌讳年轻人之间的同姓结婚和与外族通婚。重男轻女的现象虽然还存在,但其程度也有所减轻。

外出打工者对传统婚姻的变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那些常年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他们在开放的社会中形成了许多新观念,包括新的审美观和婚姻观,已不太受传统习俗的约束。有两名年轻人分别娶了四川、广西的女子,婚姻的地域范围也大大扩展。

现今凤洋村居民家庭以两代户和三代户居多。儿子结婚后一般都分家另立门户,无新住房亦与父母同住在原来的房屋,但都单独开火吃饭,经济上独立核算。如果是有几个儿子的家庭,婚后无新住房也都住在原来的地方单立门户,形成一座房屋住三四户人家的现象。女儿长大到结婚年龄一般都出嫁,极少有招女婿入赘的情况。

五、家庭耐用消费品

50年代的风洋村是一个贫困山村,还存在比较严重的缺粮和

^① 参阅《畲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3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缺衣少被问题,住房也大多因年久失修而破烂不堪。故一般的家庭几乎都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只有几张简易床、几只凳子和一只八仙桌。所谓的床多是两只条凳架上一块床板,铺上草垫和草席。50年代,搪瓷制品开始进入凤洋村普通居民的家庭。70年代,已有较多的居民使用塑料制品,极少数人开始有了手表。80年代初,有手表的居民增多,1982年凤洋村通电后,简易式电风扇等家用电器逐渐进入家庭。

进入90年代后,凤洋村终于彻底解决了历史上从未解决的温饱问题,居民手中的钱明显增加,从而扩大了对家庭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使耐用消费品以较快的速度进入普通居民的家庭。根据1997年11月凤洋村委会的介绍,如今全村100%的农户都有了电风扇和高压锅;80%的农户使用上了电饭锅;85%的农户有了电视机,其中彩色电视机十余台;40%的农户有了自行车;缝纫机的家庭普及率也比较高。还有40多户家庭有了煤气灶。

凤洋村居民购买的耐用消费品以实用为主。由于夏季天气热,电风扇是全村普及率最高的家用电器,有的家庭甚至有三四台。由于电费较贵,居民一般情况都不用电饭锅,而因煤气较贵且换气麻烦,煤气灶也很少使用,一般都使用高压锅,主要是因为其热效率高,既省时间也节约柴草。不过从居民家庭拥有的电饭锅和煤气灶的数量看,不难看出村民对提高生活质量的渴望。至于山村目前还不太适用的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全村的拥有量还极少。

电视机的普及则得益于福安市开展的“奔小康达标”活动。由于电视机的普及率是福建省制定的10项“小康达标”指标之一,作为与凤洋村挂钩“帮扶”的福安市民委,1997年7月投资3.6万元在村文化站门前安装了卫星接收天线,使全村都能清楚地收看电视节目。而且根据福安市政府的有关规定,无电视机的农户购买一台电视机可获得100元的补贴,由于购买一台黑白电视机只需

三四百元,所以该规定对促使农户购买电视机有很大的刺激作用,从而使全村的电视机拥有量迅速增加。虽然目前凤洋村大多数居民拥有的还是黑白电视机,但如此高的电视机普及率也足以使全村的文化生活掀开崭新的一页。

六、生活环境

80年代以后,凤洋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来的偏僻、闭塞状况。

(一)交通 凤洋村至山下的省道约有4公里山路,运输长期靠肩挑背驮,交通问题长期制约着全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使居民的生活十分不便。在市、乡、村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1993年完成了从省道上山的3公里路段,1996年修通了最后1公里进村的简易公路,由此凤洋村出现了交通业。1997年,全村已有两辆“三叉车”,每天于本村和穆阳镇之间往返几趟,全程每人2.5元,货物每担2元。村民们外出已经比较方便。

(二)商贸供销 福安无农贸集市,过去凤洋村居民用农产品交换生产及生活必需品都要到穆阳镇。1953年,福安县成立了供销合作总社,1954年,在第四区(穆阳)建立了中心社,并组建了7个货郎担在凤洋等畲族聚居村开展业务。货郎担采取以货换货形式,收购农副产品,供给日杂百货。1960年,在凤洋村设立了代销店。改革开放后,一些村民先后开办了小商店,既增加了自己的收入,也方便了群众购物和销售零星农副产品。尤其是修通简易公路后,村中小商店供应的商品更加丰富,可以满足大多数居民对日常用品的需要。

(三)邮电通讯 1953年~1983年先后开通了有线广播和手摇电话,缓解了山村的闭塞状况。1997年开通了全村第一部程控电话,可以直拨国内外,极大地方便了凤洋村与外界的联系。这部电话安装在村主任家开的小商店柜台,有公用电话性质,按照邮电

部门规定的标准收取长途或市内通话费。还有两三户居民正在申请安装程控电话。邮递与 50 年代相比变化不大,凤洋村设有邮筒,1956 年就设了步班投递点,至 1997 年仍然是隔日步班投递,报纸、信函从康厝到村中最快两天,一般都需要三四天。

(四)供电和用水 1982 年开始通电,结束了凤洋村无电的历史。目前用电户已达 100%,可以基本满足全村居民的生产及生活用电。村里修建了简易的自来水供水设施,使 40%的居民家庭用上了自来水,还有 60%的居民家庭仍然要挑井水饮用。

第五节 社会与文化

一、村庄管理

凤洋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的主要干部每月均从乡政府财政中领取一定数额的补贴,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我国农村的最基层组织。村委会类似于公社化时期的生产大队,其下辖的 11 个村民小组类似于公社化时期的生产队,但如今的村民小组已不能发挥什么作用,远不能与过去作为独立核算单位的生产队相比。虽然 1984 年撤销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但时隔 13 年,村民们还是习惯地不时将自己称为“社员”,将村委会称为“大队”。

村民委员会由村民们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三年。1994 年 6 月选举产生的村委会,在上任之初即制定了村级发展规划(表 4-1),到 1997 年 6 月任期届满,大多数主要指标如人均口粮、人均纯收入以及精神文明建设指标等均已如期完成。但原来规划新建的村小学则因缺乏资金未能建成。这项工程给新上任的村主任带来很大的压力,上任之后就到处奔波寻找资金。至 1997 年 11 月,村

小学新楼的建设仅完成了地基工程。

表 4-1 凤洋村发展规划

项 目	1994 年	1995 年	1996 年	1997 年
工农业总产值(万元)	240	280	310	360
其中:农业总产值(万元)	180	200	220	250
农作物播种面积(亩)	1180	1185	1190	1200
人均口粮(公斤)	270	300	320	340
人均纯收入(元)	950	1100	1500	1800
五好家庭(户)	15	30	60	100
遵纪守法(户)	180	190	220	240
科技示范(户)	10	20	45	65
电视机(台/百户)	10	20	60	90

资料来源:凤洋村委会。

村委会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抓计划生育。凤洋村建有人口教育分校(为乡人口教育学校之分校)、计划生育协会,设有计划生育服务室。村党支部书记担任计划生育协会会长,以表明村委会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视。人口教育分校每月上一次课,内容为计划生育的基本知识、优生优育、人口控制与奔小康的关系等。经过村干部们的努力,全村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100%的育龄夫妇都领了计划生育证,其它的计划生育指标也基本达到100%。计划生育工作由过去的少数人管多数人,变成了如今多数人管少数人的良好局面。1997年,全村有8个生育指标,到11月中旬只生了6个孩子。

二、教 育

民国时期,凤洋村曾办过几年私塾,但至50年代初尚无学校。据1958年凤洋村“畚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参加者介绍:当年全村只有3个人会说普通话,文化程度最高者为一名初中生。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凤洋村居民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至1997年,

全村的成年人基本上都有小学学历,其中初、高中文化程度者 42 人(不含在校生),还出了十几名大学生。目前还有两名 1997 年毕业的大专生因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在村里待业。随着教育的普及和文化水平的提高,现在全村人基本上都会说或者能听懂普通话,从而方便了居民的对外交流,或许这也是凤洋村打工者日趋增加、打工的地域越来越宽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今的凤洋村小学是一所完全小学,从 1986 年起就被定为全县(市)的 15 所重点民族小学之一。全校现有 7 名教师,其中 3 名为民办教师。校长和教导主任都是畚族,其余 5 名教师均为汉族。1996 年,该校五年级毕业生考入初中 21 人,毕业生升学率为 100%,因家庭经济困难无法继续上学者约四五人。1997 年,全校在校生共 122 人,其中一年级 22 人,二年级 22 人,三年级 29 人,四年级 28 人,五年级 21 人。学校还办有幼儿班,入学幼儿 19 人。全村适龄儿童入学率达 100%。目前凤洋村小学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校舍已破旧不堪,教室不足,现在幼儿班还只能借用祠堂上课,教师们都非常希望上级部门和村委会尽快把新学校建起来,使学校真正有个市重点民族小学的模样。

三、医疗卫生

凤洋村历史上长期缺医少药,村民得了疾病主要靠中草药治疗。山区的中草药资源比较丰富,在长期的实践中村民们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不少村民都能自己采草药治疗一些常见病。直到 1964 年凤洋村才有卫生所。70 年代福安县推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农村培养了大批“赤脚医生”,凤洋村卫生所改为凤洋大队合作医疗站。“赤脚医生”均为经过短期医疗培训的当地村民,虽然医疗技术不太高明,但能安心在农村工作,可以为村民治疗一些小病和常见病,配合公社卫生院在本大队开展儿童接种疫苗,进行疾病普查等工作,开展医疗卫生常识的宣传活动,这在很大程度上缓

解了凤洋村居民缺医少药的矛盾,同时也提高了村民的健康水平。

1984 年全县恢复乡、镇建制,大队合作医疗站改为行政村卫生所。村卫生所现在只有一名毕业于厦门某医学专科学校的医生。这名医生拥有行医执照,原为公职人员,1993 年停薪留职来到凤洋村,至今已有四年多。卫生所实行自收自支,医生通过给村民看病开药收费取得报酬,以维持卫生所的正常运转。如果村民患重病,还是需要到康厝卫生院或穆阳镇的医院治疗。

四、文 化

凤洋村是福安县(市)群众文化活动开展得最活跃的畲族村之一,也是福安县(市)举办大型畲族文化活动的重要地点。

(一)村文化站 1955 年成立,是福安第一个畲族村文化站,也是闽东地区最早成立的畲族村文化站。文化站成立之初还兼有文化学习站的功能,除开展文化宣传活动外,还负责扫盲工作。50 年代凤洋村文化站为公办性质,配备 1 名专职干部,其规格与各区文化站相同,主要职责是开展乡村文化宣传娱乐活动,设立报刊阅览、图书阅览,配合政治形势放映幻灯、出黑板报、宣传政策、讲解时事。文化站配有民间乐器,组织演唱畲族歌、畲族戏曲,编写畲族新歌曲等。1965 年后改为民办。80 年代,畲族村文化站受到各级文化部门的重视,凤洋村文化站又改为民办公助,后改为公办,由县(市)文化局直接管辖,站长每月从县(市)文化局领取工资。1997 年改为乡政府代管。

1982 年,文化站有藏书 500 册,订阅报刊 23 种。后因经费不足,订阅的报刊逐年减少。1997 年,虽然文化站阅报架上陈列着《福安报》、《闽东日报》、《福建日报》,期刊有《福建通讯》、《闽东通讯》、《文明建设》、《农村工作通讯》、《支部生活》、《福建民族》、《农家技术应用》等十余种报刊,但文化站已无力订阅这些报刊,大多数期刊都是站长顺手从乡政府拿回来的。

1975年,文化站设立了电影放映队,有2人专职放映8.75毫米的电影。1981年春,县文化馆赠送一台12英寸黑白电视机给村文化站,尽管当时的图像很不清楚,这台小电视机还是给全村的居民带来了许多欢乐。1986年电影队解散。随着拥有电视机的居民家庭不断增多,文化站的黑白电视机也逐渐失去了吸引力。不过,文化站现今依然保持着全村文化活动中心的地位,平时除了提供报刊和书籍外,也常组织猜灯谜、打扑克、下棋等活动;每逢节日,文化站则设法借来设备,为村民布置舞厅、卡拉OK厅,为村民们放映录像,丰富村民的娱乐生活。

(二)业余剧团 1980年,在文化站的支持下,凤洋村的青少年创办了平剧团,参加者多达70多人,年龄最大的21岁,最小的仅12岁,男女各半。1981年改为闽剧团。青少年创办剧团的主要目的是娱乐,节目均为自编自演,农闲时到附近乡村演出,有时也去古田、霞浦、福鼎等外县演出。主要剧目有《慈云走国》、《昆山县令》、《风月亭》等。到外地演出时带有一点营业性质,收取演出费,剧团根据收入的多少,按多劳多得的原则分配给个人。该剧团于1988年解散。

(三)大型文化活动 80年代初,福安县的一些畬族传统文化活动开始在凤洋村举行。1984年正月十一日,县、乡、村联合在凤洋村举行畬族庙会,主要内容有演出戏曲、猜灯谜、对山歌、举行武术比赛等。正月十一是畬族传统走亲戚的日子,从福安县各地和邻近霞浦县赶来参加的畬族同胞近4000人,连续热闹了三天。1989年农历八月十五日举办的团圆节,1992年举办的二月初二畬族会亲节,各地来凤洋村参加活动的畬族同胞均达上万人。福安市政府组织的第三、四届三月初三民俗节也都是在凤洋村举行。尤其是1997年在凤洋村举办的第四届畬族民俗节,各地来参加的畬族同胞达1.5万人,仅新闻记者就有四五十人,宁德地区和福安市政府的领导也参加了这次盛会。节日期间除了传统的戏曲表

演、猜灯谜、对山歌、武术比赛外，还组织了少儿游艺、放电影等活动，福安市茶艺团也赶来作了精彩的表演。凤洋村的居民蒸出香喷喷的黑米饭款待各地的客人。通过一次次地举办畲族文化活动，凤洋村也愈发展示出自己的魅力。

第五章 铁湖村调查

铁湖村位于福安市东南部,由铁湖、满洋、岩角亭、高板4个自然村组成。村委会驻地铁湖自然村,北距福安市区5公里,南离赛岐港23公里,104国道福汾段从村庄西侧穿过,可通达闽东的各县(市)及浙江的温州等地;交溪沿104国道西侧自北向南流经村落,逆水可至福安市区,顺水可抵赛岐港出海,水陆交通均十分方便,是福安市畬族居住环境最好的自然村。1996年,铁湖自然村先后被宁德地区行署和福安市人民政府授予“小康明星村”称号。我们选择铁湖作为调查点是被该称号所吸引。

第一节 基本情况

一、历史和沿革

铁湖村最早是由畬族钟姓人氏于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由梨坑迁址而逐渐形成村落。因村旁一面积9.2亩的小湖(铁湖)而得名。相传该湖有水獭出没,故又称“獭湖”,铁湖村也因此曾称“獭湖村”。清光绪十年(1884年)铁湖村属福安乡界东里二、三都,1932年属实验乡柳堤保。

铁湖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早在30年代就建立了中共党组织。1932年10月,闽东革命领导人深入铁湖村,秘密联络畬族群众,建立骨干队伍,进而发动广大畬族同胞参加革命。1934

年1月建立了铁湖村苏维埃政府。村苏维埃政府设主席1人,财政委员、粮食委员、土地委员、肃反委员各1人,交通委员2人。不久即建立了中共铁湖村党支部,并开展了分田分粮运动,从而提高了广大畚族同胞的革命积极性。1935年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铁湖村的革命斗争转入地下。1936年1月,中共党组织再次派员到铁湖村,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30年代,铁湖村共有5名中共党员,1949年仅剩下2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铁湖村属城关区化蛟乡,1958年撤乡并社后为城关人民公社化蛟大队。1972年分队,成立铁湖大队。1981年城郊人民公社更名为城阳人民公社,1984年改公社为乡,铁湖村委会归属城阳乡管辖。

二、民族与人口

1996年,铁湖行政村共有158户、720人,其中畚族105户、490人,分别占总户数和总人口的66.46%和68.06%。在行政村所辖的4个自然村中,铁湖、满洋和岩角亭均为畚族聚居村,亦有极少通过嫁娶迁入的汉族。满洋村的人口最多,共66户、297人,分别占行政村的41.77%和41.25%,全村主姓蓝,自迁入形成村落已有近六百年的历史;铁湖33户,主要姓钟;岩角亭21户,雷、钟、蓝姓都有。高板村均为汉族,共38户,以郑姓居多。

1996年,铁湖行政村共有劳动年龄人口405人。其中:劳动年龄内上学者6人,劳动年龄内丧失劳动能力者8人,不足劳动年龄参加劳动者4人,超过劳动年龄参加劳动者10人。实际劳动人口仍为405人。劳动人口的分布情况为:从事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饮食及服务业等非农产业劳动力合计98人,占全村劳动人口的24.20%,比1994年增加了26人;常年外出务工经商者约60人,占14.81%;从事农林牧渔业劳动力247人,占60.99%。

三、资源与环境

铁湖行政村总面积 2120 亩,其中耕地 720 亩,山地 1400 亩。林业资源主要有马尾松、杉树、灌木、毛竹、绿竹等。其中绿竹是铁湖和高板自然村最重要的经济林木,两村居民多年均沿交溪东岸种植绿竹,形成了宽约 30 米、长约 5000 米的绿竹林带,亦成为福安市有名的“十里绿竹长廊”。绿竹的产笋量很高,铁湖自然村居民每年从竹笋的销售中户均可收入 500 元~600 元。毛竹主要分布在村落周围的山上,种植的数量不多,多为农户编制竹篮、竹筐等自用,亦有少量毛竹或竹制品出售。马尾松是山上的主要树种,一般都不成材。灌木主要是用来作燃料。

农业的主要物产,粮食有稻谷、番薯、马铃薯,亦零星种植一些大麦、小麦和大豆;经济作物和水果有茶叶、花生、芝麻、果蔗、茉莉花、药材、蔬菜、油茶以及枇杷、柑橘、桃、李、杨梅等。除了茶叶外,经济作物和水果等均为零星种植。

铁湖村依山傍水,是福安市地理环境最优越的畲族行政村。岩角亭、铁湖和高板 3 个自然村均沿 104 国道分布,铁湖自然村居中,南北分别为高板村和岩角亭村,各距铁湖自然村约 1.5 公里;满洋村在山上,位于铁湖自然村东侧约 2 公里。岩角亭、满洋、高板 3 个自然村呈“品”字形环抱铁湖自然村。104 国道福汾段为二级公路,汽车的流量很大,平均每分钟约有 8 辆汽车经过铁湖,是发展汽车维修业、餐饮业和汽车旅馆业的好地方。

公路西侧的交溪,是福安市的重要水上通道。在河中捞沙采石(鹅卵石)曾是铁湖、高板、岩角亭 3 个自然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第二节 农业经济

从实地考察的情况看,铁湖村仍然是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农业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根据福安市城阳乡经营管理站提供的资料,1996年,铁湖行政村经济总收入76.6万元^①,其中农林牧渔业收入合计62.6万元,占经济总收入的81.72%,农业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

一、耕作条件和技术

(一)耕地 铁湖村的农业生产以水田稻作为主。根据村委会提供的数据,1996年初,行政村的耕地总面积750亩,当年因国家征用基本建设用地10亩,灾害毁地20亩,年末实有耕地720亩。其中水田654亩,旱地66亩。在4个自然村中,汉族聚居的高板村耕作条件最好,其耕地几乎全部是分布在104国道两侧平坦的水田,机耕或畜耕都很方便。铁湖自然村原来的耕作条件也不错,但自1992年公路边的16亩耕地(其中水田15亩)被征用于建设开发区后,村庄周围已无水田,现有的水田与满洋和高板村一样,全部都在山上,村民到自己的水田耕作需要翻过村后的一座山,步行约需20至30分钟。

3个畲族自然村的水田都比较分散,且呈不规则的梯田状,最大块的水田不足一亩,小块的只能插一行秧苗(约10兜秧苗),面积一分(0.1亩)以下(几厘)的水田占大多数。但这些水田一般都能自流灌溉,梯田的坡度也不算陡,故从这个意义上说,其耕作条件在福安市的畲族村中算是比较好的。

^① 城阳乡经管站的统计报表中全村经济总收入为80万元,但将表中的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饮食业等全部9个子项相加,总收入应为76.6万元。为使数据保持系统性,故本文使用重新核对过的数据。

(二)耕作技术 由于水田小而分散,耕牛转弯不方便,所以3个畚族自然村的耕作均以手工劳动为主。1996年,全村只有14头牛,其中能劳役的耕牛仅7头。高板汉族村的水田面积较大且平坦,故均为畜耕。

畚族村的水田春耕一般为二犁二耙。可用牛耕作的水田,若雇有耕牛的人家帮忙,每天需50元。由于价格较高,村民们为了省钱往往只是一犁一耙或一犁两耙了事。相对于我国南方农村春耕通常的三犁三耙或三犁四耙来说,其耕作显得较为粗放。

手工犁田一般都用田锄。田锄是畚族自然村最重要的劳动工具之一。田锄的头部酷似锄头,但比普通锄头略窄且薄、短,田锄的整个形状似锄,像是锄与锹的结合。村民们在锄田时为方便省事,一般都是边锄边耙,顺手用田锄将翻起的田土捣碎(稀)。受这种耕作方式的制约,畚族自然村目前只种一季水稻,每年收割后也不种越冬作物,而是用水泡田,这样第二年锄田就容易得多,但同时也降低了耕地的使用效率。稻作中的插秧、收割等也均为手工劳动。旱作农业亦然。

畚族自然村农业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植保技术和科学种田水平的提高。其中,杂优水稻良种的广泛使用是粮食产量提高的最直接原因。按满洋村一位钟姓村民的说法:过去种的水稻是高秆品种,1.2尺的间距,亩产三四担稻谷;现在种的水稻是杂优矮秆品种,6寸间距,平均亩产七八担。自80年代起,畚族村居民就已经很少使用农家肥,主要是使用氮肥、磷肥和复合肥。1996年,全村共使用氮肥10吨、磷肥6吨、复合肥2吨,与80年代末相比,化肥的使用总量(折纯)变化不大,然而用肥的结构则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复合肥的使用量呈缓慢提高的趋势,反映了畚族农民用肥(平衡施肥)技术的提高。

二、种植业

种植业在铁湖行政村的农业中占重要地位。根据城阳乡经管站提供的数据,1996年,行政村种植业收入54.5万元,占经济总收入的71.15%,占农业(大农业)总收入的87.06%。当年全村农作物播种面积2075亩,比1990年的2020亩略有增加。在1990年~1996年期间,农作物播种面积最多的1994年为2176亩,最少为1992年的1798亩,波幅约为21%。

(一)粮食生产 粮食生产在全村的种植业结构中居最重要地位。1996年,粮食种植面积1682亩,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81.06%,也是1990年以来种植面积最多的年份。1990年~1996年期间,粮食种植面积的波动幅度为8.52%,波幅很小,种植面积最少的1990年为1550亩。1990年~1995年的6年间,全村平均每年的粮食产量为332.8吨,其中产量最低的1992年为285吨,产量最高的1995年为382.7吨,其余4年均在320吨~340吨之间,波幅也很小。根据铁湖村委会提供的数据,1996年,粮食总产340吨,平均亩产202.14公斤;若按城阳乡经管站提供的数据,1996年的粮食总产则为452吨,平均亩产268.73公斤。

铁湖行政村居民种植的粮食品种有水稻、番薯、小麦、大麦、大豆和马铃薯。福安畬族历史上是以番薯为主食的,番薯曾是主要的粮食种植品种,但这种状况在60年代后已发生了根本变化,水稻逐渐成为畬族村居民的主食和主要的粮食种植品种。1996年,铁湖村的水稻种植面积1112亩,占粮食种植面积的66.11%,稻谷产量占粮食总产的86.06%;同年番薯的种植面积仅200亩,亦是1990年~1996年7年间番薯种植面积的平均值,全年总产19吨(按4斤鲜薯折1斤粮食),平均亩产95公斤。不过,尽管番薯在畬族村的粮食结构中已退居次要位置,但其在畬族居民的经济生活中仍然占有一定的位置,主要是取番薯藤和番薯的表皮喂猪,

番薯的较好部分刨制成丝晒干后自己食用。

1996年其它粮食品种的种植情况为：大麦种植80亩，平均亩产81公斤，总产6.5吨；马铃薯180亩，平均亩产161.11公斤（鲜马铃薯按4:1折粮食），总产29吨；大豆60亩，平均亩产20公斤，总产1.2吨。从总体上看，除水稻外，铁湖村居民种植的番薯、大麦、马铃薯、大豆等粮食作物，基本上均属于零星种植，其种植的作物品种（种子）和种植方式大体上都沿袭着传统习惯，单位面积的产量都比较低，其种植面积的波动不会对粮食生产构成太大的影响。

（二）经济作物 主要有花生、芝麻、油菜、糖蔗、果蔗、茉莉花、莲藕、药材等。受市场价格的影响，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波动较大。1990年～1996年，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最多的一年为210亩，7年平均每年种植98.17亩。1996年为55亩，主要经济作物的种植情况为：油菜22亩，总产380公斤；芝麻13亩，总产150公斤；茉莉花20亩，总产350公斤。花生、糖蔗、果蔗、莲藕、药材等1990年～1994年曾经种植过的经济作物，或者是已经无人种植，或是因种植的面积太少，1996年已不再列入统计。全村的经济作物基本上都是零星种植，对居民收入的影响不大。

（三）其它作物种植 主要有蔬菜、西瓜、紫云英（绿肥）等。1990年～1996年的种植面积在150亩～480亩之间，波动幅度很大。种植最少的1991年、1992年为150亩，种植最多的1994年为480亩。1996年种植338亩，其种植的主要情况为：

1. 蔬菜。1996年种植280亩，总产140吨。但种植面积较大、具有一定规模的只有汉族聚居的高板村，品种主要有圆白菜、芥菜等，绝大多数是作为商品出售。3个畚族自然村的蔬菜均为零星种植，以农户自己的需求为目的。

2. 西瓜。1990年种植120亩，1991年～1994年无人种植。1994年以后种植的面积不大，1996年种植40亩，总产80吨。种

植西瓜的主要是高板村的农户,畚族自然村很少有人种植。

3. 紫云英。70年代“以粮为纲”时期曾广泛种植,以后渐少,1990年~1993年已无人种植。1994年后有少量种植,1996年种植面积20亩,主要作为绿肥使用。畚族自然村无人种植。

此外,高板村的花卉种植已颇具规模,对居民的经济收入已产生很大影响,但目前尚未将其列入统计项目。

(四)茶叶和水果 茶叶和水果生产在福安市的农业生产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对铁湖行政村的影响却不大,亦是属于农户的零星种植。1996年,全村拥有茶园面积130亩,其中可采摘面积100亩。自1990年起,全村的茶园面积和可采摘面积均无变化。近两年因茶叶价格下跌,1997年鲜茶的收购价仅0.5元~0.6元一斤,制好的茶每斤还不到2元,如此低的价格使农民已不愿种茶,导致茶园的荒废面积不断增加。种茶较多的满洋村,全村66户人家,管理得较好的只有4户人家的十余亩茶园,其余农家的茶园多已荒芜,只能采一点茶自制自己食用。

水果的品种主要有枇杷、柑橘、桃、李、杨梅等,多为农户在房前屋后的零星种植,连片种植的水果很少。1996年,全村水果面积190亩,其中可采摘面积90亩,总产8.9吨。主要的水果生产情况为:枇杷面积16亩,一般年景总产1吨,1996年总产0.4吨;柑橘为1990年以后种植,1992年~1996年城阳乡经管站的统计为140亩(村委会的统计仅20亩),1996年柑橘总产仅3吨,不论采用哪一种面积的统计数据,其单位面积产量都是相当低的;桃树的面积24亩,均为可采摘面积,1994年~1995年的总产7吨,为历年最高,1996年总产2.5吨;李树的面积正在逐年减少,1991年全村有18亩,1996年只剩10亩,总产3吨;杨梅,1990年~1995年的面积为2亩,1994年总产0.2吨,1996年未见统计。

近两年由于市场的变化,大多数水果的价格均呈下跌趋势,加之铁湖行政村居民种植的水果品质不佳,无优良品种,故农户砍果

树的现象增多。1996年,由于橄榄的价格趋高,每斤可卖2.5元~3元,村委会即组织人力上山种了约3000棵橄榄树。这批橄榄树属于村集体财产,也是全村惟一比较有规模的连片种植的果树。

三、林 业

虽然3个畲族自然村的土地基本上均为山地,耕地也在山上,但林业生产在全村经济中的地位却很低。1996年,行政村林业收入2.6万元,仅占经济总收入的3.39%,占农业(大农业)总收入的4.15%。林业生产中最重要和发展最快的是绿竹生产,1990年全村种植绿竹2000丛,至1996年增加到7000丛,增长了2.5倍,年产绿竹笋约70吨,成为铁湖和高板两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其它主要林产品的生产情况为:油茶,全村约50亩,全年产油茶籽1.5吨;毛竹,年产400根~500根,毛竹笋产量约1吨;木材,1990年~1993年期间每年产木材10立方米~20立方米,其中自用和出售的木材各占一半,1994年以后再无统计。此外,零星的林副产品还有木柴、山苍子、杂木棍、棕片等,多为自用,亦有少量富余出售。

四、畜牧业

从城阳乡经管站提供的统计数据看,铁湖村的畜牧业在经济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很低,1996年畜牧业收入4万元,仅占全村经济总收入的5.22%,占全村农业总收入的6.39%。^①畜牧业生产以养猪和养家禽为主。

畲族行政村居民养猪和饲养家禽都保持着非常传统的方式。喂猪还是用老办法,一般是将番薯藤或其它青饲料切碎,混合以米糠或少许番薯,经熬煮后喂食;喂鸡和喂鸭则基本上是直接利用稻

^① 在我国南方农村,畜牧业收入一般都占农业总收入的20%以上。

谷。当问及为何不用专门饲料喂养时,一般的回答是:“买饲料每担要花 80 元,番薯藤是自家地里的,不用花钱。”但这种传统的生产方式则明显地制约了畜牧业的发展^①。目前畲族村居民基本上都是每家养一二头猪,养几只鸡鸭。个别农户养的鸭稍多些,但亦不过是数十只到百余只。

90 年代以来,铁湖行政村生猪存栏的数量波动较大。1990 年~1991 年,全村生猪存栏为 260 头~265 头,1992 年~1993 年每年存栏 120 头。1996 年末存栏 267 头,其中 120 斤以上的肉猪 172 头,能繁殖母猪 2 头;当年出栏肉猪 352 头,其中自宰自食 70 头,猪肉产量 25 吨。畲族村居民以养肉猪为主,通常是购买五六十斤的小猪回来喂养,养至 200 斤左右就出售。由于无饲料成本,出售肉猪的收入扣除买小猪的支出大体上就是净收入。一般的畲族家庭每年都可以出栏一二头肉猪,故养猪是畲族村居民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乡经管站统计上的意义。

除养猪外,1996 年全村还存栏家禽 2100 只,其中鸡 600 只,鸭 1500 只,当年村民自宰和出售 320 只;山羊存栏 26 只,当年自宰和自食 16 只。90 年代初,一些村民曾养过蜜蜂、家兔、奶牛等,1996 年已无人饲养。1996 年,全村水牛存栏 14 头,主要是作为耕牛饲养,其中能劳役水牛 7 头,能繁殖水牛 6 头,当年生小牛 1 头。

从总体上看,畲族自然村的农业尚处传统农业阶段。无论是水稻或其它作物的种植,还是猪和家禽的饲养,均属于传统的小农式经营。这种以解决自己吃饭为基本目的的农业,如果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其收入是比较稳定的,但好年景也不会有大的增长。

^① 我国南方农村,包括部分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农村,90 年代后已开始广泛使用各种专用饲料喂养猪和家禽,这种技术进步有效地突破了资源的约束,有利于实现猪和家禽喂养的规模化生产。

第三节 非农产业

一、铁湖畬族经济开发区

1992年初,在全国开发区建设热的浪潮中,在福安市政府和福建省有关部门的支持下,铁湖畬族经济开发区应运而生。这是迄今为止福安市惟一的村级经济开发区。由于该开发区冠以“铁湖”的村名,同时突出了“畬族”的民族性,故铁湖畬族经济开发区的建立使铁湖村的名声大震。

实际上,除了铁湖自然村从被征用的土地获得一定的补偿、从开发区的基础建设中获得一定的好处外,整个行政村的经济活动与开发区的建设没有任何关系。这个冠以“铁湖畬族”的经济开发区完全由城阳乡政府管理,开发区管委会的主任、经理均由一名乡党委副书记兼任,铁湖村的党支部和村委会不参与任何管理,不享有利润分成,甚至也不知道开发区内的基本情况。开发区与铁湖村的关系,实际上仅是土地使用的关系:即开发区建立之初占用了铁湖自然村的16亩耕地(15亩水田、1亩旱地),按照每亩1万元~1.1万元的价格给予村委会补偿,而这16亩耕地的征购粮仍然由铁湖自然村的居民负担。开发区管委会则以更高的土地价格对外招商引资,至1997年,在开发区已办起了3家铸钢厂,3家石板材厂,2家汽车旅馆,1个加油站和1家货运站。这些企业均招收外地职工,没有一名铁湖村的居民被这些企业所吸收,故村干部和村民们的意见都很大。如今铁湖村居民要想利用开发区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发展第二、三产业也很不容易,例如在公路边开一家60平方米的商店,仅地皮费就要花1.6万元,这是一般村民承受不了的。

然而,在几乎所有有关铁湖村的宣传或介绍材料中,都将铁湖

畚族经济开发区与铁湖村混在一起,将铁湖畚族经济开发区视作铁湖村经济的一部分。由于将互不相干的两个经济实体混在一起,这至少会在统计上造成混乱。在不同的宣传或介绍材料中,1996年铁湖村工农业总产值少的有855万元,多数材料中均为1360万元。^①城阳乡经管站的《农村经济统计报表》未将开发区的经济活动列入铁湖村中,显然要真实得多,其统计显示铁湖行政村1996年的总收入为80万元(各子项相加为76.6万元),其中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和饮食服务业等非农产业收入为14万元,按调整后的数据(76.6万元,下同)计算,仅占全村经济总收入的18.28%。

不过,铁湖畚族经济开发区的设立对铁湖自然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工 业

铁湖行政村无村办集体企业,只有1家私人合股办的石材厂。1996年,全村的工业收入4.2万元,占经济总收入的5.48%,占非农产业总收入的30%。

石材厂的厂房和设备都很简陋。厂房无四壁,为竹竿加盖油毡的简易棚,主要设备为一台电锯、一台打磨机和一只葫芦吊。石板加工的工艺比较简单:将方块花岗岩石料锯成薄板打磨抛光后即可出售。全厂只有4名工人,均为铁湖自然村的居民,轮换着昼夜生产。工资为计件工资,锯工加工每平方米可挣3元,磨工每平方米5元,每人每天均可加工20余平方米的板材。

花岗岩板材加工是比较赚钱的行业。但由于粉尘污染严重,

^① 1997年11月16日《铁湖村党支部争创工作汇报》和同年12月9日向参加“面向21世纪的中国畚族社区学术研讨会”代表散发的《福安市城阳乡铁湖畚族村简介》的材料中,1996年全村的工农业产值为1360万元;同年7月,铁湖村党支部、村委会的《加强阵地建设、发展农村经济》介绍材料中,1996年全村工农业产值为855万元。

近两年福安市政府已开始限制开办新企业。该厂进料每立方米加运费约 1000 元,1 立方米石料可加工 30 平方米~40 平方米板材,每平方米板材的就地销售价为 60 元。若按每立方米石料平均产 35 平方米板材计算,扣除工资、电费,加工 1 立方米石料可获毛利 500 元左右。但因电锯和打磨机的损耗很大,若加上设备折旧其毛利就要低许多。仅从该厂的销售情况看,全村的工业收入远不止统计中的 4.2 万元。

三、建筑业

铁湖行政村无专门组织的建筑施工队伍。建筑业收入主要是捞沙打石的收入。村民盖新房基本上都属于相互之间的帮忙,建新房者不需付工钱,只需为来帮忙者准备好酒菜即可,甚至是铁湖自然村的新村建设也是如此。这部分实物支出(实际上是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收入)没有计入建筑业的收入中。1996 年,全村建筑业收入 2.4 万元,占经济总收入的 3.13%,占非农产业总收入的 17.14%。

四、运输业

铁湖的交通十分便利,大约每 5 分钟就有一辆客车经过,村民乘车到福安或其它地方都非常方便。故全村的运输业主要是手扶拖拉机的货物运输。4 个自然村中只有铁湖和高板村的居民有少量几台拖拉机,主要是将村前河中的沙石运到福安市销售。近两年因房地产市场疲软,建筑施工减少,故对沙石的需求也随之下降,1996 年,全村运输业收入 1.2 万元,占经济总收入的 1.57%,占非农产业总收入的 8.57%,运输业收入额比 1992 年下降了 33%。1997 年 7 月,满洋村修通了简易机耕路,结束了该村不通机动车的历史,随即出现了该村第一辆用于运输的“三叉车”,居民乘车去福安(2 公里山路,5 公里二级公路)每人 1.5 元,货物每担

1元。从这辆车运营几个月的情况看,生意还相当不错。

五、商业和饮食业

90年代以来,铁湖行政村的商饮业发展较快,1996年商饮业收入4万元,比1992年增长了7倍,占全村经济总收入的5.22%,占非农产业总收入的28.57%。在非农产业中的收入额仅次于工业。

铁湖的4个自然村均开有小商店,共6家。商店的面积一般为10平方米~20平方米。其中,满洋(2家)和岩角亭(1家)的小商店较为简陋,主要是出售些油盐酱醋、烟酒、糖果点心及小日用品,满洋村有1家小商店配有冰柜,可以冷冻些鱼肉出售。这两个自然村小商店的销售对象均为本村居民。铁湖和高板自然村的小商店均设在公路边,商品的种类稍多些,其销售对象除本村居民外,还有过往的司机等。

饮食业实际上就是铁湖和高板自然村居民开的饭馆。其中铁湖自然村两家,高板自然村1家,饭馆的面积20平方米~60平方米不等。在这3家饭馆中,村支书家办的饭馆可能效益较好,这家饭馆由漳州人承包,饭菜较适合过往司机们的口味,故用餐的人较多。而铁湖自然村另一家由村民合股开的饭馆,则是自己掌勺的福安当地风味,客人较少,似在勉强维持。

一些外地人在开发区建设中所开办的汽车旅馆和货运站,也都设有饭馆和小商店,与铁湖、高板自然村居民开办的商店及饭馆交织在一起,给人一种铁湖村第三产业很兴旺的感觉。

六、服务业

1996年收入2.2万元,比1992年增长了10倍,占行政村经济总收入的2.87%,占非农产业总收入的15.71%。全村真正具有商业意义的服务业实际上只有高板村的一家汽车修理铺,主要

是从事汽车打气、补胎及汽车小故障的修理。

从总体上看,真正属于铁湖行政村的非农产业仍很薄弱,在全村经济收入中的比例还相当低。但值得注意的是,行政村非农产业的统计中并没有包括村民的外出打工收入。

第四节 居民收入与生活

一、居民收入

(一)关于统计的说明 在目前的农村经济体制下,要准确地统计农村居民收入是非常困难的。这不仅在于难以做到挨家挨户的逐家登记,而且即使能做到,农户也很难准确地说出上年全家的纯收入额。此外,统计本身也存在不少问题,难以做到统计口径的一致,还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城阳乡经管站的统计报表,是目前惟一能系统反映铁湖村居民收入状况的统计资料,而且也是福安市统计局的基础统计材料,但是我们却无法从中看出铁湖村居民的收入状况。

根据城阳乡经管站的统计:1996年铁湖行政村经济总收入为76.6万元;总费用15万元,国家税金2.7万元,乡村集体提留5.2万元,三项合计为22.9万元。按照一般的常识,总收入减成本费用、税金及乡村集体提留,全村居民可分配净收入应为53.7万元,按1996年全村720人计,人均纯收入为745.83元,但城阳乡经管站的统计结果则是人均纯收入2310元。在这两个数据中,前者虽然可以使报表平衡,但是却明显偏低,与铁湖村居民的实际收入状况相差太远;而后者虽然比较接近铁湖村居民的实际收入,但其来源缺乏依据,也无法使统计报表平衡。因此,我们只能根据实地调查来估算铁湖村居民的实际人均纯收入。

(二)畚族村居民收入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铁湖的4个自然

村几乎每家都有人外出打工,而外出打工实际上是畚族村居民货币收入的主要来源。由于技术不同,打工者的收入差别较大,如在石板材厂当磨工每天可挣 100 元,锯工每日可挣 60 元,无技术者打工的收入则低得多,而且找工作的机会亦较少。总体上看,3 个畚族村有技术的打工者较少。

满洋村 32 岁的蓝柱明可谓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打工者:蓝柱明,未婚,与母亲同住,一家两口有 2 亩水田,蓝不屑种田,将水田包给别人种,自己外出打工。由于无技术,蓝柱明只能当小工,什么活都干。近几年因建筑市场疲软,找工作已很不容易,经常几天、甚至连续十几天找不到活干,冬天和下雨天更是不容易找工作。这样有时一个月只能打几天工,若交好运,一个月最多可打 20 多天工。做小工一天大约可挣 20 多元,不管食宿。为节省住宿费,蓝柱明一般每天都回家住。一年下来,蓝柱明可挣 3000 元左右。蓝的母亲在家养了 1 头猪、七八只鸡,在零星的旱地还可收获一两担番薯和芋头。全家的收入合计 3600 元左右,人均约 1800 元。

蓝石平一家则略有不同。蓝石平兄弟都娶了媳妇,仍与父母住在一起,但都各立了门户,分灶吃饭。老人的身体还硬朗,将家里的农活全包了,全家(实际上是 3 户)一年可收获三十多担稻谷、十几担番薯和芋头,卖一头肉猪,这大体上就是全家的农业收入(约折 3000 多元)。蓝石平兄弟和他们的媳妇每年春天在家里种完水稻后就外出打工,白天去福安市区,晚上回家。蓝石平无技术,一天只能挣 20 多元,其弟弟则是村里少有的懂泥瓦工技术者,一天可挣 30 多元。打工收入加上在家务农的收入,蓝石平一家的人均纯收入约 1900 元左右。

蓝柱明、蓝石平均属于无小孩的两代户家庭,故其纯收入属于村里比较高的。若是三代户或两代有无劳动能力子女的家庭,按人口计算的人均纯收入就要低得多。家庭收入的多少,基本上是

取决于家庭中能够外出打工人口的数量,以及打工者是否有技术。根据我们与十多户居民的访谈,粗略计算满洋村的人均纯收入在1600元左右。

岩角亭自然村居民家庭的农业及外出打工收入状况与满洋村基本相同,只是外出打工的条件稍好些。岩角亭村因坐落在国道边的山坡上,村民去福安打工比较方便,过去还可以到河边捞沙石卖,收入的机会要比满洋村多一些。不过,1996年铁湖村委会让外地人承包了属于该村河段的捞沙采石权,这条增加收入的门路也断了。但因离公路近,打工的机会还是要比满洋村多。粗略计算,岩角亭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在1700元左右。

在3个畚族自然村中,铁湖自然村的条件是最好的。该村不仅有自己的河段捞沙石,还因其坐落在公路边的山下,便于开办饭馆、商店和石材厂,有拖拉机的农户还可从事运输,可以部分地解决劳动力的出路问题,故居民收入的机会较多。该村在河边种植有几千丛绿竹,仅此一项平均每户的收入就要比满洋或岩角亭村多五六百元。粗略计算,铁湖自然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不低于2000元。

总的来说,由于畚族村的农业基本上是以解决吃饭为目的,如果要想有钱花,就必须外出打工。而由于务农与打工的收入差距太大,按满洋村居民的说法“打两天工就可以挣回一担稻谷”,再加上农业耕作条件差,所以畚族村民也不愿意专心务农,这就阻碍了农业的技术进步和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使农业始终维持在原有水平。对3个畚族村的经济发展状况,按当地畚族村居民的形象说法,即是“种田吃饭,打工挣钱”。

(三)高板村居民收入 在铁湖村委会的4个自然村中,汉族聚居的高板自然村居民收入可能是最高的。由于该村的耕地条件最好,故其农业耕作要比畚族村精细得多。如秋季收割水稻后,畚族村的水田都泡上水闲着,高板村的居民则大面积地种植蔬菜,搭

上棚架种植花卉,而且凡是可以利用的土地都精心地种上了龙眼、橄榄等水果,河边也种有大面积的绿竹,因此高板村居民的农业收入要比畚族村高得多。另一方面,就外出打工者而言,高板村懂技术的人也要比畚族村多得多,故其收入要高出一截。

二、居民生活

50年代以来,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铁湖村居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衣着来看,如今3个畚族村居民的衣着都较好,看不到穿补丁衣服的村民,但也看不到穿传统畚族服饰的居民。

居民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畚族居民的主食由番薯饭变成以大米饭为主。4个自然村的人均口粮已达到300多公斤,再也不用担心粮食不够吃的问题。饮食的质量有很大提高,一般居民大体上每周能吃上一两次鱼肉。

从总体上看,居民的住房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但4个自然村的情况很不相同。其中,铁湖、高板村居民的住房均以砖瓦或钢筋混凝土结构为主,住房的质量较好,而满洋和岩角亭村居民在住房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住房的质量较差和住房不足。满洋村居民的住房大多都是近十几年新盖的,其中有部分住房的外墙还采用了砖结构(大多数住房的外墙还是土坯墙)。不过,这些住房真正完工的则极少。前文提到的满洋村的蓝石平一家,可谓是村中比较有经济实力的人家,其1984年盖的房屋至今还没有将楼层的木板铺好,厅堂左透的木板墙也还没隔,完好的只有右透用木板隔好的两间房,供蓝石平夫妇和其父母使用,而其弟弟还只能在楼上搭简易床。由于当初盖房时使用的部分松木已被虫蛀,这座尚未完工的“新房”已需要拆除新建。像蓝石平这样的人家在满洋村是比较普遍的。

还有一些人家比蓝石平家的情况更糟。蓝卫弟一家盖房已有

10年,至今还是只有房架和瓦顶,连门都还没有安上,全家现只能在房架中堂左透用旧竹帘围成的一角住宿。44岁的蓝大弟一家的情况亦与此相似。

蓝生言一家4口,住两间十几年前建的房。其住房的结构与传统的畬族房屋完全不同,为两间并列的普通砖结构平房,每间各约12平方米。两间房屋内各置一张小床(两张条凳加木板,再铺上稻草和草席),无桌椅或其它任何家具,地上堆着约40麻袋的稻谷和番薯、木薯等粮食,进屋后连转身都很困难。蓝生言在屋前搭了一间简易棚,用旧油毡盖顶,用树枝和旧竹帘简单地围着三面,这就是一家人做饭吃饭和养猪的地方。蓝生言一家还不是村里居住条件最差的。

从外表看,满洋村最好的房屋是蓝银富家刚建好的新房。这座两层的楼房均用红砖作外墙,瓦顶,外观还很不错,但屋内除了一张八仙桌和两张简易床外,暂时还空无一物。

岩角亭村除了搬到公路边的两户居民住房较好外,其余人家的住房情况与满洋村大体相同。

第五节 村庄基础设施建设

铁湖自然村原是一个破旧、贫困的小山村。1992年初,铁湖畬族经济开发区的设立对该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产生了很大影响。同年10月,铁湖村被列为福建省城乡建设委员会确定的7个村镇建设试点之一,并且明确了实行省、地、市政府和军民共建。但实际上进行新村规划建设的只有铁湖自然村。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福安市人民政府和福建省民委、省民政厅等省、地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投资35万元在铁湖自然村建成了集村委会办公楼和畬族民俗馆为一体的“铁湖村畬族文化发展中心”楼,此外还在该村投资40多万元建设了日产1000吨自来水的供水系统和电力供应系

统。铁湖自然村的新村建设总体规划进展顺利,1993年3月就获得了宁德地区行署授予的“村镇建设先进村”称号。

按照铁湖自然村的新村建设规划,全村的居民住宅均统一建成二至三层小楼,呈半圆弧形坐落在国道东侧,环抱着畚族文化发展中心大楼和铁湖,湖水沿岸柳树成荫,村后的山上是郁郁葱葱的毛竹和各种树木。“铁湖畚族文化发展中心”是一座设计别致、造型典雅的两层小楼,共22间房。这幢楼集村委会办公室和畚族民俗馆等为一体,整个建筑的外墙采用乳白色瓷砖贴面,内部装修的质量亦属上乘,据说可列为福建省一流的村委会楼。至1997年11月底,环村的水泥路面已铺设完毕,全村的33户居民,除五六户外,其余20多户居民的旧房都已拆除,其中有10户搬进了建好的新房,还有10多户居民搬进了已建好的楼房第一层暂住。一个现代化的畚族新村已初现雏形。

铁湖自然村的畚族文化发展中心大楼和自来水、电力供应工程的建设基本上是由福安市人民政府投资,甚至连村民拆旧房建新楼房也可领取政府补贴,按有关规定每盖好一层楼可领取3000元的政府补贴(尚未完全落实)。显然,新村建设具有很强的政府行为,其目的是想通过新村建设树立“小康”典型,激励其它畚族村的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而铁湖自然村之所以能有幸成为典型,主要还是得益于该村便利的交通条件。1996年,铁湖先后被宁德地区行署和福安市人民政府授予“小康明星村”称号,来此参观考察的人络绎不绝,该村的“畚族文化发展中心”是外来者的必参观之处,其中的畚族民俗馆已成为人们了解畚族的重要窗口。

岩角亭、满洋和高板则没有铁湖自然村那么幸运。岩角亭村沿公路边的山坡叠建,只有2户在公路边建了住房;满洋村则是在山上,到公路边还需翻两座山,1997年才修通简易机耕路;高板村的地理环境比铁湖村更优越,可惜全村均是汉族,缺乏特色,也很难得到政府的资助。因此,这3个自然村都未进行新村规划,村民

们的住房均显得很杂乱。满洋和岩角亭村均无自来水,居民用水主要还是靠肩挑,但也有不少细心的人家用细小的塑料管将山涧的小股泉水直接引到家中,有的人家架(铺)的塑料管长达数百米,虽然花费不少,却省了挑水的劳累。

4个自然村都通了电,但电费却相差很远。满洋和岩角亭村因没有安装变电设备,电力损耗很大,故电费非常贵。1997年,满洋村的电费为每度1.5元,电费最高的1995年每度达2.6元。岩角亭村1997年的电费曾高达每度2元。如此高的电费是无法兴办加工业的。因此,尽管这两个畲族村都已经通电,村民们却非常节省,一家人通常只有在最必要的地方才用一盏亮度很低的电灯,缺钱的人家也有用松油或煤油灯的。而铁湖自然村则幸运得多,拥有政府投资架设的专用输电线,居民用电每度只需0.8元,工业用电每度仅0.5元。虽然不能说便宜,但也比满洋和岩角亭村居民的用电便宜一半。

在铁湖的4个自然村中,满洋村的建设条件最差。该村的居民都沿山势建房,由于山坡较陡,建房时需将山坡坡体挖去一部分以形成平地,而被挖去的坡体则形成一面较高的土墙,其高度有的与新建成房屋的屋顶相差无几,如此层层叠叠地在山坡形成村落。由于山坡面的墙体太高,下雨时经常造成塌方,将房屋压倒伤人,因此满洋村的居民觉得缺乏安全感,以致下大雨时有些人都不敢在家里睡觉,担心山墙塌方把房屋压垮将自己埋在里面。故满洋村的居民早就想将村址迁到一里路以外的地方,将一座小山包推平建新村,但因耗资太大而未能如愿。铁湖的新村建设曾给他们带来了希望,所以他们也要求政府给予资助,但迟迟没有结果。

不过,铁湖自然村的居民也有自己的烦恼。虽然该村居民的收入比满洋和岩角亭村的居民高一些,而且盖新楼房还有政府补贴,但要按照新村规划的要求盖新楼房,也大大超出了多数居民的经济实力。如该村钟石任家的楼房,5年才盖了一层,为此已花了

约3万元,其中的1万多元还是借来的,全家现已住进了建好的第一层,至于建第二层的问题想都不敢想。像钟石任家这种情况的家庭在铁湖自然村约有一半,亦即全村约有一半的居民可能已无力按规划的要求盖二至三层的楼房。此外,由于村委会将属于该村河段的捞沙采石权交给外地人承包了,这就切断了居民收入的一条重要来源,从而也使居民盖新楼房更加困难。

第六节 社会与文化

一、村级组织与管理

铁湖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简称“两委”)是行政村的最高权力机构。村“两委”共有干部9名(含1名文化馆管理员),分别负责全村的党、政、民兵、财务、妇女、青年团、文化等方面的工作。全村有21名党员,每名党员都有包户任务,其内容主要是配合村干部搞好各项工作,如在群众中开展创“五好家庭”活动、开展“帮贫助富”活动等。

铁湖行政村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无主村,铁湖自然村居民仅占行政村总户数的20.89%,所以村干部的来源比较分散。在9名村干部中,村党支部书记、会计、团支部书记和文化馆管理员来自铁湖自然村,村委会主任来自高板村,村委会副主任、民兵营长来自满洋村,还有两名村干部来自岩角亭村。高板、满洋和岩角亭3个自然村距离铁湖村委会驻地都有1.5公里~2公里,每个自然村都有自己的利益,因此村干部们很难就行政村的前景作出统一的发展规划,某些发展规划虽然打着行政村的牌子,实际上也只是单个自然村的发展规划(如铁湖新村建设规划),这就使得来自其他自然村的干部缺乏热情。

除了一些日常事务外,现阶段村干部最重要的工作是抓计划

生育。为此,村委会建立了计划生育协会和人口教育分校(乡人口教育学校之分校),向村民宣传计划生育基本知识,协助乡干部对违反计划生育的居民进行罚款。村干部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协助乡干部向村民征收教育附加费、民兵训练费、乡村集体提留和五保户军烈属优抚等费用(简称“四费”)。1997年,由于粮食的市场价格下跌,每担稻谷(100斤)的市场价比国家的收购价低10元,亦即政府反而要根据定购粮的数量向农户每担返还10元,征购粮食的任务没有了,故村干部的压力主要是征收“四费”。铁湖村委会的“四费”不多,1997年人均35元,远低于中央规定的农民负担不得超过全年人均纯收入5%的标准。

调解纠纷是村级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铁湖村委会内设有调解委员会,由党支部书记兼主任,妇女主任和另外3名村干部担任副主任。调解委员会的职责是:调解本村居民之间、自然村之间以及行政村与其它村之间的各种纠纷,将各种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除了村干部外,每个自然村还有调解纠纷的家族或宗族组织,如满洋和铁湖自然村分别有蓝姓和钟姓“董理事”。“董理事”亦即过去的族长,由同姓宗族中办事最公道、威信最高的人担任,村委会或村干部调解不了的纠纷往往由“董理事”调解。实际上,“董理事”调解的纠纷比村干部调解的纠纷更多更细。

根据职责的不同,村干部均领取一定的月薪和补贴。其中,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会计和民兵营长4人每月从乡政府领取月薪,书记和村主任每月100元,会计和民兵营长分别为85元和18元。文化馆管理员的月薪也是100元,由市文化馆发给。此外,村干部还从村集体提留中领取补贴:书记每月150元,村主任每月100元,会计70元,文化馆管理员每月10元;其余无月薪的干部则每年补贴一次,民兵营长、村委会副主任、妇女主任、团支部书记等每年各领300元,还有一名干部领120元。

二、教 育

铁湖行政村的满洋、铁湖和高板自然村均设有小学。其中,满洋村小学只有两个年级班,二年级以后就到铁湖小学就学。

铁湖小学是福安市重点民族小学之一。学校位于铁湖自然村背后一侧的半山上,占地 2301 平方米。1996 年新建成二层教学楼 895 平方米,1997 年又新筑长 42 米的校园围墙。学校现有 1 至 5 年級的 5 个班级和 1 个学前班,1997 年第一学期在校生 89 人,其中畬族学生 57 人。学校的 7 名教师(男 3 人,女 4 人)均为公办,其中畬族教师 1 名。学生主要来自铁湖行政村所属的 4 个自然村,但也接纳附近其它行政村的学生就读。学校设有寄宿地,现有学生宿舍 528 平方米,安置了 30 多名学生住宿;附近村庄的非住宿学生可以寄炊,中午可在学校用餐。

铁湖小学的教学设备比较齐全。学校设有多功能活动室,其中包括自然实验室、图书室和少先队活动室。学校图书室有藏书 750 册,教学仪器有数学教具、自然课教具 25 种,电化教学器材 6 种,体育器材 14 种,以及音乐、美术器材多种。学校比较重视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开展勤工俭学活动,1994 年~1996 年,学生勤工俭学活动收入合计 858 元,这笔收入除支付教师福利 340 元外,其余的均用于添置学校的教学设备。

自 1991 年 8 月开始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以来,铁湖行政村的适龄儿童入学率都达到 100%。据铁湖小学 1996~1997 学年毕业班的教育质量数据统计,毕业班 17 名毕业生的学业成绩全部合格,毕业率达到 100%。该校附设的扫盲学校,1991 年~1993 年期间脱盲 22 人(男 14 人,女 8 人)。1994 年以来,铁湖行政村 15 岁~40 岁的青壮年脱盲率达到 94.85%,其中妇女脱盲率为 93.55%。据不完全统计,1997 年,铁湖行政村所属自然村共有初中文化程度者 40 多人,高中文化程度者 7 人,大学

文化程度者 2 人。

三、文化活动

“铁湖畬族文化发展中心”实际上主要是村委会办公楼,也是全村的文化活动中心。“中心”内有党支部办公室、财务室、会议室、广播室、医务室、阅览室、娱乐室、村史教育室等。阅览室相当规范,报刊、报架排列得很整齐;娱乐室面积约 100 平方米,置有乒乓球台等娱乐设施;村史展览室约 60 平方米,陈列有数十幅图片和文字资料,以此对村民们进行该村的革命斗争史教育,让村民们了解全村的发展规划、发展成就和发展前景。然而,这座楼最重要的地方还是畬族民俗馆。该馆面积约 100 多平方米,陈列有畬族的传统服饰、饰物及生产生活用品约 40 多件,此外还有以畬族传统服饰、饮食、婚嫁、喜庆、生产、劳动、文化、娱乐等为专题的图片 84 幅。目前该馆已成为人们了解畬族的重要窗口。由于铁湖自然村的人口不多,其它自然村离村委会也不算近,故到文化中心楼开展娱乐活动的居民很少。整个文化中心像是侧重向外人展示铁湖居民的文化生活,而不太重视村民们如何参与文化娱乐活动。

四、民间信仰和传说

铁湖村畬族居民信奉的神灵,主要是传说中的历史人物演变而成的神灵,以及自然崇拜等。满洋自然村近几年新建的“禹王殿”,为全村最宏大的建筑,即是崇拜历史上的治水英雄;铁湖自然村也建有“禹王殿”,但规模要小得多。满洋村还崇拜巨石,该村东面的山坡上有一孤立褐色巨石,约十余立方米,无依无靠地半埋于土中,巨石的北面有一棵古松,据说已有数百年的树龄,古松的树形奇特,始终半遮于巨石,亦为一奇观。村民们将巨石称为“石母娘娘”,常去烧香、磕头,求“石母娘娘”发善心,能够保平安、交好运,亦有的是求“石母娘娘”为自己的子女却病消灾。“石母娘娘”

在满洋村居民的信仰中占有很高的位置,以致该村居民的名字中多有“石”字。

铁湖自然村坐落在山下,这是畚族村极其少有的现象。据称铁湖自然村有这样的传说:不要将村庄建在山上,以免买卖东西不方便;女儿出嫁的地方距离城镇不要超过2里远,否则将来女儿就要吃苦。后者几乎是作为一条规则至今仍在延续着。这一传说或许只是想说明铁湖村祖先的先见之明,但如果没有这一传说,或许也就没有了今天的铁湖,没有了今天的“小康明星村”。

第六章 竹洲山村调查

竹洲山位于福安市穆云畲族乡的西部,是闽东第一山——白云山的支脉,其间山重水复,峰奇崖险。竹洲山行政村的石厝下、平中山、曲坑、三湾、十二泡、下竹洲和上竹洲7个畲族自然村便散落在丛菁邃谷之中。1997年11月,我们来到这个曾经是革命老区的山村进行调查,希望能够了解身处老区的畲族人民的生活现状。经过三天的翻山越岭,我们走遍了竹洲山的7个自然村。通过访谈与实地考察,我们对该村的情况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第一节 革命老区

竹洲山村的居民全部为畲族,有钟、蓝、雷三姓。钟姓是在清乾隆年间迁到此地的;蓝姓于嘉庆年间至此;雷姓最晚,于道光年间迁来。至于迁徙路线却无人知晓。

由于山高谷深、易守难攻,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竹洲山成为中共宁德县委和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基地之一。1933年,中共福安县委派员深入竹洲山地区宣传革命道理,建立中共组织与农会组织,号召当地畲族群众投身“五抗”,即抗租、抗债、抗捐、抗税、抗粮斗争和分田活动。同年冬,国民党军队围攻闽东苏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开始,原宁德县苏维埃政府的部分人员撤退到竹洲山地区。1935年,宁寿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出生于下竹洲村的共产党员钟日柱当选为主席。在中

共宁寿县委的努力下,将该县 13 个区、37 个乡、300 余个村的苏维埃政权普遍建立起来,并在竹洲山一带开辟了秘密交通线,建立游击队和赤卫队,并创办了兵工修械厂和红军后方医院。叶飞同志曾在国民党围攻竹洲山的战斗中负伤,经当地群众的掩护和护理,身体痊愈。

1936 年,国民党军队向竹洲山进攻,焚烧了村中所有的民房。当地村民在无家可归的情况下,躲避于山林岩洞之内,艰苦度日,坚持革命斗争。1936 年~1937 年的两年间,竹洲山村在国民党军队围攻中牺牲的革命志士和畲族群众多达 120 余人。

竹洲山村的畲族人民在革命战争中对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无限的忠诚,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1953 年,叶飞同志在担任福建省省长期间,没有忘记这片他当年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以及当地畲族同胞,特别指示有关部门拨款为竹洲山的村民们修建新房。自此,竹洲山人在废墟上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家园,结束了十几年无家可归的生活。1984 年 7 月,为了纪念老区人民在革命战争期间的重大贡献,中共宁德地委批准设立了竹洲山革命纪念碑。

第二节 乡村经济

一、农业生产及其技术

(一) 土壤与耕地 竹洲山村地处福安市西北部山区,山高谷深,地势起伏较大,山地坡度 30 度~45 度,气候温凉,降水充沛,热量条件相当于南温带水平。年平均气温 $\leq 16.0^{\circ}\text{C}$,无霜期 ≤ 252 天,年降水量 >1700 毫米,整个作物生长季节气候温润。

全村的土壤以黄壤为主,土浅砂多,理化性较差,耕地有机质含量低,瘦田比重大,中、低产田较多,只有少量村边屋旁的田地肥

力尚好。由于山地地形复杂,水田以山垄田、梯田为主,田形狭小且不规则。因山涧、山泉水冷,土温和水温均较低。

1996年,全村共有64户、296人,耕地面积367亩,其中水田182亩,旱地185亩,人均耕地面积仅1.24亩。由于耕地分散,许多农户要走一二个小时的山路去种田,有些农户因自家的耕地不够,还需借种邻村的土地。竹洲山村的海拔较高,粮食作物以番薯和单季稻为主,复种指数较低。

(二) 生产工具 50年代,畜民所用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包括田间耕作、作物收获和粮食加工等三个方面,用于田间耕作的主要农具有犁、耙、锄头(木锄、鸭口锄、马铤锄)、砍刀、镰刀等;用于农作物收获的有软卷(晒谷用)、竹帘(晒番薯丝用)、竹筛;用于粮食加工的有砬、磨、石臼、风车(谷物加工用)。70年代以后,村里逐渐增加了人力脱粒机。1992年~1994年,村民们投资1万元(其中政府资助6千元)购置碾米机,在5个自然村办起了5个粮食加工厂。目前,除粮食加工部分机械化以外,其它生产工具与50年代相比没有明显变化。

(三) 选种 50年代,农作物的品种不好,产量很低,一亩水田只产稻谷100公斤左右,一亩农地产番薯丝250公斤(4斤番薯晒干为一斤番薯丝)。70年代末,乡农技站开始推广杂交水稻,农民每年去乡里买种子并接受农技站的技术指导。杂交水稻具有产量高、成熟期短、矮秆、抗倒伏等优点,加之播种时间提前到4月初,水稻生长期长,产量更易提高。目前,竹洲山村单季稻的平均亩产为360公斤,比50年代增长了两倍半。80年代中期以后,番薯的新品种也大量引进,有颜粉1号、潮薯1号、华北48和广薯16等品种。竹洲山村由于地处山区,山风较大,番薯易生瘟病,因此抗风抗瘟性强的薯种——“广薯”16倍受村民的欢迎,栽种后不但产量大幅度提高,且栽培工日也减少了四分之一。

(四) 耕作方法 部分仍采用传统方式,植保技术有了较大的

提高。

1. 耕田。与 50 年代相比,耕田的方法没有明显变化。由于全村的水田和旱地大都在山坡上,有的只有一两米宽,且坡度较大,田地分散,耕种很费事,故牛耕很少,更谈不上机耕。1996 年,全村只有 4 头耕牛,大部分耕地仍采用人力耕作的方法。

2. 水稻的育秧与插秧。育秧技术自民国时期到 50 年代初期,一直沿用传统的满田撒播式育秧,这种方式耗种多、管理不便,遇到连续阴雨,烂秧严重。50 年代中期,开始推广“合式秧田”。60 年代~70 年代,又推广畦式水秧、塑料薄膜覆盖育秧等技术。80 年代,采用薄膜覆盖湿润育秧和编织布育秧技术。1994 年以后,旱育秧技术逐渐推广,其方法是选择沙质土壤,起畦平整,放一层黄土后播种。播种前用强氯精浸种消毒催芽,撒上种子后盖上一层掺沙的干细土,然后加盖农膜以保持温度和湿度。这种育秧方法有利于排除气候的影响,使秧苗生长得又快又壮,促进亩产的提高。

至于插秧技术,近几年曾试图用抛秧代替传统的手工插秧。但由于人多田少,人工插秧完全来得及,且抛秧容易使秧苗杂乱无章,除草时杂草不易辨别,农民们还是愿意采用人工插秧的老办法。

3. 番薯的育苗与插植。过去,番薯育苗主要采用老藤越冬育苗、切块直播育苗、催芽畦种育苗等方法。50 年代以后,先后采用了温床育苗、秋薯育苗、薄膜覆盖等育苗技术。70 年代以后,村民根据番薯无明显生育期特性和湿热条件的要求,采取适当早插的新方法。番薯种植期多安排在“小满”至“芒种”节气,以延长生长期,增加光合效应。同时适当提高了插植密度,每亩插 3000 株,较之以往每亩增加 400 株~600 株。

4. 田间管理。过去,田地里的除草花费不少工时,进入 80 年代以后,由于广泛使用了除草剂,不再需要人工耘田,使田间管

理的劳动强度大大减轻,水稻和番薯的生产工日缩短了很多。

(五) 化肥、农药和地膜的应用 50 年代,农民一般使用人畜粪尿、草木灰、绿肥等农家肥。现今已广泛使用化肥。一般情况是:当农家肥不够用的时候,村民们便到乡里购买化肥。出售化肥的主要是个体小商贩,供销社也卖一些。除化肥以外,农药和地膜的使用也较为普遍。虽然现在化肥、农药的价格较贵,但为了提高产量,农民们还是乐意购买。

(六) 自然灾害对农业的影响 竹洲山村地处海拔较高的山区,台风一来往往造成水稻严重倒伏。如 1997 年夏季的 13 号台风就给该村带来了极大的损失,有的稻田几乎没有什么收成,好一些的也只勉强收获一半的稻谷,不少农户要靠买米借米度日。此外,山里的老鼠很多,对农作物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危害。

二、经济结构

(一) 劳动力分布 竹洲山村没有村办和户办企业,村民们基本上都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农业以种植业为主,种植业又以水稻和番薯为主。1995 年,全村共有劳动力 179 人(女劳动力 86 人),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有 154 人,占全村总劳动力的 86%(表 6-1);从事林业、畜牧业、副业、交通运输、商饮业及卫生教育事业的有 22 人,只占总劳动力的 12.3%;还有 3 人在外打工,占总劳动力的 1.7%。在外打工的劳动力主要从事烧炭行业。

表 6-1 1995 年竹洲山村劳动力分布情况

部 项 目	农业	林业	畜牧业	副业	交通 运输	商饮 服务	卫生	教育	外出 打工
劳动人数(人)	154	2	9	3	3	2	1	2	3
占全村劳力(%)	86	1.1	5	1.7	1.7	1.1	0.6	1.1	1.7

资料来源:穆云乡农经站。

(二) 农业收入结构 1996 年, 全村农业总收入 39 万元, 其中种植业收入 25 万元, 占 64.1%; 林业收入 3 万元, 占 7.7%; 畜牧业收入 11 万元, 占 28.2%。

(三) 种植业结构 竹洲山村的种植业结构以粮食为主, 兼种蔬菜与茶树(表 6-2)。粮食除交公粮外, 只够自己食用, 个别农户还存在不够吃的现象。蔬菜品种主要有大白菜、小白菜、马铃薯、萝卜和芋头, 多种在房前屋后, 供自家食用。茶树的种植不多, 零星分布, 管理粗放, 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茶叶采摘后除自己饮用外, 也出售一部分, 但因山区交通不便, 进来收购的商贩将价格压得较低, 农民的收入不多。

表 6-2 1995 年竹洲山村主要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

项 目 \ 农 作 物	单季稻	甘薯	小麦	马铃薯	大豆	蔬菜	茶叶
面积(亩)	180	160	40	120	30	60	85
产量(公斤)	68,500	39,200	2800	22,500	1600	39,500	5500

资料来源: 穆云乡农经站。

竹洲山因海拔较高, 气候温凉, 兼之土浅砂多, 不适宜亚热带水果的种植。前些年, 村民曾经试种过枇杷、柑橘等果树, 但不是果实太小, 就是酸涩难吃。后来又打算定购柿子苗, 由于缺乏资金, 也没有成功。目前, 村民们有种植板栗的想法, 但因技术、资金等问题尚未付诸实施。

(四) 林业 竹洲山的林业资源十分丰富, 杉木、马尾松的分布面积很广。1958 年, 福建省将这片林区划归林场所有。竹洲山人便只剩下房前屋后一些零散的竹林和树林, 只能勉强靠打柴换些日常用品维持生计, 无法凭借周围山上丰富的林业资源致富。

(五) 畜牧业 竹洲山村的畜牧业不发达。由于地少, 饲料不

够,猪、鸡、鸭、兔的家庭饲养量不大(表6-3)。喂猪的饲料是将番薯擦成的番薯丝与剁碎的番薯秧叶一起煮熟喂食,其它禽畜的饲养方法也很原始。1987年,宁德地区外贸部门曾贷款六七千元给村民养羊,但因村民没有经验,大部分羊不久便死掉了。贷款部门催还欠款,造成群众负担很大。

表6-3 1995年竹洲山村畜牧业情况统计

水牛(头)		猪(头)		鸡鸭(只)		兔(只)		羊(只)	
年底 存栏	当年 生子	年底 存栏	当年 出栏	年底 存栏	当年自 宰和出售	年底 存栏	当年自 宰和出售	年底 存栏	当年自 宰和出售
6	1	65	121	730	467	74	45	18	21

资料来源:穆云乡农经站。

第三节 居民生活

据乡农经站统计,1996年,竹洲山村农民人均收入为1147元,这一数字是将农民自己食用的粮食、蔬菜等一切都折算在内。从穆云畲族乡的情况看,竹洲山村的生活水平在全乡的33个行政村中是最低的,只相当于全乡人均纯收入的64.4%。然而,通过与村民交谈,我们认为1147元这一数字要高于实际情况。在户访调查中,竹洲山村家境较好的几户人家人均纯收入也只有900元左右,按照福安市人均800元的贫困线标准,相当部分农户都应属于贫困户。

一、居住条件

竹洲山是革命老区,1935年~1937年,7个自然村的房屋全部被国民党烧毁。1952年,民政等有关部门拨出专款为竹洲山畲族人民重建家园,平整了被焚的断壁残垣,在废墟上盖起了畲族传统土木结构的新瓦房。1997年,全村共有房屋18座,均为50年

代政府拨款所建,总面积约 2000 平方米,每户平均住房面积 32.3 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为 7.7 平方米,居住较为拥挤。

竹洲山畲族村落属于零星分布的散漫型住宅点,基本上是“单座楼”或“几栋厝”。其中三湾、下竹洲村都只有 1 座房屋,而人口较多的主村平中山也才有 4 栋。这些房屋均为土木结构,四方筑墙,屋架直接安置在山墙上,屋顶呈“金”字形,盖以瓦片。墙面为浅黄色土墙,配着墨黑的屋顶,很有特色。

二、饮食状况

过去村民们以番薯为主粮,缺粮现象十分普遍,遇到灾荒,时常以野菜充饥。80 年代以后,稻谷产量大幅度提高。粮食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如今,村民们的主食一般是以白米和番薯丝对半掺后蒸食,白米饭则用来招待客人。以前,竹洲山人吃纯番薯丝饭的人很多,现在已很少见,但遇到灾年也有吃这种饭的。如前面提到 1997 年夏季的台风使三湾一带的稻谷几乎没有什么收成,有余钱的人家就到乡里买米吃,没有钱的便只好吃这种纯番薯丝饭。

村民们的蔬菜主要有马铃薯、芋头、萝卜、芥菜和大白菜、小白菜。炒菜一般用猪油,调味品以食盐为主,很少放葱、姜及酱油和味精。主要原因是这些调味品需要花钱,村民们不仅缺钱,而且采购也不便。竹洲山的 7 个自然村中只有主村平中山有两个小卖店,日用品的种类很少,从其它自然村到主村也要走很远的山路,所以村民们采购生活必需品宁愿到穆阳镇,从山村到镇上来回一趟不容易,村民平均两三个星期才去一次,带回来的食品主要是咸鱼和猪肉。有些生活困难的贫困户没有钱买肉吃,甚至连猪油也买不起,做菜时就将萝卜、青菜在清水中加点盐煮食。一般农户一个月能吃到一两次猪肉。

三、用水用电

以前,竹洲山村的人畜用水均为泉水或田水,缺水的自然村的村民要走几里山路去邻村挑水。如主村平中山人口较多,却缺乏水源,村民们饮水用水要到曲坑去挑,山陡路滑,非常不便。70年代,福安县开始进行改善畚族村人畜饮水条件的工作,1983年县民委成立以后,这项工作的进展明显加快,但竹洲山村由于地处偏远山区,水改工作开展得较晚。1993年,福安市为石厝下、平中山两个自然村引进自来水。引水的资金除上级拨款4000元外,村民们砍伐了集体所有的价值8000元的老树作为投资。1995年,邻近平中山的曲坑村也通了自来水。目前,虽然有3个自然村用上了自来水,但是深山里的三湾、十二泡、下竹洲和上竹洲的村民却依然饮不到自来水,大多靠很长的细塑料管引水到家。三湾村尤为艰苦,村民们还是靠原始的引水工具——用打通竹节的竹筒来引山涧的泉水,由于水量小,人们要用水桶一个一个地轮流接水。到了涸水季,还要到远处有水源的地方挑水饮用,十分不便。

竹洲山距离闽东水电站较近,1986年,政府投资从水电站架设高压电线,使全村居民有了生活用电和生产用电。但竹洲山的电费较贵,1997年每度1.5元。由于农户家中电器很少,因此用电量不大,主要用于照明。1995年,全村年用电量为8100千瓦/小时。

四、家庭设施

(一)厅堂用具 一般人家均有木制八仙桌1张,木制短凳、长凳若干条,多为原木色,上面漆上桐油。逢年过节之时,八仙桌还用来祭祖祭神或聚餐。

(二)卧室用具 一般家庭的卧室用具较为简朴,大多为1张木床(也有人还使用简便的矮脚竹床)、1个双屉桌,富裕些的人

家有衣橱或桌橱。贫困户家中则除了床铺、被褥外一无所有。如住在三湾的86岁的钟寿连,是竹洲山村9个老红军中惟一健在的老人,已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靠政府发放的补贴过活。以前,补贴金每个季度只有100多元,1997年才上调到258元。老人住在二楼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房间里,屋中只有1张破床,床上有1领草席,还有1条露着棉絮的破烂不堪的被子。

(三)厨房用具 村民们做饭依然使用土灶,灶上有两口相同口径的大铁锅,配以木制锅盖和木瓢、木铲,蒸饭时多用木制桶。烧火使用的柴草为细碎的松枝、芒草等茅柴,整齐一些的木柴自家舍不得用,多背到坝头(水电站)卖掉,以便换取其它生活用品。吃饭用具一般为3个抽屉的饭桌,长凳、短凳若干。碗筷不用时可以放在饭桌抽屉内。

(四)耐用消费品 如今,大多数农户家中都安上了简便式电扇,少数农户家中有缝纫机。整个行政村有10余台黑白电视机,其中6台是1987年福安市政法委主任派人送来的,当时电视机虽分送到各自然村,但却收不到节目。1997年,市广播电视局和市人民法院分别支援5000元和3000元,在邻近闽东水电站的石厝下和主村平中山设置了两个电视差转台,使包括曲坑在内的3个自然村可以收到七八个频道的电视节目。由于三湾、十二泡、下竹洲和上竹洲处在深山沟中,电视信号依然无法收到。

五、邮电通讯

1935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竹洲山曾设立过中共福安县地下革命交通网,开展传递情报等工作。1949年,人民政府接管了穆阳邮政局,该邮政局的前身是1909年在穆阳镇设立的邮政代办所,1943年改立为穆阳四等邮政局。1951年改称穆阳邮政营业处,1984年为三等邮电支局。竹洲山村地处偏远山区,没有设立投递路线,村民们寄信、收信都要亲自跑到穆阳邮电局,也有

委托去镇上办事的村民顺路捎带的。

以前,整个行政村不通电话,传递信息十分困难。近几年,穆云畚族乡政府在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工作中非常重视实现全乡“两通”,即村村通公路和村村通电话。邮电局对山区安装电话给予优惠,免费提供光缆线,使竹洲山村于1997年终于有了第一部电话。这部电话是年轻的女支部书记自己借钱安装的,由于她家住在邻近闽东水电站的石厝下村,因此从水电站接电话线比较方便,共花了2000多元。支书还想为主村平中山安置1部电话,但费用太高,需要9000余元,实在是无力筹措。目前,由于支书家有了电话,乡里与之联系方便多了,但7个自然村之间的联系仍较为困难,村民主任和村会计分别住在十二泡与下竹洲,若有事需召开村委员会,支书至少要走一整天的山路前去通知,十分辛苦。

六、道路与交通

竹洲山距乡政府驻地(设在穆阳镇)约有14公里,过去没有公路相通,村民们到镇上去一趟来回要走一整天。1971年,政府在穆阳溪上游修建了闽东水电站,从水电站到穆阳镇的公路也逐渐开通。1977年,为方便竹洲山村民过河,在石厝下附近又建起了一座长60米、宽4米的桥梁。桥梁与电站之间有机耕路相通,可行驶机动小车。目前,竹洲山共有4辆“三叉车”,均为本村青年自己借钱购买,每辆车的价格大约是8000元。这种车既可以载人,又可以装货,主要往返于本村与穆阳镇之间,单程每位乘客收费3元。

与过去相比,竹洲山与外面的交通已经便利了许多,但居住在不同自然村的村民之间的往来依然不便。各村之间只有羊肠小道相接,崎岖难行。离水电站较远的村寨的居民出山一次还是不太容易,运点货物更是困难,无法借助交通工具,只能肩挑、人扛、背驮。由于竹洲山的田地少,土质差,村民们多以砍柴为副业。又因

附近的山林被国营林场划去,故砍柴要到很远很陡的地方,去一天砍回一担,第二天挑到坝头去卖,只能卖到十来块钱。不但木柴的价格低,猪肉、茶叶的收购价也比离镇上较近的村庄低了很多。深山里虽说有不少毛竹,但因道路崎岖、运输困难,没有人愿意进山收购。可见交通不便是竹洲山人民难以脱贫的一个重要原因。

七、村庄搬迁

50年代,政府为竹洲山人民拨款重建家园时曾计划将房屋盖在穆阳镇,但村民们担心搬到镇上后缺田少地,无法生活。最后,房屋还是盖在了深山之中。1994年以后,福安市开始实施“造福工程”,帮助生活条件、生产条件恶劣的村落搬迁到自然环境较好的地区。地处竹洲山的十二泡、下竹洲和上竹洲3个自然村被列入搬迁计划之内。然而,尽管村民们都十分愿意走出深山,搬到邻近穆阳镇的村落中去,且政府又给予优惠政策,减免土地税等,但这些村庄的大多数居民却没钱盖房。有的农户虽然借钱盖起了房屋,却又因活儿难找,没有生活来源,只好又回到山里居住、种田。家在十二泡的村民主任蓝石金一家就属于这种情况。由此看来,“造福工程”既是一项卓越的事业,也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如何能真正使之造福于千百户畚乡人民,还需各级政府部门计划周详,采取配套措施。

第四节 社会与文化

一、文化娱乐

竹洲山人口不多,且居住分散,故全村没有祠堂戏台、活动中心等文化设施。在电视差转台未建立之前,村民们吃罢晚饭便早早地上床休息了。每年到了11月份,太阳落山后,山里气温骤降,

村民们便围坐在火盆旁,一边烤火取暖,一边聊天讲故事。电视差转台设立以后,石厝下、平中山和曲坑村民的文化生活也开始变得丰富多彩起来。住在上竹洲的村民尽管只能收到1个台的节目,且图像模糊不清,但村民们吃过晚饭还是喜欢围坐在电视机前。可见电视节目对地处深山、信息不灵的竹洲山人来说有着多么强烈的吸引力。

山歌是畲族人民最喜爱的和最普遍的一种音乐表现形式。以前,不论是在山村田野还是在节日喜庆之时,男女老少都喜欢以歌代言,以歌抒情,以歌叙事。80年代,竹洲山的村民中还有对歌的,但现在却几乎听不到山间田野里的对歌声了,不过还有不少人会唱山歌。从1985年起,福安市为挖掘畲族传统文化,先后举办了五届畲族歌会,竹洲山村也派出歌手前往参加,由于路远,村民们前去观看的不多。

除畲歌外,畲家拳也是畲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竹洲山的村民中也有会这种拳法的,大多为家传,主要用于防身健体,极少出现以强凌弱的现象。

二、山村教育

竹洲山村有1所公办初级小学,建于1965年。当时只有教师1人,教两个年级的学生。学校的校址设在主村平中山,房子破旧,四壁为土墙,遇到台风暴雨,孩子们不敢在教室里上课。1996年,市法院拨款8000多元为竹洲山小学改建了校舍。新修的校舍为木石结构,共有两层,楼上为教师宿舍,楼下有两间,1间为教室,1间准备做村委会的办公室。1997年,学校有教师2名,学生20名,共设3个年级。其中一年级有学生5名,二年级9名,三年级6名,都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

在现任教师中,只有一名毕业于福安师范学校的公办教师。这名教师曾在其它条件较好的完小教书,后主动申请来到竹洲山

小学任教。与他一起前来的还有他的妻子，现为民办教师。本来，应该与这名教师一起来的还有另一位教师，因嫌路远山高不愿来，于是他便将自己的妻子带到竹洲山，夫妻二人带着出世不久的孩子在学校住了下来。他们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宿舍里只有一张木桌、一条长凳和两张单人简便竹床。但这对夫妻却对自己的选择没有丝毫后悔，尽心尽力地去教育着山村的孩子。

复式教学比起正常教学难度要大，而像竹洲山小学这样的三复式班教起来就更为困难。一般情况是一个年级上课，其它两个年级上自习。每天有8节课，每节课40分钟，写字课是20分钟。学生所用的课本是全国统一的，教师讲解课文时一般要用三种语言：普通话、本地畲话和福安汉话。山村的孩子见识少，相对而言理解和记忆力较差，学习起来较为吃力。

由于7个自然村只有1所小学，不少孩子要每天走崎岖的山路上学，住在上竹洲和下竹洲的人家离学校很远，年龄小的孩子每天来回走20余里又陡又滑的山路家长不放心，于是只好等孩子长到10岁左右才送到学校读书。以前，村里的孩子大多上完初小就辍学在家。近年来，村民们越来越认识到教育的重要，再穷困也要节衣缩食送自己的孩子到燕科村或虎头村去读寄宿的高小。山村的孩子学习也十分努力，一般到完小后功课基本都能跟上。

总的来讲，竹洲山居民的文化素质较低。60年代，村里办过扫盲班，村民们基本上脱盲，但识字不多，主要学习记数。村里的年轻人大多是初小或高小毕业，能够读到初中的很少。四十多年来，全村的初中毕业生仅有8人，正在就读的初中生有8人，还没有出过一名高中生。

三、医疗卫生

竹洲山村没有卫生所，村民们看病十分不便。由于山区峰峦起伏，地势地貌复杂，水热条件好，草药资源丰富，当地群众大多能

掌握一些应用中草药防治常见疾病的方法。早在革命战争期间,竹洲山的村民就曾利用草药医治过许多伤病员,还治愈了叶飞同志的创伤。现在,村民们得了轻病还是服用草药自己治疗,患了重病只好去十几公里以外的穆阳镇就医。有时得了急症,往往来不及送到医院人就已经死了。妇女生孩子也基本在家中,难产死亡的妇女比率较高。上竹洲村就有一个村民,先后娶过两个妻子皆因难产而死。目前,村民当中患胃病的较多,有的人还死于胃癌,估计与吃饭后立即赶到田里干活有一定的关系。

四、婚姻家庭

(一) 婚姻 过去,畲族人不愿与汉人通婚,也严格遵守本民族内同姓不婚的禁忌。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村民们的观念也发生了较大变化。现在,男女青年找对象基本上是自己相识或别人介绍后自由恋爱,父母包办现象已经消除。年轻人对畲、汉通婚抱着开明的态度,同姓不婚的禁忌也开始打破。

畲族男女传统的嫁娶程序过去十分繁琐,50年代以后逐渐简化。80年代,村里办喜事,新郎新娘一般还穿民族服装。男子的婚礼服装是红顶黑缎宽沿礼帽,青色长衫,青色布靴;女子则身穿衣领与大襟上绣着花纹的黑色衣裤,腰系围裙,头戴凤冠。这些服饰有的是自己新制的,也有的是从别人那里借来或穿家里老人留下来的。近几年,村民在婚礼上已不穿这种民族服装,装束与当地汉族趋于一致。结婚仪式主要是拜堂和办酒席。农户屋中厅堂的中庭壁上平时都供有地方神和祖公神,举行婚礼时,神、祖的名称要用红纸重写刷新,家中藏有神图、祖图的要取出来挂在堂上,供新人叩拜。此外,由于畲族人崇拜凤凰,办喜事时堂壁正中一定要贴上红纸书写的“凤凰到此”四字,以示吉祥。

8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畲族青年的结婚费用也相对增加。竹洲山村虽是贫困村,

但结婚的花费还是相当大的,低者1万余元,高者两万余元,主要用于聘礼、办酒席和购置电视机、电风扇、组合家具等。为了结婚,年轻人常外出打工,主要是给人烧炭,一点一滴地攒钱回家娶亲。不过绝大多数年轻人靠自己挣的钱应付结婚开支是远远不够的,大部分费用仍需向亲友借。如住在平中山的雷石发,今年31岁,妻子是另一个自然村的居民,今年24岁。两人于1994年结婚。婚前雷石发曾到福安、永安、三明一带替人烧炭,挣了一点钱。而结婚时共花费了两万多元,其中的一万多元是向别人借的。一般人家没有太多的钱,也不愿意多借,一次只能借一二百,因此这一万多元是从许多人那里凑来的。婚后,雷石发不再出外打工,以种田、砍柴为生,自家的田不到1亩,种出的粮食不够吃,便向外村借种1亩水田,收成的四成归田主所有。现在,雷石发夫妇已生有一女一儿,可结婚时欠的钱还有5000多元没有还上。像雷石发这样的情况在竹洲山比较普遍,由于该村既偏远又贫困,本村的姑娘常常嫁到外村,外村的姑娘又不愿意嫁进来,假如再不借钱大办婚事,竹洲山的小伙子就更难娶到媳妇了。

(二) 家庭 当地畲族家庭类型以三代户和二代户为主。一般是3口~5口人,七八口人的家庭较少。在家庭中,父亲为一家之长,对内管理家庭的经济收支,调节生活需要,安排农业生产等,对外代表家庭处理各种社会事务。母亲则为“内当家”,有权处理家庭内部事务以及亲戚来往事宜,负责烧饭、洗衣、挑水、饲养禽畜等。由于竹洲山地少人多,妇女一般不下地种田,偶尔在农忙时节帮一帮男人。过去,男人在家里享有很高的权力,妇女的地位较低。如今,女人地位与男人基本平等,有事能够互相商量,能干的女人也可掌管钱财。

当地畲族子女婚后,便分居独立生活。做父母的大都与幼子同住。有的则把父母分开,各跟一个儿子过活。有的是吃派饭,有的则自起炉灶,自食其力,直到真正丧失生活能力时,才由儿子分

担赡养。当地村民大都十分纯朴,能够做到尊老爱幼、互助互让、邻里相安、和睦共处、勤俭持家。村里的社会治安良好,很少发生打架、偷盗的现象。

由于偏远和贫困,竹洲山村没娶到老婆的中年男子较多,大约有十五六个。这些单身汉为了避免绝嗣,一般都买子继嗣,或以叔伯的子侄过继。目前,7个自然村的62户人家中,有14户都属于此种情况。

五、人口问题

四十多年来,竹洲山村的人口不断地减少,主要原因有四:一是长期缺医少药,死亡率较高;二是偏僻穷困造成男子娶不到老婆;三是个别富裕一点儿的农户搬到山外;四是计划生育工作开展得较好。80年代,村里还有生第3胎、第4胎的,现在已基本杜绝。目前,福安市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本地汉族农民第1胎是女孩儿的,间隔4年后可生第2胎;畲族第1胎不论男女,4年后均可再生第2胎,两胎均为女孩儿的不许再生第3胎。竹洲山村虽有部分村民认为对于少数民族应给予更多的照顾,但在乡、村干部的反复宣传下,这一规定为多数群众所接受,只有个别夫妇出现第1胎与第2胎间隔不到4年的现象。

竹洲山村是革命老区,又是纯畲族村,在革命战争时期,竹洲山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共和国成立以后,政府并没有忘记老区人民,拨款重建了房屋,修建了桥梁、学校,又在人口较为集中的村落修建了自来水管,建立了电视差转台,使山区的面貌有了一定的改善。然而,由于远离城镇,交通不便,田少土质差,竹洲山村的多数居民依然过着较为贫困的生活。近几年来,虽然粮食问题已基本得到了解决,但如何进一步摆脱贫困,真正走上富裕的小康之路仍然是摆在竹洲山人面前的一个难题。目前,竹洲山村在穆云

乡的 33 个行政村中是最贫困的一个村,村民们勤劳质朴,除了种田、砍柴和打工、烧炭外,几乎找不到其它的谋生手段。然而,根据我们的观察,发现竹洲山还是有不少自然资源可以加以利用的。比如山里有丰富的竹材,妇女和无田可种的年轻人可以利用这种资源发展竹制品,也可利用有限的土地种植价值较高的药材,关键是要开动脑筋,敢于创新。另外,竹洲山的青山绿水、竹林畲寨是天然的旅游资源,穆云畲族乡政府有将竹洲山开辟为狩猎场的打算。若闽东地区将竹洲山与邻近的周宁县省级风景区“九龙瀑”联合开发,必将成为福建省能与武夷山媲美的又一风景名胜区。那时,竹洲山人或许会真正受益于这片养育了他们祖祖辈辈的土地。

专 题 篇

关于福安畬族乡村经济发展的思考

畬族是我国大陆惟一分布在东南部沿海地区的少数民族。80年代以来,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东南部沿海地区的经济社会取得了迅猛发展,无论是发展速度还是发展质量,都大大优于我国内陆或中西部地区。因此,在相同的时期内,东南部沿海地区所经历的社会经济变革要比中西部地区深刻得多。对于惟一分布在我国东南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来说,她的发展变化及其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都无疑对主要分布在西部落后地区的少数民族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福安市是我国畬族聚居人口最多的地区。相对于全国来说,福安市位于我国的东南部沿海发达地区;但就福建省而言,福安市则属于全省比较落后的闽东地区;而福安市的畬族与我国南方的大多数少数民族一样,主要分布在经济社会发展条件较差的山区。从总体上看,福安市畬族的发展状况大体上是我国畬族发展的一个缩影。

一、畬族乡村经济发展的基本估计

福安市的畬族主要分布在乡村,呈“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征。“大分散”即全市19个乡镇的429个村委会均有畬族人口分布,占全市行政村总数的96%;“小聚居”指畬族主要集中聚居在721个自然村,占全市自然村总数的34.2%。因此,可以说,畬族

经济基本上是一种乡村经济。

进入 90 年代后,福安畬族乡村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年均增长速度由 1990 年以前的几个百分点提高到 10 个以上百分点,与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大体同步。以康厝畬族乡为例:该乡 1983 年~1990 年的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 2.69%,而 1991 年~1996 年则达到 12.84%,年均递增速度提高了 3.77 倍;工业的年均增长速度则超过了 30%,显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乡村居民的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根据福安市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康厝、穆云、坂中 3 个畬族乡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由 1990 年的 605 元、566 元、644 元提高到 1996 年的 1600 元、1780 元和 2013 元,增长了 1.64 倍~2.13 倍。但同时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畬族乡村经济与全市的经济发展还有较大的差距。

经过实地考察畬族乡村居民的生产生活,我们认为,畬族经济社会有如下几个特征:

(一)畬族村基本上无工业。福安畬族以“大分散”的方式聚居在各自然村(或行政村),除个别村外,畬族自然村基本上都分布在山区,地理环境较差,缺乏办工业的基础条件,故畬族村基本上无工业。尽管福安市政府在坂中畬族乡设立了工业区,建立了穆阳民族经济开发区和铁湖畬族经济开发区,但都与畬族村经济的关联度不大。甚至以铁湖畬族村命名、在该村地盘开办的铁湖畬族经济开发区,其开发区的工业亦与铁湖村经济没有任何关系,村委会不参与开发区的管理、不享受开发区的利润分成,也没有一名铁湖村居民能在开发区的工厂就业。1996 年,铁湖村经济总收入的 81.72% 依然来自农业,这个比率是相当高的。3 个畬族乡也有一些工业,但基本上都是乡政府和乡政府驻地周围村庄的私人或村集体开办,与山区的畬族村没有什么关系。

(二)畬族村居民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福安畬族乡村普遍重视粮食生产,并且不断地强化粮食的基础地位,始终坚持农村产

业结构的调整必须以稳定粮食生产为前提的原则。与农村改革之初相比,一般畬族乡村的粮食种植面积都没有减少。如康厝畬族乡 1996 年的粮食种植面积达 39,800 亩,比 1983 年增加了 12.79%;粮食种植面积占全乡农作物播种面积的 83.49%,仅比 1983 年减少了 4.66 个百分点。但这个比例在我国南方农村来说是相当高的。作为“小康明星村”的铁湖畬族村,1996 年,粮食种植面积亦占全村农作物播种面积的 81.06%。随着杂优水稻等优良品种的广泛使用,粮食的产量得到大幅度提高,不仅解决了粮食问题,而且有了比较牢固的基础。目前,畬族乡村居民的人均口粮大多数都在 300 公斤~400 公斤之间,少的也在 250 公斤以上,吃饭已不成为问题。1997 年粮食大丰收后,福安市的粮食市场价格比国家的定购粮收购价低 15%(100 斤稻谷约低 10 元)左右,政府粮食收购部门反而要按合同定购粮的数量每 100 斤稻谷向农户返回 10 元钱,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

绝大多数畬族村居民的穿着也比较好,尤其是青少年和儿童,其穿着与都市的同龄人没有什么区别。但畬族居民的住房条件还普遍较差。

(三)农业生产比较落后,仍处在自给阶段。畬族村基本上都处在山区,农田以山垅田、梯田为主,且狭小而分散,大块的水田不过一分,小块水田仅一张桌面般大小,所以绝大多数农田都无法使用机械或畜耕,只能靠手工劳动,甚至像犁田耙田这样的农活也要用田锄完成。收割、打谷也基本上沿袭历史上的传统方法。据福安市民委 1991 年 4 月对 25 个畬族行政村的调查,这 25 个行政村仅有 4 台手扶拖拉机。^①而且这几台手扶拖拉机主要是用于运输,不是用于田间耕作。因此,畬族村农业的主要生产工具与 50 年代相比没有什么变化。推动粮食产量增长的主要手段是靠良种

^① 参阅《福安畬族志》第 164~165 页,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的推广、水利条件的改善、化肥的广泛使用和农民植保技术的提高。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耕技术,其生产也必然是自给型的。

手工劳动也使得农业耕作粗放。例如,许多畲族村只种植单季稻,而且水稻收割后很少种植冬季作物,一般都是用水泡田,以便第二年锄田、耙田时方便些。若不泡田,第二年锄田耙田都很麻烦。但这就降低了农田的使用效率,同时也与周围的汉族聚居村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例如在铁湖行政村的4个自然村中,畲族聚居的铁湖、满洋、岩角亭3个自然村冬季都是用水泡田,农田都是空闲的;而汉族聚居的高板村则在冬季空闲的稻田里种植蔬菜、搭暖棚种植花卉,一片忙碌。

畜牧业生产亦然。作为农户家庭收入重要来源的生猪和家禽饲养,在我国南方的许多地区,包括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从90年代初已开始根据生猪和家禽的不同品种及不同生长期,广泛地使用各种不同的专用饲料,从而提高了畜牧业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克服了环境和资源的约束,可以通过规模化生产来增加家庭收入。然而在福安市的畲族村,则基本上仍然沿袭着传统的畜牧业生产方式:直接用稻谷喂鸡鸭,将番薯藤切碎混合米糠或粮食经熬煮后喂猪等等,在观念上还未能摆脱“买饲料要花钱,番薯藤是自己种的,不用花钱”的习惯思维,结果依然是每个畲族农家都养几只至十几只鸡鸭,养一两头猪,与十几年前的家庭经营没有什么区别。在福安的畲族村,畜牧业占农业总收入的比例都较低,如铁湖村畜牧业收入仅占农业总收入的6.39%,凤洋村占17.85%,康厝畲族乡占17.24%,而我国南方农村一般都在25%以上。

除了虎头、溪塔等个别畲族村外,水果、茶叶等主要农产品的生产也基本上是零星、分散的,远没有形成规模生产。而没有规模化,也就没有农业的产业化,也就难以形成高产、优质、高效的现代农业。

(四)外出打工已成为畲族村中青年的主要经济活动。在福安

畲族村的绝大多数家庭,45岁以下的中青年几乎都要外出打工,外出打工已成为畲族村的一种普遍现象。打工者外出打工的时间一般为半年,大体上是春耕农忙结束之后即外出,但也有常年在外打工的。康厝畲族乡的风洋村,全村共有351名劳动力,常年在外打工者多达200人左右,农闲时全村80%的劳动力均外出打工。其它畲族村也大体如此。除了凤洋、和安等少数几个畲族村的打工者有建筑等方面的一技之长外,绝大多数畲族中青年都是外出做无技术的小工。按照福安市的行情,无技术的小工不包食宿一天可挣20余元,有技术当师傅的一天可挣30元~40元。有无技术对打工的地点有很大的影响:无技术者一般都在福安市区或本地乡镇打工,铁湖、满洋和岩角亭等畲族自然村的居民即是如此,通常都是白天到福安市区打工,为节省住宿费用,晚上一般都回村里住;有技术者打工的范围则广阔得多,如风洋村的打工者,在福建省各地、邻近省市的浙江、上海,远至广西、四川,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中青年外出打工对畲族乡村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是审美观、婚姻观等生活态度的变化。由于打工者主要是在城市打工,城市居民的审美观及生活方式无不对他们产生深刻影响。例如在服饰方面,如今即使是在最偏僻的畲族山村,35岁以下的居民及少年儿童的穿着与大都市的同龄人没有什么区别——深秋时节,山村里,男青年身着夹克或西服,脚穿皮鞋或旅游鞋,女青年身着紧身衣、短裙、连裤袜,脚穿旅游鞋或高跟鞋的比比皆是。打工的生涯亦使青年人的视野更加宽阔,从而更加强调婚姻自主,择偶的范围也更加宽广,风洋村的打工者甚至将他们娶的四川、广西媳妇带回了山村。

其次是年轻人已不愿干农活。年轻人不愿意干农活的现象非常普遍,道理也很简单,用畲族村居民的话说:“打两三天工就能挣

回一担稻谷”。对于习惯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来说,靠种田生产一担稻谷显然太费时、费事、费力,有些畲族村的居民甚至把承包田租给别人种,自己则外出打工。有些 30 岁左右的山村居民虽然帮助家里干农活,但也不太尽心尽力,一心惦记着忙完农活外出打工挣钱。另一方面,从畲族山村衣着入时的男女青年的情况看,即使在家闲着也不愿意干农活,甚至把家务活也交给了老年人。实际上,他们的衣着打扮已不适合干砍柴、挑水之类的家务劳动。由于外出打工挣的钱多,老年人对年轻人不做家务和不下地劳动也没有什么怨言。依靠老年人干农活,其农业的技术进步必然是缓慢的,其生产方式也是粗放的,这似乎形成了一种循环。

近两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缓慢回落,投资的增长速度趋缓,房地产市场由于积压严重而呈现不景气状态。在这种大环境下,外出打工者找工作的机会大大减少。根据我们在一些畲族村的调查,无技术的打工者连续几天、十几天找不到活干是很平常的事情,运气好的每月最多能干到 20 余天,运气差的每月只能干两三天活,一般的能干到十几天的活。但是,按照每年外出打工 6 个月的时间计算,打工的收入仍然大大高于务农的收入。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福安畲族乡村的经济大体上处在“种田吃饭、打工赚钱”的状态。由于耕作粗放,农业只能解决吃饭问题;又由于打工者普遍无技术,找工作不容易且机会不多,因此靠打工也谈不上过富裕的生活。在我们调查的畲族村当中,还没有发现特别富裕的人家,倘若家中无病残者,或缺乏劳动力(如孤寡老人家庭),也不会太贫困,至少吃饭穿衣不成问题。而由于支撑这种经济模式的是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其进一步的发展也很不容易。

二、畲族乡村经济发展的潜力

“种田吃饭、打工挣钱”的模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其基础是传

统农业已无法容纳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因此,畲族乡村的进一步发展,仍然需要从加强农业生产和提高打工者素质入手,为提高农业产出和为打工者创造有利的条件。也就是说,应把“双层蛋糕”的上下两层都做大。

我们认为,福安畲族乡村经济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业资源丰富,开发的潜力大。福安市山多临海,气候条件优越,农业资源开发的潜力很大。而就分布在山区的畲族乡村来说,无论是山林土地资源还是物种资源都非常丰富,用材林、经济林、竹类、水果和茶叶等均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只是目前开发利用的程度很低罢了。在我们调查的一些畲族乡村,林业收入占农业总收入中的比例都很低,如1996年康厝畲族乡林业收入仅占农业总收入的9.61%,该乡畲族聚居的凤洋村占7.74%,铁湖村仅占4.77%。水果、茶叶等在农业收入中的比例更是微不足道。但这些恰恰说明了山区资源开发还有很大潜力。

近几年来,我国的主要农产品价格均呈回落态势,对农业精耕细作和农业的综合开发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尤其是茶叶、水果和稻谷价格的下跌,已直接影响了畲族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造成畲族乡村荒废的茶园面积增加,农民生产粮食的热情衰减,砍果树的现象时有发生。但应该认识到,与大量的人口相比,我国的农业资源是相当有限的,由这一基本国情所决定,农产品(尤其是优质农产品)价格将呈现出长期稳定向上攀升的趋势。因此,绝不能因为农产品价格的暂时回落而放弃农业综合开发。

(二)矿产资源比较丰富,有利于发展加工业。福安畲族乡村开发潜力最大的是花岗岩资源。近几年来,畲族乡村花岗岩的开采与加工业迅速崛起,其中以康厝畲族乡的发展速度最快,如果能有效地控制污染,仍然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1997年,康厝畲族乡的石材加工企业已达28家,而且赢利情况都不错,与国有企业

普遍面临的亏损困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根据我们对单台电锯的调查测算,开办一个单台电锯的石材加工厂只需十几万元投资,毛利率约为 30%(未扣除设备损耗),获利是比较丰厚的。穆云畲族乡发现的火山气泡流纹岩,蕴藏量极为丰富,可加工成高档建筑装饰材料,有很高的经济价值。丰富的矿产资源为畲族村居民直接参与开采或加工提供了可能,至少也可为其打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三)畲族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近两年,福安市党委和政府加大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通过政府各部门与各行政村挂钩扶持、增加资金投入等措施,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使全市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根据福安市统计局和市民委提供的数据,1996 年底,全市尚有 111 个行政村不通汽车,227 个行政村不通电话,分别占全市行政村总数的 24.80% 和 50.78%;在畲族人口占 60% 以上的 78 个畲族行政村中,尚未通车的行政村 22 个,不通电或简易拉电的行政村 41 个,不通电话的行政村 71 个,收不到三套或三套以上电视节目的行政村 75 个,分别占 78 个畲族行政村总数的 28.21%、59.54%、91.03% 和 96.15%。然而仅仅过了 7 个月,即至 1997 年 7 月底,全市所有的行政村都实现了通电和通电话,电视信号覆盖率亦达到 100%(均能收看三套以上的电视节目),90% 以上的畲族行政村都通了简易公路。其建设速度是相当惊人的。至 1997 年 11 月,所有的畲族行政村都实现了通车。

畲族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的成就,无疑将给经济的发展带来许多新的机会。在我们调查的畲族村中,1997 年 3 月通车的凤洋村,已出现了两户运输专业户;1997 年 6 月通车的满洋村已出现了全村第一户运输专业户。这两个原来闭塞的山村通车后,村中的小商店迅速配备了冰柜,使山村的居民也吃上了冰激凌,还可以随时买到鱼肉;居民们外出也更加方便,生产经营的渠道也明显

拓宽。

(四)“造福工程”的实施,为畲族乡村居民发展经济创造了新的条件。从1994年起,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的部署,福安市政府对生产生活条件恶劣、“一方水土不能养活一方人”的山村居民实施异地搬迁的“造福工程”。搬迁形式有整个行政村、自然村的迁移,也有若干户山村居民的搬迁,政府对搬迁居民给予资金扶持和政策优惠。从1994年~1996年底,全市的畲族村就有662户、3318人实行了搬迁,1997年这一工程仍在加速实施。这是一项巨大的、名符其实的造福工程。

在历史上,畲族可以说是一个迁移的民族。但畲族的迁移历史都是从一个地区的山上迁移到另一地区的山上,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山。而“造福工程”则是将一些畲族居民搬下山,这就为这些原来的山区居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搬迁的畲族居民不仅仅是在条件更优越的地方建立村庄或家园,改善了生产生活条件(如新的地方有路有电等),更重要的是其观念的变化。我们在康厝畲族乡东山村调查时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东山村包括3个自然村,因山体滑坡,属于整个行政村的搬迁。当我们问及搬迁有哪些好处时,一位村干部的回答使我们感到十分意外。这位村干部没有罗列新的村庄地势平坦、有路、有电、不用每天爬山等等好处,而是仅仅强调两点:一是人变得勤快了;二是人的精神面貌好了。因为在原来的山村,辛苦一年种的粮食都不够吃,再勤快也没有用,人也就逐渐变懒了;搬迁以后,不仅在原来的山里种单季稻,还在山下的村庄周围租地种菜、租田种水稻,有了奔头,人也变得勤快了,精神面貌也好了。村民们租的水田种的都是双季稻,有的村民还养了成群的鸡鸭,也有的到建筑公司等单位打工。原来的山村居民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东山村居民目前的要求更高了:认为村里的简易公路不好,要改建;村民用水不方便,应当安装自来水;村里的排污水要解决……等等。这些要求是那些未搬迁的畲族村居

民从未考虑过的,是重大的进步。具有了新观念的畲族村居民,也具有更大的发展经济的潜力。

(五)福建省的经济实力使加快畲族乡村经济的发展成为可能。福建省是我国东南部沿海发达地区省份,改革开放的程度较高,经济实力较强。因此,福建省对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力度,是我国许多内陆省区所不及的。例如在很短的时间内集中力量解决偏僻山区农村的通路、通电、通电话问题,向每户无电视机的农户提供 100 元补贴让其购买电视机,乡财政年收入不足 50 万元的一次性补贴 50 万元,村财政年收入不足 3 万元的一次性补贴 3 万元,实施大规模地搬迁移民的“造福工程”……等等,如此强的扶持力度是我国其它少数民族地区难以想像的。福建省的畲族只有 30 多万人,对于我国的一个经济强省来说,扶持其发展应当不成问题。

此外,福建省制定的发展规划对畲族乡村经济的发展也是有利的。福建省委和省政府在制定的“九五”计划和 2010 年的发展规划中,以求实的态度,面对新的市场环境,分析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展规划中所确立的支柱产业,根据福建省山多及海域辽阔的特征,提出大念“山海经”,把发展“林”“海”产业列为全省支柱产业的组成部分,避免了与其它省、市、自治区产业雷同(如十几个省都将汽车、化工、机械列为支柱产业)而可能造成的过度竞争。福安市就像是福建省的一个缩影,同样是山多靠海,将“林”“海”作为全省的支柱产业符合福安市的实际情况,其中将林业作为全省的支柱产业更是有利于带动畲族乡村山地资源的综合开发。

以上的分析表明,无论是畲族乡村的内部条件还是外部环境,都支持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就是说,畲族乡村经济的发展正在酝酿着向上突破。

三、迈向 21 世纪的畲族乡村经济

畲族乡村目前形成的“种田吃饭、打工挣钱”格局,是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由于土地与人力资源的矛盾,以及农业生产季节性这两个基本矛盾的长期存在,目前这种“种田吃饭、打工挣钱”的基本格局仍将延续下去。实际上,在我国的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例如闽南地区、珠江三角洲、苏南和浙江的一些农村,我们也能在其经济结构中发现这种模式的影子。但其根本的区别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建立的是一种优质高效农业,农业的技术含量较高,只需很少劳动力就能实现原来需要很多人才才能完成的农业产出;发达的乡镇企业不仅能完全吸纳本地乡村的离土农民,而且还吸纳了全国各地的打工者;第二、三产业比较发达,农业只占其经济收入的很少部分。然而,受地理环境、劳动力素质等条件的约束,畲族乡村向这种模式过渡的可能性极小,甚至是不可能。但是,经过畲族乡村居民的自身努力和各级政府的扶持,充分发挥各种潜力和各方面的积极性,是能够将“种田吃饭、打工挣钱”模式提升为“种田除了吃饭也能挣钱、打工能挣更多的钱”这么一种新模式的。

建立以上的新模式,可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改变农业的生产方式,实行农业(大农业)的精耕细作。畲族乡村目前所形成的经济模式,是以粗放的农业耕作为基础的,因此,改变粗放的耕作方式是充分发挥其资源潜力的基础,也是畲族乡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农业的精耕细作,畲族乡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成为一句空话。

实际上,福安畲族乡村中个别比较富裕的畲族村和一些比较富裕的畲族农户,也基本上都是由于其实行了较精细的农业耕作。例如穆云畲族乡畲族聚居的溪塔村,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并不特

别好,只是村民的耕作比其它畲族村精细得多,该村凡是能利用的地方都精心地种上了各种作物或果树,就连小溪两岸的乱石滩都精心地种上了葡萄,并且在小溪的上空搭起支架,让葡萄藤在小溪的上空爬,可谓是充分利用土地和充分利用土地空间的创举。能做到如此精耕细作的畲族农民没有不富裕的道理。溪塔村居民也因规模化地发展水蜜桃等水果生产而成为福安市最富裕的畲族村之一。依靠农业能过上比较好的生活,外出打工者也就自然减少,溪塔村也因此是福安市外出打工者最少的畲族村之一。

在一些畲族村,比较富裕的居民虽然很少,但大体上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技术或者是家庭中有人在建筑公司当工头或老板的人家;另一类就是能够充分利用土地、耕作比较精细的居民。坂中畲族乡和安村的一户钟姓农家,是全村极少的依靠种植和养殖业过得比较殷实的人家,这户居民所做的只是养了5头猪,比本村一般居民家庭多了一倍;每年收割完水稻后就翻地种菜,然后将蔬菜挑到城里卖,而村里其他几十户居民承包的水田基本上都是空闲的。收入差别也就由此产生。

从上述的个别例子来看,畲族乡村的农业是能够实现精耕细作的。

(二)加强科技推广和普及,推进农业的产业化。近几年来,福安市在推进农业产业化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初步形成了粮食、茶叶、绿竹、水果、水产、食用菌等几大主导产业,建成了五大粮食高产区和八大高优农业综合开发区,其中赛江两岸万亩巨峰葡萄、百里绿竹长廊、穆阳水蜜桃、潭头芙蓉李等均闻名遐迩,有20多种农副产品的产量已居全省前列。畲族乡村因地制宜进行农业综合开发亦已列入发展规划:沿海畲族村广泛种植晚熟荔枝、龙眼等名优水果,重点发展海水滩涂养殖业;山区突出发展茶叶,尤其是明前茶和高档优质茶叶;毗邻城区集镇的畲族村主要发展蔬菜;沿溪、沿河、沿路的畲族村大面积种植绿竹,从而初步形成“一村一品”或

“一村多品”的畬族乡村经济发展格局。

但是,做好农业产业化发展规划仅是走出了第一步。农业产业化所包含的种、养、加工、储运和销售服务等一系列过程,其中最基本的就是生产的规模化。没有生产的规模化,农业的产业化也就无从谈起。生产的规模化不是分散的农户简单生产量的叠加,而是注入科技因素后由于效益提高所引起的量的扩大,是农业科技进步形成的生产规模化。实际上,在整个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科学技术以及科技服务都将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福建省及福安市成功地推广食用菌技术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向广大农民推广食用菌种植技术实际上就是一个科技推广的过程,伴随着这个过程的是菌种的生产(向农户提供菌种)、向农户提供技术帮助的咨询服务体系,以及食用菌加工企业的建立等,很快地形成了食用菌生产的产业化。这项从无到有的产业使福建省很快就成为全国最大的食用菌生产基地之一,而食用菌生产亦成为福安市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其生产遍布全市所有农村,成为福安市重要的农业产业之一。因此,无论是畬族乡村农业的精耕细作还是推进农业的产业化,都应当从加强农业科技推广应用和加强科普宣传工作入手。据我们的调查,这些工作目前也是畬族乡村最薄弱的。在面向 21 世纪的时候,在畬族乡村建立和健全农业科技推广网络是十分必要也是非常迫切的。

(三)建立劳务输出的中介服务机构,为畬族乡村青年开展技术培训。应当认识到,外出打工者的大量出现是畬族乡村经济发展到目前阶段的客观反映,创造条件提高打工者的收入与推进农业的产业化是促进畬族乡村经济发展的两个方面,亦即村民收入的增加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然而,目前畬族人的外出打工基本上完全处于自发状态,打工者找工作主要是依靠亲友和自己碰运气,找到工作的概率不高,既耽搁了时间又影响了收入。福安市毕竟是位于我国东南部沿海发达地区,如果政府能建立劳务输出的服

务机构,适当地组织劳务输出,这无论对增加打工者的收入还是对促进畲族乡村经济发展都是有利的。

此外,应重视为畲族乡村青年开展实用技术培训,从根本上改变打工者普遍无技术的现状。打工者无技术不仅找工作困难,而且收入也低。我们在畲族村“打工群”的调查中感受到,这些打工者都有学习一两门技术的愿望,只是苦于无处学或因为学费高而望而兴叹。因此,很有必要由各级政府出面,为畲族村青年开展一些收费较低的职业技术培训活动。劳动者从无技术到有技术,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技术,还包括了观念的变化与更新,使之成为一名全新的劳动者。这样的劳动者对推动畲族乡村经济的发展具有更大的能动性。

(四)采取政策措施,加快穆阳的城镇化进程。穆阳周边是畲族村比较集中的地区,亦是穆云畲族乡、康厝畲族乡和穆阳镇的政府所在地,其环境优美,有河流经过,交通条件便利,历史上也是福安重要的商贸集散地。为协调两乡一镇社会经济的发展,1992年,福安市设立了穆阳民族经济开发区。经过5年的发展,穆阳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设已取得了重大进展,两乡一镇的桂林、苏堤、康厝、苏板、邮亭等村的城镇化进程正在加快,这些村庄已经与穆阳镇连为一体,许多居民也从事与城镇居民同样的非农产业活动,仅桂林村的茶叶加工企业就有近30家。同时,穆阳还是我国重要的茶叶交易市场,茶叶的日交易量最多时曾达到1000多担,现今亦有二三百担。此外,近几年两乡一镇兴起的石材加工业,发展势头迅猛,特别是随着穆云畲族乡的火山气泡流纹岩资源的开发,也极有可能使穆阳成为石材加工和石材商贸中心。总之,穆阳已基本具备了形成一个城市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穆阳在未来极有可能形成约有5万人口的小城市。

然而,穆阳的行政管理目前却处于分散状况。穆阳民族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实际上就是穆阳镇政府,这就形成了同级的两乡一

镇政府同在一个地方的格局,由于各个政府均有自己的发展规划或打算,都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这就使穆阳镇的发展处于无序的分散状态。这是不利于城市化建设的。为此,很有必要在两乡一镇的政府之上再建立一级政府机构,或者扩大开发区管委会的职能,以协调穆阳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快穆阳的城镇化进程,争取在 21 世纪最初的几年把穆阳建设成一个环境优美、具有民族特色和具有较强经济辐射功能的小城市。穆阳的城市化进程对畲族乡村经济的发展无疑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总之,福安畲族乡村经济的发展具有诸多有利条件,所处的大环境也支持其进一步发展。目前,畲族乡村经济的发展水平在许多方面已优于我国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在即将跨入 21 世纪之际,畲族乡村经济也将结束徘徊而向上突破,真正地实现小康。同时,作为惟一处在我国大陆东南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畲族乡村经济的发展变化,包括其发展轨迹,也都将对我国内陆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

福安民族教育问题研究

福安是我国畬族人口最多的地区。长期以来,由于受地理、历史等因素的制约,畬族乡村一直处于贫穷落后状态,经济社会发展缓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下,经过广大畬族群众的自身努力,畬族乡村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福安市仍处于相对落后地位。追根究源,除了自然原因外,还是与民族素质密切相关。在两者的关系中,自然因素的可变性较小,因此,提高民族素质可以说是改变畬族乡村经济落后面貌的关键。而要提高民族素质,最重要的就是大力发展民族教育。

一、福安民族教育的历史与现状

在封建时代,由于统治者推行民族压迫政策,以及山区地理环境的阻隔,畬族人民没有条件接受正式的教育,而主要利用口耳相传的方式对子女进行教育,山歌、民谣、传统史诗和故事传说等成为进行初级教育和思想教化的重要教材。这种教育方式虽然对畬家子弟具有一定的启蒙作用,但无疑水平是相当低下的。民国时期,在福安县的畬族村落中也只间断性地出现过一些私塾,至于学校教育则几乎是一片空白。^①

1949年以后,在人民政府的大力扶持下,畬乡教育开始发展起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畬村经济发展速度加快,

^① 1949年10月,福安县共有各类小学近70所,但畬族聚居村还没有学校。

促进了教育的发展。1983年以来,福安县(市)党委和政府对待畲族聚居区的教育投入采取倾斜政策,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全县(市)的民族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 在民族地区实行集中办学,办好小学寄宿制,促进“四率”提高。由于畲族群众居住极为分散,畲族子女读高小难。为此,福安教育局特别致力于发展民族小学高小集中办学制。1981年,坂中乡仙岩村民族小学(1986年1月改为福安县民族实验小学)独树一帜,率先实行集中办学,成为福建省第一所寄宿制小学。此后,福安的民族寄宿制小学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到1996年,全市已有23所民族完小推行了高小民族生寄宿制,有1360名民族高小学生寄宿就读。由于实行了集中办学制,较好地解决了畲族子女读高小难的问题,促进了畲族学生“四率”(入学率、巩固率、毕业率、升学率)的提高。1980年,福安县畲族学龄儿童入学率仅为70%;毕业率更低,1976年小学一年级畲族学生1634人,而1981年五年级时只剩353人,毕业率仅21.6%。^①如今,畲族地区儿童入学率明显提高,“四率”与汉族地区基本接近。据1996年统计,全市少数民族学龄儿童6196人,已入学6153人,入学率达99.3%;全市少数民族小学毕业生636人,升初中618人,升学率达到97.2%,与1985年400余名畲族小学毕业生无法升入初中的情形相比有了极大的改观。

(二) 紧抓复式教学的管理和研究工作,提高民族教育质量。由于畲族村落分散,人口稀布,单人校(仅1名教师的学校)、双人校多(仅两名教师的学校),复式班比例大,成为普及初等教育,提高教学质量的主要障碍。80年代以前,由于长期忽视民族复式教学工作,致使许多畲村办学一二十年,学生年年“一二一踏步”,培养不出一个高小毕业生。从1982年起,福安市教育局先后采取了

^① 引自福安市教育委员会编:《福安市教育志》第329页。

一系列有效措施,加强对复式教学的管理和研究工作。首先,福安教师进修学校将复式教学作为教育科研重点项目,建立了复式教研网络,制定了教研活动制度,加强对复式教学的理论研究,目前已完成了复式教学综合改革的第三轮研究方案。其次,市教育局协同进修学校开展市、学区、教学辅导片复式教学的三级培训,建立了市、学区、教学辅导片复式教学的管理网络,并指定复式教学由各学区分管民族教育的副校长直接负责;各学区都成立了复式教学研究组,一方面将行之有效的复式教学方法加以推广,另一方面不断地总结新鲜经验,以提高复式课堂教学效率,提高教学质量。此外,福安市还设置了穆云学区梨坪民族小学、潭头学区鹅山民族小学等8个复式班教学试点,承担起全市复式教研课题的试验任务,总结经验,为全市的复式教学树立榜样。经过长期努力,福安市的民族复式教学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1996年11月于浙江召开的国家教委复式教学研究会上,福安市的成绩得到了肯定。

(三)民族中等教育形成体系,得到长足的发展。目前,福安市畲族中等教育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普高类(完全民族中学),如宁德地区民族中学,培养的目标是为高等院校输送大批合格的人才;二是普及类(初级中学),如坂中初级中学、福安市民族职业中学初中部,主要任务是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三是职高类,如福安市民族职业中学,主要任务是培养畲族地区的产业大军;四是普通中专类,如福安农业学校畲族班、宁德地区卫生学校畲族班,主要任务是为基层培养专门的技术人员。

宁德地区民族中学创办于1958年,是福建省第一所民族中学。办学38年来,已为社会培养出1万余名初、高中毕业生,其中有1600多名学生考入各高等院校,900多名学生被各类中等专业学校录取,100多名学生后来成为硕士生,10多名成为博士生和出国留学。在宁德地区,从行政村到地委、行署一级的畲族干部

中,90%都是从该校毕业的,该校因此被誉为“培养民族人才的摇篮”。

福安市民族职业中学是福安市惟一的一所民族职业学校。该校1990年正式创办以来,专业设置以“面向农村,服务畬乡”为总体指导原则,并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调整,先后设置了农村家庭经营(包括禽畜养殖、茶叶及果树栽培)、服装制作、民用建筑、美术装潢、公关、保安、机电、财会、村干、电脑、会计、汽车驾驶、汽车修理、旅游、乡村行政管理、文秘等专业,并对畬族学生采取了降低录取分数、减收培养费、发放助学金以及进行额外辅导等优惠政策,成为培养畬族中、初级技术人员的重要基地。

此外,坂中初级中学和各中等专业学校畬族班在培养畬族人才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总体来看,近年来,福安市畬族地区的中等教育已形成了一定的体系,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比以往有了飞速的发展。1996年,全市普通中学少数民族在校生1866人,高中75人,职业高中80人;初中毕业生升高中的75人,升一类中专的24人,升职业中专的60人,少数民族高中毕业生升大专院校的35人,升学率为64.8%。中等教育的发展与畬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同步性。

(四)畬族群众的教育观念有了很大转变,办学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虽然畬族是一个重视教育的民族,但过去由于贫困,往往让子女过早地参加田间劳动或操理家务。畬族群众重男轻女的思想较为普遍,因此女童的入学率相对较低。改革开放以来,畬村居民越来越认识到知识的重要,许多畬族家庭节衣缩食也要供子女读书,办学的积极性也明显提高。如社口乡南山村的村民腾出仓库、庙宇作教室,让出自己的住房给寄宿学生当宿舍,借出家中的桌凳给学生当课桌椅,还亲自烧砖、烧瓦、抬石、运沙兴建新的校舍,表现出了很高的办学热情。

二、福安民族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福安市的民族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受畲族地区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制约,目前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与困难,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 办学经费不足,民族小学基础设施差。近几年来,由于市财政没有专门划出民族教育经费,民族教育的办学经费十分困难,因此,大多数民族小学的基础设施都很落后,改善办学条件的步伐非常缓慢。目前,部分民族小学还是土墙校舍,接近于危房;还有不少学校因缺乏校舍而借用仓库、祠堂及民房的厅堂;很多靠群众集资修建的校舍,常因资金不够,不是盖到一半就盖不下去,就是没有钱安装玻璃,遇到风天、雨天以及天气寒冷的季节,学生们几乎难以正常地学习。穆云畲族乡洋坪村的民族小学就是这种情况。该校的校舍有两层,一层为教室,二层是4名教师及其家属的宿舍。由于没钱装玻璃,教师们只好将宿舍窗户用塑料布围起来,而一层的学生教室为了采光则只好让其透风。不但如此,本是完小的洋坪小学却因教室不够无法设置五年级,而一年级也不得不与幼儿班的孩子们挤在同一间教室里上课,严重地影响了教学质量。

不仅一般民族小学的校舍条件差,就是多次被国家、省、地评为“先进集体”的福安市民族实验小学的办学条件也相当艰难。由于该校教学质量高、教师素质好,学生数量猛增,本来只能容纳百来人的学校,要解决300多名学生的住宿、吃饭问题,困难很大。尽管这几年省地市有关部门陆续拨款,扩建校舍,但由于资金有限,只好将教师的工资也暂时停发用来扩建。即便这样,目前加盖的教学楼三层只盖了半截便无钱再盖,新建的教室没有(无力)安装门窗便投放使用,给学生们的学习带来很大的不便。学生宿舍

的条件就更差了：狭窄的房间里摆满了床铺，每张单人床上要挤3个学生，冬天还好说，到了夏季，孩子们的休息实在很成问题。这种情形也同样出现在重点示范民族小学——社口镇南山民族小学中。该校也因教学质量高而导致学生爆满，又因无力兴建新的校舍，只好让学生挤在教室里住宿，一个教室要挤进60多名学生，一个床位也要睡上3个孩子，连翻身都很困难。这两所创办了几十年的学校，在教学质量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而基础设施和办学条件却仍处于全省较差的行列当中，不能不引起有关部门的深思。

（二）民族小学民办代课教师多，待遇低，流动性大。畲族村落一般都在交通闭塞的偏远山区，经济比较落后，教学和生活条件相对较差，公办教师大都不愿去，因而造成公办、民办教师比率失调。1996年，全市251所民族小学共有教师438人，其中公办教师仅158人，而民办代课教师却达280人，占民族小学教师总数的63.9%。这些民办教师大多数只相当于初中毕业的水平，有的只是小学毕业生，师范和高中毕业生极少，因此使民族小学的教学质量难以提高。民办教师的工资很低，1995年以前每月只有160多元，1995年以后才提高到300元左右，而且是通过向各户征收教育附加费来解决。虽然教育附加费摊到每户每年只有几十元钱，但这对于尚不宽裕的畲族居民来说也不是小数，而对部分贫困户来说更是难以筹措。因此教育附加费需要乡村干部花费很大的精力去征收，经常出现征收不足的情况，这就必然会影响民办教师的收入。除了收入低以外，民办代课教师的转正也成问题。很多民办教师在民族地区艰苦教学了十几年，有的取得了函授合格证书还无法转正，而且一旦有公办教师分派到学校，原来的民办代课教师就要被辞退。在上述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导致畲族村民族小学的民办代课教师更换频繁、流动性大，加剧了教师队伍的不稳定性，严重影响了民族教育的发展。

（三）畲族学生的生活补助费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畲族地

区的少数民族群众的经济收入相对较低,还有部分贫困户,有的贫困家庭要负担学生的学费已经很不容易,再要负担寄宿生的生活开支就更难了。寄宿生的伙食标准一般都很低,每顿饭只合几毛钱,有些生活特别困难的学生甚至时常饿着肚子学习。虽然福安市政府制定了一些扶持或帮助少数民族学生的优惠政策,但却未能得到很好的落实。例如,1996年,全市尚有1360多名民族高小寄宿生和900多名民族初中寄宿生(不包括地区民族中学和市职业中学民族生)没有领到助学金;宁德地区民族中学少数民族学生的生活补助费多年来一直保持26元的标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物价上涨,补助费明显偏低。福安市民族职业中学对畬族学生每月发放20元的助学金也明显过少。这个问题如不能很好解决,势必导致畬族辍学生增多,影响畬族学生的升学率和巩固率。

(四)中等专业学校畬族班数量少。目前,畬族乡村的公办小学教师、农技员、医士等专业技术人才十分缺乏,而各中等专业学校设置的畬族班却数量少、时间短。如位于坂中畬族乡的宁德地区卫生学校仅在1987年办过一届畬族班,仅招收了30名畬族学生,这与畬族山区普遍存在的缺医少药现象极不相适应。福安师范学校也只在1978年和1986年办过两届畬族师范班。畬族小学教师的培养主要靠宁德地区师范学校,而该校畬族班是面向全地区招生的,每年招50名学生,分配到福安市的名额相当有限,难以满足福安市畬族村小学对具有中等师范水平的教师的需求。

(五)民族职业教育严重滞后。目前,福安市仅有一所民族职业中学,这也是闽东地区惟一的一所民族职业中学。该校创办以来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面临的问题也不容忽视。首先是存在着严重的“三缺”现象:一是专业教师缺。该校职教部现有专职教师33人,基本上是由普通中学的教师改任,而该校开设的专业有十多个,对专业课教师的需求量很大。尤其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该校的专业设置也在不断调整,

许多教师并不具备所教课程的专业知识,这就势必影响到教学质量。二是教学设备缺。职业教育主要是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而学校的教学设备不足则使一些教学实践难以开展。如电工和电器维修专业的基本教学设备——电工试验箱,一个价值 300 多元,学校竟无力给学生配齐;文秘、财会等专业需要的电脑,学校至今只有 4 台 386 电脑,无力添置新机型。三是办学经费缺。学校经费由康厝畲族乡管理,除去教师工资,所剩无几,仅靠甚为有限的职高培养费收入维持日常开支,实在入不敷出。因缺乏资金,该校至今还没有教工宿舍,教师只好均租借民房;为进一步发展职业教育,该校计划搞农业科技试点、建立微机房、添置新的教学设备等,但都受到资金不足的困扰。“三缺”现象已严重影响了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而此种现象单靠学校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解决的,如果没有上级有关部门的有力扶持和社会资助,这种现象还将继续存在下去。

其次,民族职业中学的专业设置还存在很大缺陷。该校所开设的大多数专业都是为了解决学生个人的就业谋生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与发展畲乡经济、开发畲山资源、改变畲村贫困落后面貌的大方向不相适应。这其中的原因:一是福安市民族职业中学将“文凭”与“出路”作为其专业设置原则,并以此为定位,通过职业技能培训使畲族学生获得脱离乡土、脱离农村生活的资格与途径,忽略了为民族地区保留人才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二是畲族农村的普通农民家庭和学生本人在选择专业时普遍选择那些诸如财会、文秘、公关、旅游等与城镇生活更为接近的专业,以求摆脱贫困的农村生活,走出畲山、跳出农门;三是福安民族职业中学的畲族学生只占学生总人数的 36%,招生范围覆盖市辖的所有乡镇,部分专业还面向宁德地区招生,其人才培养计划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为汉族与城镇服务,因此在专业设置上也很容易向非农业化倾斜。

三、福安民族教育的发展方向与对策

众所周知,一个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该地区的人口素质、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福安畲族乡村社会经济之所以发展滞后,从客观上讲,是由历史原因和环境因素所造成的;从主观上讲,其根源还是文化教育落后,人口素质较低,思想观念封闭,缺乏先进科学技术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因此,在面向 21 世纪之际,要使畲族乡村摆脱落后面貌,政府必须要下大气力狠抓教育,将教育摆到优先发展的位置,提高畲族人口的素质,造就一大批畲族人才。

目前,福建省民委针对福建的主要少数民族——畲族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教育为先,科技为要,经济为重,小康为实,干部为本”的工作思路,这一思路把发展教育摆在最优先的位置,为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新契机。作为福建省畲族人口最多的福安市,应当进一步加强对民族教育工作的重视程度,从政策到经费上向畲族乡村实行倾斜,有效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针对当前畲族地区劳动者素质普遍偏低,市场经济观念淡薄,缺乏致富本领和应用先进科学技术的能力的现状,我们认为,今后福安市民族教育的发展方向应重点放在抓好九年制义务教育和民族职业教育两个方面。

首先要抓好九年制义务教育,加大民族基础教育投入。“治贫先治愚”,九年制义务教育是从根本上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程度,提高畲族人口整体素质的基础,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长远之计。市、乡镇财政应增加教育经费开支,改善民族学校的办学条件,确保中小学生的入均公用经费。在政府增加投入的同时,发动畲族群众多渠道投资集资办教育,征足、收齐教育附加费;加强对教育经费的审计,严禁克扣、截留和挪用教育经费,专款专用。在加强民族学校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政府还应划出专款,解决

1360 多名民族高小寄宿生及 900 多名民族初中寄宿生的助学金问题,保证畲族贫困家庭的子女能健康地学习和成长。

其次,要想方设法逐步解决民族小学教师缺额,公办、民办教师比例倒挂的现象,加大对公办、民办教师倒挂严重的民族小学教师的分配力度,尽快改变这些学校专任教师合格率低的问题。同时,还应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民办教师的各类培训,提高民办教师的业务水平。对那些安心工作、教龄长、取得合格证书的民办教师应及时予以转正。

第三,针对当前畲村小学普遍存在的单、双人校多的特点,应继续将复式教学作为少数民族基础教育的基本形式,加强对复式教学的管理和研究工作。复式教学与单式教学一样,都要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和统编教材的内容,按计划、有目的地完成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的任务。但是,复式教学又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在同一课堂内和同一教学时间中,要进行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年级、不同教材的教学;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有教师指导下的“直接教学活动”(简称为“动”),有小助手带领下半独立活动或由学生完全独立活动的“自动作业”(简称为“静”);“动”与“静”要按一定的先后顺序,既有节奏地互相交替,又严密地互相制约,组成具有整体性、层次性、条理性的课堂教学结构。这些特殊性表现在复式课堂教学过程中,即具有教学头绪多,教师要妥为梳理;教学方式变化多,教师要灵活掌握运用;学生独立活动多,教师要善于安排;直接教学时间少,教师要面面指导等特点。因此,复式教学往往比单式教学的难度更大,容易造成学生注意力分散,学习质量下降等不利影响。这就需要不断加强对复式教学的研究和改革,增强复式班教师的素质,稳定复式教师队伍,使复式教学的教学质量得以提高。只有紧抓民族复式教学的管理不放,才能为畲族乡村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打好基础。

此外,目前福安市的普通民族中学只有宁德地区民族中学 1

所,而该校是面向整个宁德地区招生的,每年给福安市的招生名额只有 100 名,远远不能满足广大畲族学生的升学需求。如果将距离城关较近的位于坂中畲族乡的坂中中学改办为市民族中学,这样就可以为福安市更多的畲族学生提供更好的升学机会,使他们能受到质量较高的普及教育。

在抓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福安民族教育的另一个重点是发展回报率较快的职业技术教育及专业培训。应当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1. 加强宣传教育,使扶持和发展畲族乡村职业教育成为社会共识。同时还应加强畲族群众的商品意识、市场经济、科技兴农等方面的宣传教育,使之认识到畲族乡村要在经济上彻底翻身,不能寄希望于几个畲家子弟“逃出畲山、跳出农门”上,更重要的是使众多的畲族子弟接受职业教育,掌握开发畲山资源的实际本领,提高民族的整体素质。学校也应对畲族学生加强爱国爱乡的教育,鼓励畲族学生报考职业中学或毕业后接受农业技术培训,用自己所学的科技知识为改变家乡面貌作出贡献。

2. 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应切实帮助民族职业中学克服专业教师缺、教学设备缺、办学经费缺的“三缺”困难,解决好畲族学生的助学金问题,使学校教师能够教得放心,学生能够学得安心。

在专业设置上,民族职业中学应向农技类专业倾斜。增设一些以脱贫致富为主要目的的农技类专业,适当降低录取分数和收费标准,与其它专业拉开距离以吸引畲族农村学生报考这些专业。学校还可以增设农技类专业的速成班,举办农村实用技术讲座,使无法继续升学的畲族青年以及希望掌握新的农业科技知识的畲乡农民能够得到更多的培训机会。此外,由于学生毕业后的发展不易预测,难于确定哪项专业技能一定用得上,也难于确定临时又急需某个生产技能,因此学校应多设置一些系列选修课程,增强对学生一专多能的培养。

3. 在巩固和发展现有民族职业教育阵地的基础上,多渠道、多方位地开展民族职业教育工作。一些初级中学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设置一些有助于当地农村脱贫致富的实用技术性课程,开足开足劳动技能课,培养学生的劳动兴趣和基本的劳动技能,使学生初中毕业后乐于报考职业中学,接受职业教育。宁德地区民族中学等完全中学还可举办一年制民族职业班,以高考落选的畲村考生为主要教学对象,开设当前农村紧缺的专业,为学生回乡参加建设创造条件。各乡镇、行政村的文化技术学校也应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吸收经济能人、科技能手参与教学,加大科技知识培训的力度,特别应将初中毕业后失学的回乡青年列为重点教学对象,帮助他们迅速熟悉社会 and 家乡的需求,掌握一定的农业技能和实用科技知识。

第四,中等专业学校畲族班不但要增加数量,而且还要根据畲族山区的具体情况,扩大招生学校、招生规模和招生专业。不但要设立普通班、预科班,还应增设成人班和函授班,以适应畲族乡村对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

福安畬族迁移与畬族社区发展

福安是全国畬族人口分布最集中的地域。根据 1990 年的第四次人口普查,福安市有畬族人口 5.8 万,占全市总人口的 11.04%,占全国畬族人口的 9.7%。畬族在福安遍布各乡镇(街道),呈“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

由于历史原因,福安畬族多属山地聚落,大多居于低山、丘陵和山麓。在福安,畬族人口占 60% 以上的畬族村委会有 78 个,占全市村委会总数的 18%,纯畬族自然村有 721 个,占全市自然村的 34.2%。依据吴文藻先生的界定,“社区即指一地人民的实际生活而言,至少包括下列三个要素:(一)人民;(二)人民所居处的地域;(三)人民生活的方式,或是文化。”^①从这个定义出发,我们可以把福安畬族群众生产、生活的地域及其特有的语言、文化环境视为畬族社区。

历史上,福安畬族社区是在畬族人民频繁迁移的过程中形成的。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历史上福安畬族人口迁移的特点,也由此形成了福安畬族社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生活贫困的特点。本世纪 50 年代以来,福安畬族社区共发生了三次规模较大的畬族人口迁移活动,并且人口迁移的方式与方向都与历史上的畬族迁移截然不同。这三次人口迁移是福安畬族社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 90 年代以来开展的“造福工程”搬迁,不仅为贫困地区畬族群众脱贫致富提供了可行途径,而且对

^① 王同惠、费孝通著:《花蓝瑶社会组织》,“导言”,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逐步缩小畬族社区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具有重要意义。探讨福安畬族人口迁移与社区发展的关系,对于准确把握畬族社区发展现状与趋势具有实际意义。

一、福安畬族迁移的历史及特点

据谱牒记载,福安畬族祖籍广东潮洲凤凰山麓,迁入福安始于唐代。虽然自唐五代时就有畬族迁入福安,但畬族大量迁入福安是从明代开始的。由于迁徙频繁,至清代,畬族已广泛分布于福安全境。当今福安最有影响的“大林钟”、“后门坪雷”和“溪塔蓝”三大姓分别是于景泰年间(1450年~1457年)、成化二年(1466年)和万历十六年(1588年)迁入的。

大林钟氏畬族先祖法广公祖籍广东,于明景泰年间(1450年~1457年)由金溪玉林迁福安西门外五都眠山岗。明正德年间,其曾孙钟熙公的5个儿子分徙各处。长子聪公于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迁大林,次子明公于正德十一年迁山头庄,三子朝公于正德七年迁白石,四子听公于正德十年迁大留,五子乐公于正德九年迁侯官汤岭。大林钟氏祠堂为福宁府钟氏祖祠,钟熙公被尊为钟熙侯王而成为大林村土主。

大林钟姓一支及其后人迁移路线:

聪公于正德十一年迁大林——>上广、横溪林前——>濂头、廉岭、凤翔(凤洋)、过洋里(过洋)、下奥——>竹园兜、金斗量(金斗洋)、仙岭洋(仙岩)、翁山、长坑、叠石、仙岭头——>松罗东兴垵、桦岭、大镇——>桦墘、林洋、桥座头高岭、叠石深水湾、横溪高溪——>牛楼、桔垄、箬篱壑、牛池岗、鸡角岩下、清路头、象地、溪尾马山——>白沙南坑、福安城内龙山头、江竹林下墘白岩鼻、下瓠山。^①

^① 参阅《福安畬族志》第6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福安雷姓中人口最多的是“后门坪雷”。此雷姓先祖谱名两公字孔文行千天三,祖籍广东潮州普宁,于明成化二年(1466年)自福州方向迁入福安十都官湖,以后,又迁十一都陈家林,复迁十八都大丘田。其后,旗公讳方雨行千乐一迁五都赤墘,其子6人分徙各处,长子君文迁十八都牛石坂(吴石坂),次子君章迁三十六都金飘带(金腰带),三子君赐于明正德二年(1507年)迁四都后楼,四子君爵迁五都南坪,五子君达迁二三都明岭(林岭),六子君生迁三十一都刘坑坪。福安雷姓畚族多由此衍发而成。

后门坪雷姓一支及其后人迁移路线:

六子君生→刘坑坪→五斗(月斗)、燕迹、百林坑、坑坪、东山、桐湾王家林、井口、六都林下、纸坪、江洋洞门宅(后门坪)、十八都茶园、仙岭洋→沃里、王家洋、七蒲坑、化蛟茶洋、岔头、竹园兜、林洋湖、桦坪、坑下楼、险坑、赛岐金蟹、鸡角岩下、大林、横路、后潦^①。

福安蓝姓中人口最多的一支“溪塔蓝”开基始祖学礼公祖籍广东潮州海阳县山头甲,其先祖迁浙江太顺龟头长坝头后迁居寿宁。学礼公生7子,时号七雄。其次子恒麟、七子恒彪两支子孙多迁居福安,也成为福安蓝姓畚族的主要衍发派系。

学礼七子恒彪派系迁徙图:

寿宁(恒彪)

↓

寿宁下溪洋后坑

↓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

福安溪塔

福安上沃

↓

洋坪高山 长洋坑 上沃 桃乾洋 下林 半山 林前王墓

^① 参阅《福安畚族志》第8~9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大坪 山后垄 坑里坑 坑里 章坑 长坑 九都南山 长坪
化蚊满洋 后坑濑头 秦坎 燕窝 溪北岩头 张坑



和庵(和安) 金斗量(金斗洋) 铁场 岭岗 考河半岭 七蒲登
科 外山 溪兜 洋中 城内上杭 井墩 险坑 东瓜坪
鲤鱼背 溪北马山 留洋施坑 甘棠仙交迹 茶洋 瓜溪何林
柯岔山 周坑里 渡头漳后 仙岭岔 井墩 塔仔^①

福安畬族主要由钟、雷、蓝、吴、杨五姓构成。以上所述仅为其中人口数较多的“大林钟”、“后门坪雷”和“溪塔蓝”其中各一支的人口迁移路线。在福安,钟、雷、蓝三姓及吴、杨两姓还各有其他若干支派和各自曲折的迁移路线,我们在此不再赘述。仅以上所述,我们已可看出历史上,福安畬族人口的迁移具有三个显著特点:

首先,福安畬族人口的迁移多以家庭或家族为主体单位。每迁一处,则以家庭或家族小规模聚居的方式居住下来。除在平原畬村逐渐发展起一些集聚型畬族村落外,在山区畬村,畬家聚落的离散性特点十分突出。在山间,最常见的是零星分布的散漫型住宅点,文化地理学称之为“散村”,当地俗称“单座楼”或“几栋厝”。正如清道光《建阳县志》所言,畬家“所居在丛菁邃谷,或三、四里或七、八里始见一舍,无比屋而居者。”^②如居住于社口桐湾一带的吴、雷、钟姓畬族村,聚落分散,有“桐湾三十六村”之称。

其次,历史上福安畬族人口的迁移十分频繁。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明、清畬族大量迁入福安时,福安大部分土地已被汉族所开垦和占有。当时汉族统治阶级准许畬民在“庶田之外一丈三尺地方开荒耕种”,所开土地,叫做“畬田”。由于荒地有限,加之开出的田地不断被汉族地主以各种名义剥削和蚕食,有限的土地难以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因此,每隔一两代人,宗族(家族)中就必须

① 参阅《福安畬族志》第9~11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② 江远清、江远涵:《建阳县志》卷二,《舆地志·附畬民风俗》。

有一支或几支迁往他乡辟地谋生。

再者,畬族的迁徙多为由平原地区、中心地区向偏远的山地、角落地带迁移。畬族最早迁入福安时,或经水路或经陆路,多落脚在平原及交通便利的地区,以开垦汉族田地周边的荒地维生。据了解,历史上,福安畬族聚居地附近的土地,原为畬族人民辛勤劳动开辟出来,后因交不起租税而丧失土地、或因高利贷剥削而丧失土地的现象比比皆是。有因家人生病或遇荒年而出卖土地的;也有因汉族地主控制水源,逼得畬族农民出卖土地的;还有因地主依靠封建官僚势力,大肆霸占畬族土地的。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失去土地的畬族农户或者沦为汉族地主的佃户,或者迁往丘陵和山地等偏远地区去拓荒以寻求新的资源和生存环境。那些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以致汉族地主尚未开发或汉族地主势力不大的边缘、角落地带经过畬族农户的辛勤耕作,逐渐发展形成新的畬族聚居地区。到清代,畬族已广布于福安全境。清光绪十年(1884年)版《福安县志》刊“各都畬民村居”180余个。^①那个时候,已基本形成了福安畬族人口与汉族人口大杂居、小聚居,畬族多属山地聚落,大多居于低山、丘陵和山麓这样一个分布格局。

总之,福安畬族社区就是在畬族人民为躲避征剿、战乱、剥夺和侵害而不断迁徙开拓,通过辛勤劳动寻求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畬族社区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明代畬村被摒于里图榆枋之外,官方租庸不及,清乾隆年间“编图隶籍”、“编甲完粮”的政治经济政策逐渐实行于畬族社区。民国时期,畬族日益贫困,土地多被兼并,畬民主要耕种汉族地主土地,受地主阶级剥削,终年不得温饱。从历史的角度看,福安畬族社区的形成和发展深受当时不平等的社会制度的影响,在封建土地兼并制度的吞食和汉族强势群体的压迫下,畬族人民被迫向边远山区迁移。由于汉

^① 参阅《福安畬族志》第1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族地主的剥削和压榨以及频繁的迁移活动,导致畬族人民难以积累起土地和财富,长期以极度贫穷的方式维持着基本的生活。1951年,福安县土地改革调查表明:全县畬族 8122 户中,仅有地主 7 户,占 0.08%;富农 25 户,占 0.31%;富裕中农、中农 774 户,占 9.53%;贫雇农 7316 户,占 90.08%。而同期福安县共有地主 2045 户,占农村总户数的 2.93%;富农 944 户,占 1.35%;中农 16,766 户,占 24.01%;贫雇农 45,237 户,占 64.79%,而且汉族的社会结构也更为复杂,已有手工业者、小商贩、债利生活者、工商业者等阶层。与汉族相比较,畬族的社会结构比较简单,同时畬族社区的极端贫困问题已经十分突出。因此,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生活贫困成为福安畬族社区的普遍特点,这也正是 1949 年以后福安畬族社区发展所要解决的难题。

二、50 年代的畬村迁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福安畬族社区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革。1952 年,福安县完成了土地改革,全县 10 区、106 乡、610 村畬族农民共 8711 户、28,258 人分得可耕地 47,796.34 亩,每人平均 1.69 亩;非耕地 8706.37 亩,每人平均 0.31 亩。土地改革后畬民成了土地的真正支配者,人民政府也赋予畬民移盖新居的权利,由此掀起了 50 年代畬村搬建新居的高潮。

在这次搬建新居的过程中,人民政府对畬村搬迁给予了政策优惠和经济扶持。政府的主要扶持对象是畬族老区基点村。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竹洲山畬族山区是闽东苏维埃政权与红军的重要根据地,畬族人民为革命事业作出过卓越的贡献,畬村因此也多次受到国民党军队的扫荡和破坏,畬族民居多被烧毁,畬民居无定所。50 年代初,人民政府在为畬族老区人民重建家园时,在村址的选择、资金的筹措、生产生活的安顿上都作了精心的考虑。政府

曾为老区畲村居民是否愿意搬迁到平原地区或大村去而进行调查。但当时多数畲民都选择了留在山区。直到我们这次调查时,50年代未搬迁的畲民的后人谈起这次搬迁时还说,当初父辈们认为已经分得了自己的土地,政府又可以帮助盖新房,住在山里,生活自给自足,不再受欺压已经十分满意了。但是从现在的生活和发展来看,如果当初父辈们选择搬迁到平原或大村去会生活得更好。

由于畲民在土改中分到了比较集中的土地,因此大多数畲族农户选择了在靠近田地的地方居住或建房,只有少数深山畲村和畲族农户迁入平原或大村。穆云乡洋坪村就是50年代的新建畲村。该村的钟姓由甘棠山头庄迁入,雷姓和蓝姓分别由康厝红坪和社口谢岭下迁入。村舍依开阔地密集而建,交通比较便利。50年代,福安畲族社区共兴建了10个洋坪村这样的畲族新村,用以安置从山区或小村迁入平原或大村的畲族农户。总体而言,50年代畲民迁移的规模不是很大。

三、80年代的畲村迁移

80年代,福安畲族山区聚落中山体滑坡危及村庄民居的现象多次发生。经过调查发现,山体崩塌和滑坡是由于畲族山区有些区域山坡陡峭,加上人为开挖破坏天然边坡和植被,一遇暴雨往往造成山体崩塌和滑坡。这种区域不宜居民从事农业生产。调查认为“不宜根治,急待全村搬迁”的有康厝畲族乡东山畲村,穆云畲族乡牛池岗畲村等。人民政府十分重视自然灾害区域的畲村搬迁工作,80年代,福安畲族社区共搬迁兴建畲族新村21个,搬迁重点是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急待搬迁的畲村。

1987年,东山畲族村有96户、370人,其中畲族79户、310人。1987年发现该村后门山出现裂缝、有滑坡险情后,政府有关

部门十分重视,开始有组织地对该村进行搬迁。当年,省民政厅拨款 5 万元,地区民委拨款 1 万元资助村民搬迁,户均可得 625 元,人均 163 元。康厝畲族乡政府于东山村山下蛤蟆洋边协调建房用地 24.5 亩,乡土地管理所进行统一规划,平整房屋地基,至 1992 年止,共搬迁了 90 户、380 人至石碑洋新村。新的村落仍称“东山村”。

搬迁前,东山畲族村是一个典型的贫困村。全村有山地面积 700 亩,耕地面积 340 亩,其中水田 290 亩,农地 50 亩。村落参差不齐地挂在半山壁上,交通闭塞,村庄通往康厝、穆阳集镇的道路,除终点段 1.5 公里是狭窄的机耕路外,其余全是崎岖的山间小路。绝大部分田地离村而下,最底部的田地已落到了石碑洋处,离村约 5 公里,且多是“眉毛丘”状的小块梯田。全村每年农业生产用肥 400 余担,得从康厝乡所在地沿崎岖的山间小路向上挑至家中,待下肥时,又要从家里往下挑到田地。村民平时干活同样要从山上下来,打下的粮食要一担一担往上挑,加重了劳动负担。恶劣的生产条件使东山畲族村长期以来无法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全村的基础设施极差,建在半山腰的房屋有 90% 是低矮破旧的木房,人畜混居、阴暗潮湿、苍蝇成群。村中无自来水、无广播、无电话,由于电压低,照明电力也不足。村中贫困户多,仅有 96 户人的村子就有 39 户是贫困户,贫困面达 40%。1988 年,全村人均纯收入 270 元,比全市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475 元)低 205 元,人均口粮 350 斤,全村三分之一的农户每到三四月份就开始缺粮,40% 的群众常年以吃番薯饭为主,50% 的群众常年油、盐、酱、醋等项日常开支依赖于挑柴片卖。全村 35 岁以上未娶到媳妇的有 19 人,占该年龄段男子的 24%,有 16 户人家因担心孩子将来婚姻成问题而抱了童养媳。学生辍学现象比较严重。村中的初小只有两名教师,教四个年级共 50 来个学生,上完四年级的孩子升学后或因学校路途遥远或负担不起学费等种种原因而辍学的占 30%。

搬迁后的东山畲族村逐步富裕起来,面貌为之一新。由于新村地势平坦,海拔低,离康厝、穆阳集镇只有2公里,并且修通了机耕路,村民往来集镇打工或买卖商品十分方便。因此村民的生产经营范围也不再局限于山沟沟里,不再受交通不便的困扰,可以积极参与到市场中去。搬迁后,村里涌现出钟进金、缪其生等10多户新村脱贫致富的带头人。由有一定建筑技术的缪其生牵头,组建了一支建筑拌泥队,年转移剩余劳动力3000个工日,创收9万元;钟进金等9人利用邻近穆阳集镇、茶叶市场旺盛的优势,在村里创办了三家茶叶精制厂,年收入3万多元。根据市场需要,村民还大力发展了蘑菇种植、仔猪养殖等多种经营。在粮食种植方面,东山新村的畲族农户不但种好自己原有的田地,而且利用搬迁到山下的地理优势,租种邻近邮亭、桂林等商品经济较发达村庄的田地,使粮食总产成倍增长。1993年,全村粮食总产扣除征购后达2700担,人均口粮700斤,比搬迁前的1988年增长了1倍。1993年,全村总收入达40.3万元,人均1060元,比1988年增长790元,增长了293%,比全市农民人均收入(980元)高8.16%。

收入多了,村民的消费水平也随之提高。1993年,东山新村人均消费840元,自行车、电视机、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也进入了农民家庭。按规划建设的东西村房屋排列整齐,搬进新村的居民也变得整洁起来,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家具摆放得整整齐齐。拥有一座两层楼的东山村完全小学校也已落成,小学生的升学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短短五年的时间,东山畲族村不仅完成了村庄的搬迁,而且使一个贫困村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不仅东山畲族村如此,80年代从山区搬迁到平原,从小村搬迁到大村的搬迁畲村普遍表现出这一特点。搬迁后,群众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发展速度普遍高于未搬迁的邻村。

尽管80年代的畲村搬迁大多是为了避免自然灾害,而不是以

解决贫困问题为出发点,但客观上搬迁畲村却取得了脱贫致富的良好效果,从而为贫困山区畲村的脱贫摸索出一条可行之路。

四、畲族社区的贫困问题

1949年以前,福安畲族普遍处于贫困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畲族社区和全市其它农村一样,历经曲折和艰难,取得了稳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畲族村多种经营的发展,部分畲村迅速走上了富裕之路。但由于种种原因,也还有相当一部分畲村依然处于贫困之中。

(一)畲村发展的差异。福安畲族社区存在着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现象。1996年,穆云畲族乡各畲族村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约在800元至3000元之间,差异很大。

虎头村属于穆云乡比较富裕的畲村之一。该村位于穆云乡南部的秀溪畔平原,为福安市少有的位于平原的畲族村,距乡政府驻地穆阳镇2公里,交通十分便捷。全村海拔60米,有耕地面积680亩,其中水田625亩,拥有丘陵山地面积2189亩。虎头村是穆阳水蜜桃的主产地,且种植水蜜桃的历史悠久,但在以粮为纲的年代,虎头村山上的桃园被改造为农田,村民生活贫困。改革开放以后,村民根据市场需求,不断扩大水蜜桃种植面积,家家户户都种植水蜜桃。至1996年,全村水蜜桃的种植面积已达500多亩,产量达400多吨。仅水蜜桃一项,每年就可创产值290万元,扣除化肥、农药、果树苗等各项费用,收入仍十分可观。此外,村民还根据市场需求,种植反季节蔬菜和栽培蘑菇,养猪、养鸡等家庭副业也开展得红红火火。1995年,虎头村成为第一批通过福安市小康验收的畲族村,村中有96%的农户过上了小康生活。当年与虎头村一起成为首批小康达标村的畲族村共有16个,占福安畲族行政村的21%。

洋坪村属于穆云乡生活水平中等的畲村。该村为 50 年代新建的搬迁畲村,位于穆云乡南部,村舍距乡政府驻地穆阳镇 4 公里,有机耕路并接小浦公路直抵村口,交通比较便利。全村有耕地面积 730 亩,其中水田 680 亩,山地面积 1469 亩。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农业生产结构单一,只重视粮食生产,而洋坪村是搬迁畲村,土地条件较差,粮食生产不能满足居民的需求,生活比较贫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搬迁畲村的优势逐渐体现出来。由于距离穆阳镇比较近,交通便利,因此村民可以根据市场需要,灵活调整农作物的种植结构,以取得最大收益。根据城镇市场对蔬菜需求的增长,洋坪村把蔬菜作为主要的经济作物,村民通过种菜、卖菜迅速提高了家庭经济收入。同时,村民还租种邻近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苏堤村的土地种植粮食和蔬菜,既弥补了本村耕地不足的缺陷,也获得了较好的收益。此外,便利的交通条件也使全村的剩余劳动力有了到集镇市场打工的机会。1996 年,洋坪村共有 149 户、673 人,大部分农户均为兼业农户。村民有的利用农闲外出打工,有的则全年在外省市做工。目前,外出打工和种植蔬菜已成为洋坪村居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1996 年,全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1600 元。村中还有 13 户为贫困户。处于洋坪村这种发展水平的畲村大约占福安畲村的 40% 左右。

竹洲山畲族村为穆云畲族乡经济比较落后的行政村。该村位于穆云乡西部白云山支脉竹洲山中,并因此而得名。竹洲山行政村共包括石厝下、平中山、曲坑、三湾、十二泡、下竹洲、上竹洲七个畲村,这七个畲村散布于竹洲山中,共有耕地 367 亩,其中水田 182 亩,山场面积 500 亩。竹洲山村位于山区却没有多少山场面积,主要是因为国营蟾溪林场创办时划走了原本属于竹洲山的林地,由此导致全村山林资源匮乏,村民靠山却无法吃山,完全依靠有限的耕地从事农业生产。山区的水田以山垄田、梯田为主,小块而分散,村民为种地常需上下走十多里山路,对人力的耗费很大。

农业灌溉主要依靠自然降水和山涧、山泉水,由于山区的水温和土温较低,土壤以沙质为主,有机质含量较低,因此稻作只能一年一熟,亩产远远低于平原地区。年景好的时候,每亩水田能产500斤稻谷,农户的口粮还能有保障;若收成不好,亩产只有200斤~300斤,农户就必须依靠番薯当主食;若遇天灾,如1997年夏季13号台风过后,三湾村6户人家颗粒无收,生活立即陷入极端贫困状态。由于自然村分散于山中,畲村孩子上学是一个难题。竹洲山行政村有一所初小设在平中山村,四个年级的学生分在两间教室里上课。上竹洲村的小孩若到平中山村上学要走5公里山路,因为危险,家长往往要等孩子长到10岁才敢放心让孩子每天爬山去上学。由于完小和中学都很远,大多数孩子初小毕业就不再升学了。这种教育状况使村民的文化素质也很低,农业科技在竹洲山村的推广困难重重,反过来又制约了全村经济的发展。竹洲山各自然村的居民生活水平也略有差别。靠近山边的石厝下自然村生活水平最高,1996年人均收入900多元,靠近山里的三湾、十二泡、上竹洲、下竹洲的人均收入只有500元~600元。

(二)畲村发展差异的成因。富裕畲村的农业生产经营与贫困畲村的农业生产经营都是依据其自身所具有的自然地理条件开展的。富裕畲村农户的生产方式与劳动力安排与贫困畲村的生产方式与劳动力安排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由于前者处于比较有利的地理环境,如土地肥沃、地处平原、交通便利、靠近城镇集贸市场、信息灵通,使得富裕畲村农户的视野较为开阔,能够及时地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生产方式,合理地安排劳动力以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而贫困畲村的农户被恶劣的自然环境、生产条件所束缚,落入了“粮食自给合理陷阱”。^①所谓粮食自给合理陷阱是指因为山区交通运输困难,比较闭塞,从而导致山区居民往往追求粮食自

^① 参见王文长:《云南澜沧江流域多民族经济发展构想》,载《民族研究》1993年第5期。

给;而山区种粮劳动时间长,劳动力投入大,相应经营粗放,广种薄收,为了达到粮食自给,必须广开粮地,从而使劳动力难以转移到其它生产项目上;这样一来,山区居民经济收入少,购粮难,又必须追求粮食自给。由此形成了一个山区粮食生产的困境,极大地束缚了山区居民的劳动生产力。而搬迁畲村的优势恰恰在于摆脱了恶劣生存环境对生产力的束缚。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50年代和80年代的搬迁畲村由于地处平原、交通便利、靠近城镇集贸市场,增加收益的机会比山区畲村多得多,因此能够迅速发展起来。

(三)畲、汉社区发展差异的成因。80年代以来,虽然畲族社区在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与汉族地区相比,差距却越拉越大。1986年,福安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78元,畲族社区人均收入为140元,相差138元;1990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51元,畲族社区人均纯收入为480元,相差171元;1995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1863元,少数民族人均纯收入1530元,相差333元;1996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2232元,少数民族人均纯收入1800元,相差432元。由此可见,畲族社区的发展与汉族社区相比差距还很大。

总体而言,社区间发展差异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总是客观地存在着导致社区发展差异的原因。从福安市的具体情况看,畲、汉社区发展差异的形成既有自然条件的原因,也有社会条件的原因。

从自然条件看,福安汉族社区大部分处于平原地区,地势平缓,农耕条件优越。而历史上福安畲族迁移的特点决定了85%以上的畲族人口散杂居于半山区和边陲地带。畲族社区山地地形复杂,耕地质量和耕作条件都比较差,这种状况势必对其经济发展造成深刻影响。从经验上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社区,几乎都是以良好的农耕条件为基础的,而畲族社区的贫困村无一不是以地处

深山、农耕条件恶劣为背景的。自然条件的差异对社区发展差异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生态环境恶劣、交通不便的山区与交通方便、水土条件良好的平原地区相比,生产过程的投入和劳动效率相差悬殊。同样一亩水稻的单产,桂林村几乎为竹洲山村的两倍,而后者种田成本的投入明显高于前者,收益却明显少于前者。地处平原的汉族社区水稻可以一年两熟,而地处山区的畲族社区水稻只能一年一熟。这就是社区发展差异的自然基础。

从社会条件看,福安汉族社区由于地处平原,毗邻交通要道,与外界交流方便,而畲族社区由于地处边远,山高岭峻,到1997年仍有32%(25个)的畲村没有通机耕路,与外界交流困难。

社区间交通状况的差异进一步导致了市场发育的差异。一般来说,市场多形成于交通发达的地区以便于商品交换及买卖,因此福安汉族社区的市场发育比较充分,集市繁荣,商品流通规模较大,市场功能也比较完善。如穆阳镇的集贸市场、桂林村的闽东茶叶市场等,交易规模较大,辐射面广,对所在社区的社会发育、经济发展均产生了较为深广的影响。而畲族社区由于地处偏远,不仅难以发育形成市场,同时受汉族社区市场的推动和影响也较小。

与交通状况及市场发育相联系,畲、汉社区间的经济结构也存在较大差异。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达社区的经济结构一般都具有在农业稳固发展的基础上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的特点。

如表1所示,1996年,穆云乡桂林村的工业收入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89.46%,而最富裕的畲村虎头村的工业收入仅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14.58%。这正是汉族社区与畲族社区的重要差距。

穆云乡虎头村经济结构呈现的问题正是福安畲族社区在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即畲族社区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在农林牧渔业取得了较好的发展,但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严重不足,经济结构仍然偏重于农业种植业。特别是贫困畲村,基本上都属于乡

表1 桂林村与虎头村农村经济收入
结构比较(1996年) 单位 万元、%

村	种植业		林牧渔业		工业		建筑、运输、商饮服务业		合计
	收入	百分比	收入	百分比	收入	百分比	收入	百分比	
桂林(汉)	378	7.74	73	1.49	4369	89.46	64	1.31	100
虎头(畲)	121	63.02	33	17.19	28	14.58	10	5.21	100

资料来源:穆云乡统计站。

镇企业“空白”村。有些畲族村的非农业收入虽然占有一定的比重,但其收入来源主要是靠打工等劳务输出,而不是建立在当地非农产业的基础上。这在一些搬迁畲村中也表现得很突出。如洋坪村和东山村等。

由上述分析可见,社区自然环境的差异会进而导致交通、市场、经济结构、人口素质等社会发育的差异,这是造成福安畲、汉社区之间发展差异的根本原因。因此,缩小畲、汉社区的发展差距,必须从改造贫困畲村的自然环境入手。改造自然环境有两种办法:其一是通过搬迁彻底改变贫困畲村的自然环境,50年代和80年代的畲村搬迁事实证明,移民搬迁是畲村脱贫致富的一条可行之路;另一种办法是通过修路、通电、水改改善贫困畲村的基础设施。这是一项投入大、难度大、周期长的工作。

五、90年代“造福工程”搬迁与畲族社区发展

在吸取50年代和80年代畲村搬迁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福安市决定通过搬迁移居的方式实现畲族贫困村的脱贫致富。

从1994年初起,福安市就以乡镇为单位,对全市该搬、愿搬、能搬、可搬的特困村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摸底,掌握了全市需搬迁少数民族101个自然村、2271户、8717人的第一手资料,并着手对“居住在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自然条件恶劣,生存空间狭

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制约的特困畲族村”实施搬迁移居,此举在当地被称为“造福工程”。

“造福工程”将一些自身形不成市场,同时现有市场又难以辐射到的小村并入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村镇,或迁到靠近市场的地方。针对民族地区实际情况,福安市政府决定在坂中留安、城阳铁湖和湾坞半屿垦区建立少数民族“造福工程”点,使搬迁畲民集中建房居住。

从1994年至1996年,全市畲族群众共搬迁662户、3318人,整个村庄搬迁的有赛岐镇的流水坑村、下白石镇的牛楼村、溪柄镇的下可坑村、湾坞乡的乌石岗、长垅里等村。

从50年代开始,福安畲族社区共掀起了三次搬迁的浪潮,改写了历史上畲、汉不平等的社区分布,逆畲民历史上的迁移方向而动,表现出畲族迁移的新特点:其一,变历史上同姓同宗同族的小规模迁移为大规模的畲村(自然村、行政村)整体迁移;其二,变朝向边陲、角落的迁移方向为朝向平原和中心市场的迁移方向;其三,变民族压迫、不平等社会背景下的迁移为民族平等,畲、汉社区协调发展的迁移;其四,变畲族群众自发的迁移为畲民自觉的、由政府有关部门协同规划、统一布局、合理安排的迁移。实施如此大规模的畲村迁移,必将使畲族社区呈现出一个新的发展面貌。

后 记

“福安市畲族现状与发展调查”课题组组长由龙远蔚担任,成员有白滨、万红、侯红蕊。赴福安市调查的时间为1997年10月底至12月初。本书撰稿分工情况为:

龙远蔚:撰写前言,综合篇的第二、三章,典型篇第二、四、五章,专题篇中的“关于福安畲族乡村经济发展的思考”;

白滨:撰写综合篇第一章,并调查、搜集和整理了典型篇第二章第四节的大部分资料,以及典型篇第四、五章中有关教育方面的资料;

万红:撰写综合篇第四章,典型篇第一、六章和专题篇中的“福安民族教育问题研究”;

侯红蕊:撰写综合篇第五章,典型篇第一、三章和专题篇中的“福安畲族迁移与畲族社区发展”。

全书由龙远蔚统稿。

本书的图片由福安市文化局的黄俊同志提供。

在本书的修改过程中,卢勋、王承权、满都尔图和刘世哲同志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宋军同志为本书的录排以及版式设计等方面作了许多工作,特此铭记并深表感谢!

作者

1998年8月20日